

红旗

H O N G Q I

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

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一九六六年

1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

目 录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 一九六六年元旦社论 (1)

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人民日报编辑部 (4)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

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周 扬 (8)

高标准的质量，来自高标准的思想 苏 星 (27)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坐着等

..... 中共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
下丁家大队总支书记 王永幸 (30)

一个长期扎根农村的电影放映队 吉 映 (37)

把书送到农民手里 崔月仙 (41)

人类认识化学元素的过程 刘际启 (45)

☆ 一月一日出版 ☆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一九六六年元旦社论



新的一年——一九六六年开始了。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各条战线上突出政治，因而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

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①。“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②。

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加强政治工作。在各项工作中，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战胜任何困难，取得出色的成绩；凡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好的，就必然没有起色，甚至会走到邪道上去。这是在我国的实践中一再证明了真理。

如何处理政治同经济、技术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摆在什么位置，这是关系到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方针问题，路线问题。

无产阶级政治，集中反映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一切工作都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不从属于政治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列宁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③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政治统帅一切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

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相比，政治工作占第一位。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②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③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2页。



中表现。政治要统帅经济，而不是经济统帅政治。那种所谓“经济好就是政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相比，政治工作占第一位。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要统帅军事，而不是军事统帅政治。早在一九二九年著名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解决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就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他指出：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相反。那种所谓“军事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政治工作同科学技术工作相比，政治工作占第一位。政治要统帅科学技术，而不是科学技术统帅政治。那种所谓“技术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政治同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的关系，政治工作同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只能是这样摆法。

政治工作同各项业务工作当然也有矛盾。但是，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采取削弱政治工作，甚至挤掉政治工作的办法，而只能是突出政治，加强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做在业务工作的前头，贯彻到业务工作中去。这样做，就能以政治带动业务，以政治促进业务。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①。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无所谓政治。

在我国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世界上，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严重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突出政治，就要求我们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就要在各条战线上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更有力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的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就会得势，我们的事业就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②。离开了群众斗争，就无所谓政治。

现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觉悟，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掘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8页。



出来，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是做好工作的保证。工农群众說得好：“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人們的头脑，人們就心紅，眼亮，胆壮，骨头硬”；“脑子里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困难吓不倒，碰了釘子弯不了”。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武器，是最大的政治威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

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出現了英雄的大庆人，大寨人，在各个战綫上出現了許多雷鋒、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他們不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工作崗位上，都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們关心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人民的大事，国际的大事，也就是最关心政治。他們懂得自己工作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意义，能够自觉地服从总的政治任务，把各項具体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把日常的、平凡的工作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我国人民的这种精神面貌，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結果。

物质变精神，精神又可以变物质。人的精神面貌，对于任何工作都具有决定的意义。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生产上才能过得硬，技术上才能过得硬，业务上才能过得硬。不突出政治，生产、技术、业务就必然不能过硬。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思想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以后，就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政治挂帅，主张实行“物质刺激”、“利潤刺激”、“奖金刺激”，发展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列宁曾經指出：“做事就是为了拿錢，——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①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奉行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

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統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統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綫。我們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綫，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綫。

我国第三个五年計划开始了。在新的战斗年月里，只要我們繼續在各項工作中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摆在首位，使人的思想不断革命化，就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成就。

^①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會議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5頁。



苏共领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人民日报编辑部



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五周年的时候，苏共新领导发表一批文章，演出了一场反华小闹剧。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是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忠实信徒们，妄想打起宣言和声明的旗号来迷惑人，这只能使自己进一步出丑。

在宣言和声明制定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经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剧烈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原则的对立物，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混乱。中国共产党同兄弟党一起，针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莫斯科会议上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也是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当时，赫鲁晓夫完全颠倒敌我关系，公开勾结美帝国主义，并且彻底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

当然，宣言和声明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有不明确的地方，甚至有缺点和错误。当时由于苏共领导一再要求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要求对他们加以照顾，我们为了达成协议，作了一定的妥协。这一点，我们已经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批评，我们是乐于接受的。不管怎样，宣言和声明总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原则，这些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共同遵守的。

但是，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宣言也好，声明也好，都不过是废纸。文件签订之日，就是他们撕毁之时。他们一心一意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唱对台戏，同宣言和声明唱对台戏。到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他们搞了一个修正主义的苏共纲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一股脑儿地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让我们把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同苏共新领导坚持执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



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綱領所規定的路綫对照一下吧。

宣言和声明制定了革命的路綫，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却推行所謂“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路綫。他們自己不革命，也不許別人革命。他們自己反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武装斗争，也不許別人支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全世界人民必須結成最广泛的統一战綫，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却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人民，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

宣言和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却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謬論，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們在苏联实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专政，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宣言和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必須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必須实行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支持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却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分裂主义，到处揮舞指揮棒，任意干涉和力图控制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陣营。

宣言和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須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声明还明确譴責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叛徒。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却同铁托集团同流合污，打得火热，公开替这个叛徒集团翻案。他們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反对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論战，就是坚持还是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还是抛弃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一場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正是概括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在一系列涉及当代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坚持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陣地，批判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已經有了初步的但是重大的結果。苏共新领导不是很喜欢說什么“經過生活檢驗的路綫”嗎？請睜开眼睛看一看，“生活檢驗”的結果是十分清楚的。在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包括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坚决斗争之下，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已經破产，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創始人被赶出了历史舞台。这是维护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维护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斗争的伟大胜利。



苏共新领导在《真理报》的文章中说，“苏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忠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好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苏共新领导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吧。

过去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赫鲁晓夫的亲密战友。他们忠实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信仰的鼻祖，那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鼎鼎大名的赫鲁晓夫打入冷宫，只不过是因赫鲁晓夫太臭了，太笨了，混不下去了，赫鲁晓夫本人已经成为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障碍了。他们只有采取换马手法，才能维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

现在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原班人马。他们仍然忠实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他们无数次赌咒发誓，说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是他们“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他们有时装出一些反美的姿态，但是，一切政策的落脚点，仍旧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他们多次重申，“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他们一面叫喊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一面加快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他们在所谓“联合行动”的喧嚣声里，召开了三月莫斯科分裂会议，加紧进行分裂活动，并且正在策划着全面反华、全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阴谋。他们沿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将来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他们能不能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能不能回到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主要是看他们自己是否清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的修正主义总路线。只要他们不进行彻底的清算，不管他们玩弄什么花招，怎样修修补补，都仍然只能说明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就只能继续揭露他们，同他们斗争到底。

苏共新领导现在声嘶力竭地叫喊所谓“联合行动”。他们叫嚷得最多的，是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但是，正是在这个当前国际斗争焦点的问题上，集中地表现了苏共新领导反对革命的立场。他们不仅不相信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能够赢得胜利，反而生怕给他们“惹祸”，妨碍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不管他们怎样装腔作势，他们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企图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帮助美帝国主义实现“和谈”阴谋，扑灭越南人民革命的烈火。“联合行动”的口号，现在已经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手中用来进行挑拨离间的一支毒箭。他们利用这个口号，同美帝国主义互相呼应，妄想破坏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妄想破坏越南人民的反美团结。越南人民正在胜利地进行着抗美救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义务，是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的革命斗争，坚决揭露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的阴谋。

苏共新领导说，谁不同他们“联合行动”，谁就是“鼓励帝国主义者进行冒险”。这完全颠倒了黑白。难道不正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投降主义和绥靖主义政策，他们的苏美合作



主宰世界的路綫，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嗎？应当說，真正“鼓励帝国主义者进行冒险”的，并不是別人，恰恰是苏共新领导自己。

苏共新领导最害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們划清界限。但是，正如列宁所說的，“如果不同向无产階級传播資产階級影响的分子完全划清界限，并进行无情的斗争，那末，联合和巩固革命无产階級的战斗队伍这个伟大事业，就不可能实现”^①。苏共新领导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把他們自己置于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能够指望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同他們划清界限嗎？

如果我们不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那么：

我們岂不是就要跟着他們一道，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使我們自己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嗎？

我們岂不是就要跟着他們一道，投靠美帝国主义，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嗎？

我們岂不是就要跟着他們一道，破坏兄弟的越南人民的革命，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扩大战争的政策效劳嗎？

我們岂不是就要承认他們是老子党，充当他們指揮棒下的小卒，承认他們的大国特权地位，充当他們的附庸嗎？

我們岂不是就要同他們一样，在国内复辟資本主义，使广大劳动人民重新陷于被压迫和被剝削的地位嗎？

我們岂不是就要同他們一样，把自己置于同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相敌对的地位，逃不脱历史的惩罚，落得一个可悲的結局嗎？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斬釘截铁地回答：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办不到的，永远办不到的。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只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則基础上的团结，才是真正团结。苏共新领导的所謂“团结”，是假团结。他們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背弃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只能导致分裂。我們要的是真团结，坚决反对假团结。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正是为了实现国际无产階級真正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人将一如既往，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一起，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旗帜，遵循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把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世界在前进。我們坚信：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一定会不断地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原載《人民日报》1965年12月30日）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組关于党内状况的決議》。《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5頁。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
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周 扬

同志们！今天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开幕了。首先，我向大会表示祝贺。

跟过去历次的文艺会议不一样，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的一支新军。你们是从工农兵群众中来的。你们又会劳动又会创作，拿起枪来是战士，拿起笔来也是战士。你们既是生产的队伍、打仗的队伍，又是创作队伍。这么一支队伍，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出现，是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庆贺的大事。

你们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培养下，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中，成长起来的新人。你们在工厂、农村、部队的基层单位，作为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战士，开始写作活动。你们有一个明确的写作目标：为工农兵而写作，为革命而写作。你们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把工农兵的新的生活、新的斗争、新的人物，写进作品里面来。你们把创作当作一种战斗，当作一种争夺思想阵地的战斗。有一个部队的作者说得很好，他说：“一个革命战士，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当找到自己的阵地，这个阵地，不光是狼牙山的悬崖和上甘岭的坑道，而且也是我们头脑里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地。”一点不错！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建立起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地、毛泽东思想的高地，我们才能胸怀祖国，放眼全球；我们才能工作得出色，才能写出有意义的作品。

你们写的有一些作品，不论思想性、艺术性，可以说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是我们过去的文学中所少有的。当然，收获不只是在作品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由于你们在工厂、农村、部队，广泛地开展业余的群众文化工作，讲革命故事，唱新歌，演新戏，同旧的文化作斗争，为当前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使社会主义的文艺真正普及到工农兵中



問去，在那里占領陣地，这样，就使我們的文艺真正成为有广大工农兵参加的强大战綫。你們把新鮮血液、革命朝气帶到我們文艺創作里面来，帶到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里面来了。这是文艺战綫上的新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文艺路綫的胜利！

在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有进步的文艺，有反动的文艺。为帝国主义、資本主义服务的文艺是反动的、腐朽的、沒落的，是腐蝕人民思想的毒剂。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墮落成了西方资产阶級文艺的应声虫。它尽管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文艺，是变节的文艺。它誹謗革命和革命战争，誹謗无产阶级专政，宣揚资产阶級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渲染核恐怖，宣揚“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宣揚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級思想和赤裸裸的资产阶級生活方式。这种文艺已經成为帝国主义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思想顛覆、为資本主义复辟开路的工具。

我們的文艺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艺是針鋒相对的。我們的文艺是鼓舞人民不断前进、不断革命的文艺。它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用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思想，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来武装人民。像毛泽东同志所說的，它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①。

今天的世界上，有两股力量在你死我活地斗争：一股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另一股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力量；他們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在这两股力量的搏斗中，革命的力量正在汹涌前进。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正走向新的高涨。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正在发展和壮大。各国人民正在现实斗争的烈火中經受种种的考驗，愈来愈多的人們逐漸打破对于旧世界的幻想，增长了为实现一个沒有帝国主义、沒有資本主义、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的信心。在我国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一天比一天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一天比一天深入。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設的丰富經驗和巨大成就，愈来愈吸引世界人民的注意。世界革命人民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我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的指引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精神焕发，斗志昂揚地建設着和捍卫着我們伟大的祖国，同时，以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帝国主义、反动派，如果胆敢侵犯我們神圣的国土，它只会在中国人民的銅墙铁壁面前碰得粉身碎骨。我国人民一面加紧建設，一面时刻准备打击侵略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①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0页。



同志們，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大好。我們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紅旗，积极参加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实现革命化、劳动化，用文艺的武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让我们的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

这就是摆在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战斗的任务。

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和文化革命的新形势

我們的文艺要很好地担当起自己的任务，根本的保证在于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

文艺究竟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的剥削阶级服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还是以现代修正主义思想作指导？这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这个斗争，不但贯穿着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贯穿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现在跟同志们简略地谈谈文艺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过，我们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一九四二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并且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文艺工作者要和工农兵结合。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纲领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路线。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根据社会主义时期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详尽的深刻的阐述。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当我们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取得胜利；违背了这个路线的时候，工作就遭受失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1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离开了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那么，我们的文艺就会走到修正主义、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上去。反过来，如果我们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不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采取这么一种民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那么，我们的文艺就会走向教条主义，走向思想僵化。毛泽东文艺路线，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又是反对教条主义的。

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的核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跟工农兵相结合。

在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分歧，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为不为工农兵服务，要不要同工农兵结合。

毛泽东文艺路线是在斗争当中产生，在斗争当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场大辩论的产物。它是同当时的各种反对工农兵的、脱离工农兵的倾向进行斗争的一个总结。同时，它又是对“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的一个科学的总结。毛泽东同志对“五四”以来以鲁迅为旗手的我国的革命文艺运动，作了很高的估价。同时，指出了它的根本缺点，就是脱离工农兵。这种缺点一直带到延安，带到革命根据地。到了革命根据地，这个问题再不解决就不行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在文艺上所引起的巨大变革，使得我们的革命文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文艺界一致表示接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但是口头上拥护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不等于实际上都执行了。这是两回事情。有的人是口头上赞成，实际上是反对工农兵方向的；有的人是真心赞成，但是由于脱离群众，执行不力，也不能真正贯彻这个方向。

开国以后，我们的文艺界围绕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有过五次大辩论、大批判。

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一部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影片。武训，是个地主的奴才，电影里却把他描写成一个为了贫苦农民子弟取得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人物”。对《武训传》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不少共产党员失去了辨别能力，赞扬了这个电影。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次批判，树立了如何正确地对待和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时结合社会历史调查，开创了学术工作中



調查研究的良好作风。

第二次，是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红楼梦〉研究》这本书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写的，可是却受到一些共产党员的推崇，而企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重新评价《红楼梦》的年轻人，却遭到压抑。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究竟是宣传唯心主义还是宣传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究竟是采取扶植的态度，还是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压制的态度？这次批判，为学术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开辟了道路。同这个批判相联系，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全面批判，因为《〈红楼梦〉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是同这个臭名远扬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第三次，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一个叛徒，后来又混到革命队伍里来，在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内部形成一个反党的集团，解放以后又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在中国文学运动里，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最恶毒的攻击的就是胡风。他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正确主张说成是什么“扼杀”文艺的“五把刀子”，詈骂党的领导是“宗派集团统治”。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他是我国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姿态出现的修正主义者。这次批判，既是彻底的政治揭露，又是对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有力的反击和批判。

第四次批判，是在一九五七年。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发生了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右派进攻的主要矛头在政治方面。文艺也是他们进攻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在文艺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的两个主要口号是：一、“今不如昔”，就是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不如国民党时代；今天的文艺、今天的教育、今天的一切都不如国民党时代。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文化、教育等等。这两条口号，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一条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企图让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在文艺方面，他们还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它“已经过时了”，要另外开辟什么“广阔的道路”。他们对于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最正确、最宽广的道路，认为“太窄了”，他们要当“探求者”，打算离开工农兵方向去探求什么“新的道路”。他们把我们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漆黑一团”。他们鼓吹什么“写真实”，就是要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他们叫嚷要“干预生活”，就是要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批判和改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他们还提倡“一本书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来诱惑青年人离开党的领导，使之走向反党的道路。

随着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我们文艺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胜利。以丁玲、陈企霞为代表的文艺界的右派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界是不是从此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呢？资产阶级是不是从此就不再向我们进攻了呢？不，阶级斗争不会停止，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了一定气候，资产阶级就又兴风作浪了。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国内连续三年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联合起来疯狂反华。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又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同这些进攻相呼应，我们的文艺战线也出现了一股逆流。

这一次资产阶级进攻不采取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时那么一种形式，不是明目张胆地说什么“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

在文艺领域，他们首先在我们舞台上（因为舞台同群众的联系是最广泛的），大演各种坏戏和鬼戏。一个时候，我们的舞台几乎完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占领。这些戏歌颂古代封建统治者，美化封建道德。还有一些戏用隐喻的、借古讽今的手法，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来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不满。舞台上的出现各种牛鬼蛇神，不单纯是一个舞台的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这是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的反映。

电影方面，有的同志提出“离经叛道”的主张，就是要离革命之经、叛革命战争之道，说我们的电影写革命、写武装斗争的太多了，不“离经叛道”，电影就不能出“新品种”。你们想想看，能不能够离革命之经、叛革命战争之道？如果我们这样做，那我们同修正主义还有什么区别呢？后来出现的一些坏电影，就是当时这种错误思想指导的结果。

文学方面，有的同志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什么叫“写中间人物”？他们诬蔑我国贫农、下中农的大多数都是处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状态”，主张文学应当多写这种“中间人物”。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写中间人物”去散布对社会主义怀疑、动摇的情绪，抵制和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写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

有些同志还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要我们的文艺回到三十年代去，就是要我们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文艺界这股逆流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了高峰。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们觉察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向我们敲起警钟。他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文艺整



风，同时在报刊上对学术、文艺领域内的各种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展开了严肃的批判。这是文艺战线上第五次的大批判，这是比过去历次批判更为深刻的一次批判，这是又一次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同志们，从上而所简单叙述的文艺斗争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看出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多么频繁，多么剧烈。你们可以看到，文艺战线从来不是一条平静的战线。

文艺战线的斗争之所以频繁、剧烈，是因为：第一，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客观反映，是不可避免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十分敏锐的感觉器官。阶级斗争必然要在文艺方面有所反映，而且常常是首先在文艺方面反映。文艺好比是个触角，各个阶级有什么动向，它就立刻感应。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每当无产阶级遭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每当无产阶级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趁机进攻。这个进攻，常常首先在文艺领域里发动，因为这个领域是最敏锐也是最薄弱的环节。第二，资产阶级在文化艺术领域里还有某种的优势；他们自以为还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和无产阶级较量。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在内，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在世界观和文艺观方面保留了許多资产阶级的东西。从事文艺工作，很容易沾染资产阶级的思想，沾染资产阶级的名利观念。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一旦脱离了工农兵，脱离了劳动，脱离了实际斗争，就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或代言人。

可见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进行这种斗争，我们的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政治是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文艺，如果不去宣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去宣传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那它就不但不能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只能起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思想准备，为它开辟道路。

同志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搞暴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就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团体，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如果我们不反对修正主义思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将来哪一天有什么风吹草动，文艺界就会有很多人陷进修正主义的泥坑。

坚持不断地进行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不但可以避免和减少在文艺方面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而且可以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批判，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扫清道路，扫清基地。资产阶级的势力、资产阶级的影响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阻碍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所以必须把道路扫清。要反复多次



地打扫，打扫一次，我们就大踏步地前进一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国的革命文艺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最近这次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文艺整风，是延安文艺整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可以预言，经过这次斗争，我国的文学艺术，又将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一个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它已经而且将要继续引起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大变化，现在正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文学艺术面貌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表现在戏剧舞台方面。舞台是前沿阵地。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在文艺方面发动进攻，就是从占领戏剧舞台开始。无产阶级反击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深入展开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也是从占领戏剧舞台开始。京剧大演革命现代戏，打开了文化革命的新局面。《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赞赏。各地区的各个剧种的会演中，都有不少好剧目出现在舞台上。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有大胆革新的勇气和反复试验的耐心，敢于和善于用新的革命内容去改造旧有的形式，这样，不但内容是新的，而且形式也变成新的了。对中国的传统形式如此，对外国的形式也是如此。芭蕾舞演出了《红色娘子军》。《东方红》用大歌舞的形式，表演了中国革命史诗，这个新的大胆的尝试收到了成功的效果。交响乐演奏了京剧《沙家浜》。四川的美术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同群众结合，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雕塑了动人心魄的《收租院》群象。所有这些成就都说明，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艺术的最正确的方针，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有用的经验。一切为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式，都是前人的创造，前人心血的结晶，我们要有区别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和发展，而决不要轻易把它们抛弃。有了革命的思想，有了新的内容，就会引起各种艺术形式的变化，引起舞台的变化，引起音乐舞蹈的变化，引起雕塑的变化，引起文学的变化。我们的文学不是也在变化吗？新故事，新小说，都有很多创造。它们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风尚，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明显地突破了过去的同类作品的水平，表现了新的特色。《新人新作选》就收集了这方面的一部分成果。所以，这次批判引起的头一个变化是文学艺术开始了全面的革新。

其次是广大工农群众文化生活面貌的变化。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和文化革命的深入，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有了新的活跃。我们整个文化教育工作都开始把重点转向农村。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是以俱乐部（文化室）为中心而展开的。你们参加会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你们对前几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牛鬼蛇神占领文化阵地的景象，感到不能容忍。斗争把你们推上了文艺的战



場。你們許多人是被迫拿起自己本来不熟悉的文艺武器的。你們在广大农村和厂矿开辟了社会主义文化陣地，如果沒有你們开辟这些陣地，就不可能有真正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有多少万个生产队和厂矿的俱乐部，每个俱乐部就是一个陣地，你們在那里用新故事比垮旧故事，用新戏比垮旧戏，用新歌比垮旧歌。你們是革命新文化的传播者，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員，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冲鋒陷陣的闖将。你們通过这些活动，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为生产服务，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只要你們密切注意联系群众，配合生产，遵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按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办事的原則，那么，你們的活动就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众的欢迎。

再次是文艺队伍面貌的变化。一方面是从工农兵中涌现出一支文艺新軍，这就是你們所代表的业余文艺創作的新軍。另一方面，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批地、踊跃地、热情地带着自我改造的决心深入到工农兵中間去，参加劳动，参加斗争，把革命的文化輸送到广大的农村、工厂和部队。他們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你們和他們不同，你們很多人自己就是工农兵，你們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第一綫。专业文艺工作者正在和你們更好地結合起来，首先，他們要向你們学习，同时，你們也要向他們学习。业余的和专业的文艺工作者都深深地扎根在工农群众中，都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样，一个真正革命化、劳动化的文艺队伍就会結結实实地成长起来。

总括起来說，文学艺术面貌的变化，工农群众文化生活面貌的变化，文艺队伍面貌的变化，这构成了文化革命的新形势。如果沒有批判，沒有斗争，能够出現这样的形势嗎？不可能的。我們可以看到：只有經過批判、斗争，才能推进文化革命，才能将社会主义文艺推向新的高涨，推向新的阶段，我們現在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而努力。

大写社会主义，大写英雄人物

文艺战綫上的批判和斗争，主要是解决文艺为不为工农兵、为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問題。方向問題解决以后，就应当把发展創作的任务提到首要的地位。当然，方向問題是一个长期的問題，决不可能經過一次运动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們应当时刻注意，在創作实践中，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創作問題，主要就是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問題。我們今天的文艺，应当：第一，大写社会主义；第二，大写英雄人物。

我們要不要写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写社会主义呢？

提出要不要写社会主义的問題，好像有点奇怪。难道我們的文艺作品可以不要写社会主义嗎？好像誰也沒有这样說过。可是却的确发生过問題。三年前，現在已經逝世的柯庆施



同志要求作家写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现在讲就是十六年），当时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什么叫写十三年？就是要写社会主义时代。对写十三年有抵触，还不就是对写社会主义有抵触？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为什么不愿意写社会主义呢？有些人是因为根本不喜欢社会主义。他们喜欢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喜欢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用各种借口，抵制写社会主义。更多的人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缺少思想准备。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如果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算起，就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奋斗），在全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从这时候开始，我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当然，还有一些民主革命的任务，例如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等等，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才完成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在全国建立，占全国工矿企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官僚资本已经收归国有，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就是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的，完成了民主革命很快就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许多人对于这个革命不像对民主革命那样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深刻的感受。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不大清楚。彭真同志说过，许多人身子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可是脑袋还留在封建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的思想不能同今天的时代和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在文艺界表现得相当突出。

从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变化，是时代的变化。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在这两个阶段中，有共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两个阶段的文艺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的政治服务，都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作指导，用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不同的地方是：在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文艺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文艺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和世界革命人民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变了，由于世界形势变了，我们文艺的任务和内容也必然要有变化。在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其中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就整个政治、经济、文化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一九四九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整个经济基础变成社会主义的了，我们整个的文化也必须要是社会主义的，才能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虽然还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说，反帝还是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但在国内，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对于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文艺的变化，我们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清楚的認識。今天，宣传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是我们整个思想战线、文艺战线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你们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写社会主义的，你们的长处是比较熟悉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老一代的作家就不如你们，他们比较熟悉民主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太熟悉。写社会主义，主要靠你们。当然老作家也在努力熟悉社会主义，写社会主义。同志们，写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在今天的时代，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比社会主义更值得描写、更值得歌颂的吗？欧洲有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作家也说，社会主义是今天唯一值得写的主题。但是他又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技巧不行，写不出好作品；西方的作家有技巧，但又没有社会主义可写。他的结论是悲观的；这是他带着资产阶级偏见看问题的必然结果。写社会主义，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幸福。

肯定了要大写社会主义，跟着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写。

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有从思想上、实践上清楚地认识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正确地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到共产主义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是有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是有矛盾的，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一直到共产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创造性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从根本上给我们指明了如何写社会主义的方向。过去我们很多有影响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写民主革命阶段的，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都是，而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影响的作品就比较少。最近这几年写社会主义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了，而且观点比较明确了，写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新事，也写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影响也比较大了。

我们回顾一下，当三年以前舞台几乎完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统治的时候，部队的作者却写出和上演了《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样一个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在于：它像第一声春雷一样打破了笼罩当时舞台的一片乌云瘴气，同时写了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解放军战士的侵蚀这样一个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主题。《霓虹灯下的哨兵》之



后，接着有《夺印》，这是写农村里面的阶级斗争；接着有《年青的一代》，是写青年里面的阶级斗争；再接着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写工人里面的阶级斗争。这些剧本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描写了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向我们的青年一代进攻，以及我们如何有力地打退了这次进攻。对这几部作品应当给以充分的估价。这些作品尽管还有某些缺点（如有的先进人物的形象还不够突出等），却一下子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它们回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要不要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且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作品只有正确地反映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积极地帮助人们推动历史前进。

要大胆地写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要写人民内部的矛盾，写阶级斗争，写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写这些矛盾和斗争，我们就违背了时代的真实，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其结果就要陷入“无冲突论”的死胡同。

有些同志认为写人民内部的斗争和矛盾容易犯错误，就尽量把这些斗争和矛盾磨平，冲淡。这是不对的。不但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就是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我们如果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写成好像是很容易解决的，把革命斗争写成一帆风顺，那我们还要学什么“愚公移山”的精神呢？革命斗争总是充满惊涛骇浪，要经历各种艰难险阻、迂回曲折，反复搏斗，才能最后取得胜利。哪有矛盾那么容易解决的呢？哪有斗争那么顺利的呢？我们的作品，如果把现实斗争歪曲了，简单化了，就不能达到正确地教育人民的目的。

我们强调写社会主义，并不是反对写历史题材。但是，摆在第一位的，大量的，是写今天的社会主义。当然，民主革命的题材以及历史上人民斗争的题材，都是我们创作里不可缺少的。民主革命阶段还有很多题材可以写，应当写。譬如说，写各个革命阶段我国人民战争的伟大历史，写我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不但要写今天工业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还要写我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我们过去的文艺作品里，写工人阶级斗争的，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太少了。

要不要写英雄人物以及如何写英雄人物呢？

写不写工农兵当中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关系到我们的文艺是不是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我们的作者是不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能不能塑造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是标志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是否成熟的问题。每个阶级的文艺都歌颂自己阶级的理想人物。无产阶级文艺不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那还能算无产阶级文艺吗？就是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没有阶级了，还是要写英雄人物。那个时候，没有阶级，社会上总还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人的



觉悟水平不会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肯定还是要写先进人物，帮助人们继续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的《国际歌》，是第一首伟大的无产阶级诗篇，是不是写了无产阶级的先进人物？它不是小说，也不是长篇叙事诗，里面当然没有具体的人物。可是，它表现了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在整个歌曲中，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要“奴隶们起来”，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光辉的英雄形象！列宁说，《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之歌”，正因为它是“先进战士之歌”，才能动员和鼓舞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战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歌”。如果是落后人物之歌、中间人物之歌，它能起到这种作用吗？

我们曾经同反对写新英雄人物的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过一系列的斗争。我们批判“写中间人物”的错误理论，就是因为这个理论的实质是反对歌颂社会主义，反对歌颂工农兵的先进人物。不是说在作品里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中间状态的人物是不少的，也可以写、应当写；反动的人物也要写，为什么中间状态的人物不能写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提倡“写中间人物”的人，对于“中间人物”有他们自己特殊的解释。他们把我国农民的大多数看成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人物”。这是对我国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诬蔑。当然，贫农、下中农觉悟水平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哪里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呢？持这种论调的人，他们自己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动摇，实际上他们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对资本主义则恋恋不舍，这就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硬把这种精神状态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里面有英雄人物，因此，他们认为多写“中间人物”才合乎现实主义，才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如果多写了英雄人物，那就不是现实主义了。很明显，他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是用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现实，而决不是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们是根本反对的。

写英雄人物的问题，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什么是我们今天的英雄人物呢？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忠心耿耿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雷锋式、王杰式的人物，就是以“愚公移山”精神进行改天换地斗争的大庆人、大寨人。这种英雄人物，今天已经不是个别的了。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合作社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的按语中就指出：“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①。有些文学家不但自己不去找，而且还反对人家去找。这样的人，正像毛泽东同志

^① 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4页。



所說的，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罢了。

共青团中央的同志提出，我們今天的文艺作品，对先进青年还写得不够，有些作品沒有着重去表现青年的先进的方面，反而渲染了他的落后的方面。这是个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写作的同志注意。应当描写各个战线上的先进青年的事迹，塑造当代各类先进青年的光辉形象，作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这是我們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說：“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①。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当然，现实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青年：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有意志坚强的，也有意志薄弱的；有富于进取精神，不怕艰苦，勇往直前的，也有进取心不强，贪图安逸，得过且过的。各种人都会有，各种人都可以写。但是重点应当写青年的主流。毫无疑问，整个青年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今天我国青年的主流更是先进的、革命的；他們的精神面貌是朝气蓬勃的；他們充滿了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不断革命的进取精神和敢于同一切敌人、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正在成长之中。我們的文艺作品应当把我国青年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真实地表现出来。

我还要建議作家們注意写一写年輕的科学技术人員和上山下乡的知識青年。大批科学技术人員，特别是年輕的科学技术人員，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群众一道站在生产第一綫，不辞劳苦地为祖国的建設服务。他們刻苦钻研，敢想敢干，努力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他們中間的許多先进人物和动人事迹，难道不值得我們的作家去写写嗎？近几年来，千百万知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劳动，成为新式农民，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这是一个伟大的青年革命化的运动。他們革命化、劳动化的生动过程应当在我們的文艺作品中得到表现，借以鼓励更多的青年踏着他們的足迹前进。

写英雄人物，这几年有了一些比較好的作品，特别是写部队生活的，引起了人們的重视。像《开顶风船的角色》、《政治連长》这样的短篇，鮮明地塑造了解放軍里面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战士的形象，深刻地体现了人的因素第一这个伟大的真理。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精神力量，能够發揮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当一个人被伟大的理想所鼓舞，用伟大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时候，他能干出什么样的不平凡的事情。《开顶风船的角色》不是简单地写魯牛子的倔强的性格，而是写他的这个性格是怎样形成的，他的惊人的毅力和耐心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党培养出来的，人民軍队的熔炉中鍛炼出来的；因为党指給他一个伟大的目标，这就是他身上一切力量的源泉。《政治連长》写解放軍里面的政治思想工作、人的工作做到了如何細致的程度，好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了每个人的心，把劳动人

^①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的按語。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59頁。



民本来具有的优良品质提到了最高度，把劳动人民之间的友爱提到了最高度。我们的解放军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成革命的同志关系，无微不至地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勉励。这是一种阶级的友爱，革命的友爱，没有一点私心的最高尚、最纯洁的友爱。我们解放军中的五好战士、四好连队，代表一种完全新型的人，共产主义的新人；代表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关系，革命的同志关系。我们的一些描写解放军部队和描写工人、农民的作品中，开始把这种新的人，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表现出来了，这是过去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英雄人物，是我们作品中的正面形象。我们要写正面，也要写反面。正面是同反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我们的文艺当然不能只写英雄人物，也不能孤立地去写他们，而应当把英雄人物放在围绕着他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中去表现。英雄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的高贵品质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显现出来。

关于如何写英雄的问题，过去有不少的讨论是抽象的，脱离实际的。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有各种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事迹，怎么能预先规定一个模子，然后再按照这个模子来塑造呢？你们在如何写英雄人物方面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熟悉英雄，了解英雄，学习英雄。我看除此别无途径。你不熟悉他们怎么写得出来？你不学习他们，你同他们在思想境界上有很大的差距，怎么写得好？我们的有些文艺作品，把反面人物、落后人物写得很有生气，而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反而相形见绌。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本原因，就是对先进人物不够熟悉，不够了解。要熟悉和了解他们，就只有首先向他们学习。一位同志说得好，熟悉英雄人物和写英雄人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改造和提高自己思想的过程。

我们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就是写社会主义，写英雄人物，但是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却要多样化。多样化，离开了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要滑到资产阶级的邪道去。在坚决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形式、风格就愈多样化愈好。应当容许和鼓励各种不同艺术风格的互相竞赛。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努力去探索和创造群众所喜欢的文艺形式，口头的也好，文字的也好，只要群众欢迎，我们就要加以提倡、推广。比如讲故事，这种口头文学，就是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就应当加以提倡、推广。在这方面，要打破清规戒律，突破各种框框。我们在文艺上要有标新立异的勇气；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新的革命内容，需要新的形式和风格。有了正确的政治内容，又有引人入胜的艺术形式，我们的文艺就能更好地发挥教育和影响千百万人民的作用。

为了迅速而又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我们需要采取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的方法。领导要向创作者指明方向，提出任务，在写作过程中从思想上给以帮助和指点。许



多青年业余作者从自己的亲身經驗中感到，如果没有领导的指点和启发，没有群众的帮助，作品就写不好。你们說，要請教领导，請教群众，这是对的。这样，政治統帅文艺，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結合起来，創作就不再是單純的个人的事业，而真正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了。所以实行“三結合”，是在文艺創作方面体现党的领导的問題，又是在文艺創作方面走群众路綫的問題。

培养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我們党要十分注意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說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万年大計。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也需要培养和造就自己的接班人，这是解决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总任务中的一个部分。

培养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問題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

第一，我們文艺事业的接班人要接老一輩的班，但是又不完全走老一輩的道路，甚至要走根本不同的道路。我們应当继承“五四”以来革命文艺事业方面許多老前輩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說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魯迅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最后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詩充分表现了魯迅的敌我分明的态度，对敌人要恨，对人民要爱。这种精神，是我們应当继承和发揚的。此外，老一輩作家有比較丰富的創作經驗，我們应当重視，向他們学习。但是，对老一輩作家的創作經驗也不能照搬，也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去学。因为你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你们所反映的对象也不同；你们在文学創作事业上將走一条同老一輩作家根本不同的道路。你们生活、劳动和战斗在工厂、农村、部队的基层单位，你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农民、新工人、新战士，你们有劳动的經驗，有打仗的經驗。老一輩的作家中，絕大多数人沒有你们的这种經驗；在这一方面，我比起你们来就是一个落后分子，我要向你们学习。你们一开始就是完全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老一輩作家不完全是这样。你们中間絕大多数的人，將一直不离开生产崗位和基层工作，一边劳动，一边創作，这是同老一輩的作家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你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要走一条真正是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一条逐步縮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道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第二，这个問題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知識分子（包括文艺、科学各方面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爭夺的一个重要对象。阶级敌人既企图用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又大搞“和平演变”的阴謀。这种阴謀在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統治下的苏联，已經收到了效

^① 《新民主主义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1頁。



果。“和平演变”，通俗地说，就是从思想上腐蚀你、溶化你，使你变质，变成资产阶级，最后使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我国老一辈的革命者已经不再抱多大的幻想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下一代，特别是寄托在我们下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希望你变质，希望你有了知识就看不起劳动人民，就脱离劳动人民，就学资产阶级那一套。你脑子里的思想高地，有人在争夺，如果你那个高地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了，那么你就成了他们的接班人了，就不是无产阶级接班人了。尽管你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称号，但实际上你成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就是摆在每个知识青年面前的危险。文学知识青年更要注意防止这种危险。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就是坚持文艺工作者要革命化、劳动化，使我们的青年一代成为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人，为逐步缩小直到最后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进入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方法是政治挂帅，思想挂帅。另一条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就是使文艺工作者脱离革命，脱离群众，养尊处优，成为特殊阶层，最后走向反对革命，反对人民，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准备条件。方法是物质刺激，名利挂帅。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只能使知识界、文艺界的许多人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精神贵族，成为修正主义的一部分社会基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注意防止这种危险。

我们自己在培养青年作者方面也有过反面经验。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不是有一些青年作者在政治上倒了过去，做了右派的走卒吗？有些青年作者，党和共青团把他培养出来以后，他有了一点名气，就和党、和团逐渐疏远了，甚至感到党和团妨碍他成名成家。他宁愿去找资产阶级“名人”、“专家”，去拜个人的门。他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的捧场和蛊惑，往往就听他们的话，跟他们走，以至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这里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对青年人既要热情鼓励，又要严格要求。文艺团体和刊物特别要注意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关心他们的成长，不要对他们采取拔苗助长的方法，不要对他们作不适当的捧场，用虚荣心或物质利益来葬送他们的前途。

你们有些同志也许会想：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工农兵当中，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执行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接班人，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可是，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没有问题，如果你们这样想，就会犯错误。仅仅因为你们是工农出身，当过兵，你们就永远不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会成为资产阶级文艺的接班人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是处在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意识形态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坚定地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永远跟工农兵一起，不断斗争，不断前进；要在思想上准备长期斗争，准备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首先是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还要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要有民主作风，要谦虚，要有自我批评精神，等等。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各种专业的分工。对我们来说，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文艺工作者。这两者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摆错。

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做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的标准，那么，我们文艺创作的目的就很清楚，就是同志们所提的一个很好的、响亮的口号：为工农兵而写作，为革命而写作。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写作。究竟是为工农兵写作，还是为个人名利写作？是革命者第一，还是作家第一？这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是我们要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有位作者说，创作就像打靶一样，眼睛只能盯着一个目标，两个眼睛盯着两个目标，就一定打不准。这个话说得好！既说为工农兵写作，又要为个人名利写作，那还不是两个眼睛盯着两个目标？结果，必然是两个眼睛都被个人名利观念所蒙住。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为革命而写作，为工农兵而写作，不要有一点个人的杂念。所谓为个人名利写作，就是为资产阶级写作。个人名利观念，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了这种思想，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忠实代言人。一个人有了一点成就，出了一点名，就容易骄傲起来。我们要防止骄傲，反对骄傲。要认识，骄傲是一种盲目性，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一种低级精神状态。我们应当正确地对待荣誉问题，不要把荣誉看做是个人的，要看做是集体的，看做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鼓励。对自己总是要严格要求，首先在思想上严格要求，不能有一点松懈；既要经得起批评，又要经得起表扬；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在于不脱离工农兵，不脱离劳动，不是一时不脱离，而是永远不脱离。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是要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为逐步缩小直至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将来走向共产主义。现在，我们要继续推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试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制度。这是我国的根本性的建设。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会改变颜色。我们青年文艺创作者要永远保持革命精神，永远不褪色。要做到这样，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工农兵，是一切保证中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的业余的文学创作者，千万不要想着专业化。我们文艺队伍，包括专业和业余两个部分。业余是大量的，专业只能是少量的。将来的发展，是业余愈来愈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可能都是业余。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



已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①。那个时候，每一个人既要既从事体力劳动，又从事脑力劳动。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时代。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去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直到最后消灭这种差别，而是去继续扩大这种差别，那怎么能达到共产主义呢？

我们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

如何提高呢？有两种提高，一种是沿着工农兵的方向去提高，一种是沿着资产阶级的方向去提高。两种提高，实际上就是文艺战线两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只能沿着工农兵的方向去提高，而决不可以沿着资产阶级的方向去提高。任何离开工农兵方向的提高，都是错误的。

林彪同志要求部队文艺工作者努力做到“三过硬”。第一，思想过硬，就是毛泽东思想过硬；第二，生活过硬，就是熟悉工农兵生活过硬；第三，基本功过硬，就是技巧过硬。这三者缺一不可，而重点是思想过硬，思想是最根本的。林彪同志的指示，对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是适用的。我们要学习解放军，也要学习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解放军文艺工作所以取得特殊的成就，也正是突出政治、思想挂帅的结果。思想是灵魂，是统帅。生活是基础，是源泉。技巧是表现思想、表现生活的手段。有的青年作者觉得自己思想没有问题，生活也有，就是技巧不够。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也是危险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止境的，任何人都不能说已经学得够了，思想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应当学习一辈子。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源泉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人都不能说生活已经够了；我们应当在工农兵中生活一辈子。要正确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你就必须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分析和研究生活。要提高技巧，你也必须以毛泽东思想做指导，采取革命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前人和别人的经验中去吸取于我们有用的东西。所以，无论是观察生活，或者掌握技巧，我们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作为指针。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而写作，为工农兵而写作，立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勤学苦练，坚持不懈，争取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为普及群众文化做更多的工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让我们奋勇前进吧。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0页。



高标准的质量，来自高标准的思想

苏 星

产品质量的提高，是当前工业生产新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说明质量第一、好字当头的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领会，并且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了。

质量第一，同一切事情一样，也是贵在坚持。

一般说来，在数量没有问题的时候，容易坚持质量第一。当需要增加数量，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尖锐了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坚持了。其实，这个时候同样应当坚持质量第一。“萝卜快了不洗泥”，是资本家做生意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萝卜慢了要洗泥，萝卜快了同样要洗泥。

增加数量，是要增加合乎质量标准的质量。如果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废品，数量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不是数量越多，浪费越大，害处越大吗？

经验证明，质量不稳定，数量是很难上去的。小批生产质量不稳定，就忙着转向大批生产，质量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以致不得不回过头来补质量的课。结果是欲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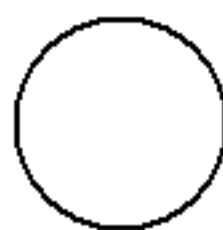
不达。只有质量好，产量才能展翅高飞。

坚持质量第一，不是只保住现有质量，不求提高。

一件新产品，经过试制、投产以后，有一个质量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使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要健全技术管理，做到严格地按标准、图纸、工艺、制度办事；要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过得硬的技术队伍。但是，质量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质量也精益求精。今天看来是质量高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变成质量低的东西。不能在质量问题上原地踏步。质量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谁原地踏步，谁就一定要落后。

产品质量，不能不求稳定，但是，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求提高。提高了，还要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再求提高。稳定——提高——再稳定——再提高，这就是产品质量发展的辩证法。

因此，在产品质量问题上，绝不能一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更不能骄傲自满、固



步自封、无所作为。一定要有不断革命的精神，力争上游，力求高标准。

高标准，是指产品质量要争取赶上和超过先进单位的水平，有一些还要争取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个战略问题。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没有这样的志气是不行的。当然，提高产品质量，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任何时候，产品的质量总会有高有低，不可能那么整齐划一。

高标准的质量从何而来？

高标准的质量，来自高标准的思想。

有人说：“我是重视质量的，因为不完成质量指标，就完不成计划任务。”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单纯为了完成任务，算不得高标准的思想。

也有人說：“我是重视质量的，因为质量不合标准，会损害厂子的名誉。”这种仅仅从自己企业的荣誉出发而重视产品质量，比不重视产品质量的思想要好，但是，也算不得高标准的思想。

按这些思想办事，即使能够完成质量指标，也不易于使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天天向上。

什么是高标准的思想？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思想，是对革命、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思想。

我们工厂所生产的产品，有的用之于经济建设，有的用之于国防建设，有的用之于人民生活。无论用在那里，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生产的产品是农业上用的，心中首先要有五亿农民，对他们极端地负责。要想到这些产品在农民劈山填海、改天换地的英勇斗争中，在建立现代农业的斗争中，过硬不过硬？

生产的产品是工业上用的，心中首先要有改变祖国技术落后面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对工业建设极端地负责。要想到这些产品，在兄弟工厂赶先进、超先进的斗争中，过硬不过硬？

生产的产品是国防上用的，心中首先要有敌情观念，对国防建设事业极端地负责。要想到这些产品在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用来保卫祖国、打击任何来犯敌人的斗争中，过硬不过硬？

高标准的思想，威力无穷。一个企业，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都有了高标准的思想，把他们生产的一吨钢、一个螺丝钉、一滴油、一尺布的质量，都同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提高质量的思想就真正地深入人心、

声



落实到每个人的心上手上了。这样，革命的独创精神就有了，办法就有了，措施就有了，什么洋框框、中游思想，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上，同现代修正主义企业要走根本不同的道路。

现代修正主义办企业，靠物质刺激，靠检查关卡。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招牌，实际上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物质刺激，这是质量的大敌。越是用奖金、高工资来刺激，越容易造成弄虚作假，因而降低产品质量。

检查制度和检查人员，在我们的企业中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有原则的区别。他们是单纯靠检查关卡，而不相信广大职工群众，企业和工人实际上处于对立的地位。这种办法我们是不能采用的，实际上也是卡不住的。一个产品，往往是由上千上百的大小零件组成，要经过许多道工序，光靠检查很难发现所有的问题，何况工人觉悟不提高，他们总是可以想出办法来对付检查员的。正如有的工人说的：“质量高低就看思想高低。思想提不高，一个检查员盯着一个工人也不顶事。”

我们办企业，要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办事，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办事。我们相

信群众。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只要工人自觉地意识到他的阶级地位，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是在干革命，他们就会积极起来，以忘我的精神增加生产，提高质量。许多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企业，设备没有变，可是，生产上去了，质量也上去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变了，人的思想变了。人的思想一变，一通百通，什么样的奇迹也可以创造得出来。

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

提高产品质量，是要职工动手去做的。质量第一，一丝不苟，如果不变成群众的东西，不为群众所掌握，就是空谈。

大庆油田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提高产品质量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就在于他们突出政治，做人的思想工作，在思想上要求高标准，并且把政治工作落实到生产上，落实到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上，落实到企业管理上，落实到大练基本功上，落实到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上。

政治是灵魂，是统帅。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紧紧地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做到生产第一线上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坚持质量第一、好字当头，坚持质量的高标准。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坐着等

中共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
下丁家大队总支书记 王永幸

我们下丁家大队，本来是个穷山沟，现在变了，穷山沟变成了富山沟。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是怎么变的？我说，这是上靠党的领导，下靠群众的创造，一锹一锄，天长日久干出来的。用我们社员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坐着等”。

不怕生在穷地方， 就怕没有志气

我们这个大队有八个自然村，二十一个生产队，五百六十户人家，两千六百九十五口人，两千四百一十三亩耕地。解放前，这地方很穷，每人平均才九分地，又多是斜挂在山坡上。山高地薄，十年九旱，再加上地主、富农的剥削，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的祸害，老百姓的生活真苦、真穷啊！不少人靠扛长活、卖短工、逃荒要饭过日子。

解放了，土改了，大家再不受压迫，不受剥削，有地种了。可是，山是穷山，岭是薄岭，过去的底子又差，一般群众的生活仍然不富裕，而且又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毛主席说得真对，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我们穷哥们合计着“闹革命”，打井，革天旱的命；整地，革地薄的命。可是有的富裕中农说：“穷山沟穷山沟，八辈子也富不了。”我

们赌气先试了试，确实不行。打井、整地，单家独户人力财力都不济事。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时，有了道路，有了方向，心里亮堂，干劲更大了。我们先成立了互助组，后来又转成初级社，一九五五年又由七个初级社合并成了一个高级社。那时，地主、富农明着暗着破坏合作社。还没有入社的富裕中农也想和我们合作社赛一赛，入了社的一些富裕中农说入社吃了亏，吵吵着要退社单干。我们贫农下中农，憋着一股子气，非长志气不可。从这时起，我们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合作社办好，一定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这穷山沟。咱们不能叫富裕中农看笑话，不能叫地主、富农钻空子破坏咱们的集体事业。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依靠集体的力量，搞好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有了志气就干，干出成绩来更增长志气。后来，又认识到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都欺侮我们国家穷，想卡住我们的脖子，我们立志更快搞好建设，发展生产。

我们这个大队，山穷、地薄又缺水。既要治山，也要治地，更要治水。我们是先从治水干起来的，开始是打井。一九五七年大旱，又改修水库塘坝。这年秋天，正干的热



火朝天，上级派我到莒南县厉家寨去参观。这一看，更开了眼界，解放了思想。人家厉家寨，靠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开十个岭，真叫人佩服，叫人感动。回来后，宣传了厉家寨开山劈岭的革命精神，学习了毛主席对厉家寨大山社的批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这就更增长了我们的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促进了我们的水利建设高潮。大家说：要革穷山沟的命，就得学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同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厉家寨人能办到的，我们下丁家人也一定能办到。一九五八年，我们又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对厉家寨大山社的批语，开始大规模整地。一九五九年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提出了整地的标准，规定了因地制宜，当年见效，开头不打硬仗，先易后难，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整地工程。一九六四年遇上大雨，造成内涝，我们又学习了临沂地区排灌结合的经验，使整过的地都达到能排能灌，旱涝保收。

我们这里虽然是穷山沟，但是靠了这股志气，我们治山、治水、整地，坚持不断，年年干，年年收效，产量一步步提高，面貌一年年改变，使穷山沟变成了富山沟。十年来，我们共计用了三十三万多个工日，做了四十五万多个土石方工程，修了十八座水库塘坝，一座拦河坝，四处扬水站，挖了一百六十眼水井方塘，使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旱地变成水浇地。彻底整好了一千六百多亩山岭薄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九，余下的高山岭地也进行了一些小整。还封山育林，修了三百二十座谷坊工程，栽了两万棵果树，使荒山基本上绿化。

治了水、治了地、封了山，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从一九五九年起就达到亩产八百斤以上。一九六四年大涝，却增长到亩产九百二十斤。一九六五年春秋两季卡脖子大旱，又增长到亩产九百五十斤。产量增长了，有了力量支援国家建设，公共积累也增加了，集体经济更巩固了。社员有余粮，不少户有存款，年年有人盖新房，生活也大大改善了。

治山、治水、整地的十年，也是我们下丁家人长志气的十年。我们真正体会到，不怕生在穷地方，就怕没有志气。老一辈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压迫，不得不留下一个穷摊子。咱这一辈人，生长在新中国，上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有集体经济做靠山，一定得长志气，决不能再把穷山薄岭留给下一代。生在这个穷地方，就得改造这个穷地方。只要听毛主席的话，学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有了方向，有了志气，有了干劲，没有改变不了的穷山沟。

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 斗争为纲，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

我们下丁家大队的社员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决心，这样大的力量，来改变穷山沟的面貌呢？为什么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坐着等，要靠自己来建设呢？说来说去，主要是这一条，就是党总支以阶级斗争为纲，采取各种方法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依靠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智慧，依靠群众的创造。

人的思想支配行动。没有革命的思想，



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要依靠群众，就要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就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前几年，我们依靠贫农下中农，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向社员不断地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同时，还向社员进行了要当大自然的主人，不当大自然的奴隶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创业的教育。近几年，大学毛主席著作，向社员进行了为革命种田，为社会主义搞建设的教育。通过革命教育，广大社员进一步树立了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为革命而不怕苦、不怕难的革命精神。革命思想挂了帅，克服了那种“穷山沟没前途，命里八尺，难求一丈”的不想革命、不敢革命的思想。社员们说：治山治地是拔穷根，栽富根，为社会主义打基础，为子孙造福。通过革命教育，社员们认识到，要革命就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话，全听全丰收，半听半丰收，不听不丰收。

我们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组织社员进行改造自然的斗争，从始至终都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搞建设，阶级敌人没有睡觉，资本主义势力没有死心。他们时刻想破坏我们的事业，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阶级斗争推动了改造自然的斗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合作化后的第一年——一九五六年，开始整地试验，我们打算把七块小地整成一块大地。小地并成大地，就要拔掉私有制遗留下来的界石。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说：“拔了界石，社垮了怎么办？”我们抓住这件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贫农下

中农说：“南山不倒，社垮不了。”群众把界石拔掉，就干起来了。社员们突击了十天，一块整地的样板就完成了。

一九五七年，在口子村修一座水库。修这座水库，要搬掉座落在库基上的土地庙，要从“土龙背”上取土筑坝。有人说：“土地爷是一村之主，不能动。动了‘土龙背’上的土就破坏了风水，辈辈受穷。”我们抓住这种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教育。组织社员辩论了过好日子是靠神、靠风水，还是靠集体经济和艰苦劳动。真理愈辩愈明。群众说：什么神，什么风水，修了水库，让梯田有水喝，那才是好风水。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搬掉了土地庙，从“土龙背”上取土筑了水库的大坝，建成了水库。

一九五七年的形势很好，有了整地的样板，又有了修水库的经验，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就有了群众基础。当时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可是地主、富农却配合城市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煽动社员闹退社，劈社，企图搞垮合作社。一些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也乘机而起，攻击合作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不打退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集体经济是不能巩固的，治山、治水、治地的斗争就不能继续进行。这时，我们在全社范围内又展开了一次大辩论。在辩论中，诉了旧社会的苦和小农经济的苦，用活生生的事实驳倒了合作社不如单干的谬论。揭发出了小陈家村富农分子拉拢党员干部破坏集体经济的罪行。阶级敌人的



进攻是坏事，可是一抓阶级斗争，经过辩论，坏事变成了好事。分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一个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开始了，出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高举三面红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同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一九五九年，总结了一九五八年的成功经验，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在党内进行了整风学习，同小陈家村包庇富农、勾结奸商的干部进行了斗争。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提高了党员的觉悟，把混在党内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开除出党，纯洁了党的组织。由于这次阶级斗争取得胜利，思想得到提高，促使一九五九年在九五八年的基础上继续跃进。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党内团结了，问题不大了，思想斗争就放松了。可是，一放松就出事。一九六一年又刮起了一股歪风。有人说：“整地划不来，不如砍山卖柴。”有人弃农经商，到黄县城去开羊肉馆。这又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年秋，我们依靠贫农下中农，在全大队范围内辩论了搞社会主义是创业、是守业、还是当败家子。社员们说：搞社会主义是创业，要创业就不能走邪门歪道，就得治山整地。砍山卖柴，眼前受益，那会造成山坡大脱皮，那是破业，那是败家子。这一场辩论，不仅顶住了砍山卖柴、弃农经商的歪风，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创业思想。

近几年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

仍然没有间断。进行这种斗争，是建设的动力，推动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生产不断地向前发展。

我们大队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革命促进建设的道理。要建设，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抓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能因为治水整地，就把头浸在水里，埋在地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放松就出事，一麻痹阶级敌人就进攻。只要经常抓住阶级斗争，阶级阵营不乱，社员就有干劲，社会主义建设就发展。

农民有个重事实、重实效的实在脾气。发动农民向自然作斗争，除了在阶级斗争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以外，还要引导农民在改造自然的实际斗争中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加强他们改造自然的信心。因为从根本上治山、治水、治地，是前人没有做过、当时又没有见过的新事，农民是不会轻易相信，不会轻易接受的。

怎样才能让农民相信和接受呢？必须突破一点，拿出样子，摆出事实，让群众看，让群众议。一看二议，群众就容易相信了，就容易接受了。我们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论治山、治水、治地和推广新技术，都是这样做的。

例如，一九五七年，我们修建第一座水库时，有些群众不相信能够在山沟里修起水库浇地。老农吕清忠说：“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从古来，只见过箍盆、箍碗的，没见



过箍山沟的。弄点泥巴就能挡住山洪!”我们便一边向群众宣传,一边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动手干,做出样子让群众看。第一回修水库没有经验,怕修坏了影响不好,我们党员干部一齐上了水库带着群众干。干了一个多月,水库修成了,放水浇了地,让群众看了,议了,群众相信了。这会儿,吕清忠信服了。他说:“**实事就是实事,不信服也得信服。我这老脑筋不好使唤啦!**”原来不相信能在山沟里修水库浇地的人,成了后来修水库的积极分子。有了这座水库做样子,拿这个样子来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一个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的高潮就掀起来了。

从此我们体会到:突破一点,做出样子,让群众看,让群众议,思想通了,就发动群众干。这个方法,好似滚雪球。开始是少数群众通,少数群众干,依靠这少数积极分子,向群众宣传,做出样子,教育群众;群众通了,就依靠积极分子带着群众干。这样,便由少数人的行动,变成多数人的行动,形成群众性的治山、治水、治地的运动。

发动群众开展治山、治水、治地的运动,要先易后难,先吃肉后啃骨头,不要一上来就打硬仗。这样容易取胜,容易见效,鼓舞士气。打了几个胜仗,练了兵,再打硬仗。我们大队整地,就是先整山脚下和河两岸容易整的地,后整高山梯田。

发动群众治山、治水、治地,还要掌握一条原则,就是将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按照这个原则办事,我们采取了当年修,当年成,当年见效为主的方针。

这个办法,能使社员增强信心,干劲更大,越干越有瘾。正如一个社员所说的:“我们整过的地,当年见效,庄稼长得挺好。看着那些没有整过的地里的庄稼矮半截,心里就不舒坦。”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 干好干孬全在领导

能不能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依靠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智慧,依靠群众的创造,全在于领导,全看党的组织是不是能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一切工作都是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干好干孬全在领导。如果干部不把心放在创业上,东溜溜,西转转,踏不下身子领着干,群众的干劲就起不来,干起来也干不好,干不到底。

干部要领导好,先要有为革命干一辈子的创业思想。这几年,在工作中我体会到,先在干部中树立创业思想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这里有少数干部就没有这种思想,总想换班,没有创业心,没有干劲,不能带领群众好好干。我们为了解决“换班思想”,由党总支委员会的打过仗的同志讲了打仗的情况,讲了过去我们为什么打仗,为谁拚命流血,怎样才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离着实现共产主义只是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把革命进行到底,究竟对不对?是不是对得起牺牲的先烈?通过回忆对比,进行了阶级教育,干部们认识到,不革命就要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就会



复辟，就要回到旧社会去受二茬罪。这样，在一部分干部中克服了换班思想，树立了创业思想，干着今年想明年，干着明年想后年，总想干上一辈子。社员就是不选自己当干部，也还要革命，为集体和国家创业。干部的思想踏实了，整天琢磨着如何实现改变穷山薄岭的计划，谁也不东溜西转了。

要领导好这场改变穷山薄岭的斗争，不但干部要有创业思想，还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党支部。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战斗力。党支部不团结，就不能领导好群众。党支部不团结，阶级敌人就容易钻空子，打一个拉一个，把领导核心搞乱，篡夺领导权，就要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这个党总支，在高级社时，小陈家村出了个分支书记，不注意思想改造，叫富农奸商拉了过去，和党总支唱对台戏，削弱了党总支的战斗能力。党内出现了不团结怎么办？是采取迁就主义，还是坚持原则，同破坏党的团结的人斗争呢？用迁就的办法求团结，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只有用批评和斗争的方法求团结，才能达到团结。我们党总支委员会对待这个人就是采取斗争的方法，和他斗了好几年，揭发批判了他的错误，教育了党员，教育了群众。后来因他屡教不改，把他清除出党。党总支的团结加强了，党总支的战斗能力提高了。我体会到：领导好，主要不在个人能耐大小，而在于要有一个又坚定又团结的领导班子。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决议，大家执行，说干就干，干就干到底，干出样子来，才有战斗力。我们党总支的几个同志，论能耐都不

大，就是靠大家立场站得稳，团结，齐心，所以，就能领导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穷山沟。

发动社员改变穷山沟的面貌，我们还有一条领导经验，就是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党总支在治山、治水、整地中提出：“看准就干，干就干好，干就干到底”。要做到这一点，全靠民主集中制来保证。怎样才能看准？靠发扬民主。我们打算搞什么工程，家有千口，人人讲话。这样，一能看准事，二能看准人。众人是圣人，大家讲话、出主意，就能摸透山、水、地的脾气。应该怎么整，怎么治，怎样才多快好省，怎样就少慢差费，大家商量，就能弄得清清楚楚。大家发言，讲出了各人的思想，正确的就表扬鼓励，错误的就教育纠正，有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这样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发扬社员的积极性，才能使领导上看准事、看准人，从实际出发，集中起来，做出正确决议。例如，一九五八年春，我们学习厉家寨的整地经验，整了十多亩梯田。夏天一场大雨，山水把大部分田埂冲垮了。群众议论纷纷。听着群众的批评，有些干部沉不住气了，有的认为是泼冷水，有的甚至泄了气。党总支冷静地分析了群众的意见，找出了这次修梯田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根据下丁家的具体条件运用厉家寨的经验，只是形式上搬用了人家的一些具体做法。党总支总结以后，教育干部说：“办错了事，群众能大胆批评咱们，这是大好事。它告诉咱们时刻记住办事要从实际出发”。经过这次总结，又经过一年多的



实践，下丁家提出了适合自己本地情况的整地办法。

“干就干好，干就干到底”，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集中，就是有了正确决议坚决执行。治山、治水、整地，人与天斗，天也与人斗。工程不够质量或者半途而废，一场大雨，就等于白干。所以，看准了，决议了，就要高度集中。没有看准，认识不一致，就不要急急忙忙作决议。既然看准了，决议了，就是石板上钉钉，要坚决执行。对不执行决议的，就要批评，绝不能马马虎虎，破坏民主集中制，养成坏习惯。只有看得准，下决心，才能领导群众苦干实干，打硬仗，啃骨头，与天斗，与地斗，逢斗必胜。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①，又说：“将革命进行到底”^②。我体会，在治山、治水、整地上也完全适用。

治山、治水、整地和打仗一样，是胜是败，还要看干部能不能带头冲上去。干部劳动要带头，试验要带头，碰到苦，碰到难，更要带头吃苦，带头克服困难。干部经常劳动，带头劳动，就能摸透社员的思想，熟悉农活，熟悉事，说话踏实，能出好主意，社员就能听从领导，干劲大，干的好。新工程、新措施，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人还不相信。干部带头试验，做出样子，摸到经验，找到办法，说话入辙，才能服人，才能推动工作。碰到艰苦和困难，好比打仗时拚刺刀夺山头，只有干部带头冲上去，才能拿下来。一九五七年，修第一座水库的时候，党总支委员会一动员，各村的党员、团员、积

极分子都来了。他们担石、挑泥、平基、筑坝，个个生龙活虎，干得热火朝天。六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姜延友也赶到工地一面劳动，一面喊号子助威。在他们的带动下，不到二十天，水库的底基工程就完成了。我们在修大陈家拦河坝合龙工程时，冰还没有化，水齐腰深，需要顶凌合龙。大冷的天，有些社员有点犹豫。当时，大队长带头跳下水去，接着青年突击队长也带领一帮小伙子跳下水去。在齐腰深的冰水里，连干三个多小时，终于完成大坝合龙工程。社员说：“干部能跳江，社员敢跳河。”我体会，干部带头吃大苦耐大劳，是光荣的事，也是本分的事。不怕社员做不到，就怕干部带不到。干部做不到的事，别要求社员做。干部做出样子来，社员自然会跟着做。干部带头是个宝，是下的无声命令，不说话也有人跟着干，说话就有人听，领就能领上去，困难就能克服，胜利就能得到。

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钻出来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听毛主席的话，立革命志气，鼓革命干劲，团结群众，一镪一镪一干到底。我们要继续以大寨为榜样，查缺点、找差距，把下丁家建设得比以前更好。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坐着等”，这是社员的话，也是我的总体体会。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页。

②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7页。



一个长期扎根农村的电影放映队

· 吉 映 ·

吉林省和龙县第一电影放映队，从一九五四年成立以来，就长期扎根在农村，坚持为农民服务。十年来，他们爬过几百次山，趟过几百次河，走过四万三千多里路，在该县最偏僻的山区德化和芦果人民公社范围内，普及了电影放映的工作，为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这个放映队，曾二十七次受到党和政府的奖励，是吉林省电影放映工作中的一面红旗。

属于他们放映范围的两个公社，共有三十九个自然村，分布在方圆一百多里的深山密林之中，交通不便，绝大部分山路坎坷不平，陡峭难走。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个偏僻山区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上坡，东西俩小屯，隔山又隔河，要想串亲戚，来回一天多。”在这样偏僻的深山密林中，怎样开辟一条放映路线，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主席著作给了这个放映队的队员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毫不畏惧地承担起这个任务。他们以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称赞的张思德同志为榜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动力，决心吃大苦，耐大劳，把电影送到深山

密林中去，送到山区农民的家门口去。为了在山区放映电影，他们冬踏没膝雪，夏冒暴雨淋，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迎着困难前进。他们每巡回放映一次，要翻几十座大小山岭，趟几十条大小河流，历时一个月，步行四百里。有的地方不但得帮牲口拉车，而且得背着机器才能通过。如一九六一年春天，拉放映设备的牛车，走在一个大岭底下，被刚刚融化了的泥水陷住了。这时，他们宁肯自己吃苦，也不影响农民看电影，立刻背起机器、行李向山顶上爬去。一个人背七、八十斤重，走起来拖泥带水，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们虽然又冷又累，可是心里充满了愉快，一边向山顶攀登，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有的农民感动地说：“这帮小伙子真是铁打的硬汉子。”群众称赞他们这个电影放映队叫“三不悞”放映队，即早晚不悞，远近不悞，晴雨不悞。

经过几年奋战，这个电影放映队在他们放映的范围内，开辟了三十三三个放映点，使放映区内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民，能够不出五里就看到电影。然而他们并没有满足。有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谈到要用“完全”、“彻



底”的高标准为人民服务，他们就逐村研究普及放映情况，算来算去，还剩下一个只有九户、四十四口人的虎曲小村看不到电影。因此，大家认为普及放映工作只能算基本上完成任务。为了把“基本”换成“完全”、“彻底”，让放映区内各村的人都能看到电影，他们决心消灭放映空白点，把电影送上虎曲村去。他们在勘查了进村的道路后，便背起行李出发了。道非常难走，不仅山路崎岖，还要翻五道大岭，许多地方都要背着机器从夹壁中穿过去。当他们爬上第三道大岭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在休息的时候，他们联系毛主席著作，漫谈起来。有的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阶级观点，为了让虎曲村的阶级弟兄看到电影，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出来。”有的说：“山高高不过大雪山，水深深不过大渡河，我们要踩着革命先辈的脚印前进。”于是，他们一鼓作气，又连爬了两道大岭，终于到达了那个极其偏僻的虎曲小村。农民看见了他们，高兴得欢呼跳跃，纷纷跑到村口迎接。当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兴奋得手舞足蹈，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说：“毛主席在北京就摸透了咱们的心思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生产，建设边疆，回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如何减少放映工作的盲目性，做到有计划的放映，增加巡回放映的次数，使农民多看电影，这是他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从

一九五八年开始，他们进行了放映区域基本情况的研究工作。对于各个自然村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以及邻村距离等，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制订了普及放映规划，合理地确定了放映点、放映路线、放映时间、放映场次、收费标准。经验证明：实行规划放映是普及电影放映的重要措施。

这个山区兄弟民族杂居，百分之九十是朝鲜族，大多数听不懂汉语。为了能让朝鲜族的农民兄弟看懂电影，这个电影队煞费苦心，想了不少办法。十年来他们进行了数十次的研究、试验。起初，主要是用印发、张贴朝鲜文电影说明书和海报等办法，帮助朝鲜族农民兄弟理解电影的思想内容。后来又采取了在放映过程中用朝鲜语插话解说的方法。一九五六年以后，他们又运用了“对口型配音解说”的方法，即由解说员根据电影中人物的对话，用朝鲜语配音。这个办法，不仅要求配音准确，对上人物说话的口型，而且还要求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为了做好电影的配音工作，电影放映队的同志起早贪黑，甚至吃饭、走路都在琢磨如何把配音解说搞好，同时，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经过长期的刻苦钻研，勤学苦练，他们终于掌握了对口型配音解说的规律，能够学男像男，学女像女，分清老少，分清好人坏人。领导上表扬他们，群众鼓励他们。群众说：



“嘿，就像看翻譯片一样，真过瘾。”

但是电影放映队的同志并不满足于这一成绩，他们决心继续努力，乘胜前进，搞一个装置，使对口型配音解说能通过涂磁录音的方法进行。在县电影管理站及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进行了研究、试验。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技术知识和经验也不多，因此在试验“十六毫米涂磁录音装置”过程中，碰到不少困难。他们知道涂磁录音需要磁粉，但磁粉是啥样，却没有见过。为了突破这一难关，他们便根据仅有的一点资料，用土办法制造磁粉。第一次制成的磁粉，涂磁录音后，仅有沙沙的杂音。第二次制成的磁粉也不合乎规格，失败了。但连续失败并没有使他们气馁。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又进行了反复试验。放映队队长、共产党员李兴石为了突破一个技术难关，不分昼夜地学习、钻研，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几夜睡不好觉。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战，他们终于试验成功了“十六毫米涂磁录音装置”。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技术革新，也是电影解说工作的一个飞跃。有了这个解说工具，既缩短了配音的准备时间，又减轻了解说员的劳动强度，还大大地提高了解说工作的质量。

他们在很早以前，还研究过一种可以使一个场地的观众，同时听到两种民族语言解说的方法。在试验成功“十六毫米涂磁录音

音装置”以后，他们又对这个办法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使其更加完善起来。这样，他们就解决了民族杂居地区农民都能看懂电影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电影的宣传教育效果。

如何使广大农民都看得起电影，也是这个电影放映队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发扬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爱机护片，节约开支，花一分钱也要和降低收费标准、减轻农民负担联系起来。他们是爱机护片的模范，曾多次受到县、自治州和省的表扬。他们对待机器就像战士爱护武器一样，经常检查，经常修理，爱护备至。如果机器放映后不便搬动，他们就整夜守在机器旁边。如果走山路，牛车颠簸震动机器，他们就把自己的行李垫在机器下面。共产党员李珉洙每次走路都是跟在牛车后面，遇到石头多、坡度大的地方，他总是带头背起沉重的机器走在前面。队长李兴石把机器看成是自己的心尖子，没事就拆卸下来一件一件地擦，不让它沾上一点尘土。有人形容说他保养的机器可以当镜子照。有一次去斧洞大队放映，装满机器、影片的牛车经过鹰嘴子一段险恶的山路时，由于坡陡，路滑，牛失前蹄，大车突然拖着老牛向悬崖下滑去。在这紧要关头，李兴石毫不犹豫地用大腿挡住车轮，虽然受了伤，却避免了一次严重的事故。过后他说：“就是豁出命



来我也要把机器、影片保住，这是咱们电影工作的‘武器’呀。”十年来，由于他们精心爱护，这个队所使用的机器没有发生过一次责任事故。他们的发电机已经使用了十年，工作了八千六百多个小时，至今仍然可以正常发动。

他们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他们的设备没进工厂修理过，大修小修全是自己动手。他们还设立了一个节约箱，人称“万宝囊”。里边装满了钉子、螺丝帽、旧机件、旧工具。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随手拣来的。他们除了利用这些废品旧物修理机器以外，有时还用它们无偿地给贫农下中农修理缝纫机、收音机、广播喇叭等。有一次节约箱里的一根唱针掉在地上了，李兴石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它找到。当时有人说：“一根唱针不值几厘钱，何苦费那么大的事呢？”他却说：“一厘钱也是人民的财产，不能丢。”本来每场电影汽油消耗费定额是两元，经过他们的努力，现在已经降低到两元钱以下。

十年来，由于他们不断降低放映成本，合理调整收费标准，因而曾四次降低电影包场费。以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相比较，已经降低了百分之四十，使农民花很少的钱就能看到电影。

和龙县第一电影放映队的同志们正确地认识到，在农村放映电影，是党对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自觉地把他们的工作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联系起来，使电影充分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他们经常紧密地配合党在

农村中的各项任务来放映不同的影片。如当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他们就放映《白毛女》、《槐树庄》、《夺印》、《李双双》；进行水利建设时，他们就放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边防民兵进行军事训练时，他们就放映《地雷战》和《铁道游击队》。他们还绘制了一批幻灯片，利用幻灯来进行宣传鼓动，表扬好人好事。此外，他们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群众开展业余文化活动。他们挤出时间来辅导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代售革命图书，帮助业余剧团排戏，教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写黑板报，写标语，甚至当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他们走到那里，那里就歌声四起，立刻热闹起来。因此，群众说他们是山里的“宝”。

和龙县第一电影放映队，在放映工作中所以能够突出政治，面向生产，是他们长期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努力使自己思想革命化的结果。他们把《毛泽东选集》视为珍宝，走到那里，带到那里，学到那里。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并且处处以毛主席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依靠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坚持与贫农下中农相结合。他们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经常帮助群众干活，给群众办了許多好事，群众写了許多信表扬他们。近年来，他们还利用休息时间访贫问苦，听群众讲家史和屯史，在进行忆苦思甜的自我教育中，培养自己的工农感情，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下定决心，要全心全意为农民放映一辈子电影。



把书送到农民手里

崔月仙

我做图书发行员的工作已经七年了。七年来做出了一些成绩，这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学习毛主席著作取得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使我逐渐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我越来越热爱这项工作，并决心在这个岗位上为农村读者服务一辈子。

开始做这个工作时，我还是一个十七岁的不大懂事的小姑娘。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当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吉林省安图县长白山下的松江屯，建立了一个新华书店松江门市部，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把我从农业生产战线调到这个门市部做营业员。

新成立的小书店，条件很差，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刚一来还挺高兴，时间一长就泄劲了。一个人既管书，又管钱，还要管账，再加上业务工作不熟练，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当时我想：在这老山沟里整天跟书打交道有啥前途呢？干这玩意儿还不如回家种地，虽说泥一把水一把的，可是总比干这个省心哪。这样，就渐渐地不安心起来。这时候党支部正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党支部的同志对我说：“你也参加学习吧，读读毛主席的书，你的脚跟就站稳当了。”从此以后，我就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我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对照检查自

己。我是贫农家庭出身，爸爸妈妈在旧社会受了多半辈子苦，小弟弟还是在那个时候活活被冻死的。因此，毛主席的话就好像对着我说的一样，句句说在我的心坎上，越读越亲切。通过反复的学习，我逐渐地懂得了：一个人活得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他干的是什么工作，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高尚的人，主要是因为他有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品质。而我却想的是个人得失，不安心工作。看看人家，想想自己，相差得太远了，我心里感到很惭愧。我想，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没有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像我这样出身贫农家里的女孩子，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吗？能有我的工作吗？我不好好地工作，这不是忘本了吗？于是我便暗暗地下了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向革命先辈学习，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山区人民献出我的青春。思想对头了，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也就热爱了。

我工作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山成群，树成林，方圆一百多里地只有这么一个小书店，大部分村子离门市部远，交通不方便，农民到门市部买一次书太不容易了。我曾想，如何才能使农民节省些时间，既不耽误生产，又能及时买到所需要的书呢？若是改变守门待客的办法，顶着图书



走村串屯不是会便利群众吗？记得我刚调到书店来时，党支部的同志就曾对我提过：“山沟里的书店站柜台等读者上门不成，要走出门，把书送到农民手中去。”那时没听进去。读了毛主席的书，认识到应该这样做，我便向党支部提出这个想法，党支部的同志对我说：“流动卖书困难多呀，得有一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才成。”我已下了决心，便用毛主席的话回答说：工作就是斗争，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在党组织的鼓励下，我就顶着图书和年画下乡了。走了几个村子，走到哪个村子，哪个村子的农民都高兴地把我给围上了，问寒问暖的，非常亲热。有的农民说：“若不是你送上门来，今年我又贴不上年画了，为了买张年画耽误一天生产不上算哪。”也有的说：“你要是能常来就好啦。”听了群众的这番议论，心里热乎乎的。从此我就经常下乡流动卖书了。开始的时候还是在附近的村子，后来，逐渐地就扩大到了边远的山区。

到边远山区卖书的困难更多一些，要多跑路，而且路还不好走。有一次我到一個偏僻的公社去卖书，在这个公社卖完书天已经快黑了，我急着第二天到其他公社去，便决定贪黑返回书店来。这时候正是三九天，森林里雪大，路滑，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子刮似的。再加上是走黑道，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起来相当吃力。当我走回书店的时候，脚也磨破了，手也冻肿了，把妈妈心疼得直打转。妈妈非让我在家休息几天不可，可是我一想到毛主席的教导，说什么也躺不住了。我背着妈妈包扎了伤口，穿起爸爸的大棉鞋又出发了。我连续奔走了七天，把四百多册

图书送到了群众的手里。

到一九六四年五月间，我所服务的四个公社大多数村子都走到了，只有一些极边远的小村子还没有去。二道白河公社有个奶头山生产队，在长白山脚下，这个村四周全是原始森林。为了消灭这个空白点，我打算顶书上奶头山。这时候有人劝我说，奶头山人烟稀少，什么野兽都有，你一个姑娘家还是别去了。我过去没有走过这么背的道，心里也没底，可是一想到这个村的群众渴望着看到图书的时候，胆子也就壮了：怕什么，路是人踩出来的，非征服这个难关不可。通往奶头山的路确实很难走，不仅要在树棵子里钻来钻去，而且有时候还得踩着草根过像泥浆塘一样的“草甸子”，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在锈水里边，弄得满身都是泥水。跌倒了，或是走累了，我就想，红军长征时过雪山草地比这困难得多，我给农民送几本书吃点苦又算什么呢？为了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强大起来，我把图书送到农民手中，鼓鼓他们的生产劲头，还有什么做不到的。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终于到了奶头山。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对我非常亲热，说我像“及时雨”一样。

我服务的地区共有一百二十多个生产队，这几年差不多我都到过了。步行了约一万五千多里，发行了图书、课本和年画共计三十多万册（幅）。

上山下乡流动卖书是为了便利农民的，可是这个做法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开始一段时间，有的农民对我提意见说：“我们大老远的来买书，你却把门一关下乡了，这怎么能行呢？”我一琢磨觉得这话说得对。这是流动卖书和开门营业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是



在时间的安排上。因此我就留心看门市读者买书的情况，发现到门市部买书最多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其他时间买书的很少。根据这个规律，我便把流动卖书的时间安排在下午四点以后，或者是我的公休时间。宁可自己多受些累，少休息，尽量做到门市营业和流动卖书两不误。如果是到边远地区流动卖书，我就把读者急需的图书委托临近的机关、单位代卖，并在书店门上贴上个字条，说明我流动卖书去了，来买书的请到某处去买。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流动卖书和门市营业的矛盾。

送书上门是一个方便群众的好办法，但是送什么书去，却是一个问题。开头我是盲目地送，因此有时候爬山越岭连跑几个生产队也卖不了几本书。当时我还以为是群众没有买书的习惯，后来我才发现是我带的图书不符合农民的心意。什么样的书才符合农民的心意呢？毛主席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因此我便通过各种方法去摸群众的底，了解群众的需要。在门市部营业的时候，我就向常下生产队的公社干部了解；流动卖书的时候，我就向群众了解。并和一些农民读者建立了通讯联系，书店来了新书我就写信告诉他们，群众需要什么书他们也写信来让我给带去。有一次，一位读者告诉我：“我们村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很多，就是缺书。”根据这个意见，我又重点地调查了几个生产队，许多社员也有这个要求。从这以后，每次流动卖书都尽量多带一些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群众感到很满意。

做了几年发行工作，我渐渐地懂得了，为农村服务的图书发行工作，主要应该为农

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毛主席说过，文化工作是要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所以，我下乡上山时总想能和党的中心任务挂钩。一九六三年冬天，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知道一些公社在开干部会的时候，便顶着六、七十斤的书包到这些公社去卖。

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不断提高，我感到，做为一个革命的图书发行工作者，不仅要想办法把图书送到农民的手里去，而且还应该帮助农民了解图书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既当营业员，又当宣传员。这几年我发行了成千上万册毛主席著作，深深体会到了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情。有一位老农民对我说：“毛主席的书就是给咱们写的，我不认字，可也得卖给我一本，好让孩子常给我念道念道。”为了满足群众这种如饥如渴的要求，我常利用流动卖书的机会，帮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协助十四个生产队建立了十八个学习小组，有三百多人参加了学习。

记得有一次我到杨木生产队去卖书，看到许多青年干完活坐在一起闲谈天，有的还问我有没有旧小说。当时我想：应当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然他们就会被那种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旧小说拉过去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想法向团支部书记讲了，团支部书记很高兴，第二天就成立了一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这个生产队的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变化很大。后来那个要买旧小说的青年还当了生产队的出纳员。杨木生产队还有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青



年，由于受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爱劳动，思想落后。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于是我便和他交朋友，帮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来他也转变了，还加入了共青团。他给我写信说：“你帮助我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好好劳动，为建设美丽的山村贡献力量。”

我还利用各种机会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例如，一九六五年春天，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行有关忆苦思甜的进行阶级教育的图书时，我一边走乡串屯卖书，一边向群众讲解《罪恶的地主庄园》挂图。在二十三天中我讲了三十一次，听众有三千八百多人。每当我讲到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贫苦生活时，就自然地联想到我的家史，因此我一边讲一边流泪，群众也一边听一边流泪，唤起了群众憎恨阶级敌人的阶级感情。新华大队一位老贫农领着儿子来听讲，听后对他儿子说：“一定要记住阶级仇恨，当革命的接班人。”

我接触的读者中有很多是少年儿童。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懂得了培养教育年轻一代，是关系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他们到书店来，我就向他们介绍好书，帮助他们选购，还给他们介绍毛主席著作中讲的模范人物的故事，把书店变成了向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因此，学校还聘请我当了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

我们门市部的主要发行对象是广大农民，同时也担负着森林企业和边防驻军的图书供应工作。我除了经常把图书送到森林企业和驻军营地以外，还尽自己的力量，多方面满足林业职工和解放军战士的需要。一九

六三年夏天，某森林保护部门的一位医生来书店买《农村医生手册》，恰巧这本书已经卖光了。若是在我刚来书店工作的时候，我只说一声“没有”就完了，可是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对这个问题处理的态度就不同了。看到他那失望的神情，真比我自己买不到好书还难受。我记下了他的工作地点和姓名以后，立刻向上级书店联系，在上级书店的帮助下终于调来了这本书。当我把这本书亲自送到这位医生手里的时候，他很感到意外，说是没想到能这么快就买到了这本书。有一次一位驻军同志来门市部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时汉文版的早已卖光了，上级书店也没有。仅有的几本朝鲜文版的他又看不懂。为了帮助他买到这本书，我利用早晚的休息时间，连续访问了二十多位朝鲜族读者，希望从他们中间找到一本汉文版的，好用朝鲜文版的兑换。我一进屋就看人家的书架。他们和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书店来的客人，进门就看书架。”经过十多天的时间终于兑换着了一本汉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位解放军同志接到书后来信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保卫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给医生和解放军同志买书这两件事情，若是在以往我总会认为是多管闲事。可是现在我却这么想：当人民的勤务员，这样的“闲事”管得越多越好。

七年来，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可是距离党的要求还很远，我决心今后要更努力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战士、红色图书发行员，使我工作的山区小书店，变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更好地为山区农民服务。



人类认识化学元素的过程

刘 际 启

世界上无限多样的物体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现在我们知道，日常所接触的多得数不清的物体，都是由数目有限的近一百种化学元素构成的。从化学组成的角度来看，这些物体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单质，即由一种元素构成的，例如铅丝、铜块等等；一类是化合物，即由两种以上的元素构成的，例如水、食盐、化学肥料等等。化学元素是化学上最简单的物质。例如，水可以分解为氢和氧两种成分，食盐可以分解为氯和钠两种成分，化学肥料中的硫酸铵可以分解为硫、氧、氮和氢四种成分。而氢、氧、氯、钠、氮、硫则不能用化学方法再分成更简单的成分，它们就都是化学元素。

人类对化学元素达到今天这样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伴随着生产和科学发展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化学元素的认识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

化学元素是 组成物体的各种性质

人类对化学元素的认识，在近代化学元素观念形成以前可以算作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的时间最长，包括了整个古代和史前时代。

化学和人类的生活需要有着密切关系，

因而它是最古老的科学之一。人类自从脱离了动物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之后，就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物体，使它们合乎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不仅需要改变物体的数量、形式和位置，而且需要改变物体的性质。火是人类最早发现和掌握的能够改变物体性质的化学手段。火的利用，不仅使人类获得了熟食，而且逐渐发展出了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等化学工艺。农业生产发展以后，人类又从谷物发霉变质现象中，发现和掌握了发酵的化学工艺。我国殷商时代饮酒风气的盛行，表明三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已很会运用发酵这一生物化学过程来酿酒了。人类就是在这种改变物体性质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大量的化学知识，逐渐产生了化学。

古代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千万次地观察到各种物体性质的变化，逐渐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有一些性质是一切物体的基本性质，这些基本性质的不同组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单纯具有一种基本性质的东西就是元素。例如，我国古代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元素说，古希腊有土、水、气、火的四元素说。

这种古代元素观，给化学的原始形态——炼丹术（包括炼金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古代元素观把一切物体看成是由它的各



种性质构成的，因此认为只要设法改变物体的性质，就可以把它变成另一种物体。我国古代的炼丹家认为，“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卷）这就是幻想把金丹（昇华硫化汞）和黄金的抗腐蚀性移植到人体中来，使人变得和金丹、黄金一样永不朽败。炼丹家们还认为，如果给不值钱的金属设法加上黄金的性质（金黄色、光泽等等），就可以把它变成贵重的黄金。产生于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的我国古代炼丹术，后来通过阿拉伯传入了西欧。由于炼丹家们所从事的活动符合于统治者企求长生不老或贪得无厌的欲望，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

炼丹家们所根据的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幻想，当然不会获得成功。但是，炼丹家们在进行改造物体性质的大量探索性的实践活动中，却熟悉了不少化学元素和它们的化合物的性状，积累了很多化学知识，创造了一些化学操作方法，因而对化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炼丹家们所炼制和使用的金石药物，主要是汞、铅、砷等的化合物，其中可溶性的都具有强烈毒性，因此，不仅不能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毒的惨剧。于是，炼丹术就逐渐被人抛弃。我国大约从公元十二世纪（南宋）起，炼丹术的化学就逐渐让位于“本草学”的化学；在遗留下来的本草学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化学史的重要资料。在西方，炼丹术在化学中的地位，也从十五世纪开始逐渐被医药化学所取代。

实践在前。人们不是在有了认识之后才去实践，而是在有了长期实践经验之后，才能概括出理论，得到正确的认识。人类在还没有认识到能量转化规律以前，就老早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了这一规律。同这一样，在整个古代，人们尽管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化学元素观念，但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却事实上已经发现和合理利用了许多化学元素。在公元前就已被发现和利用了有金、银、铜、铁、锡、铅、碳、汞、硫等九种元素，公元后又陆续发现了砷、锑、铋、锌、磷等元素。

我国古代由于生产发展水平较高，对许多化学元素的发现早于世界各国。例如，明朝宣德年间（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关于著名的宣德炉（香炉）的制造，证明我国当时已经能生产金属锌，早于西方三四百年。

化学元素是组成 物体的最简单的物质

资本主义的兴起，生产发展的需要，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化学在为冶金、火药、染料、制酸、制碱等化学工业服务的过程中，积累起来了大量的资料，逐渐抛弃了旧观念，形成了科学的化学元素观。

到十七世纪，人们从炼丹家们的失败中逐渐认识到，古代的物质观和元素观是错误的。物体并不是由性质组成的，相反，是物体本身具有着各种性质。不能把元素看作性质，元素是具有一定性质的最简单的物质。例如黄金，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能使它分解成更简单的部分，因此它是一种元素。黄金具有自己的各种特性，这些特性是不能随意改变的。这就是炼丹家们把低劣金属改造成



黄金的企图不可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认为化学元素是具有一定性质的最简单的物质，这种观点无疑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当时在技术上，还不能分辨出已知的物质中哪些是化合物，哪些是元素，因此，事实上还没有真正形成科学的化学元素观。这就不能不使化学又被司太尔和柏策所创立的燃素说统治了一百年。

当时人们不了解物体的各种特性是怎样形成的，因而想象出了许多微素来解释。例如，物体有重量是因为含有重素；有磁性是因为含有磁素；物体发热是因为有了热素，等等。化学上的燃素说，也正是当时用来解释物体燃烧现象的一种微素说。燃素说认为，某一物体能够燃烧是因为其中含有燃素，燃素是构成可燃物的一种元素，在燃烧过程中，燃素从物体中飞散掉，剩下的就是灰烬或渣滓。

根据燃素说，许多可燃的金属元素都被看作含有燃素的复质，而燃烧后生成的金属氧化物反被认为是元素。这是一种颠倒了事实的理论，但它却能对当时化学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作出一致的不相矛盾的解释。例如，燃素说关于由矿石冶炼成金属的过程的解释就相当简单而自然：金属是由矿石（或金属燃烧后生成的渣滓）和燃素合成的，因此把矿石和含有丰富燃素的煤炭之类的东西共同加热，煤炭中的燃素就跑出来和矿石结合成金属。

燃素说甚至还帮助化学完成了重要发现。有人在精制酒石酸时想去掉溶液中的混浊物，认为这可能是酒石酸中放出的燃素造成的，因而设想，用对燃素非常贪婪的木炭

可能把它吸掉，试验结果，真地制出了极好的酒石酸结晶。就这样，既解决了酒石酸的精制问题，又发现了木炭这种多孔性物体吸附杂质的特性，给以后防毒技术奠定了基础。

这类发现，似乎更加证实了燃素说的正确。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化学进入定量实验时期，燃素说才一步步被推翻。

在化学上没有采用定量的实验方法以前，燃素说是很难被推翻的。例如，化学家们早就发现，金属经过煅烧，并不因为失去燃素而减少重量，反而增加了重量，这分明是和燃素说相矛盾的。但当时却有人辩解，这是由于燃素具有负重量，所以失去燃素后的金属会增加重量。现在，化学家们在密封容器中煅烧金属，煅烧前和煅烧后称量密封容器，重量不变；开封后进入空气，重量增加，而增加的重量等于金属上增加的重量。这表明，金属增加的重量是从空气里得到的，不是失去燃素后造成的。

化学家们采用定量实验法以后，在硷性物质研究中，发现了很多和燃素说的解释相反的事实。

人们当时把硷类分为温和性的和苛性的两种。根据燃素说，认为苛性硷中含有燃素，失去燃素后就变为温和性硷，所以温和性硷是比苛性硷更简单的基本物质。有的化学家，把苛性石灰放在捕集气体的仪器中，企图捕集燃素，但等到失去苛性后，并没有捕集到燃素，同时石灰的重量反而增加了，空气的体积也显著减少了。这一方面说明，苛性石灰失去苛性的原因不在于失去燃素，而在于吸收了一部分空气；另一方面说明，温和性硷不比苛性硷成分简单，而是比苛性硷



多含一部分空气。

化学家们作了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一切温和性硷经过加热都放出气体，减少重量，变成苛性。而放出的气体，重量恰好等于温和性硷所减少的重量。并且发现，这种气体跟人所呼出的气体没有区别，跟一些可燃物体燃烧时所生成的气体也没有区别。当时的化学家们，根据这种气体是固定在硷性物质上面的一种空气，所以把它叫作“固定空气”。这实际上就是碳酸气。

此后，化学家们的兴趣集中到气体研究上，接连发现了氢、氧、氮三种重要的气体元素。而由于氧的发现，阐明了燃烧现象的本质，揭开了许多有关化学现象的真相。原来，燃烧是物质的急剧氧化现象。金属煅烧时和空气中的氧化合，所以增加重量。含碳物质燃烧时产生碳酸气，把矿石（金属氧化物）和炭一起燃烧，炭就和矿石中的氧化合成碳酸气，使矿石还原成金属。这就是金属冶炼过程的实质。温和性硷就是硷金属的碳酸盐，加热后会放出碳酸气，变成苛性硷；苛性硷放在空气中，和碳酸气化合成碳酸盐，就失去苛性变为温和性硷。这样，燃素在一切化学变化中都失去了存在的余地，因而彻底否定了燃素说。

十八世纪末发现了定比定律，即每种化合物的组成成分是固定不变的。十九世纪初又发现了倍比定律，即在同样两种元素所形成的不同化合物中，若把某一元素的分量固定，则另一元素的分量彼此间必成为一个简单的整数比。为了合理解释这两个定律形成

的原因，产生了原子—分子学说。根据原子—分子说，每种物质都由分子组成，而同一物质的分子都由同一数目的一定种类的原子所构成，所以它们的组成是固定不变的；分子永远由整个的原子所构成，所以组成每种物质的各个成分互成整数比。原子—分子说确立后，接着又创立了化学元素符号和分子式，简明而科学地记述了化学反应过程。

到这时，人类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化学元素是不能再分割的最简单的物质，它的最小单位是原子，不同元素原子的一定的结合，构成各种物质的最小单位——分子。因此可以说，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初，原子说产生后，科学的化学元素观才初步形成。

发现化学元素的周期律

原子—分子说的确立，使人类对化学元素的认识深入了一大步。按原子—分子学说，自然界中数不尽的物体都是由种类不多的元素的原子构成的。但是，自然界究竟有多少种元素？这个问题给化学家们带来了新的困惑。

随着工业的发展，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在十九世纪初，已知道的元素是二十八种，而在十九世纪的头五十年中就发现了二十七种，等于以前发现的总和。看来，新发现的元素几乎是有增无已。

同时，新化学元素的发现完全是偶然性的产物。库尔特瓦在研究海藻灰时，由于不慎把硫酸加多了，突然在杯子上出现了紫色蒸气，凝结后成为黑色带金属光泽的结晶，



无意中发现了碘。巴拉在试验盐卤时，通进氯气后，忽然发现盐卤变成了棕色，从而分离出了溴。

帮助化学家们摆脱这种困境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门捷列夫关于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是在认识了化学元素的最重要而又密切相关的两大特性——原子量和原子价的基础上发现的。

到原子说确立时为止，人们所知道的各种元素的原子间的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重量不同。原子量就是各种元素原子间的相对重量。要测定原子量，必须知道一个分子中究竟有几个什么样的原子。例如，在水的构成中，氢和氧的重量比是1:8，如果一个水分子中含氢和氧的原子各一个，那末1和8就是两者的相对重量，如果一个水分子中含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那末两者的相对重量就是1和16。当时，主要是对那些可以采用体积测量方法的不多几种气体，能够弄清楚分子构成，对于其他大多数物质的分子构成只能靠猜测。

此后，又过了五十多年，发现了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价就是元素的一个原子只能严格地和一定数目的其他原子相结合的能力。例如，氯、钠等能同氢一对一结合的叫作一价元素；氧、锌等能同一价元素一对二结合的叫作两价元素；如此等等。知道了元素的原子价，就可以比较容易弄清某一化合物的组成，即一个分子中各含有哪种元素的几个原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俄国化学家门捷

列夫，在对当时已知的六十三种元素的原子量、原子价和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特性进行了长期深刻的研究之后，发现这些元素并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在相互间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的关系，按照原子量的大小依次把各个元素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到，元素的原子价和化学性质发生周期性的重复。例如，在门捷列夫所排的周期表中，第一横列的锂、铍、硼、碳、氮、氧、氟这七个元素的性质，是按照从金属到非金属的顺序变化的。锂是最强最活泼的金属，铍是不大活泼的金属，硼的金属性很弱，碳是介于金属和非金属之间的过渡元素，氮是不活泼的非金属，氧是活泼的非金属，氟是最强最活泼的非金属。第二横列的钠、镁、铝、硅、磷、硫、氯等七个元素，就基本上重复了第一横列的七个元素的性质。周期表中每一纵列的各元素构成一族，它们的原子价相同，原子量依次增大，化学性质也依次增强或减弱。例如在第一族中，锂和水化合时很平静，钠则化合得很猛烈，而钾和水化合就要发生火光。

元素化学性质的这种依原子量增加的顺序而发生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就是元素的周期律。周期律第一次使人们在认识化学元素方面具有了科学预见的能力。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使人们有可能判断化学家们所测定的原子量是否正确。铍原来被认为是三价，根据对氯化铍的分析知道，同35.5克的氯相化合的铍是4.7克，因此认为它的原子量是4.7的三倍，即14.1。门捷



列夫排周期表时，开始曾把铍排在氮和氧之间，但他发现，铍的一切特性都同三价的硼和铝不同，而同两价的金属镁、钙、钡很相似；同时在一价的锂和三价的硼之间还空了一个位置；因此他断定铍的原子量应该是4.7的两倍，即9.4，大胆地修改了铍的众所公认的原子量，把它放在锂和硼之间的位置上。他还改正了其他一些元素的原子量，使它们符合周期律的要求。以后，这些修改都得到了证实。

周期律还克服了发现未知元素方面的盲目性。周期表好像元素的花名册，那些空着的格子就是还没来报到（没被发现）的元素的位置。因此，元素的种类并不是无限多的。人们可以根据周期表中的空位，预知还有哪些元素没被发现。门捷列夫预言了三种元素的存在，即在原子量为40的钙之后和原子量为50的钛之前的空格里，还应该存在一个原子量接近于45的“类硼”；在铝下面的空格里还应该存在一个原子量约为68的“类铝”；在硅下面的空格里还应该存在一个原子量约为72的“类硅”。他还预言了这三种新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甚至指出了寻找方法。他认为，“类铝”很可能具有比较大的挥发性，因而将要由光谱分析法来发现；而“类硼”是不挥发的，很难用普通的光谱分析找到它。果然，一八七五年，法国化学家巴波德朗用光谱分析法发现了镓，证实了关于“类铝”的预言；一八八〇年，瑞典化学家尼尔松发现了钪，证实了关于“类硼”的预言；一八八五年，德国化学家文克勒发现了锗，证实了关于“类

硅”的预言。更令人惊异的是，当镓的发现人公布了他的研究结果后，收到了门捷列夫的来信，指出他把镓的比重弄错了，不应该是4.7，而应该是5.9到6.0，经重新试验，竟证明了门捷列夫是正确的。

在周期表上，从氢到锂、从氟到钠和从氯到钾，都是从强烈活泼的非金属到强烈活泼的金属的变化，门捷列夫在一八七〇年就根据这种性质上过分突然的跳跃，猜想在这里可能存在一族带有特殊性质的未知元素。果然，一八九四年，拉姆塞发现了位于氯和钾之间的氩；一八九五年，拉姆塞又发现了位于氢和锂之间的氦；一八九八年，拉姆塞和特拉弗斯一起，先后发现了位于溴和铷之间的氙、位于氟和钠之间的氖、位于碘和铯之间的氡。这五种元素组成了周期表上新增加的零族，即惰性气体族，使周期表具有了更加完整的形式。

以上的事实，充分显示了周期律的理论威力。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是人类认识化学元素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它所创造的业绩，几乎使以前认识化学元素方面的一切成就都为之黯然失色。但是，周期律的发现决不是人类认识化学元素的终点，相反，只是科学地认识元素的起点，因为当时关于元素的本质和形成周期律的原因，还完全不了解。

把认识深入到原子内部

周期表上的各个元素本来是按原子量增加的顺序来排列的，门捷列夫还根据这一点



修改了一些元素的原子量，但他却留下了几处显然颠倒了顺序的地方没有改动，即原子量为 58.94 的钴原子序数是 27，而原子量为 58.69 的镍原子序数却是 28；同样，原子量为 127.61 的碲原子序数是 52，而原子量为 126.91 的碘原子序数却是 53。原子量为 39.944 的氩被发现后，按性质应是第 18 号元素，但原子量为 39.100 的钾却是第 19 号元素。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这些问题向人们暗示：表达元素性质的最基本的东西是原子序数，而原子量是次要的。为了解释这个道理，就必须把认识深入到原子的内部。

到一九一三年，人们逐渐认识到，原子不是最简单的东西，而是有结构的。原来，原子是由中心的原子核和外围的电子两部分构成的。原子核带阳电，电子带阴电，两者电量相等，性质相反。原子核的阳电荷越大，核外电子也就越多。核外电子按一定轨道以极高的速度绕核转动。电子多的原子，轨道就分为好几层，每层所能容纳的电子（或电子轨道）有一定的限制，超过一定限度，就要排到更外一层上去。例如，最里面的一层最多只能有两个电子，第二层最多可以有八个电子，第三层最多可以有十八个电子等。

现在，元素周期律可以得到深入一步的新解释了。

各种元素的核电荷恰好等于它们在周期表中各自的原子序数。这就表明了，周期表中钴、碲和氩等违反原子量递增顺序的排列是正确的。

化学变化和原子深处的电子没有多大关

系，只有最外层的电子的位置和运动发生变化。因此，原子最外层电子的数量和情况，决定着原子的化学性质。氢只有一个核外电子，因此是一价的。氦有两个核外电子，由于它的电子层非常稳固，即使取出一个电子也很困难，所以它是惰性气体。锂有三个电子，里面一层两个电子的排列和氦一样，外面一层有一个电子，所以它成为一价元素；外层的一个电子由于距核较远，容易离开核的吸引而失去，因此形成了锂的金属性和在化学上的活泼性。铍有四个电子，有两个在外层，所以是两价元素；但这两个外层电子所受核的引力比锂强些，所以铍的金属性和化学活泼性也都较逊于锂。硼、碳、氮、氧、氟、氖等依次在第二层上增加一个电子，因此依次成为三、四、五、六、七价的元素。而氖的第二层上是八个电子，又成为一个非常稳固的电子层，因而又是和氦一样的惰性气体。氖后面的钠有十一个电子，最外面的第三层只有一个电子，所以它又是一价金属元素；又由于最外面的电子离核更远，所以它也比锂具有更强的金属性和化学活泼性。其余与此相仿，最外层的电子总是从一到八重复增加，这就形成了元素化学性质的周期性重复。

原子结构阐明之后，周期表的排列形式也得到了改进。过去，不断有新的稀有土族元素被发现，已发现的又往往被判明不是单质而是其他土族元素的混合物。这就产生了问题：稀土元素究竟有多少？在周期表中究竟应该占有什么位置？现在问题解决了。根



据核电荷等于原子序数的原理知道，从镧到镱只能有十五个元素；而根据对原子结构的研究得知，这十五个元素虽然原子序数不同，但它们所增加的电子都不是增加到最外层上，而是增加到未完成的内层上，因此它们的原子价和化学性质几乎完全相同，都应归在第三族的位置上。这就使周期表中各元素的排列具有了更加严整的形式。

这样一来，元素周期律就应该从新表述。过去说，周期律是元素的化学性质随着原子量的增加而发生周期性变化的规律；现在应该说，周期律是元素的化学性质随着原子核电量的增加而发生周期性变化的规律。

改造原子核，创造新元素

认识了原子结构，使元素周期律得到了更加完整的阐释。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说明。原子的重量几乎全部集中在原子核上，因此原子量的增大就意味着原子核的增大，核电荷也应该按比例增大。第1号元素氢的核电荷是1，原子量也基本上是1；第2号元素氦的核电荷是2，比氢增大了一倍，但原子量却是4，比氢增大了三倍。这是不好理解的。一九一三年，又发现了同位素，知道了同一元素的原子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钾这种元素就有原子量各为39、40和41的三种不同的原子。这三种原子的核电荷相同，即化学性质相同，所以它们都处在周期表上第19号格子里，都是钾的同位素。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看来，还必须把认识深入到原子核的内部去。

早在十九世纪末，居里夫人发现了第八十八号元素镭的放射性现象的时候，就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原子核也是有复杂结构的東西。一九三〇年发现了中子后，使苏联科学家伊万年柯，在一九三二年创立了关于原子核结构的理论，解释了上述问题。

原子核结构理论指出，一切元素的原子核都是由质子和中子两部分构成的；质子带正电荷，质子数等于原子序数；中子重量大体和质子重量相等，但不带电荷；质子和中子的总数基本上等于原子量。氢核只有一个质子，所以原子序数是1，原子量也基本上等于1。氦核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构成，所以氦的原子序数是2，而原子量却是4。

原子核结构理论也解释了同位素的秘密。同位素原子核中的质子数是相同的，因此原子序数和化学性质相同，但中子数不同，因此原子量不相同。例如，钾的三种同位素的原子核中都有十九个质子，但钾39有二十个中子，钾40有二十一个中子，钾41有二十二个中子。一切同位素原子量的不同，都可以由所含中子数的不同来解释。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接着就出现了新的疑问：既然中子数目不同可以形成同位素，那末，为什么同位素的数目有一定的限度，而没有任意原子量的同位素？譬如说，为什么钾不能有含二十三个中子以上的同位素？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使人类对化学元素的认识深入了一步。

对放射性元素的研究，终于使人们认识到，原子核好像一个由质子和中子所构成的



建筑物，中子的不适当地增加或减少，都会削弱原子核这个建筑物的坚固性。稳定的原子核，中子和质子之间有着一定的比例。较轻的原子核，中子和质子数大致相等。原子序数较高时，核内的中子数就逐渐比质子多起来。原子序数在84以上的原子核、质子或中子过多的原子核，都不稳定。不稳定的原子核会自行崩解(衰变)，放出多余的质子和中子，产生放射线，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如果新形成的原子核还不稳定，就要继续崩解，直到变成一种稳定的原子核为止。这就是不能有任何原子量的同位素的原因。

元素原子核的自行衰变的特性，就叫作放射性。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现象表明，元素是能够变化的，各个元素可以互相转化，一种元素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元素。例如，放射性元素铀衰变时，依次转变为钍、镤、镭等等放射性元素，最后转变为稳定的铅的同位素。

一九三四年发现，用甲种粒子(即氦核)射击原子核，可以产生放射性元素，以后又发现用质子、氘核、中子和丙种射线射击，也可以得到放射性元素。这种人工放射性的发现，使人类对元素的认知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化学元素不仅能够自然互相转化，而且能够用人工使它们互相转化，人们能够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元素了。例如，用中子射击第92号元素铀238，可以使它的原子核吸收一个中子，原子量增加1，转变为不稳定的铀239；铀239抛出一个电子，使核内的一个中子变成质子，核的阳电荷增加1，即原子序数增加1，成为自然界中所没

有的第93号新元素镎239。镎239的核是不稳定的，在放出一个电子之后，核电荷(原子序数)增加1，转变为另一个自然界所没有的第94号新元素钚239。现在，得到的人工放射性同位素已经将近一千种；到一九五七年，自然界不存在的、原子序数从93到102的元素，都已经用人工方法制造出来了。

* * *

最初认为，元素是物体的几种基本性质；以后认为，元素是构成物体的不能分割的最简单的物质；以后又认识了化学元素的规律性——周期律，能纠正对一些元素的错误认识，预言一些未发现元素的存在；以后又认识到，元素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物质，它只是在化学变化范围内不能再分割的最简单的东西，元素的原子是有结构的、可分的东西，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周期律；以后又认识到，原子核也是有结构的、可分的东西；接着又认识到，元素能够互相转化，也可以人工地使元素互相转化，可以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元素。概括说来，这就是人类认识化学元素的漫长而又不断深化的过程。

当然，直到今天，人类对化学元素的认知过程也没有完结。在化学上，关于分子结构的研究，在物理学上，关于核粒子的研究，等等，都正在不断发展，都将会带来对化学元素的新认识。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也是无限的。因此，人类认识化学元素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红旗

HONGQI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评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

一九六六年 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

目 录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

供状本刊评论员 (1)

苏共新领导鼓吹苏美合作的两本书 (10)

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本刊评论员 (16)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运用《实践论》总结民间测天经验段春作 (20)

《矛盾论》的思想进了水泥窑刘培顺 (28)

一万公里和一公里赵维会 (33)

“老规矩”是怎样一破再破的魏勤生 (34)

为人民站柜台，从实践中学本领杨瑾瑜 (36)

评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马 岩 (42)

一家贫农

——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二魏 巍 (52)

☆ 二月十一日出版 ☆



苏共新领导奉行 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本刊评论员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灵魂。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极力显示他们与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装起一副反美的样子，企图掩盖他们继续推行这条路线的实质。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他们在苏美合作方面，比赫鲁晓夫做得更加彻底，走得更远了。

苏共新领导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揭露他们的真面目，感到很恼火。他们破口大骂，说我们揭露他们的文章充满着“毫无根据的诽谤性和挑衅性的捏造”^①。

咒骂和诡辩是改变不了事实的。苏共新领导的大量言论和实际行动，他们的报刊文章，每天都在揭露他们自己。苏共新领导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一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籍，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一批书中，《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具有代表性的两本。

这两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些什么呢？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一书，是一九六五年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这本书虽然不能不谈到美国对外侵略的某些事实，说了一些指责美国侵略活动的话，但是它力图证明，这些坏事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干的，而同样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美帝国主义头子却不属于反动派之列，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谴责美帝国主义，不过是表面文章，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才是全书的实质。

这本书把美国统治集团分为“冷静的、明智的”和“好战的、侵略的”两个派别。书中说，

^① 苏联《真理报》1965年11月16日文章。



“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冒险主义的和侵略的趋势同冷静的和明智的趋势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正日益强烈地席卷着美国的真正统治者队伍——国内最大垄断组织”。书中还说，“美国社会生活中两种对外政策趋向，即两个集团——极端反动的疯狂侵略派和倾向于明智地估计现有力量对比、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冷静派之间的斗争已达极点。”

谁是这种“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冷静派”呢？照这本书的说法，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书中说，艾森豪威尔“代表比较温和的、无意实行自己的冒险主张和冒大战危险的人士”；肯尼迪是“受人民欢迎的”总统，“眼界宽阔，冷静地对待国际生活的迫切问题”，“了解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约翰逊是个“非常慎重而温和的政治家”，“不倾向于政治冒险”，他“得到人民的绝对委任，去实现旨在巩固和平、消除‘冷战’、谋求苏美接近的政策”。

这些战争罪魁怎么会忽然变成了和平人士呢？这些人民公敌怎么会忽然变成了受人民欢迎的总统呢？书中这样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涂脂抹粉，无非是为了推销苏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货色。书中说，“美国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地开始理解到，当前世界阶级力量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场所是和平经济竞赛”。在“核世纪”，“只有疯人，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美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示出了妥协的意愿”。书中说，只要苏美“和平共处”，“那么国际舞台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的竞赛和两个主要敌手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将限定在没有流血冲突与战争的、广泛的经济、外交、科学和文化的竞赛与合作的范围之内”。

这本书宣称，“苏美关系，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书中引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话，鼓吹“两大国——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对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书中说，苏联“致力于同美国的和平与合作，认为苏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首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键”。

那么，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轰炸社会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屠杀越南人民，会不会妨碍苏美关系呢？照这本书的说法，是不会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美之间也没有任何冲突。这本书强调“苏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所谓“两国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书中说，“除开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美国参加对苏俄的军事干涉这个污点之外，俄美和苏美关系没有为任何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乌云所笼罩。”“就是在现在，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的、经济的争执和冲突，它们的民族利益，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都没有互相冲突”。

《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书，是一九六五年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经



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批准出版的。这本书论述了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美关系史。它不能不提到美国侵略和敌视苏联的历史事实，但是，它的落脚点仍然是苏美合作，它强调“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为了替苏共新领导的苏美“全面合作”政策辩护，这本书不惜歪曲历史，硬说“苏维埃国家从其成立最初之日起就始终一贯地奉行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方针”，“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苏美关系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既符合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书中还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苏美合作，为永远结束美国统治集团战前的不现实的和缺乏远见的对苏政策，为发展战后时期卓有成效的苏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给苏美合作的政策制造根据，这本书极力渲染当今的美国统治集团是爱好和平的。书中说，现在“美国有势力集团中比较有远见和头脑清醒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实行比较现实的对外政策”，“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在现时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苏联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基础是和平共处及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进行竞赛”。

这本书强调，“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苏美关系的正常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书中搬出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中的这一论点：“改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对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对普遍和平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本书的腔调，同赫鲁晓夫的言论是一模一样的。赫鲁晓夫说过，“整个国际局势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①，“历史把对世界命运的巨大责任加于我们两国人民身上”^②，苏美两国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发生直接冲突，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共处”^③。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不过是照着葫芦画瓢而已。

很显然，这些书，完全是根据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的修正主义路线写成的。书中的话，就是苏共新领导所要说的话。这些书的出版，又一次证明了苏共新领导奉行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证明了他们的苏美合作的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他们追求苏美合作，不是个别的言行，而是根本的路线。这些书，

① 赫鲁晓夫 1961 年 9 月 8 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②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1961 年 12 月 30 日给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新年贺电。

③ 赫鲁晓夫 1962 年 4 月 20 日同美国出版商考耳斯的谈话。



就是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状。

乍看起来，这两本书用了不少篇幅叙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骂了美国的反动派。但是，只要仔细看一看，就不难发现，书中只是泛泛地谴责美帝国主义，而对美国统治集团的当权派，却极尽其吹捧之能事。尽管书中表示苏联反对美国的侵略活动，然而说来说去，总是乞求苏美合作。这种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无非是为了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为美帝国主义更好地效劳而已。

这两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揭穿了苏共新领导现在玩弄的种种欺骗手腕。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事实怎么样呢？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一九六五年，他们出版了这样一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宣称“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苏共领导人自己也多次出马，亲口说明了这一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一九六五年五月说，“我们主张发展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同《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的谈话中说，苏美两国“从长远前景的观点来看，主要的应该是，组织一切力量来抵制战争”，苏美两国应该动员自己的力量，“把这些力量用于发展合作和寻求各种争端的解决办法”。^② 这那里是什么反对美帝国主义呢？这些话难道不都是苏共新领导坚持苏美合作的自供吗？

苏共新领导装模作样地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人们可以看看，他们在自己出版的书中究竟是想证明什么。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把美国统治集团的当权派说成是“明智派”，说这些人“愿意和平共处”，“认识‘核世纪’的现实性”，懂得“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这岂不是等于说，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奉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美帝国主义不再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了吗？这些论点不是明目张胆地宣传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了吗？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尽管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之间尽管有剧烈的利害冲突，他们在奴役国内外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统统都是反动派。美国统治集团在反革命的方法上虽然有不同的主张，经常吵吵嚷嚷，这个说这种反革命方法好，那个说那种反革命方法好，但是，他们在维护国内反动统治和侵略世界各国的根本政策上，是完全一致的。世界上绝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明智”。如果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什么“明智”的

① 勃列日涅夫 1965 年 5 月 8 日在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

② 柯西金 1965 年 12 月 6 日同美国记者赖斯顿的谈话。



话，那不过是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明智”，对内压迫本国人民、对外掠夺世界人民的“明智”，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明智”罢了。苏共新领导热衷于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划分什么“明智派”和“反动派”，他们的实际用意，除了替美帝国主义打掩护，帮助美帝国主义者麻痹世界人民，又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苏共新领导有时也骂几句约翰逊。这不过是一种烟幕。这些书表明，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把美国总统说成是和平的天使，美国人民的绝对代表。他们这样做，道理也很简单。这是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总是把他们的赌注压在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身上，不论谁当了美国总统，他们都要极力地加以美化。

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耳光。当代美国的总统，那一个不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呢？约翰逊自己并不掩饰这一点。他在美国商会一九六四年年会上对美国垄断资本家说，“你们都是本政府的股东”，“我在进行你们雇用我来做的工作”。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他们独霸世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疯狂。“约翰逊主义”就是当代的法西斯主义。它赤裸裸地宣布，要使用武力来干涉世界上一切地方的事情，推翻世界上一切美国所不喜欢的政府。约翰逊政府正在战争冒险的道路上逐步升级。“约翰逊主义”是美帝国主义更加好战、更加冒险的表现。苏共新领导不顾一切地给美帝国主义头子脸上贴金，只能给他们自己出丑。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恪守列宁遗训”的。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列宁的呢？他们在这些书中，竟然把列宁说成是苏美“全面合作”政策的创始人，把苏美关系的历史描绘成一部实行“全面合作”的历史。这不是对列宁的背叛，对历史的歪曲，又是什么呢？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积极参加了武装干涉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帝国主义十字军。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美帝国主义继续用“饥饿的绳索”，企图阻挡苏联的发展。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苏美关系充满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同国际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剧烈斗争的表现。苏共新领导要在苏美关系的历史中抹去阶级斗争的内容，这是篡改历史，这是污辱苏联人民。

列宁在世的时候就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消灭俄国自由的刽子手和宪兵”^①，扮演了“世界革命的绞杀者和刽子手的角色”^②。列宁号召，“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

① 《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② 《全俄工、农、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1页。



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世界大屠杀的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①。列宁的这些话，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那么清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打出列宁的旗帜来掩护自己，但是，列宁的话恰恰最有力地揭穿了他们的面目。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忠实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但是这些书表明，他们是在说谎。宣言和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而这些书却大谈其苏美友谊。宣言和声明指出，全世界人民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这些书却极力鼓吹苏美合作。他们所忠实的，还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他们抬出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来，不过是采取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老手法，表面上承认它，实际上阉割它的革命原则，用漂亮的词句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本质。

苏共新领导说，他们是承认各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的。但是在这些书里，他们毫不掩饰地宣扬强权政治，活现出一副大国沙文主义的神气。在他们眼里，世界的命运是要由苏美两国的统治者来决定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应当围绕着苏美轴心打转，全世界人民的生存都只能仰赖于苏美两国统治集团的恩赐。这难道不是证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就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吗？

苏共新领导假惺惺地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并且一再表白他们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但是，他们在这些书中大事宣传的，却是苏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样两种“共同利益”，是截然相反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怎么能够扯到一块呢？美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公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心要跟美帝国主义者讲什么“共同利益”，这只能说明他们把屁股坐到美帝国主义那一边去了，他们把自己置于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

按道理说，社会主义的苏联同帝国主义的美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就必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同美帝国主义发生尖锐的斗争。现在，苏共新领导却强调，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都没有互相冲突”。这只能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世界范围内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早就不存在了，支持被

^① 《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页。



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义务早就不存在了。他们已经堕落到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的泥坑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气味了。

苏共新领导强调苏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这完全是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肯尼迪早就要求苏共领导“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同美国“达成能保障我们两大国的利益”的协议^①。从赫鲁晓夫到苏共新领导，都积极地响应帝国主义的号召。他们的确同帝国主义者有着共同利益，这就是他们所代表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苏美合伙反对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

苏共新领导在这些书里所阐述的苏美合作的政策思想，早已付诸行动。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为了追求同美国的“共同利益”，大大加紧了同帝国主义的勾结。

苏美印三家在新德里会见，公开加强反华联合阵线。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在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以后，毫不掩饰他的满意心情。汉弗莱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次会谈是“坦率的、直言不讳的”，他在会谈中说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并且“也从柯西金先生那里得到了响应”。汉弗莱说，“苏联正试图在共产党中国周围建立一道遏制的墙”，“苏联政府今天对于自己在全世界各地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关切，比对于美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可能做的任何事情更关切得多”。汉弗莱认为，“展望今后几年”，美国同苏联的“接触将会扩大，关系能够改善而且应该改善”。^②

汉弗莱的谈话表明，苏美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汉弗莱对于苏共新领导的政策这样有把握，敢于公开这样讲，是因为他们互相交了底。苏共新领导的政策，就是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的反革命包围圈。苏共新领导的这种政策，完全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心意。美帝国主义者很自然地要拍手欢迎，加以支持和鼓励。这就是苏美新德里会谈的实质。这是苏共新领导最突出的叛变行动。如果事情不是这样，苏共新领导为什么没有对汉弗莱的讲话辟谣呢？

在越南问题上，苏美勾结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当美国“停止轰炸”，掀起一阵“和谈”喧嚣的时候，谢列平仆仆风尘访问河内，紧密配合美国的“和谈”阴谋。苏共新领导还同美国在欧洲局势问题上达成了默契，使美国能够从欧洲抽调越来越多的兵力到越南来扩大战争。苏共新领导现在讲一些支持越南的话，给越南一些援助，无非是企图在越南问题上增加自己的发言权，企图挑拨中越关系，企图帮助美国实现“和谈”阴谋。归根到底，他们是要在越南

① 肯尼迪 1961 年 11 月 25 日对苏联《消息报》总编辑阿·伊·阿朱别伊的谈话。

② 汉弗莱 1966 年 1 月 16 日对美国记者的电视谈话。



问题上为美帝国主义找出路，让美帝国主义永远霸占越南南方，同美帝国主义做成一笔政治交易。

苏共新领导这种立场，美帝国主义者很清楚。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麦·邦迪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很清楚：苏联政府希望能够取得和平解决”^①。美国报纸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和美国事实上是在并行的轨道上向着它们共同持有的某种目标前进”^②。美国报纸还说，如果苏联“最终将帮助取得一种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越南解决办法的话”，美国将可以“从一种危急的局面中脱出身来”。“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目前苏美关系的根本之点在于，这种关系必须是一种默契的关系”，“美苏之间的矛盾必须继续是公开的，它们之间的一致却必须继续是不讲明的”，“它们既是公开的敌人而同时又是暗中的盟友”。^③

苏共新领导的苏美合作路线，一个时期以来又扩展到了苏日合作方面。美帝国主义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作为自己在亚洲的主要战争帮凶，指使日本反动派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签订了“日韩条约”，实际上拼凑了东北亚军事同盟。对于美帝国主义这样一种针对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严重战争部署，苏共新领导不但不予谴责，反而向日本反动派大献殷勤，加紧拉拢。苏日高级官员频繁地进行相互访问。日本外务相最近应邀访问了苏联。苏共新领导实际上承认了日美军事联盟，并且要搭上自己的一股，搞一个苏美日联盟，来反对中国、朝鲜和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发生了所有这样一些事情以后，苏共新领导还说，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要把它们之间的分歧放在一边，在反帝斗争中实行“联合行动”，这怎么能够取信于人呢？他们究竟是联合谁，反对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苏共新领导是同美帝国主义者联合行动，是同日本反动派联合行动，是同印度反动派联合行动，是同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联合行动。既然他们这样热中于反革命的联合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怎么能够同他们联合行动呢？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真革命派同假革命派之间，最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反对还是联合美帝国主义的分歧。这样重大的分歧怎么能够放在一边呢？

只要苏共新领导不放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不改变苏美合作路线，不取消苏美印日

① 麦·邦迪 1966 年 1 月 16 日对美国记者的电视谈话。

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6 年 1 月 13 日评论。

③ 《纽约时报》1966 年 1 月 17 日报道。



联盟，我们就决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美帝国主义拴在一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势必要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只有坚决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只有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顺利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崇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认清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媚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仇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认清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恐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藐视帝国主义的思想，如实地把它当做一只纸老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散布联美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怎样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世界人民进行反美革命斗争的强大武器。毛泽东同志号召，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以及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都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反美斗争的积极因素都要调动起来。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指出了打败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它的正确性已经为战后时期国际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所证明。这个战略思想，不但武装了中国人民，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是帝国主义最害怕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最头痛的，全世界人民最欢迎的。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只是一种狂妄的梦想。世界的真正主人是各国人民。任何国家的统治集团，无论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要想骑在各国人民的头上，统治全世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新的、伟大的反美革命风暴不久就将来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人民的政策，只能是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反对人民的人必定被人民所打倒，违背历史潮流的人必定被历史潮流所埋葬。无论要经历什么样的斗争和曲折，世界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一定要灭亡，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



苏共新领导鼓吹苏美合作的两本书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一大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籍。《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

这些书，以论述美国对外政策和苏美关系史为名，极力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美国的关系史说成是一部“全面合作”的历史，鼓吹苏美联盟主宰世界。这些书肆意歪曲现实，篡改历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苏美“全面合作”的路线辩护。

这些书，虽然也用了不少篇幅，谈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但是说来说去，结论总是：美国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是“明智派”，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苏美“全面合作”的路线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揭穿了苏共新领导装出一副反美姿态，不过是欺瞒世界人民的障眼手法而已。

苏共新领导出版的这些书籍，在散布崇美、媚美、恐美、联美的谬论方面，比起赫鲁晓夫时期出版的同类主题的书籍来，不仅一脉相承，而且更加露骨，更加彻底，更加肉麻。贯穿着这些书的一条黑线，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两本书，已经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在全国发行。现在，把这两本书的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И·列明主编

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经改变

这本书说，“认识‘核世纪’的现实性——这是有利于维护和平和改善苏美关系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苏联拥有的“绝对武器”，“迫使美国领导人大大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美国



认识到，“火箭——核战争对美国来说是自杀，因此必须寻求战争以外的某种出路”。书中说，“只有疯人，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和平共处政策成了客观的必要性，历史的必然性”。“美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示出了妥协的意愿”。

书中说，“美国国际政策的主要动力”、“决定着美国当前行动方针的主要因素”，是“两种制度的斗争和竞赛”。“美国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地开始理解到，当前世界阶级力量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场所是和平经济竞赛。资本主义的命运正是在这里来决定”。

把美国统治集团分为“明智的”和“好战的”两派

这本书强调“不能抽象地看待帝国主义本性”，认为“在美国垄断集团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况”。书中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分为“冷静的、明智的”和“好战的、侵略的”两派，说“我们不能把整个美国社会都说成是一丘之貉，不能不看到美国社会内部的斗争，即统治阵营中两种趋势——好战的、侵略性的趋势同温和的、清醒的趋势之间的斗争”。书中说，“在美国统治集团、大生意人、国会和国家机构里都存在着稳健派和侵略派的斗争”。

这本书认为，“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冒险主义的和侵略的趋势同冷静的和明智的趋势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正日益强烈地席卷着美国的真正统治者队伍——国内最大垄断组织”。“美国社会生活中两种对外政策趋向，即两个集团——极端反动的疯狂侵略派和倾向于明智地估计现有力量对比、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冷静派之间的斗争已达极点。”

书中说，“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好战、侵略、反苏以及温和、清醒、愿同苏联和平共处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并将尖锐化”，“苏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两个对立倾向、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过程和结局”。

对美国民主党大肆吹捧

书中说，美国“近几年来，出现了两党之间划清某种界限的趋向”，“民主党开始更多地指望工会、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群众基础，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民主党成了比较灵活，比较慎重和自由主义的国家管理方法的体现者”，“民主党在选举中则受到工人、职员、知识界、黑人的广泛支持，比较温和而冷静的资产阶级集团都向民主党靠拢”。这本书还说，民主党“表示准备‘欢迎’任何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的迹象”。书中甚至引用肯尼迪临死前一个星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我们并没有发誓要对红色中国采取敌对政策”的谎言，来掩盖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华政策。

极力颂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

对于艾森豪威尔，书中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在当时代表比较温和的、无意实行自己的冒险主张和冒大战危险的人士”，“似乎不能把他归入极端军国主义分子一类”。书中说，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透过‘冷战’的浓雾，第一次露出了阳光，出现了某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最初征兆”。书中认为，“艾森豪威尔实质上是不公开的两党反孤立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

对于肯尼迪，全书从头到尾不遗余力地加以吹捧。书中说，肯尼迪是“受人民欢迎的”总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了解核时代的现实性，了解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在自己的讲话和信件中一向为举行关于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的谈判敞开着大门。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选举中曾答应保证持久和平，他表现出他是一个比他的前任更善于同苏联打交道的人。”“如果把肯尼迪政府发表爱好和平的言论和采取爱好和平的行动仅仅看成是竞选动机，那是错误的”。

书中吹嘘肯尼迪上台后，极力要同苏联进行合作，说什么“在他惨遭毒手之前，旨在认真改善美苏关系、消除‘冷战’的路线是日益明显而清楚的”。书中说，肯尼迪“呼吁停止冷战，寻求裁军的途径。肯尼迪极力说服人们必须重新审查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肯尼迪认为可以而且必须用和平方法消除现有分歧，也就是保障和平共处”。

书中引用所谓“美国温和的、头脑清醒的人士”的意见，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及时止步，因为他了解入侵古巴会引起热核灾难”。书中吹捧“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最后阶段所起的作用”，“使他的声望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有一定的理由可以说，一九六三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书中还吹捧“肯尼迪总统眼界宽阔，冷静地对待国际生活的迫切问题，愿意谋求某种同社会主义世界的‘临时协定’”。书中还引述了赫鲁晓夫在肯尼迪被刺丧命后打给约翰逊的电报中的话：“肯尼迪的逝世是对所有珍视和平与美苏合作事业的人的打击。”

对于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的美国现任总统约翰逊，书中说，他“是一个能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中随机应变而不倾向于政治冒险的活动家”，他“很注意于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在竞选运动期间，约翰逊非常坚决地主张和平共处，主张防止热核灾难，主张停止‘冷战’，主张彻底改善苏美关系”。书中说，美国“一九六四年的大选，成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全民投票，而在这次全民投票中，约翰逊得到人民的绝对委任，去实现旨在巩固和平、消除‘冷战’、谋求苏美接近的政策”。书中还说什么“应该为约翰逊这位富有经验而且非常慎重而温和的政治家说句公道话：在一九六四年的竞选运动中，他至少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接受了戈德华特的挑战，并且以多少明智一些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口号来对抗了政治冒险主义和好战的侵略性纲领”。

书中对约翰逊寄予很大的希望，说“约翰逊和民主党将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换言之，应该认为，在最近八年中（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二年）美国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将操在约翰逊和民主党手里。约翰逊在大选中获胜主要是由于他的对外政策纲领，他应许遵循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对外政策的方针”。

此外，书中还吹捧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富有魄力”，甚至把臭名昭著的战争贩



子麦克阿瑟美化为什么“温和、冷静、现实政策的拥护者”。书中还把美国现任副总统汉弗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等人美化为什么“国会中的‘左翼’自由派”，说他们常常“从左的方面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活动进行批评”，“往往本着和平共处的精神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并反对美国的侵略性挑衅行为”。

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书中为了替所谓“温和的”、“头脑清醒的”美国总统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上的“独立作用”制造理论根据，强调美国政府的“独立性”，实际上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书中说，“对外政策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增长了，统治阵营中围绕着国际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些情况都进一步加强国家（例如总统，政府机构，特别是外交机构和军事机构）在制定和实行对外政策方针中的相对独立的作用”。

书中诬蔑斯大林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服从垄断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胡说斯大林的这种理论“轻视国家的作用，贬低国家的意义，否认国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积极性，把国家贬低为某一个私人银行或托拉斯的奴仆”。

宣扬苏美的“共同利益”和“友好合作传统”

书中在描述苏美关系的“历史性质和历史传统”时写道：“美国和俄国曾经是由传统的友好和合作联系着的”，“除开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美国参加对苏俄的军事干涉这个污点之外，俄美和苏美关系没有为任何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乌云所笼罩。相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曾经是战友，这可以证明两国民族利益的共同性”。

书中认为“苏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就是在现在，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的、经济的争执和冲突，它们的民族利益，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都没有互相冲突。”

鼓吹苏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书中说，“无论两个体系的对抗有多大，也有解决它的一把可靠的钥匙，就是列宁的天才的发现——和平共处原则”。书中说，“如果认识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而不容许热核战争发生，认识到和平共处作为国际生活的不可违反的准则是必需的，那么国际舞台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的竞赛和两个主要敌手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将限定在没有流血冲突与战争的、广泛的经济、外交、科学和文化的竞赛与合作的范围之内”。

书中迫切祈求扩大苏美贸易，实现苏美合作，说“一九六三年底，美国国会同意向苏联出售粮食并允许总统给予相应的贷款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又说，“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有九十二名美国银行及工业团体的著名活动家访问了莫斯科”后，“美国实业



家们答应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苏美经济联系正常化并扩大这种联系”。

吹嘘苏美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

这本书说，“苏美关系，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书中引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话，强调“两大国——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对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书中说，“用他的话说，两国领导人‘了解到苏联政府的任何一个首脑和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由于必要而承担着保持普遍和平的特殊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前的核世纪承担着维护北半球生存的责任’。说得很好。”

书中说，苏联“致力于同美国的和平与合作，认为苏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首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键”。

书中一再吹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可耻行径。书中说，苏美英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是美国政策上出现某种变化的标志”，“是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表现出和平共处政策的生命力”，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巨大胜利”。

《苏联和美国

——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批准出版

B·A·瓦里科夫著

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宣称苏联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这本书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苏美关系的正常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书中引用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中的这一论点：“改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对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对普遍和平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

书中强调说，“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书中说，“苏维埃国家从其成立最初之日起就始终一贯地奉行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方针”。“苏维埃国家从自己存在的最初之日起，就曾力求并且现在继续力求同美国建立事务合作和友好关系。苏维埃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关于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和发展全面合作的建议”。

书中说，“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苏美关系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



平共处、友好合作，既符合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

宣扬美国统治集团愿意同苏联共处和合作

这本书反复宣传“在美国过去发生作用和现在继续发生作用的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实行公开反苏政策”的趋势，一种是“同苏联建立合作和发展同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趋势”。

这本书说，“美国的许多国务活动家承认，像美国和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无论在战争年代，或者在战后时期，都能够共处和合作”。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苏美合作，为永远结束美国统治集团战前的不现实的和缺乏远见的对苏政策、为发展战后时期卓有成效的苏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本书赞扬美国统治集团中“比较有远见和头脑清醒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实行比较现实的对外政策，即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寻求同苏联进行有效谈判的途径的政策。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在现时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苏联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基础是和平共处及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进行竞赛”。

吹嘘苏美勾结联合行动的事实

书中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建议，并且列举一九五九年以来苏美两国在联合国的联合行动，以及一系列相互勾结的事例，来证明必须实现苏美合作。

书中说，“为联合国制定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决议的共同草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联合国关于为和平目的利用宇宙空间的共同决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苏美向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裁军原则的共同提案，以及专为和平日的利用南极洲的协定，苏联科学院和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空间研究局之间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缔结的关于宇宙的协定，都是苏美两国间可能进行事务合作的标志”。

书中大肆吹嘘臭名远扬的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说“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根据苏、美、英三国政府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以及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相互谅解并在一九六三年十月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不把带有核武器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投入环绕地球的宇宙轨道的决议，在全世界得到重大的反应。这些决议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各国间，其中也包括苏美间的相互关系，为巩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也就是说为采取新步骤来使国际空气健康化，创造了前提”。

书中最后吹嘘说，苏美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对苏美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人类的命运，都是生命攸关地必要的”。



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本刊评论员

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众学习理论的运动，正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着，这就是工农兵群众自觉地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学习的效果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农兵群众不但能够学懂，而且学得很好，很会运用。

我们看到，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并且成为他们行动的指针。

我们看到，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又可以变物质，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工农兵群众已经越来越熟悉，并且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创造着无穷的物质财富。

我们看到，“一分为二”，即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在工农兵群众中，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道理，大家正在实际生活中广泛地运用着。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又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在今天的中国，理论掌握了群众，群众掌握了理论，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群众手中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

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觉悟，就懂得了为革命而做工，为革命而种田，为革命而练兵打仗。他们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寻找工作中的规律，就更会做工，更会种田，更会练兵打仗了。各行各业的人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懂得了为革命而工作，也就更会工作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中，不断

^{①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0、467页。



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广大劳动人民一直被关在理论知识的大门之外。一提起理论，人们就会想到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无产阶级虽然早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毕竟还是少数。在今天的中国，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闯开了理论知识的大门，开始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开始掌握自然科学的理论。从此，理论开始从课堂、研究室解放出来了，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理论的局面被打破了，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伟大意义必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然而，正像一切新事物的出现都会遇到旧势力的阻碍、都要经过斗争一样，工农兵学理论，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的，也是有斗争的。有的人，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在一切方面都不相信群众，瞧不起群众，也不相信工农兵群众能够学理论。几年以前，当群众学理论的高潮已经兴起的时候，就有人对这一新事物大肆攻击，说群众学理论是什么“即景生情，就事论事”，是“枝枝节节地学”，“不系统”，破坏了理论的“完整的体系”，甚至诬蔑这是“一股邪风”，是“稀奇古怪的事”，给理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反面教材”。由于工农兵群众开始学哲学、用哲学，这种企图垄断哲学理论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就说什么自己做理论工作是“倒霉”的职业，感到“最灰溜溜的”。几年来，工农兵学理论，采取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方法，取得了立竿见影的巨大成就，最有力地回答了那些毫无根据的谬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这本来是应当的、正常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群众应当懂、也能够懂的。江苏省一位贫农妇女，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人怕她听不懂，她说：“毛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贫下中农说的，又不是对地主富农说的，为什么听不懂？”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旧时代不可能在广大群众中实现，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毛泽东时代，才能实现。

一八九五年，列宁曾经说过，沙皇大臣先生非常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首先被炸的就是沙



皇政府。列宁说：“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拥有了力量！”^①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

那种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害怕工人的觉醒，害怕工人有了力量的人，那种反对人民脱离愚昧状态，反对人民作历史的主人的人，当然会认为群众学理论是“稀奇古怪的事”。工农兵群众掌握了理论，就能更加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国家的命运，使那些想用书本知识作本钱，贩卖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企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人，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们当然会感到最“倒霉”，最“灰溜溜的”。

对于群众学习理论，掌握理论，我们认为正常的，是正风，是正面教材，资产阶级理论家却认为是“奇怪”的，是“邪风”，是“反面教材”。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思想同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是理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意义，自觉地进行这种斗争，才能把群众学理论这一件大事做得更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和工农兵群众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群众更加聪明，更加有力量。

工农兵群众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这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最重要保证，也是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国内国外的阶级敌人，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都会碰得粉身碎骨。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头等重要的基本建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事，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对于广大干部的学习，会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一切群众运动中走在前面，就必须首先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面走在群众的前面。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干部教育的最重要内容，也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只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力地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潮的斗

^①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8页。



争，才能有力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才能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提高、不断前进。不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思想上就会掉队，工作上就会掉队。不掌握毛泽东思想，就失掉了领导群众前进的最基本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不觉悟，那是很危险的。如果有的地方存在着干部不如群众学得好，领导干部不如一般干部学得好的情况，那就应当迅速改变。

工农兵学理论所以学得好，同他们采取活学活用的方法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学习他们活学活用的方法。

活学活用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所一贯提倡的，广大工农兵群众运用得很好。他们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边学边用。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既做好了工作，收到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效，又提高了思想，收到了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工农兵的很多好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这些文章，生动活泼，内容丰富，通过具体的斗争生活，用群众的语言，把哲学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使人爱看，看了很有用处。有人可能不承认这些文章是哲学文章、理论文章。我们说，不对。这样的文章是很好的哲学文章、理论文章。因为它是从社会实践中，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产生，又是用来指导社会实践的。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死学不用。死学不用的人，关在房子里死啃书本，死抠概念，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不分析实际问题，不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学习的结果，还是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会讲、会写，就是不会用，讲起来似乎头头是道，一接触实际斗争就束手无策，分不清是非。这样的学习，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样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尽是知识分子腔调，毫无实际内容。这样的文章，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看懂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不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专门从事哲学、经济学等等理论工作的人，有必要来一个革命，从书斋里走出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连队去，到商店去，联系群众，深入实际，改造思想。只有深入实际，研究实际生活中的哲学、经济学，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理论，能够回答现实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样的理论工作才是有用处的。这样，也就能够写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了。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指示。只要我们采取活学活用的方法，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运用《实践论》总结民间测天经验

湖南省南县气象服务站 段春作

一九三九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逃过荒，讨过饭，整年过着流浪的生活。解放后，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让我上了学。一九五八年，我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领导上调我到县里学习气象。在县里学习了二十天，回到公社担任气象员。

开始，我工作很积极。但过了不多久，有些不安心了。我想，在县里学到的气象理论知识很少，工作的条件又差，没有一样仪器，连测定空气温度的温度表也没有，怎么开展工作、作天气预报呢？我怕万一搞不好，落得人家笑话，不如早改行好。

正当我有些不安心的时候，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哥哥给我来了信，叮嘱我不要忘记过去的苦，不要忘记解放前在长沙街头流浪求乞的生活，要我听党的话，安心做好气象工作。这使我回忆起了解放前苦难生活的情景。我是党和毛主席救出来的一个苦孩子，

怎么能为自己打算，不听党的话呢？不能！我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我不能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的思想通了。

接着，就在党组织的指引下学习了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更加鼓舞了我的勇气，使我下定了决心，干一辈子气象工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几年来，我反复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实践论》、《矛盾论》等二十多篇文章。在学习的过程中，使我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做气象工作就是干革命，就是要为人民“管好天”。特别是自一九六〇年以后，我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实践论》的观点，向群众学习，和同志们一起大搞科学实验，从实践中探索了民间土法测天的经验。

向群众请教

思想问题一解决，工作干劲就大了。我



恨不得一下子就建立气象哨，作起天气预报来。但是，客观困难还是存在的。知识缺，条件差。怎么办？正在焦急的时候，公社党委书记开导我说：“没有洋的就搞土的。搞科学实验，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党委书记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进一步帮助我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决心。

我在领导的帮助下，反复地学习了《实践论》这篇文章，初步认识到人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实践的真理。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看天经验。要做好气象工作，必须向群众请教。但是，如何去向群众请教呢？这还是一个难题。这时，正好有一位贫农社员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们那里有个很会看天的老农。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满怀信心地去访问这位老农，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看天的经验。谁知一访问这位老农，他却说：“没有什么说的。我们是老一套，老迷信。现在要搞新技术。”问来问去，老人总是不肯说。这次，我一无所获地回来了。

老人为什么不肯说呢？我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态度和方法，找到了老农不肯说的主要原因，是我的访问方法不对头。我去请教老农的时候，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拿着钢笔，那个样子好像在逼着他说一样。所以，他干脆不说。我总结了这次教训以后，在调查中就注意了方法。一般都是先和群众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建立了感情；然后谈家常，谈农业生产；最后再扯到看天的事情上来。以后，我访问有看天经验的老农，都是用这种方法才访问成功的。

我听人说老农邓乐南有一本记载我国古

人的测天经验的书。但开始他一直不肯拿出来。后来通过共同劳动和广泛地接触，他不但把书拿出来了，而且还告诉我“老云接驾，不阴就下”，“太阳笑，淋破庙”等民间的测天谚语三十多条。他交给我的那本古书和后来发现的其他几本古书，虽然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东西，但也有一部分是记载我国古人的测天经验的。这些经验，绝大部分在今天仍然适用。如“清晨起海云，风雨霎时辰”，“西北黑云生，雷雨必震声”等一百多条谚语，对于观测天气变化很有参考价值。最后，邓乐南还告诉我用蚂蟥、青蛙等动物测天的方法。这使我初步尝到了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好处。

为了更好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做气象工作，我又在附近生产队邀集了五个有丰富看天经验的老农，组成一个“五人看天小组”。我们经常在一起，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观察天气的变化。

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办，虚心向贫农、下中农学习，使我逐步与贫农、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工作上，他们处处支持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公社有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木匠杜洪光，趁早晚休息时间帮助我做百叶箱，还经常鼓励我好好干气象工作。有一次，他看到我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心里烦恼，就劝我说：“搞气象就是好，有作用。”同时，还对我说了一件辛酸的往事。他告诉我，解放前的一九四七年，他的两个儿子帮地主到大通湖捞湖草，突然遇上大风，翻了船，活活地被淹死了。和他的儿子一道淹死的，还有五十多个贫农兄弟。他流着眼泪说：“要是



现在，我的两个儿子和那些贫农兄弟就不会淹死了。”听了老人的这段话，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我们的阶级兄弟是多么盼望建立自己的气象哨啊！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气象工作岗位上的责任。

从实践中大量搜集感性材料

老农邓乐南告诉我：“蚂蟥可以测天。蚂蟥浮上水面或爬到田坎上来会下雨。”我就弄来了一条大蚂蟥，把它放在盛着水的玻璃瓶里试验。但是在下雨前，蚂蟥却睡在瓶子底下一动也不动。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一试验就不准呢？我没有灰心，仍然继续观察试验。我又从稻田里、沟港湖泊里寻来了十多条蚂蟥，按它们的大小和颜色分别放在六个玻璃瓶子里，进行观察。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天空晴朗无云，我和公社气象哨的崔淑纯同志发现十多条蚂蟥大部分都越瓶逃跑了。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立即到附近生产队，同“看天小组”的老农进行研究，作出了当天下午到傍晚有寒潮侵入和有七—八级偏北大风的预报。结果，在当天傍晚果然寒潮来了，刮起了九级大风，并下了冰雹。当时，我们公社的大批种谷下泥才只有五天左右，正是出苗期间。由于公社党委动员快，事先作好了防备，保证了全公社已播下的三千三百五十八亩秧苗基本上没有受损失。这次预报准了，使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也使我认识到科学实验的重要性。从此，做好气象科学实验的信心就更大了。

做好工作的强烈愿望，使我更广泛、更深入地去接近群众，向群众学习。不管晴天

雨天，不管白天晚上，不管路途远近，只要知道哪里有会看天气的老农、老渔民、老船民，我就去拜访求教。几年来，我先后进行了二百六十七次调查访问，共访问老农二百四十二人，老船民六十五人（包括摇摆渡的老人），老渔民四十八人，对天气变化有反应的慢性病人三十一人（如患关节炎、鼻炎的病人），共收集了民间测天谚语一千一百零六条，农谚一百八十五条，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看天经验。例如，“死水鼓泡，大风就到”，“游鱼跳水有大风”，“小鱼巡边有大风”等这些专门预测大风的谚语，就是从渔民那里收集来的，是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测天经验。

一九六〇年二月，我参加全省在株洲市召开的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议时，听到参加会的同志们介绍如何以《实践论》为武器指导科学实验，解决科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的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这时，我又一次学习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①。读到这里，我就想到，搞气象不能光听别人说，自己应该亲手做一做，亲眼看一看，样样试一试。毛主席的话，启发了我大胆设想，广泛试验。我开始用民间还没有发现能预测天气的动物、植物、家具等进行观察试验，开辟了搜集感性材料的新途径。从蚂蟥能测天想到田螺，从田螺想到蚯蚓，从动物想到植物，从植物想到家具和器具。如我在食堂吃饭时，发现屋中央的彩球有时碰脑袋，有时又自动升高了不碰脑袋。彩球为什么有升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页。



的变化呢？我认真地进行了观察记载，终于发现彩球在晴前升高、在雨前下降的规律性。后来，根据彩球的这种性能，做成一个“绉纸晴雨计”。又如，我把明矾水涂在马粪纸上，又把食盐水涂在另一张马粪纸上。长期观察后发现，大雨前，涂明矾水的一张纸颜色变白，涂食盐水的一张颜色变暗（黑）。根据这些现象，我在一张大的马粪纸上用蘸满食盐水的毛笔写一个“雨”字；再把笔洗干净，在字的周围涂上明矾水。这样做好后，晴天马粪纸上什么也看不到，但在下大雨之前，“雨”字慢慢现出来了。这样，就制作成了一个“见字天变”的土仪器。另外，还做出了“电示晴雨计”、“竹叉子晴雨计”等，并发现了四叶草、含羞草等植物能测天。几年来，共做了五百八十六项试验，获得成功的有一百一十项。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通过艰苦的收集与大量的试验，得到了较丰富的感性材料。但这些材料又多又杂，有时又自相矛盾，到底谁是谁非，弄不明白。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①我想，我所掌握的材料一定有“真”的和“伪”的，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制作工作。我将一千一百零六条民间测天谚语逐一试验、查对、鉴定，归纳为科学的、巧合的、迷信的三类。结果，肯定了五

百二十条是科学的，三百一十六条是巧合的，二百七十条是迷信的。例如，“正月初一刮南风，屋檐底下躲虾公”这条谚语，它的意思是，正月初一刮了南风，预兆这一年雨水多，有大水。我找了南县、大通湖、常德等地的气象资料进行查对，了解到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这十一年中，有六年正月初一刮了南风，但是这六年雨水都不很多，特别是其中两年还出现了较严重的旱象。这就证明，这条谚语是没有根据的。一九六〇年，我二十四次观察记载了“乌云接落日”的景象。结果是，十九次在当晚或第二天都下了雨，五次没有下雨，但也阴了好几天。这就证明了“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这条谚语是具有科学性的。

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之后，对感性材料进行了一些提炼。但是，这些动物、植物和谚语为什么能预测天气，却不懂其中的道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曾先后到南县、长沙市借过和买过很多气象理论书籍，自学理论知识。开始，虽然被“大气环流”、“锋”、“高压”、“低压”、“脊”、“槽”等科学名词难住了，但是我坚持学下去，学不懂的就请教有专业知识的同志。这样，学到了一些基本气象理论知识。不过，对于动物、植物测天和谚语测天的道理，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后来，又反复学《实践论》。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



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①“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句话多么重要啊！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决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进一步在实践中进行实验分析。我在大量进行试验的基础上，采用“深入虎穴”、重点突破的方法，集中精力抓住一、两个项目，进行跟踪追迹的试验、观察，深入探讨动物、植物和谚语测天的科学道理。

例如，我细致地观察了青蛙与气象变化的关系。青蛙的叫声为什么能预报天气呢？为了找到这个原因，我采用“虎穴追踪”的办法，到田野里，蹲在青蛙后面观察它的动态，听它的叫声。晴天看，雨天看。经过反复观察，发现青蛙头部两侧各有一个气包，这两个气包一开一合，就发出了声音。晴天叫得很自然，声音前后一样大，很响亮；暴风、雷雨来到前六小时左右，它的动态和叫声就不同了，一声大，二声小，叫时全身发抖。为什么这两个气包能预测天气呢？我又捉来了大的、小的、麻的、绿的等多种青蛙进行解剖。通过解剖观察，发现青蛙的两个气包是一层很薄的膜，用草管插进去一吹，气包也是一鼓一鼓的。这时我联系到书本上的知识，明白了气压的剧烈升降引起了青蛙的不同叫声，找到了青蛙能测天的原因。

这样反复多次试验，使我懂得了动物、植物的变化与气压、湿度和温度等气象要素有关系的道理，使感性认识初步上升到了理性认识。

对民间谚语测天，我们也进行了反复的观察、试验。为了弄清“太阳笑，淋破庙”这句谚语的道理，我曾苦苦思考。一天，天空出现了太阳笑的景象。晚上，我把煤油灯点

燃，罩上灯罩，出现的情景，与白天出现的“太阳笑”相差不多。我马上把灯罩用布擦干净，再罩上去，灯光又不“笑”了。我反复作了试验。擦干后罩上去，灯光明亮（不笑）；再对罩内哈进几口热气，灯光就模糊（笑）。我想，玻璃灯罩是透明的，空气也是透明的；灯罩上有水汽，有灰尘，灯光就“笑”，与空气中水汽多、灰尘多，太阳就“笑”是一个道理。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了解到空气中水汽多，含尘量大，正是下雨的重要条件之一，从而找到了“太阳笑，淋破庙”这条谚语的科学道理。

有一次，我观察蚂蟥对天气的反应时，发现黄、绿、麻三种蚂蟥浮起来了，其他三种蚂蟥却无反应。到底有没有雨呢？我拿不定主意。最后用折衷的办法，预报“晴天多云”。结果，第二天却下了一场雨。预报失败了。

这次预报失败，促使我深入地探讨六种蚂蟥的反应不一样的原因。我又认真地学习了《动物学》和《普通植物学》等书籍，初步了解了各种动物、植物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性。我重点地翻阅了介绍蚂蟥的生活特性和生活环境的书籍，查阅了有关的参考资料，系统地整理和分析了以往所记载的六种蚂蟥的资料，终于发现蚂蟥对于天气的反应有季节性的特点。大的黄色的蚂蟥，在春季反应最灵敏，麻色的在夏季反应最灵敏，灰色的在秋季反应最灵敏，绿色的和白色的在冬季反应最灵敏。其中，黄蚂蟥除春季反应最灵敏，绿蚂蟥除冬季反应最灵敏外，在其他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节也有反应。

蚂蟥对天气的反应有季节性,其他动物、植物对天气的反应有没有季节性呢?我又对青蛙、蚂蚁、含羞草等一百多种能预报天气变化的动物、植物一项一项地进行考察,发现了动物、植物测天有个共同特点——季节性。根据这根线索,跟踪追迹,又发现青蛙测雷暴雨最准,鳅鱼测雷雨很准,鸡鸭报晴雨最准,蚯蚓报大雨很准,等等,各有所长。这就又发现了动物、植物测天的一个共同特点——独特性。这样紧紧追索,经过一年多工夫,找出了动物、植物测天的六个特点,即季节性、独特性、生活习性、地方性、时间性、综合性,进一步认识了利用动物、植物测天的方法问题。

这时,我又考虑,动物、植物测天有“六性”的特点,民间谚语测天有没有规律可循呢?通过认真摸索,终于又发现了民间天气谚语测天的相关性、季节性、地方性、准确性、时间性、比较性等“六性”的特点,找到了进一步运用民间谚语测天的方法。

一九六〇年,在领导的鼓励、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初步总结了几年来向群众学习和进行科学实验的成果,写成了《民间测天法》一书。

反复实践,检验理论,不断发展

写成《民间测天法》,这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按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人的认识过程来说,这只不过是完成了认识过程的一半,而且是不十分重要的一半。怎样去完成更重要的一半呢?怎样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世界呢?

我体会到,要使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实际,就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理论的真理性。

毛主席说,要完全解决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①。又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②

我们革命者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目的,在于指导革命的实践。我研究物象测天的规律和谚语测天的规律,目的是为了报准天气,为农业生产服务。如果掌握了理论,不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只是空谈一阵,这种理论是没有用的。

为了用于生产,进一步检验物象、天象测天的“六性”的准确性,从一九六〇年起,我就着手按“六性”的标准将各种物象、天象分类排队,分别进行检验。

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七日,我发现蚂蟥越瓶逃走,猫头鹰偏头低飞,燕子低飞等象征,根据动物测天的独特性的特点,立刻发出大风警报。第二天,果然刮起了八级左右的大风。由于早有准备,社员们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物象测天的独特性是正确的。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我们根据蚂蟥浮游、泥鳅乱跳、“绉纸晴雨计”下降等物象的反应,和“日出紫云生,午后雷雨鸣”等天象反应,预报当天午后有雷阵雨出现。公社各生产队收到预报后,突击抢收了晒场的

^{①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稻谷。午后，果然下了一场雷雨。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早，全公社二十六万多斤谷子没有受损失。

就这样，一次、二次、三次、无数次，大部分灾害性天气基本上预报得准确。在为生产服务的不断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些方法和理论的正确性。

再就是，通过实践去纠正理论的不完全性。在摸索到了物象测天“六性”和谚语测天“六性”之后，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在实践中亲手试验过的，是一些靠得住的东西。但是，《实践论》中说：“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①我读到这里，对自己认为“靠得住”的东西是不是完全可靠，产生了疑问。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还需要将自己的理性认识放到实践中去不断检验。

怎样去检验呢？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查对几年的观测记载资料；一是在实践中考察。一天，我看到太阳落水时，西方有云上升。按照“日落云长，半夜听雨响”这条谚语的说法，当天半夜有雨下。可是，一直到天亮时才下雨。我在资料上查对，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出现的三十二次“日落云长”的现象，有十九次第二天上午才下雨，一次是第二天下午，两次是当晚上半夜，半夜下雨的只有六次，还有四次没有下雨。后来，我们又对其他几百条谚语进行了考察工作，发现谚语测天的时间变化差距较大，需要灵活掌握。这样，我又发现了谚语测天具

有灵活性的特点，将谚语的测天“六性”发展到“七性”。

在运用物象测天方面，开始时，认为盐缸子、盐水浸的复写纸等盐类器具对预报大雨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不断实践中发现，这些器具在天气突变，如下雷阵雨时，事先没有反应，而雨来了以后才有反应。这样，进一步补充了原来认识的不完全。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一再指出：认识是无止境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②。认识是无穷的，我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也应当是不断实践，不断摸索。在收集和运用群众谚语的同时，我们又新编了“云无根，雨无踪”，“馒头云，晒死人”，“梭子云，定天晴”等四十多条看天谚语。可见，只有不断实践，才能使认识不断发展。

为了使气象工作更紧密地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我们探索了气象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一次，我和社员一起翻粪堆。我问老农，肥料怎样才能腐烂得快，才能肥效高呢？老农说，最好是晴天，水里、泥里的热度高，肥料发酵快，肥效才会高。老农的回答使我了解到，肥料问题与气象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能不能让气象工作突破常规，更进一步地为生产服务呢？从那时起，我又开始琢磨水、泥的温度和气象之间的关系。我在生产队选了五个地势、水源、土壤大致相同的粪堆作五个观测试验点。在每个点上安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282、285页。



装测量水、泥温度的温度表，不分晴雨进行每天六次的连续观测。经过几个月的观测分析，和农业技术干部、老农一起总结了一套造肥、保肥办法，初步找到了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水、泥温度的变化规律，及其对肥料腐化的影响等指标。接着，我又采取措施来提高畦内的水、泥温度。通过多次试验，摸索出了秋季晴天畦内浅灌水，可以提高水、泥温度，加速肥料腐烂的经验。

这几年，在气象工作岗位上，我所以能够虚心向群众请教，搜集群众看天的经验，进行观测试验研究工作，探讨了民间测天的经验，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必须带着革命的阶级感情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毛主席的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书。《实践论》是一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著作。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培养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才会相信群众，下决心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深入群众，是认识事物、改造社会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使我们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实践；对《实践论》才学得进，用得上。

在学习《实践论》时，要边学边实践，带着问题学。如我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十六个字的指导下，去掉迷信谚语，提炼科学谚语，寻求物象、天象测天和谚语测天的规律性等，就是通过多次学、多次用才解决的。学一点，用一点，有时甚至对一句话、几个字都需要反复思考，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在工作中，在

科学实验中碰到了问题，就去请教《实践论》，在学习中得到启发后，又去找工作上的问题。

学习和运用《实践论》，还必须有股闯劲、“傻”劲和钻劲。

闯劲，就是说学习《实践论》，运用《实践论》，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难关是很多的，遇到难关，就需要有一股革命的闯劲，敢于去闯出自己的路子来。不过，这个闯劲，应该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去闯。盲目地闯，是闯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傻”劲，就是说在运用《实践论》搞科学实验时，要有一股革命的“傻”气。搞科学实验要想闯出一条路子来，非有“傻”劲不行。我整天跟在青蛙背后，观其动态，听其声音，又捉来进行解剖，有个别人讽刺我是呆子，是干蠢事。实验的最终结果回答了他们：一项科学实验的成功，是需要一些“傻子”去做“笨事”的。实践教育了我，只要专心专意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总是会有结果的。

钻劲，就是说要认真钻研，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一个一个的问题要钻透。学习《实践论》，要钻，才学得懂。要钻，才学得深，用得好，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我感到自己学习得还很不够，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才摸到门，离开党和人民对我的要求还远得很。我要永远记住毛主席说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继续努力，不断实践，不断前进。



《矛盾论》的思想进了水泥窑

牡丹江水泥厂看火工人 刘培顺

我是牡丹江水泥厂的看火工人。我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几年来，我和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把《矛盾论》的哲学观点请进了水泥窑，在生产上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水泥窑生产中 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带着怎样认识和解决人和窑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来学习的。

一九五一年我开始学习看火。一九五四年，领导上叫我独立操作。当时，我感到担子很重。因为水泥窑是全厂的“心脏”，能不能管好，对水泥质量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看火工人是直接掌握水泥窑的。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心里觉得挺光荣，决心要把水泥窑管好，不辜负党和国家对自己的信任。

可是，那个时候，想的和干的总是对不上茬，劲没少费，活却没干好。今天合适的火候，到明天就不合适了，甚至这个钟点合适的火候，到了下一个钟点又不管用了。一

天弄得手忙脚乱，还免不了出漏子。记得有一次，我接班以后，窑里温度一连三、四个钟头都比较正常。后来温度有点升高了，我就把给煤量调整了一下，但温度还是继续上升。这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眼看着温度升高，也不敢去处理，结果不到一个钟头的工夫就把窑烧垮了，造成一次重大责任事故。

当时，我又着急又难过，悔恨自己做学徒的时候为啥不下功夫呢！可是，后来发现不光我这样，其他两个班的老师傅，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有人说：“水泥窑这个玩艺，干好了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要是碰不准，累死也干不好。”由于我没有掌握住水泥窑的生产规律，工作一直很被动。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全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这个时候，党组织领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学习中，我首先懂得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因素，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就打



开了我心里的闷葫芦。事是人干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破坏一个旧世界靠人，建设一个新世界也靠人。我厂水泥窑的每小时产量，由生产初期十几吨达到了二十九吨，这还不是人的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吗？想到这里，我的胆子就大了，敢和水泥窑斗了。今天斗不过，明天还和它斗，早晚会斗赢的。

怎么样斗？毛主席说过：“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①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完全适用于水泥窑的生产。对于水泥窑，我们既要敢于斗，又要善于斗。这就是说，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在斗它时，首先要重视它。如果只斗它，不重视它，就成了盲目的乱斗，必然会遭到失败；如果光重视它，不同它斗，还是摆不脱被动地位。

我和小组的同志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总结出了增大窑尾通风，提高水泥窑产量的经验，并在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对水泥窑进行了一些改革，增强了通风能力，使水泥窑的小时产量由二十九吨提高到三十三吨。

这个事实使我们初步认识到，人应当是窑的主人，窑是人们进行生产的工具。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必需的，但是，生产的好和坏，归根到底取决于人，而不是取决于窑。人的作用发挥了，就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变革窑，更大地发挥窑的作用，生产就会不断地提高。

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已有的经验

我们增大窑尾通风，提高了水泥窑的小时产量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每当要想提高产量时，就设法增大窑尾通风。可是，后来增来增去，不仅产量没有继续提高，反而降低了。当时我很纳闷：这项经验，过去有效，为什么现在不管用了呢？想了很久也没有想通。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读了《实践论》。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②我领会毛主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客观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不能一成不变。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用增大窑尾通风的办法，能够提高小时产量，是因为窑尾通风和窑头鼓风相适应了。就像烧火炕一样，烟筒堵了就倒风，排风过大就会把火焰抽到炕洞子里去，只有排风适当，炕才好烧。如果把增大窑尾通风看成是提高生产的唯一办法，不顾条件，无限度地去增大窑尾通风，结果就会把火焰拉得很长，降低烧成的温度，不能合理地使用火力。窑尾通风和窑头鼓风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一方超出另一方所允许的范围，就会造成比例失调，直接影响着火焰的长短和燃烧速度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的快慢。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相应地增大了窑的鼓风，生产情况就好转了。

这件事还证明：对在生产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任何经验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运用这些经验时，必须注意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并且根据实践中取得的新的经验加以发展。如果一成不变地把所有的经验都当成灵丹妙药，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不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它，就会犯经验主义的毛病，好的经验也可能引出坏的结果，成功的经验也可能变成失败的因素。

一切从全局出发 充分发挥局部的作用

为了搞好水泥窑的生产，不仅要解决人和窑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这是由水泥窑的生产特点所决定的。水泥窑生产是由几十个机台联系在一起、三班连续作业的。它的上下工序、上班和下班都是矛盾着、联系着的。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主机和附机、上班生产和下班生产的矛盾。例如，有的人为了完成本班生产任务，总喜欢把窑里的温度烧得高高的，结果是一个班烧窑，两个班保护窑，一个班完成任务，两个班完不成任务，甚至还有把窑烧垮的危险。老是这样干，不仅生产会遭到损失，还会造成三班之间的不团结。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有些人缺乏“一盘棋”的思想，考虑问题只从完成本班生产任务出发，而不是从完成三

班总的生产任务出发。

针对这个问题，我跟小组的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局部和全局关系的论述。从学习中，我们认识到，局部应当服从全局，因为丢掉了全局，局部再好也不顶用；但是，全局又是由局部构成的，如果局部都不好，全局也不会好。如果某项意见从局部看来是可行的，而从全局看来是不行的，局部就应当服从全局。反之，从局部看来是不行的，从全局看来是可行的，也应当服从全局。因此，我们要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局部的作用，正确地解决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才能把生产搞好。

在学习中，我首先检查了自己过去缺乏整体观念的错误思想，认识到只顾本班任务，不顾三班任务，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的反映，不符合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同志们也都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检查，提高了认识。有的同志说：“我们三个班在一个生产岗位上，用的是一个看火镜，烧的是一台窑，为的是一个目标。我们不仅要看到小组的生产任务，还要看到车间和全厂的生产任务，看到我们的生产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只顾完成本班任务，不顾完成整体任务的观念，是错误的、渺小的！”

学了毛主席著作，我们的眼界宽广了，树立了以窑为重、以全局为重的思想，有利于本班、不利于全局的事情不做，有利于全局、不利于本班的事情也去做。三班之间更



加团结了。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了上下工序之间的关系。这样，在我们小组就出现了一个上下工序一条线，三班拧成一股绳，互相协作，密切配合，搞好生产的好局面。

发扬先进因素，克服落后因素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我们小组的面貌焕然一新，几年来一直被评为省、市的先进集体。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大跃进、大跃进的热潮中，我们小组无论在工具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等方面，都落在了电工小组的后面。起初，这件事没引起我们的重视，有的同志说：“我们的家底厚，基础好，只要生产过得硬，啥也不怕。”党委号召全厂向电工小组学习，我们感到没啥学头，尽拿自己的长处比人家过去的短处，就是不跟人家比思想、比革命意志。这种骄傲自满的思想，很快就反映到生产上来。按上级领导要求，水泥窑的运转周期平均应为六十天。在一九六三年，我们的水泥窑曾经出现过两次八十天安全运转。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安全运转却连续两次失败，第一次运转四十六天，第二次运转五十五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快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首先学习了《矛盾论》，懂得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电工小组之所以由落后变成先进，是由于他们敢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有一股子永不自满、永远前进的革命精神。我们

小组之所以由先进变为落后，是由于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成绩就骄傲自满，碰到困难又灰心丧气。我们又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在自觉的基础上，谈思想、摆认识，检查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思想。在检查的过程中，有的人说：“在生产上连续打了两次败仗，再从思想上揭露出一大堆问题，今年的先进小组不就垮了吗？”大家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过：“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要不要揭露矛盾，实质上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揭露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只会把小组搞好。缺点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你不搬开它，才真正会把小组搞垮。经过讨论以后，我们小组克服了“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认真对待生产中的问题，克服困难，搞好了生产。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人认为，水泥窑的运转，在实现一个长的周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一个短的周期，“一长一短”是窑的运转“规律”，连续长期安全运转是不可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如何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论述，并对过去水泥窑运转周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过去几年的情况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看,水泥窑运转确实有时是“一长一短”或“一长几短”地波动着的,没有出现过连续的长期安全运转,所以,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造成了这个“规律”性的印象。但是,只要深入分析长的运转周期和短的运转周期的具体条件,就会暴露出“一长一短”或“一长几短”并不是必然的现象。例如:从几个周期的物质条件来看,都是相同的,但是,有的周期长,有的周期短。为什么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运转周期会有差别呢?经过分析,我们认识到,水泥窑能否长期安全运转,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如果人们对它维护得好一些,发生问题时处理得及时一些,运转周期就可以长一些;如果人们对它维护得差一些,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运转周期就要短一些。从此,我们奠定了争取长的运转周期的信心。

人们在生产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表现在对生产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善于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的条件。例如,一九六四年,我们水泥窑要试用一种新的耐火砖。有人提出这种砖不好使,兄弟厂用了一个星期就把窑烧垮了,想用它来实现长期安全运转是办不到的。究竟能不能试用新的耐火砖,怎样看待兄弟厂的失败呢?我又跟小组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矛盾双方互相转化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学习后,我们认识到,一切矛盾着的东西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失败和成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使失败转化为成功

的重要条件。因此,对于失败了的东西,也要做具体的分析,正确地对待它。于是,我们派人到兄弟厂了解了对这种砖的使用情况,自己也做了一些试验。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弄清了这种砖的特点是:不耐急冷急热,耐高温而不耐磨。我们现用的耐火砖,耐急冷急热的性能比较好,就是耐高温差一些。再分析我厂水泥窑的特点是,温度比较稳定,急冷急热现象少,熟料的颗粒也比较小。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定,新的耐火砖是可以使用的。在使用时,我们又把现用的耐火砖和试用的耐火砖交替镶砌,发挥了它们各自的长处,抵消了它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就使水泥窑在当年实现了一次一百二十天的长期安全运转。

* * *

几年来,我们深刻认识到,生产本身是个千变万化的大的矛盾体,生产发展的过程也是矛盾转化的过程。人们对生产上的矛盾的不同反映,会形成正确与错误、先进与保守、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能够正确地认识 and 解决。

我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提高生产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水泥窑生产的规律,运转周期还不稳定,生产上的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今后必须进一步地努力学习,改进工作,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一万公里和一公里

解放军某部运输连班长 赵 维 会

古话说：“千里大堤，溃之蚁穴”。为什么小小的一个蚁穴，可以使千里大堤崩溃？这是因为护堤人不把小小的蚁穴放在心上，麻痹大意。人们驾驶汽车时所以会发生事故，麻痹大意往往也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和新驾驶员颜洪新一起出车，为了让他多得到些实际锻炼，我让他开车，一路上穿过大街小巷、公路山道，一直开到砖瓦厂，他又是倒车，又是拐弯，开的都很稳当。在把砖装满车开往工地的時候，汽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颜洪新感觉有些疲劳，便停下车让我开。当时我心里想：你放心休息吧，方向盘在我手里，已安安全全地驾驶了一万多公里路啦。我开了起来，汽车没跑多远，发现前面公路两边停了二十多辆地排车，拉车的人都在公路边的树下休息。当时我便照着老经验作出判断：这是个“死情况”（意思是拉车人正在休息，不会走动），不减车速也问题不大。于是我喇叭也没多按，把住方向盘向前开去。谁知道，正在这当儿，停放在后一列的地排车中，意外地走出一个人。他一见到汽车，就惊慌失措地往路中间跑，汽车离他

只有两三米了，这时我非常紧张，连忙打方向盘带刹车，只听见“咋咋咋”的连声响，糟糕！汽车撞上了路边的地排车，虽然没有撞倒人，却轧坏了两部地排车，发生了事故，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这次我只开了一公里的车，就造成了事故。事后，我深思了这个问题：以前我为什么能安全行车一万公里，现在却不能安全行车一公里呢？我想，行车一万公里没有事故，那是因为在历次行车中，在每一公里的路上都思想集中，驾驶谨慎。这次行车一公里，又是在平坦的大公路上，却发生了事故，这是因为我背上了“安全行车一万公里”的包袱，麻痹大意，忽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作两种准备的必要性，看不到在“死情况”中会出现“活情况”的可能性。我只看到拉车人坐在公路边休息，没有估计到其中有人会走到公路中来的可能，只作一种打算，没有作另一种打算。等到事情的发展不符合我的判断的时候，就手忙脚乱，以致造成了事故。

事实证明，“一万公里安全”会转化为“一公里不安全”，这是并不奇怪的。在这



里，一万公里和一公里，安全和不安全，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公里、一公里的安全行车，就没有一万公里的行车无事故。反之，一旦有了“安全行车一万公里”的包袱，丧失警惕，那就可能会在一公里路上摔跤子。

自此以后，我就非常重视安全工作。今年我已行驶了三千多公里，可是每当我一上汽车，摸上方向盘，我所想到的就是：我正在走第一公里路。

（原载《解放军报》1965年7月22日）

“老规矩”是怎样一破再破的

——解放军某炊事班磨豆腐的故事

· 魏 勤 生 ·

某团部大灶食堂，一斤黄豆磨两斤多豆腐，算是“老规矩”了。老班长的班长传给老班长是磨两斤多，老班长传给新班长熊雨芳还是磨两斤多。虽说只磨两斤多，总比吃煮黄豆强。因此，也就没有人想到要改革、提高。

去年五月，三连竟然一斤黄豆磨出了四斤豆腐！这使熊雨芳吃了一惊，省悟到：“不能因循守旧，不能把老规矩看作一成不变，必须要有敢闯的精神，要去突破它。”于是，他们决心学三连、赶三连。

开头，事情进行得不很顺利。按照三连的办法磨出来的第一锅豆腐，不仅数量没有增加，质量也显著下降。豆浆在锅里一烧就结成了碎块，吃起来酸不溜溜的。接着又做

了四次，都和第一次差不多。不过，从多次的失败中，熊雨芳却也弄清了豆腐发酸的原因：豆子变了质。但是，每一次用的豆子都是好的，在哪一环上变的质呢？他们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在泡豆子这道工序上。因为豆子是从晚上九点，直泡到早晨六点，时间长，又过了夜。是不是真是这个原因？他们想试验一下看。于是，先用两三斤黄豆，少泡了个把小时，果然强些；再少泡它个把小时，又强一些。这样一次次试验，终于发现：泡豆子的时间太长了，豆沫多，豆腐又少又酸；时间太短了，豆渣多，豆腐少；豆子泡得最理想的时间是泡三个半小时，看豆子表面很光滑，豆瓣的平面稍有点凹，这就正好。但是，熊雨芳又想：“为什么三连泡七、八个



小时磨出的豆腐又多又不走味呢？”一考察，发现三连用的豆子粒比较大。从此，他得到了一点启示：学习别人的经验，千万不能死搬硬套，因为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一定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但是，他们还只能磨出三斤半豆腐，比起三连，还差一点。既然差一点，就得赶上去。他们继续钻研、琢磨，发现自己在磨豆子的时候，不是水加多了，就是水加少了，这样就磨得不够细，出豆腐的数量就少。再经过实践、摸索，他们找到了水和豆子应有的比例关系。同时，也发现，磨子的好坏，对磨出豆浆的粗细也有关系。磨子好的，就少磨几圈添一次；磨子差的，就多磨几圈添一次。这样磨出的豆浆又细又均匀，豆腐也就出得多了。他们一斤豆子能出四斤多了。

四斤多，达到了当时所在部队的最高水平，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在这种时候，还要不要再敢想敢干地向前闯呢？熊雨芳认为：“还要闯。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你不闯，别人会闯，到时候，又只好落在别人后边。自己磨的豆腐，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呀！”于是，他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找问题，想办法，攀登新的高峰。

新的问题果然找到了。过去，是在浆一烧沸，就点石膏，很难看准。看起来，明明点好了，过一会又发现点老了；少点一点，又太嫩了，压不成豆腐。是不是能够让它冷却

一会儿再点呢？他们重新进行试验，并且改变了操作方法。

第一次，放了十分钟，温度摄氏九十度左右，豆腐数量增加，质量较好；

第二次，时间长一些，温度低一些，又进了一步！

第三次，放了二十多分钟，温度摄氏七十度左右，糟糕！数量下降，味道又酸起来了。

什么原因？时间放长了？再做。

第四次，时间、温度完全和第三次一样，结果，豆腐出了五斤半，质量优等，能炒、能煎、能炸、能煮。

怪呀，第三次和第四次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一研究，原来第三次所以失败，是因为点好石膏以后，忙着做饭，多放了两个多小时才去压成豆腐，再加上过滤布没洗干净，就成了那个样子。后来，纠正了工作中这些粗糙、疏忽的缺点，豆腐的数量和质量便都稳定了。

最近，班长熊雨芳当了团里的磨豆腐技术集训队的教员。他既是“先生”，又是“学生”，虚心学习了兄弟单位的长处，回来后又进一步改进了自己的操作方法。现在，用同样的黄豆，每斤能磨到六斤豆腐，创造了所在部队磨豆腐的最高纪录，他可以说是比较地掌握了磨豆腐的自由了。

（原载《解放军报》1965年10月29日）



为人民站柜台，从实践中学本领

西安市综合零售公司
纺织城商店百货门市部营业员 杨瑾瑜

在营业员工作岗位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九六一年，我从高中毕业后，劳动部门介绍我去做商业工作。接到劳动部门的通知，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我想：“这一辈子算完了。商业部门就是卖货买货，整天笑脸接待顾客，有啥出息！”我家一个亲戚，听说我要参加商业工作，赶忙来对我说：“啥事都可以干，可千万不要搞商业工作。这个工作一时不注意就要受冤枉气。”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更加不安。当我被分配到纺织城商店百货门市部当会计时，一见算盘和厚厚的十几本账簿，密密麻麻的数字，头脑就发胀了。我整天闷闷不乐，工作不起劲，有时控制不住，就背着人暗地里哭。

这样下去哪能行？得想个办法跳出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是共产党员，他严肃地批评了我。这条路走不通。我回到房子里扪心自问，想起自己入团的时候，站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说，要坚决服从党的需要，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想起领导对我无微

不至的关怀和殷切的希望，想起学校老师、同学们对我亲切的鼓励：“要使个人志愿服从祖国的需要，不要被个人兴趣所俘虏。”越想越惭愧。

党总支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引导我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学了以后，就觉得毛主席的许多话都是说我，正是给我画像啊！我深深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太不对了，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为人民利益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思想通了，看见算盘、数字就想起张思德、白求恩同志，不由得拿出自己全身精力做好工作。别人用三个指头打算盘，我用两个指头慢慢拨。有些营业员就在背后议论说：“高中毕业生打算盘还不如营业员，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往上拨。”我听了，没有生气，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自己也想：“当兵的不会打枪，干会计的不会打算盘，这实在讲不通。”所以，我就虚心地向同我一道工作的老会计崔桂贤同志学习。每遇到一个问题，我都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了使崔桂贤同志有更多的时间教我学业务，有时我帮助她到托儿所接



孩子。有一段时间，在星期天，我也利用半天时间和弟弟一起打算盘，看谁打得准，打得快，常常打得手指发麻了才休息。为了掌握会计知识，我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每天早上学习一个小时。特别是对商店编印的会计须知，我坚持天天读几遍，直到背得烂熟为止。就这样，在领导上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初步掌握了会计知识，能够独立工作了。

没有多久，崔桂贤同志休假了，两个人的工作由我一个人担任，工作很忙。当时看到和我一起参加会计工作的同志，都是和老会计一起工作，比较轻松，而我却整天忙得连休息、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又胡思乱想起来。我知道这个想法不对，就赶紧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反复读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毛主席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①我读了这段话，懂得了要为人民服务，就不能遇事先替个人打算，应该时时、事事想到集体，想到人民。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正在长知识和锻炼阶段，不主动挑重担子，哪能有所进步。后来，遇到工作忙的时候，就是加班到晚上两三点钟，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如果当天的工作没有做完，我也睡不着。

我这个商业战线上的新兵，并没有做出多少成绩，一九六三年却被同志们评为商店会计标兵和先进工作者，后来又被团组织推选出席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

六四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三时，毛主席、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照了相。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也是我进一步下决心踏上革命化道路的起点。当毛主席走到离我最近的地方，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使尽全力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从我加入少先队起，就盼望着有一天能够见到敬爱的毛主席，可是当我实现了这个愿望，见到了毛主席的时候，我内心里却又感到惭愧，总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没有什么值得向毛主席汇报的。我心里暗暗向毛主席保证：毛主席，我从今以后，不论是风里雨里，火里水里，一定跟着党，跟着您，就是牺牲生命，也要把革命的红旗高高举起。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把自己的工作好好检查了一下。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②。自己是个从学校门出来又坐办公室的小知识分子，对商业工作，既没有感性认识，也没有理性认识，需要老老实实从取得感性认识开始，所以，我决心到第一线当营业员。经过自己申请，领导批准，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我正式到化妆组当营业员。

有一天，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听说我见过毛主席，就专门到商店来，走到柜台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页。



拉起我的手，亲切地问：“你这个年轻姑娘，见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吗？”我连忙回答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身体好。”老大娘把我看了一会，又说：“你见了毛主席，今后可要好好工作啊！”群众的亲切希望，深深感动了我。我心里暗暗地想：“老大娘，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把营业员的工作干一辈子！”

熟悉商品，了解顾客 练好营业员工作的基本功

初站柜台，什么都不熟悉，困难很多，顾客的询问，常常答不上来。顾客问：“这牙膏是什么味道的？这香皂是什么香型的？”我只能说：“不知道。”这样一来，有些顾客就不满意地走了。自己心里怪不是个味道。我为什么做不好工作呢？反复考虑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对商品不熟悉。因此，我觉得只有努力钻研业务，才能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服务。

但是，究竟怎样钻研业务、熟悉商品呢？开始时我曾这样想：领导上如能把我送到商业学校学习一个时期，出来后再当营业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思想上不断翻腾，想了很久。后来想到，毛主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①又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②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应该在商业工作的第一线学习，在实践中面对商品学习，在实践中练好基本功。

化妆组经营着五百多种商品，要想一下子都熟悉它们，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商

品虽然很多，从销售的情况来看，总有个主次之分。于是，我就先学销售量较大的牙膏、肥皂、香皂、香脂之类商品的知识，然后学销售量较小的花露水、香粉之类商品的知识。

经过学习、实践，我摸到了六种学习方法：

第一，把商品的说明书和商品包装皮剪下来，作为学习材料，进行对比学习。我收集了八十多种牙膏和香皂的包装皮和说明书。开始收集包装皮时，有些同志说：“瑾瑜就是个小孩脾气，见啥盒盒都喜欢，都往口袋里装。”当他们知道我这样做的目的后，都说做得对。

第二，接待顾客时，多征求顾客对商品的意见，向顾客学习。如顾客来买牙膏时，我就问：“您过去用哪种牙膏？是什么味道？”这样，问得多了，对一些商品的特点也就熟悉了。

第三，自己在购买本组商品时，有意识地选择不同品种，亲自实践，熟悉商品性能。

第四，碰到较难熟悉的商品，特别是新产品时，就写信向工厂请教。有一次，新到了一种扇牌透明洗衣皂，每块四角三分钱，比一般肥皂贵，比香皂便宜，有的人一买就是四、五块。但也有人提出：“既然是洗衣皂，为什么这样贵？”我自己也弄不清，就写信问工厂。工厂来信说：“这种扇牌洗衣皂是新产品，原料同香皂一样，就是香精少一些，也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可以当香皂用。”后来碰到顾客提出疑问时，我就能主动宣传这种新产品的特点了。我先后向上海制皂厂、天津香皂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等单位写过信，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使自己学到了不少的商品知识。

第五，向别的营业员学习。我们化妆组的几位同志各有特长。有的同志对各种商品，特别是各种牙膏，不看标签，就能一口报出价格来；有的同志陈列商品又快又好。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第六，联系实际，学习介绍商品知识的书籍。我过去看过一些这类书籍，由于没有联系实际，不会使用。例如，学过香皂有各种不同香型的知识，可是，拿出一块香皂来，却对不上号。后来，在营业中注意了对照商品来学，接待顾客时联系起来用，这样边学边用，记得牢，用得上。

一个营业员，如何才能使一种商品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充分发挥其效能呢？这就使我联想到牙膏与牙齿的关系和各类牙膏的适应对象。大夫看病要对症下药，难道我当营业员就不能做到这样吗？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里说的，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①，就决定抽个时间去口腔医院挂个号，向大夫请教。我想，见了大夫时就说：“我不是来看病的，是请你教给我一些关于牙膏与牙齿方面的知识。”但又怕人家不告诉我。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领导，开了个介绍信，请纺织城职工医院一位有经验的老大夫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大夫告诉我药物牙膏分两大类，一类是防锈牙膏，一类是

防蛀牙膏，各有不同的用途。以后，我就能够根据不同顾客的需要，介绍牙膏的性能了。

通过这件事，使我深刻感到：任何人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诚心，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这又推动了我不断前进。

徐寅生同志在《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中说，他的技术全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我的商品知识，同样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向顾客学习的，向营业员学习的，向工厂学习的。现在回想起自己学习商品知识，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的过程，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在我不熟悉商品知识、没有掌握营业员工作规律的时候，顾客一问三不知，心里很紧张，工作很被动，感到站在柜台里很不自由。当我慢慢熟悉了业务，掌握了一些商品知识和营业员工作规律时，就有了点“自由”。顾客问什么，能随口应答，心里也不害怕了。有一次，一位顾客要买留兰香牙膏，当时我们商店正缺这种货，我就主动给他介绍和留兰香牙膏香型相同的红马牙膏，顾客满意地买了。

营业员了解商品，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顾客的需要也要作分析和了解。由于顾客的职业不同，年龄大小不同，性别不同，籍贯不同，他们的喜爱也就各有不同。营业员自己的喜爱，并不等于顾客的喜爱。如果营业员按自己的喜爱向顾客介绍商品，就可能在工作中犯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28页。



所以，在介绍商品时，要根据不同顾客的特点，考虑到他们的不同需要。例如，我们商店供应的对象主要是纺织工人、职工家属以及郊区农民，他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在职工中，新职工和老职工的需要也不同。老职工大多数都愿意购买名牌商品和质量较好的商品。新职工，特别是女职工，在购买商品时，一般喜爱买物美价廉的，除了注意商品的质量以外，有时还特别注意商品包装的美观，如看雪花膏的瓶子是否好看，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对顾客介绍商品时要灵活机动，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介绍，不能一见顾客就“劈哩叭啦”介绍一大堆。不然，有时会引起顾客的反感。介绍商品也要因人、因时制宜。忙时少介绍，闲时多介绍；顾客是内行就少介绍，是外行就多介绍；顾客买货主意定了的少介绍，顾客拿不定主意的多介绍；老牌商品少介绍，新产品多介绍。营业员只有掌握了顾客买货的规律，在介绍商品时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缩短交易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严格要求自己 改善服务态度

熟悉商品、了解顾客需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党组织要求我们对待顾客要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因为营业员服务态度好，体现着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态度的冷与热，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我们要不断改善服务态度，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营业员成年累月在柜台前接待顾客，有时和顾客之间难免要发生矛盾。根据我的观察，营业员和顾客之间发生的矛盾有三种：一种是来自营业员方面的。有的营业员由于种种原因，工作时思想不集中，或者因为工作上的疏忽，对顾客提出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引起对方不满。一种是来自顾客方面的。有的顾客不照顾营业员工作的特点，对营业员提出不适当的要求，或者不顾国家利益，坚持不合理退货等等，给营业员的工作造成困难。还有一种情况是顾客和营业员双方都有缺点。

出现这些矛盾时应该怎样解决？过去总认为，营业员和顾客之间发生矛盾，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有责任。学习《矛盾论》后，这种看法有了改变。我想，营业员卖货，顾客买货，营业员是为顾客服务的。只要营业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良好的服务态度，顾客和营业员之间的矛盾，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这样，就比较清楚地看到，营业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改善服务态度：

第一，营业员站在柜台上，要全心全意做好工作，不能在接待顾客时夹杂个人情绪。营业员一进柜台，就要时刻想到服务态度好不好，是影响到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的大事，要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地去接待顾客。

第二，营业员和顾客之间发生了矛盾，营业员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检查自己的服务态度。

第三，遇到顾客方面有缺点，营业员要



体谅对方，耐心解释，不急不躁，使问题得到正确的处理。

进行调查研究 不断改进工作

在柜台上有时忙，有时闲，这件事有没有个规律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对于某个问题，“你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为了认识和找到这件事的规律，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我利用自己的休息日，专门作了一天观察和统计。这天我们营业小组共接待了八百六十多人次，男女顾客比例是一百比一百八十，全天共卖二百六十元，平均每笔交易三角多。用这个平均数除一定时期的销售额，就可以估计到这个时期共接待了多少顾客。根据夏季作息时间，顾客进店最多的时候是上午八点半至十点，中午十一点至一点半，下午六点至八点半。这些情况，为我们组织货源、安排任务和排班等提供了参考。当然，这只是我学习调查的开始，今后我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更多的调查，为我们主动安排好工作寻找比较科学的依据，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加主动。

我们是社会主义商业的营业员，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限于一手交货，一手收钱，还必须当好工厂的耳目，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尽力帮助国家掌握供、产、销方面的情况，以便解决营业中遇到的矛盾。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下旬，我详细调查了上海制皂厂生产的二十多种产品的销售情况，发现有的销售快，有的销售慢；群众反映有些香皂包装不好，有的香味不持久等等。我把这些情况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写信告诉上海制皂厂，使他们了解我们这里顾客需要商品的情况，便于安排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一个营业员，还必须从革命利益出发，时刻注意工作的政治方向。我们化妆组有一个时期，单纯为了降低商品零售起点，把卖二元四角一瓶的指甲油，改为搽一次一分钱。有的青年纺织女工就来搽指甲油，把指甲染得红红的。当时我想，我们社会主义商业的营业员，首先是个革命者，不能为了做生意就什么都不顾了。搽一次指甲油一分钱，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少，而在于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打扮。我们经营指甲油，主要是为了供应一些演员演戏时的需要。所以，我和同志们一起向领导建议，取消了这个办法。通过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站柜台决不能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开方便之门。

我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当我翻开毛主席著作学习时，总觉得好像毛主席就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今后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学一点，用一点，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改造思想，做好工作，真正做一个红色的营业员。

^①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8页。



評吳晗同志的資產階級歷史觀

馬 岩

吳晗同志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能夠算作“自我批評”嗎？不能。它是对《海瑞罷官》的辯護。豈止是辯護，而且是反攻。這又一次證明了，吳晗同志是多麼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

《海瑞罷官》這個劇本，不可等閒視之。它喊出了資產階級的心聲。它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一種反映。

不可低估批判《海瑞罷官》的意義。圍繞着批判《海瑞罷官》展開的這場大辯論，是一場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這場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揭露和批判吳晗同志在史學領域內堅持和宣揚的資產階級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的最根本之點，就是反對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來觀察歷史。吳晗同志對封建社會的描繪，對歷史人物的評價，無不貫注着這一點。

今天，形形色色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都在鼓吹抹煞階級矛盾、調和階級鬥爭的謬論。我國歷史學界中持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唱出同樣的調子，絕非偶然。

我們必須在歷史研究中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階級鬥爭學說，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歷史觀。

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不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故意抹煞階級鬥爭，是吳晗同志資產階級歷史觀的核心。他認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時，地主階級是進步的力量，不能批判；秦皇、漢武、唐宗、康熙、乾隆這樣一些“全盛



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光明面”，不能批判^①。他断言：“并不是如有人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是人吃人的时代，应该说历史上曾经有过黑暗时代，也曾经有过光明的时代。”^②

“人吃人”，这是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揭露。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处于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下，或者被杀戮，或者被折磨，总是逃不脱被“吃”的命运。早在五四运动前夕，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便在《狂人日记》中，揭穿了封建制度这种“人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五四运动时期，激进民主派以无畏的勇气，从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揭露出封建制度这种“吃人”的本质，这正是他们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承认不承认封建制度是“人吃人”的制度，反对不反对这种制度，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是判别一个人是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一个重要标志。白翎从小就对“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的吴晗同志^④，竟连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反封建精神，都觉得不能容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处于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就不是“人吃人”的制度了吗？就不能批判吗？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认任何一种剥削制度在其上升时期的历史的进步作用，而且给了这种作用唯一科学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时期中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论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或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都是以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任何一种剥削制度，不论它处在没落时期还是上升时期，都存在着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有地主，就有骂地主的农民；有封建，就有反封建的农民。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不管吴晗同志对于“一见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等等，就喊打倒”的人^⑤，怎样讥讽嘲笑，也改变不了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经济上比较繁荣的时期。可是，就在比较“繁荣”的时期，封建制度的人剥削人、“人吃人”的本质也是不变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

① 《学习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第301、267页。

② 《灯下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91页。

③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④ 《春天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

⑤ 《学习集》，第301页。



没有因为“繁荣”而消失。恰恰相反，这种“繁荣”，正是建筑在对农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是以这种剥削和压迫为前提的。恩格斯写道：“文明的基础既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那末它的全部发展便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领域里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后退一步。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灾难”^①。吴晗同志的严重错误就在于，抹煞了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皇帝爱百姓、百姓爱皇帝的光明时代。

谁要指出封建社会中的“上升时期”“繁荣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吴晗同志便大肆责备，说这样就使得“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他说，在许多新编的历史教材中，“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②原来，在吴晗同志看来，农民起义算不得历史上的光明面，岂止不光明，而且很黑暗！说农民起义如何好，同说一个个皇朝如何坏，完全一样，都是抹煞了光明，宣扬了黑暗。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完全相反，吴晗同志说的“光明面”，恰恰是黑暗面；吴晗同志说的“黑暗面”，恰恰是光明面。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③他还指出，这种“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的农民起义，正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④。

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光明得很！农民革命势力所到之处，官府的赋税不纳了，劳役不服了，地主阶级所有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才是黑暗的封建社会里透露出的真正的光明。

吴晗同志为了证明封建社会的光明面，不是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是农民同地主的阶级合作，为了替这种阶级调和论制造论据，他一方面极力夸大大地主、大官僚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大讲所谓中小地主同人民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说“好皇帝”“清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0页。

② 《学习集》，第267页。

③④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9、617页。



官”就是代表着中小地主和人民的利益向大地主作斗争的。他说，朱元璋“无情地打击了一部分大地主”，“朱家政权的支柱是广大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在他的官僚机构中，官员的来源主要来自这个阶层”^①；海瑞“打击了官僚地主，保护中小地主和贫农中农以及市民”^②。

说来说去，吴晗同志是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代替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

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的，如阶层等级之间、集团派系之间、在朝与在野之间、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地方势力相互之间，等等。这种矛盾，有时也会表现得很尖锐，需要动用法庭、监狱、军队来解决。而在这种冲突中，人民也往往大批地成为无辜的牺牲品。那末，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这种矛盾呢？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归根到底，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权力的自相厮杀。不论这种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各集团在反对农民这个问题上总是一致的。怎么能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代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③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贯串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始终，决不会由于“上升时期”而消失，决不会由于“繁荣时期”而中断。这个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的矛盾，决不会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代替。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决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④承认还是否认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无产阶级历史观同资产阶级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在吴晗同志笔下，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见了。他或者用经济繁荣的现象来掩盖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或者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来代替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就证实了，他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奉行的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而阶级调和论就是这条路线的神经中枢。

① 《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187 页。

② 《灯下集》，第 195 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9 页。

④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491 页。



封建王朝的政策是不是“超阶级”的政策

为了宣扬阶级调和论，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吴晗同志以及一些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明智的“让步政策”，说什么朱元璋“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①，说什么西汉初年、东汉初年、唐朝初年、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当时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的结果。

这是对阶级斗争历史的歪曲。

历史上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开始建立的时候，如西汉、东汉、唐朝、明朝等，封建统治者面临的都是经济雕敝、政治动荡的局面。地主所有制，遭到了农民革命的严重打击。在地主阶级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地主阶级集团之间混战的过程中，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已被镇压，但余波未平，还有农民起义军在坚持斗争，或者以隐蔽的形式在积蓄力量待机再起。地主阶级中有些集团，暂时还没有听从新王朝的统一指挥。这种时候，封建统治者总得采取种种措施，扑灭农民起义的余烬，恢复和巩固地主所有制，恢复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他们很明白，如果不这么办，新建立的统治大厦是不稳固的。

吴晗等同志反复渲染的所谓“让步政策”，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而是新王朝团结整个地主阶级的政策。所谓“轻徭薄赋”“免租减税”，实质上是给予各地大大小小地主的优惠。汉末的荀悦曾经说过，汉文帝时，实行减免租税的政策，是“资富强”，结果是“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②。朱元璋曾经明令规定，只是官员、退職官员、生员才享有减免徭役的权利，而其他人特别是农民则有“趋事执役以奉上”的义务，不在减免之列。^③推行这些措施，是新王朝取得整个地主阶级信赖和支持的重要原因。由于推行这些措施，地主阶级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力量，新王朝便能依靠他们加强对农民的统一统治。可见，所谓“让步政策”，其实是封建统治者调节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统一地主阶级力

① 《朱元璋传》，第300页。

② 见《前汉纪》，卷8。

③ 《明太祖实录》，卷111。



量，共同对付农民的政策。

封建王朝只会对地主阶级施行“仁政”，决不可能对农民施行“仁政”。封建统治阶级决不会因为受到农民革命的打击，就“接受历史教训”，改变自己的阶级本性，变得对农民亲爱温柔，慈悲为怀。相反，在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怀着刻骨的仇恨，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剥夺农民在革命中取得的胜利果实。例如，东汉初年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奖赏官吏以杀人多少为标准。明朝初年，农民起义仍然连绵不绝，“官军”对起义农民的逮捕和屠杀，动辄以千万计。这种残酷的阶级报复，是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建立起的一切封建王朝必然采取的措施，从无例外。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报复的历史事实，是那种虚构的“让步政策论”所冲刷不掉的。

不错，新的统治者对农民也实行过招抚逃亡、奖励垦荒之类的措施，但这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加强暴力镇压的同时，玩弄的欺骗手腕罢了。他们要用这种手腕来达到用暴力手段所达不到的目的。在新王朝建立的时候，由于农民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和逃亡，许多地区严重缺乏劳动力，农田荒芜。而没有被剥削的对象，统治阶级是活不下去的，何况那些逃聚山林的农民还是对统治阶级的严重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才采取那一套欺骗政策，用一些小恩小惠，把农民哄来作为供他们剥削的牛马。这些政策，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仁慈或明智，并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而是封建统治阶级寻找到的最适合于当时条件的统治办法。采取这种办法，对地主阶级是最有利的，既可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又可以麻痹农民的革命意志。

每当农民起义的暴风雨过去以后，地主阶级用“恩威并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把农民重新控制和束缚了起来。由于农民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封建势力，地主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恢复元气，因此，在某些地方，农民遭受的剥削暂时可能较起义前略有不同。但是，任何时候，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都是它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的剥削。正因为如此，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力量的加强，农民遭受的剥削越来越残酷，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便又陷入严重的危机。这时候，农民便又点燃起了起义的烽火。

当地主同农民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地主的时候，当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而农民的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的是反攻倒算，尽快地消灭农民革命势力，尽可能地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决不会实行什么“让步政策”。当地主同农民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地主的时候，当地主阶级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的时候，地主阶级有时也会采取一些迂回曲



折、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某些统治办法作局部的改变，欺骗和麻痹农民，力图削弱和扑灭农民革命斗争。这种策略，是地主阶级整个反革命政策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也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实行这种策略的时候，地主阶级决不会放松对农民的暴力镇压，而是用这种策略来作为对农民的暴力镇压的补充，并为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更加凶恶地镇压农民革命势力准备条件。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①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革命势力，应用的同样是这个原则。吴晗同志却硬说，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不采取这个原则，反而实行仁慈的“让步政策”。你看，封建统治者这么厚道，农民还要反对它，还要造反，那当然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了！

吴晗同志除了宣扬地主阶级曾经对农民实行过什么“让步政策”之外，还力图证明“好皇帝”“清官”办了很多“好事”，如惩治贪污、抑制豪强、兴修水利，等等，说“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②。在吴晗同志看来，这些“办了大大的好事”的“好皇帝”“清官”，或者由于出身“贫苦”，或者由于“秉性刚阿”，或者由于“眼光远大”，虽然一方面仍旧是皇帝，是官，但同时却又奇妙地兼职作了“人民的代表”，“一身而二任焉”。总之，“好皇帝”“清官”之所以成为“好皇帝”“清官”，就是因为他们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办了“好事”。

“惩治贪污”！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有时皇帝也惩治几个贪官，这是因为，那些贪官贪得过多，王朝的收入就会减少，还可能闹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抑制豪强”！皇帝就是最大的豪强。有时皇帝也抑制几个豪强，这是因为，那些豪强的行为，不利于王朝的统治，甚至会动摇皇帝的宝座。

执行王朝意志的“清官”，也反对过贪官豪强的某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地主阶级的一切“不法行为”。实际上，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和“不法行为”之间不会有严格的界线，更不会根本对立的，而是可变的、相对的、相互补充的。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时说过：“我们可以主张使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今后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碍有过分常见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发

^①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1182页。

^② 《春天集》，第204页。



生。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作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何处算是诚实赚钱的终点，何处算是诈欺取财的起点。”^①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哪里是“诚实”剥削的“终点”，哪里是“欺诈”剥削的“起点”，是分不清的；怎样算是“合法”的剥削“权利”，怎样算是“不法”的剥削行为，同样是分不清的。今天的“不法行为”，明天会被当作法律固定下来，成为“法定权利”；今天的“法定权利”，明天也许会在法律条文中被取消，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仍然保持着。“豪强”的地主和“不豪强”的地主，“法定权利”和“不法行为”，本身就很难分清。其实，封建社会的“王法”所划的“合法”和“非法”的界线，主要是为了对付农民，地主剥削农民是“合法”的，农民反抗地主是“非法”的。至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怎样的限度内算是“合法”的，超出了怎样的限度算是“非法”的，地主阶级是不能够也不愿意划分清楚的。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清官”，又怎么能去制裁所有的贪官豪强，惩办所有的“不法行为”呢？所谓“执法如山”的“清官”，惩治几个贪官豪强，也不过是找几只替罪羊，来宣扬宣扬“王法”的“公道”、帝王的“英明”而已。

“兴修水利”！当然，这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好事也应该分析。水利，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修的，主要应当归功于劳动人民，而不应当把功劳都记在“好皇帝”“清官”的账上。而且，“好皇帝”“清官”兴修水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阶级的需要，是为了地主阶级掠夺更多的地租，是为了王朝征收更多的赋税。事实上，一切剥削阶级，从奴隶主到资产阶级，为了剥削得更多，总要采取一些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有人会说，社会生产发展了，劳动人民不是也有好处吗？生产发展了，劳动人民不一定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剥削阶级常常把增加的社会财富全部掠夺了去。有时，劳动人民也可能得到微薄的一份。即使如此，又为什么要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呢？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应该归剥削者享有，如果留点残羹剩饭给劳动人民，就是剥削者办了“大大的好事”！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逻辑。

毫无疑问，封建统治阶级的不同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实行的不同政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那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生产的政策，和实行那些政策的代表人物，从来也不抹煞其历史功绩。但是，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政策，决不会是为农民谋利益的政策，决不会是“超阶级”的政策，而只能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执行这些政策的帝王官吏，毫无例外，都是地主阶级的阶级代表，他们的行为决不

^① 《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6页。



会违背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怎么会有那么一种人，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是农民的“救星”呢？

史学领域中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的指引下，掀起了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浪潮，掀起了一个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浪潮。历史著作和历史教材，必须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已经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共同要求。原来被一些人当作偶像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遭到了革命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某些简单化的缺点，可是整个地来说，史学领域里呈现出一种敢于打破旧传统，敢于跳出前人窠臼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①历史学界中革命批判精神的激越昂扬，是这场大喊大叫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这个总目标服务的。

对于史学领域内革命精神的大发扬，资产阶级认为糟得很。凭着阶级的本能，资产阶级深知保卫自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阵地的必要，他们就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进行抵制和反击。

为什么对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竟会引起资产阶级如此激烈的反对呢？为什么在史学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却是环绕着如何对待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呢？这必须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上来寻求答案。

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它的先进人物对封建的社会、封建的国家、封建的传统曾经作过无情的批判。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剥削阶级的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版，第706页。



意识形态，它们之间有共同的东西，有妥协的基础，因此当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它需要也能够同封建的意识形态结成同盟。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不过它还有自己的特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抵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常常感到自己可以夸耀、可以迷惑人的东西未免太少了。而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人们却有很深的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时，除了贩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些反动学说以外，还不得不乞灵于封建的意识形态。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冲击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就挂起“尊孔复古”“东方文化”的招牌，从历史垃圾堆里拣出一些东西，作为反对革命的武器。当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御用文人又一次打出了“尊孔读经”的旗号，颂扬封建道德，攻击马克思主义。

开国以来，资产阶级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时，依然是同封建的意识形态结成联盟。一九五九年以来，他们的活动又发展到非常嚣张的程度。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利用我国所遭到的某些暂时困难，刮起了一阵反对社会主义的黑风。随着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也尖锐化了。“合二而一论”、“无差别境界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等，一时纷纷出笼，此呼彼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吴晗同志著文立说，不许人们批判封建制度，不许人们批判帝王将相，不许人们批判封建道德，不许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历史，以历史学家的面貌，积极参加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合唱。

不仅如此，吴晗同志还“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那样的剧本。写这个剧本，果真像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那样，是“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的吗？

我们同吴晗同志在史学领域内的这场大辩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科学阵地同其他阵地一样，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盘踞着不走。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大旗，在史学领域里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一家贫农

——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二*

魏 巍

汽车在夜色里忽然颠簸起来。借着暗淡的月光，我看看外面，大大小小的炸弹坑愈来愈多。有的山坡也被炸瘫了，石头滚落在路面上。经验告诉我，这是敌人的轰炸重点。一问，果然前面不远就是W桥了。

“哦，W桥！”我的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不自禁地喊出声来。我早就听说，这是一座英雄的桥。在我们来到以前，这座桥已经被少则十几架多则成百架的美国飞机轰炸了三十六次，而这座桥却仍旧巍然屹立在浓烟烈火中。并且，就在这座桥的四周，有整整四十架敌机落地焚烧，还有不少的飞贼被活活生擒。（等到写这篇记事的时候，听说那里击落的敌机，已经不是四十架而是六十架了。）

我们决定立刻下车步行，好更真切地看看它，这座英雄的桥。

沿着山间公路走了不远，就看见一带江水在朦胧的月色里发着白光。人们告诉我，这就是D江。这是被约束在黑森森的群山里的一条激水。它势如奔马一般，正好在这里穿过一个险峻的山口。W桥就横在山口上。

江水穿过黑郁郁的山口直泻平原，莽莽苍苍，正像是从群山里跃然而出的一条苍龙。

我们在桥上缓缓走去。一面察看这座桥在夜色里雄伟的姿影，一面察看两岸高耸的群山，一切都显得无比威严。听听脚下的江水，江水并不喧哗，但却隐隐传出深沉有力的涛声。听说，在战斗最激烈的两天里，这里曾击落二十八架敌机。我在想，当这些敌机冒着黑烟纷纷坠地的时候，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难道这是白宫的老爷们所曾料到的么？不，他们没有料到。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这不过是地图上的一座普通的渡桥。他们不知道一座普通的渡桥，因为拥有英雄的人，它就变成了一座隐伏着怒火的强大堡垒，一座在烈风火雨中镇静而威严的“钓鱼台”！

围绕着这座桥，产生了多少动人心魄的故事呵！

然而，我愿意首先叙说的，却是一家贫农。也许它可以回答：为什么W桥能够在烈

* 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一：《飞机也怕民兵》，发表在《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5日第6版。



火中昂然屹立？也许它可以回答：人民战争的花朵，在什么人的心里开得最美最红？

这是发生在五月末尾的一次战斗。由于敌机一次又一次遭到惨重的损失，这些胆怯而狡猾的飞贼们，就想出一条鬼主意：他们在轰炸时总是向海的方向俯冲；即使被打掉，也可以落在海里，等待直升飞机来救。这天，当敌机正这样俯冲轰炸W桥的时候，忽然，江中犁开一道浪花，从海上沿江而上开来了一条越南军舰。这条军舰正好对准俯冲的敌机猛烈开火，给敌机造成了致命的威胁。为了摆脱不利的处境，敌机也就向这条军舰拚命地展开攻击。又是投炸弹，又是发射火箭和导弹，顷刻间，军舰四周都是腾起的水柱。这条军舰十分镇定英勇，在奔腾的D江里忽进忽退，宛如一座威风凛凛的活动堡垒，不断地向着俯冲下来的敌机喷发着猛烈的炮火。但是后来因为军舰搁浅，中了一发火箭冒起烟来。舰上的炮手也有不少负伤。也就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出现了一场民兵保卫军舰的惊心动魄的搏斗。

当时，在岸上指挥民兵作战的，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她名叫阮氏嫦，是这个区的民兵队长。（她已经是我的熟朋友了，可惜此处不能详细描写她。）她正指挥着两个民兵连同敌机战斗。她一见军舰中弹，立即一面指挥民兵射击俯冲的敌机，来掩护军舰；一面指挥男女民兵登上军舰，去救护伤员并代替负伤的炮手们。一声令下，男女民兵们，有的驾起小船向军舰猛划，有的跳在D江的

激流里向军舰奋力游去。有一个女民兵吴氏选（我在上篇文章里曾经提到她），因水急浪大，被大浪打昏了，又漂回到江岸；但她刚刚醒转来，吐了几口水，就又跳在奔腾的江水里游过去了。还有一个发电厂的电工，也游到军舰上代替负伤的电工。顷刻间，这只江面上的活动堡垒，炮火又轰鸣起来，炮筒指向天空展开更加炽热的战斗。在这同时，村子里的群众也都忙碌起来，有的忙着给民兵做饭，有的驾着小船把啤酒和椰子送上军舰。尽管弹片不断地刷刷地落到江面上，但是运送弹药、运送饮料和接救伤员的小船，仍然一只接一只地向着军舰前进。直到军舰驶出自己的防区，民兵们还在江岸上不舍地追着它，跟着它，护送着它。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人民战争的图画呵！

我所要讲的一家贫农的故事，就是在这场战斗里发生的。这个村子里有一个老贫农，名叫吴寿南，已经六十四岁了。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早已参军，下剩的四个儿子，这次全部上了军舰。弟兄四个合使一门高射炮，有的装弹，有的开炮，打得十分英勇。老人最小的儿子吴寿六——大家都亲热地叫他六儿，连续负伤两次都不下军舰，直到第三次负了重伤英勇牺牲。小六儿的两个哥哥也光荣负伤。当他们英勇奋战时，老人正在社里喂猪，听到儿子的伤亡，一步也没离开自己的岗位。直到给六儿送葬，他才去了。人们怕这位年迈的老人悲伤过度，找人搀他，而他却拒绝别人来扶。并且，在墓地的追悼会上，老人硬是没有掉下一滴眼泪。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庭，怎样的一位老人呵！

我是多么渴望能够亲眼看一看他。到达这个地方的第三天，我们就到他家里去了。那是一个雨夜。他的老伴说，他在社里喂猪还没回来呢。我们等了一会儿，也不见回。夜已经很深了。相随的人催我们回去。我只好带着非常遗憾的心情，在潇潇的雨声里离开了这个村庄……

没想到，过了一天，我们却意外地看到了他。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正坐在一户农家挥着汗雨谈话，吴寿荫和他的老伴，一人手里提着两个绿皮儿的人椰子来了。他们是顶着大大的太阳，从二十里外赶来看我们的。老人的老伴是前天雨夜我们在一盏小油灯下看见过的。她比寿荫老人小两岁，今年已经六十二了。她今天还特意换了一件比较干净的棕紫色的上衣。可是，只要看一看她裙子下一双隆起粗筋的赤脚，就可以想见她一生一世经过了多少辛劳。寿荫老人穿着抗战鞋，棕色的三婆衫已被汗水浸得褪了颜色。他留着越南老人喜爱留的平头，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却行动敏捷，精神活跃。他把两个大椰子往地上一放，就说：“那天晚上你们到我家去，我到社里喂猪去了，很对不起！”又一再说明，椰子是自家种的，不是在街上买的。说完，又接着告诉我们：那天我们刚走，飞机就来投弹。有两颗炸弹正投在离他喂猪的地方不远，可是，“都是臭的”！说过，哈哈一笑。

我们忙着给老人点烟倒茶，称赞他的儿

子所作的贡献。老人兴奋得烟也顾不上抽了，把点着的纸烟往烟灰缸上一放，就谈起他的儿子来了。他告诉我们：他的大儿子在抗法战争时就参军去了，并且“参加过奠边府战役”；他的大儿媳妇也参加了工作，对他非常孝顺；他的二儿子原来在军队上当炮手，复员回来在碾米厂当工人；他的三儿子在太原工业区当工人，最近也回来搞农业来了。说到这里，他笑了一笑：

“光我们家就有四个党员！”

“都是谁？”我笑着问。

“你看，”他伸着手指，“老大家两口儿，还有老四和我们的六儿。”

“六儿本来是团员，他牺牲那天才追认是党员的。”吴寿荫的老伴补充说，“在墓上追悼他的时候，连他的叔叔都称他是吴寿六同志。”

这时，我看见老人放在烟灰缸上的纸烟已经熄灭，连忙拿起打火机帮他点着。老人究竟有些上年纪了，由于他的话被别人打断，抽了两口烟，抬起头望望众人，问：

“我，我刚才讲到第几个了？”

“讲到第四个了。”大家笑着说。

“对，对，讲到老四了。”

他抱歉地笑了一笑。接着告诉我们，老四也在军队上当过炮手，现在是民兵连长。战斗那天，他怕社里的稻子霉了，正在社里晒稻子哩，一听飞机响，就连忙跑到江边阵地上去了。……

老人兴致勃勃地谈着，当他刚刚谈到全家最宠爱的小儿子六儿，他的老伴当众打断了他。

“还是我来说吧，”她向大家说，“有些事



儿他不知道。”

提起六儿，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非常可爱的十七岁的男孩子的面影。那天深夜，我们到他家里访问，看见屋里柱子上挂着他很大一张照片。他梳着小分头，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含着微笑，显得非常漂亮聪颖。

“他是个乖孩子。”老妈妈说，“不光全家喜欢他，全村人都喜欢他。他是村里团支部的委员，牺牲时候，好多男女青年都哭啦……”

从老妈妈的叙说里，我们知道，六儿在七年级上就停了学，在村供销社当售货员。可是他思想开朗，他说，停几年再上学有什么要紧！供销社一部分卖百货，一部分卖烟、油。本来由两个售货员管，另一个不在时，他就跑来跑去一个人干。他还在村子里担任治安工作，敌机一来，他就拿着喇叭喊，督促大家下防空洞。飞机一走，他又跑到供销社售货。晚上还去文化补习班教书。临参加战斗那天，他正拿着喇叭喊呢，一听军舰遇险，就急忙把喇叭交给别人，说：“我要到军舰去！”还说：“你们等着看吧，我会表现出勇敢来的！”他上了军舰，哥哥们打炮，他就在旁边装弹。他还让哥哥教自己打炮。他的下巴被弹片打伤，掏出手帕包扎了一下，一边淌着血，一边坚持战斗。他的哥哥要他下去，急得他什么似的连连向哥哥作揖说：“我的好哥哥，我拜拜你们，叫我千万留在这里吧！”他打出了第二排炮弹时，敌人的弹片又打伤了他的左脚，他没有倒下，仍旧继续向敌机开火。后来，一发火箭射来，弹片打中了他的头部。他实在无法继续战斗了。可是在滚滚的烟火里，他还向哥哥们行了个举手礼，表示告别，然后才倒在甲板上……

屋里沉寂无声。我脑海里立刻又浮现出六儿可爱的面影：圆圆的孩子脸，聪颖的大眼睛露出微笑。

“他活着的时候，我是有些宠他。”沉了沉，老妈妈又回忆着说。“不过整个说这孩子也没有别的。他就是喜欢书，喜欢交朋友，出去的时候，衣服喜欢穿得整齐一些。他还特别疼爱七妹妹，每天晚上回来，都教妹妹念书。他每月的工资不算多，除了给我买烟打油，其余的都供给妹妹上学……”

我转过脸问寿蔺老人：

“听说六儿牺牲的时候，你正在社里喂猪？”

“对，对，”老人点头说，“那天我正在社里喂猪。有人跑来说：‘吴寿蔺！你的四个孩子都上军舰了！’我说：‘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过一时，又有人跑来找绑担架的东西，我就问：‘有人负伤了吗？’他们就告诉我，老四负伤了，六儿也负伤了。他们没有敢说六儿牺牲了。这时候，我打了一个寒噤，觉着跟平时很不一样。可是我守着猪圈，一步也没有动。我不能离开！”

“这是为什么？”有人插嘴问。

“为什么！这是我们社里的整整五十口猪呀！”老人望着大家，“我要离开，飞机来炸了，就没有人把猪栏打开，这些猪得统统炸死！”

老人神色激动，把手里的烟又往烟灰缸上一放：

“后来，又有人说：‘你的四个孩子，不是死了，就是伤了。’我想，负了伤，国家给他治疗；就是牺牲，国家也会好好安葬。我



只有仇恨美帝，如果美国飞机不来，我的儿子怎么会有的负伤有的牺牲了呢！同志呀，我给你说，这时候，我真愤怒得发抖，可是我不能哭。因为，这时候飞机走了，大家正在扬场，人很多；我要是哭了，就会影响扬场，更可能影响别人的情绪。我就吩咐家里人：统统不能哭！谁也不许哭！……”

“那天，也有不少人去安慰他。”老伴补充说。

“对，对，那天有不少人到猪圈来安慰我。”老人接着说，“我对乡亲们讲：做父母的谁不心疼孩子？六儿，也不是容易就养大的。可是，他是为祖国，为党，为人民牺牲的。他牺牲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不能回家去，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直到当天晚上，有个姑娘来代替我喂猪，我才离开了猪圈。……”

我又问：

“听说，给六儿送葬，你还不让人搀？”

“是呀，”他点点头说，“你想，哭哭啼啼搀搀扶扶的多难看哪！我给人家讲：我知道你们搀我，这是好意；可是，你们看，我不哭，也不掉泪，我走得动，你们谁也不要来扶！”

说到这里，他指了指他的老伴：

“那天晚上，我们送葬回来，已经后半夜了。省委的同志担心我们过于悲痛，把我们接到办公室去安慰我们。我的老伴就说：‘请领导上放心。以后敌机再来，我就代替六儿去送炮弹！’我说：‘不成！你还要照顾孙子哩，再说你的身子也不太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

当老人谈着这些的时候，我的心被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震撼着。我不禁又想起前天

晚上的那个雨夜，在奔腾的D江边上的那座茅屋。这座茅屋看来比村里其他的农舍要显得低矮。可是就在这样的茅屋里，居住着一户对革命对祖国多么忠诚而又多么坚强的家庭啊！

谈起现在的生活，老人说：

“困难是有，可是要比起从前就好得多了。我给同志说吧，八月革命前，我吴寿荫没有一寸土地，几十年，我们两口都是给地主做苦工的……”

“算啦，过去的事不要提啦！”老伴扭过脸去。

“给中国同志讲讲怕什么，”老人看了老伴一眼。“后来我又给人挑东西。来回几十公里，挣不到几个钱。就这样，日本法西斯还在路上拦住我，不让我去。钱挣不来，饿得孩子们哇哇地哭。逼得没法儿，我又去山里开荒，法国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一天到晚钻防空洞。等到开出荒地，粮食还没有收到手里，地主又跑来收租子了。”他激动起来，“这天地虽大，逼得我吴寿荫没有一条路可走呀！最后我不得不去……，”

“唉唉，你给同志们讲这些有什么用！”老伴立刻又打断他，而且显得有些激动了。“这些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由于老伴几次打断，老人对自己的身世也就不多说了。但是他的神色仍然十分激动，他说：

“同志，你想想，我们还愿意走回头路，再去过那样的生活吗？不，不，我们一定要打到底！”

寿荫的老伴心事重重，偏过脸坐在那里。她今天几次打断老人的谈话，可以想到，这



其中有多少辛酸事呵！虽然这些事没有细讲，我们也是可以猜到的吧。这个富饶的绿色的国土，整整被法国人压榨了八十年！在这八十年中，越南人民真正是被榨得干干的。听人说，过去由于人们吃不起咸盐，甚至流出来的汗水都不是咸的。这是多么可怕的生活！两位老人和千千万万的越南人民，就是从这样的生活里走过来的。而今，越南人民好不容易从法帝国主义铁蹄下得到了解放，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这个国家，企图重新来奴役他们。难怪一提这些，老人会那么愤激。是的，这是永远也不能再让它回来的旧生活！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再走这样的回头路！“我们一定要打到底！”——这是寿荫老人也是全体越南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

最后，老人站起身来，托我们一定要向毛主席、刘主席问好，感谢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坚决支持。说过以后，从手上脱下一个用敌人飞机残骸做成的银色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

我们把两位老人送出门外，送到栽种着绿色的龙骨篱笆的小径上。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望着他们被终年的汗水浸褪了色的衣裳，望着他们粗筋隆起的赤脚，心里不禁默默地喊着：贫农们！对革命、对祖国、对党忠诚不二的贫农们！今天，我又从你们身上，看到了这块土地上深不可测的力量，听到了这块土地上真正的心声。我深信，即使在你们的面前，横起一道红腾腾的火山，它也挡不住你们的去路呵！

两位老人已经转过小径，渐渐消失在芭蕉的绿丛里。我正待转过身来，这时候，猛然听见 W 桥方向，响起了一阵十分嘹亮悦耳的像滚雷一般的高射炮声。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

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中，很多工农兵和学生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本刊准备经常选登工农兵和学生写的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文艺等方面的文章，欢迎大家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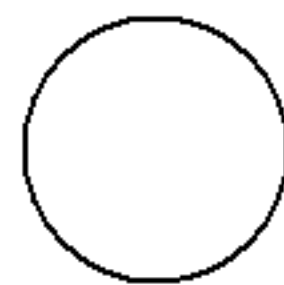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



一九六六年

3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三期 ★

目 录

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尹 达 (1)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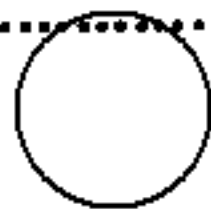
不爱红装爱武装 杨作红 (11)

思想不断革命 技术不断革命 邹瑞祿 (15)

从不愿当干部到决心干一辈子革命 宋文美 (20)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

——评《收租院》泥塑群象 蔡若虹 (26)



☆ 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



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尹 达

前 记

这篇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写的，这次发表，只作了个别的文字修改。

文章里谈的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倾向，当时只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的，没有指名道姓地进行批判。但是，这里所谈的一些错误倾向是有事实根据的。

文章中对史学革命的一些看法是否妥当，请同志们批评。

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探讨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理论体系，从思想上武装了无产阶级，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他们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写下了一系列典范性的历史论著，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恩格斯曾指出，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南，重新研究全部的历史。^①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着世界的时代，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展开政治斗争，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都积极领导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为当时迫切需要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们没有来得及改写全部的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的历史，系统地揭发剥削阶级歪曲、伪造历史的罪恶，把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历史，按其真实面貌还给广大劳动人民。

但是，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世界各国世世代代的剥削阶级御用的史学家，为

^① 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 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



其阶级利益，借其阶级偏见，编写了大量的歪曲历史的史书。这些史书在世界各国长期流行着，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的力量，似乎这就是真实的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战斗任务，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必须把史学从剥削阶级的手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史学革命运动。不经过这样一场革命，就不可能清除剥削阶级长期灌入史学中的毒素，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历史。

帝国主义者，为着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利用史学宣传其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理论，编造各式各样反动的历史书籍，用以迷惑、麻痹各国的人民，松弛人民的斗志。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继承着帝国主义的史学理论，歪曲本国的历史，歪曲本国和邻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现代修正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的革命原理，继承着老修正主义者的理论，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新老殖民主义的别动队。现在，现代修正主义者已经把他们的理论渗入到党史、工人运动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里面，而且正在对全部历史进行篡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史学理论，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从剥削阶级的史学理论中捡来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招摇撞骗。这就更容易混淆视听，炫惑人心，起资产阶级反动史学理论所不可能起的作用。不识别它的本质，不消除它的毒素，它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渗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腐蚀剂。

在史学领域内，我们必须坚决地同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史学理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阐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严肃的光荣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应当用科学的历史观，对世界各国的史学遗产，进行严肃的批判，写出科学的历史。我们相信，在毛泽东时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二、史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史学遗产的批判，是无产阶级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史学理论阵地的斗争，是兴无灭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随之而来，和封



建主义史学思想合流，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反动史学。它是反动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结合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进行了批判，揭露其虚伪的反科学的本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指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引导广大青年走向革命。一些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也曾作了若干工作。这无疑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九四九年，我国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此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

十几年来，我们对史学遗产的批判已经作出了某些成绩。但是，有些史学工作者往往强调继承，忽视批判；有些人竟大肆宣扬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进攻。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解放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非法的地位，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却处于合法地位。反动的史学家配合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政治需要，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还有一些史学家，在反动的政治压迫下，不敢触及政治，在“为学术而学术”的气氛中进行学术研究，似乎是“超阶级”的，实际上何曾逃出唯心史观的思想窠臼？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在社会上，在学校里，在学术界，长期散布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

解放之后，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巨大变化，史学界也在起着变化。大部分史学工作者是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不少人确实有了相当的进步。也有一些人，表面上收起了那套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而思想深处，却依然故我。例如，昨天大讲李自成是流寇的人，今天也不得不说李自成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但是，他们在文章中却隐晦曲折地继续诬蔑农民起义的领袖。昨天还在大肆宣扬程朱之道的人，今天也不得不说那是封建理学；但是，却玩弄所谓“抽象继承法”，继续宣扬程朱之道。看来好像是真的马克思主义化了，其实，如果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认真加以分析，所谓“化”，只不过是加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而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左翼，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日益不满，在政治上成为革命的同盟军。这种政治上的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学术观点，使其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虽然他们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但是，他们所作的某些历史研究工作，在当时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朋



友当然是有份的，当然也在胜利者的行列之中。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决不是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理论的胜利，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已经成为阻碍史学前进的绊脚石。

毛泽东同志说：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

在具有高度党性的历史科学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也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剥削阶级史学有长期的历史。剥削阶级史学以及作为它的灵魂的唯心史观，决不可能由于革命的胜利而自行消亡。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史学家，必然采取各种形式，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进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歪曲马克思主义，以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反对马克思主义。

回顾十几年来史学发展的历史，这种斗争，在不同阶段，采取的形式往往有所不同。解放初期，迫于革命胜利的威力，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右翼，自然要收起他们极端唯心的、反动的一套，静以待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少数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右翼曾经跟着猖獗起来。经过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经过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经过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特别是对“厚古薄今”的批判，史学界对反动史学思想的面貌，有了初步的揭发，对反映在这一学科中的阶级斗争，有了初步的认识，反动史学思想的市场无疑是缩小了。

在这以后，我们的史学工作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和鼓舞下，敢于向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传统宣战，敢于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敢于藐视历代的帝王将相，敢于打破帝王家谱式的封建王朝体系。这种力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的精神，这种敢于革命、勇于战斗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右翼更不便公开反对党的学术政策，不便公开以极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82页。



端唯心主义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抗衡。他们往往以一种拥护党的学术政策的姿态，极力向右歪曲，向右拉去，甚至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在领导上纠正学术研究中的某些缺点时，他们就在纠“左”的幌子下，极力夸大某些缺点，企图全面否定党的阶级政策，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

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右翼，多数不是以极端唯心史观的形式出现，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的身分参与学术争论。表面上满篇经典著作的辞句，实质上却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的核心。其言甚辩，而其心极丑！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遭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这个期间，牛鬼蛇神大批出笼，史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也尖锐了起来。几年来，在对待党的学术政策上，在许多史学问题的争论中，在治学方法里，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史学研究中，同整个学术领域一样，我们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经过反复争辩，逐步弄清是非，借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逐步消除史学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积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资产阶级史学家却企图把“百家争鸣”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不论他们“鸣”什么，都不能批评。你批评吗？那就是“妨碍”了他们“鸣”，那就是不准他们“争鸣”，那就是违犯了“百家争鸣”。这里难道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吗？

我们一向珍视祖国的史学遗产，我们说必须经过批判，汲取其中的精华。你要批判吗？他就说你是“虚无主义”，抹煞遗产；你要继承吗？他就自居遗产，“继承我就是继承遗产”。这些史学家，就是反对批判，企图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偷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来。这些史学家的灵魂深处，还是充满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虔诚地向孔夫子偶像行礼的人，难道不就是典型的例证吗？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任何人都不得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当然，在史学界任何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历史问题的新见解、新观点，都必然会触及某些旧见解、旧观点。新见解、新观点，往往是在批判、否定旧见解、旧观点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在这种理论的自由争论中必然会涉及到某些人，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本着旧学术界的传统习惯，疑神疑鬼，恶意揣测，某某人在打击某某人，某某派在进攻某某派，以旧社会勾心斗角的宗派情绪，歪曲学术上某些原则性的是非之争，并且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把严肃的科学是非问题，转化为庸俗的人事纠纷。他们利用某些史学工作者在政策的理解上或历史理论观点上的某些分歧，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纵横捭阖，上



窜下跳，拥护某某，反对某某，硬把旧学术界的卑劣手法，塞进今天的史学界。难道他们不是用这种手段，打击左派，企图瓦解我们革命的史学队伍吗？

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企图垄断史学论坛。他们懵懵然，昏昏然，自封权威，君临于史学界。他们在宗派情绪支配下，形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学阀作风。他们的矛头特别指向青年史学工作者，冷嘲热讽，肆意谩骂，说青年“幼稚”、“无知”、“空洞”，是破坏他们“伟大建树”的“爆破手”。企图用这样的手法，把革命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打下去。另一方面，对于少数亦步亦趋跟着他们走的青年，却认为是天才，是希望所在，大肆吹嘘，赞不绝口，培养起他们的接班人来了。

我们提倡“以论带史”。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历史，对于大量史实给以科学的分析，反对“为史实而史实”、“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把理论同史实对立起来，以“尊重史实”为名，行其“史料即史学”之实。他们片面夸大“考据”的作用，企图以考据学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作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

高度革命性与高度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特征。而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革命性和科学性割裂开来，自居于“科学性”，自外于“革命性”。说什么现在“只有革命性，而无科学性”，“要末，就要科学性；要末，就要革命性”。试问，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还有什么科学性的史学呢？难道这不是抗拒马克思主义吗？

我们说，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研究社会的历史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具体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某些史学家却认为“阶级分析并不是万应膏”，“研究原始社会就不需要阶级分析”，企图否定阶级分析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试问，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能够用所谓超阶级的观点吗？世世代代的史书都在诬蔑劳动人民，这不是剥削阶级的阶级观点吗？试问，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怎么能够了解原始社会从没有阶级到阶级发生的真实过程呢？

一位史学家曾这样讽刺一部中国历史的稿子：“见农民就捧，见地主就打”，把这说成是两大罪状。这样的话竟会出自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口！我们要问：你们是否主张“见农民就打，见地主就捧”呢？

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为纠正“不良学风”而战，为反对“非历史主义”而战。于是，一系列的座谈会、报告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史学理论家的文章就出笼了。他们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他们认为对帝王将相只能歌颂，不能批判。谁



要批判，就是“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历史上的农民，竟成了他们诬蔑的对象。一说农民落后，只想发财致富，只想做皇帝；二说农民起义没有自己的思想，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封建制度；三说农民粗暴，杀人太多，往往造成瘟疫，造成社会的分裂局面。总之，帝王将相成了历史的“光明面”，而农民却成了历史的“黑暗面”。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主义”。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整个史学界的这一反复现象，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吗？

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能够听任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到处泛滥吗？不，不能！这样，在史学界就展开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尖锐争论。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上，在农民战争的问题上，在封建道德能否继承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问题上，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向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展开了反击。这正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时代在变化着，斗争形势在变化着，过去的某些左翼史学家，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却停滞不前，日益僵化，潜在的旧思想、旧作风，浮动起来了，日益发展了。他们就在恭维奉承，吹吹捧捧的气氛中，得意忘形，自以为“绝对正确”。这样，他们就潜移默化，昏昏然地进入了“和平演变”的迷宫。这样，他们就成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的俘虏，就成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作风的义务宣传员和推销员。他们尽做一些“亲痛，仇快”，“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的事情。

过去的左翼史学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反动史学曾经进行过斗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些成绩全部写在自己的账上，千万不要以为革命的胜利，证明你当时的史学理论全部正确，已经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了。重读一番过去所写的著作，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的史学理论，是会使自己出一身冷汗的！

过去的左翼史学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本来可以充分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形成一种核心力量，帮助青年史学工作者，大力推动史学迅速前进。可是，有些人却不是发扬革命传统，而是在发展本身潜存着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倒行逆施，向自己的反面走去，并且，把青年史学工作者向右拉去。这难道还不值得深自警惕吗？这样的一意孤行，那就必然滚进修正主义的深渊！

在史学工作者的头脑里，如果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史学思想不清除出去，听任这些思想继续作祟，那就谈不上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样下去，就会向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史学那里找祖师，续家谱。那就只有无批判地继承，哪里还谈得上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

如果史学工作者的世界观不经过彻底改造，不从资产阶级方面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不论口头上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辞句，一万年也跳不出资产阶级史学的泥潭。



三、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认为，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首先要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这就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批判的武器，才能对史学遗产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在史学革命斗争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些史学工作者，一提到学习，往往看得比较轻松，自以为已经养成了读书习惯，坐下来一本本读下去就是了。这样，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到他们手里，就毫无生气了。他们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而是采取学院式的态度，咬文嚼字，寻章摘句，从经典著作里为自己的定见找根据。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变成了经典著作的词句加上任意抄取的“史料”，构成自己的一套所谓“体系”，就自以为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了。这些人虽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①。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

史学是具有高度阶级性的科学，自己的立场如果没有转变过来，思想感情还没有从剥削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对阶级斗争、对革命没有充沛的火热的斗志，即令读一万遍经典著作，摘录一万张卡片，也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

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②。史学工作者的立场问题，能不能说已经正确地解决了呢？不能这样说。有些人口头上尽管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灵魂深处却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甚至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士大夫遗习。这样的思想感情如果不加改变，满脑子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而劳动人民的业绩却一点也装不进去，怎么能写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历史呢？怎么能真正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③ 如果和劳动人民没有共同的立场和感情，就很难懂得“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一真理。在剥削阶级的立场和情感支配下，

^{①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05、508页。

^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0页。



所梦寐以求的，绝不会是如何写出劳动人民的历史，而只能是名誉、地位、稿费、生活，甚至结合三朋六友，“保卫”其私人的所谓“学说”。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我们的思想感情必须“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①。

我们的史学工作者要使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真正起变化，真正从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就必须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就必须投入实际的生产斗争中去。

现在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参加。我们要有组织地到基层，和劳动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虚心向他们学习，在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使自己真正懂得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具体认识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真谛。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具体过程。在实际生活中接近了工农群众，了解了工农群众，感情就会逐渐起变化。这样，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③。

这样做，是不是会影响本身的业务呢？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史学这样一门业务。史学既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阵地，史学发展中既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要夺取这个阵地，巩固这个阵地，就必须有一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队伍。这支队伍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在阶级斗争中，才能够形成起来。应当了解，史学的业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理论上进行阶级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只有懂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思想深处具有充沛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志，才算具有了这门业务的灵魂。这不仅不会耽误业务，相反的，却正是加强业务的最重要的环节。

“我们有任务！”是的，作为理论工作干部，应当认真完成党和国家所付予的任务。我们回顾一下十几年来来的情况，固然作了不少的工作，培养了大批史学干部，写出了一些论著，在史学中也进行了理论斗争；但是，认真检查一下，这些任务究竟完成得怎样？史学队伍究竟马克思主义化到什么程度啦？那些论著中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不来一个认真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就不能完成。马马虎虎下去，自己究竟为哪个阶级完成任务，就很值得考虑了。

“我们要读书。”我们绝不反对，相反的，却提倡认真读书。但是，我们却反对静止的、孤立的读书方法，反对书呆子式的“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这样下去，“读书万卷，止以导迷”，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②③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08—509、508页。



越读越蠢。

我看这样的同志，还是首先读一读现实阶级斗争这本“活书”才是办法。当前这本内容极其丰富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书，很值得精读。虽然还没有写成文字，印成本本，但是，这里却包含着各个阶级、各个人，在社会斗争中，用语言、行动所写下的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这就形成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密切结合现实阶级斗争的书，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读懂了这本“活书”，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斗争中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只有认真地读通了这本“活书”，才有可能很好地读那些已经写成文字的书，才有可能从那些浩如烟海的旧史书中，发现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才有可能发现广大劳动人民世代进行的阶级斗争对历史的伟大推动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①。青年史学工作者在长期、艰巨的史学革命中，肩负着特别重大的责任。因此，更需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复杂的、深刻的革命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新的课题，是新的社会实际提出的新的革命任务。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成为史学战线上兴无灭资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投入阶级斗争中去，是培养红色史学工作者的百年大计。

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首要步骤，应当从社会实践开始，从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开始。史学工作者参加社会实际斗争，也正是历史科学的科学实验。参加一次并不能受用一生。在一定时期参加社会实际斗争，今后也是完全必要的事。

为了改造史学队伍，为了提高史学队伍的阶级觉悟，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正视个人思想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加以清除。

认识自己，改造自己；认识当前史学的现状，改造史学，进行史学革命，是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目的。

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革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史学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潜在力量，只有彻底进行史学革命，才能把它清除。

我们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① 《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第2版，第14页。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不爱红装爱武装

河北省武清县黄庄公社
老米店大队女民兵副连长 杨作红

一九六一年，党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当时，我心想，我是贫农的女儿，在农村生长大的，党培养我初中毕业了，更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在农业战线上干一番。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升学，回乡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回村以后，见到与我岁数差不多的青年，大都当上了民兵。我想，大伙在一起干活、学习、练武，倒也不错。于是，我也好奇地参加了。可是，事情不像我想像的那么顺心。农活一忙，活一累，再加上民兵学习、开会、练武，很紧张，我就不耐烦了，觉着干庄稼活真累，还不如升学好。由于脑子里有了这种杂念，情绪就不高，劳动时只是纺纺石棉，还不能坚持经常；民兵开会、学习、练武时，班长、排长找我去，也懒得去。

一九六四年春，我村开展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号召广大民兵积极投入

运动。民兵连也有计划地组织民兵大学毛主席著作，首先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我虽然也跟着学习了这篇文章，但是体会不深，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不清。我对村里存在的问题也看不见、想不到，以为村里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当时，我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打仗也轮不到女的身上，女的只要干好活就行了。所以，每天开会发言不多。

运动一天天深入，我的思想也在一天天变化。村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我这才大吃一惊。原来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他们正在挖社会主义墙脚，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的干部。这时，工作队的同志教育我说：“作红，你是贫农的女儿，是共青团员，又是民兵，应该当红色的革命接班人，不要忘记本。”接着，村里又开忆苦会，贫农、下中



农都吐了苦水。我也想起，解放前我家房无一间，地只二亩，全家六口人，依靠父兄打短工勉强糊口，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的军队，穷人怎能翻得了身呢？现在阶级敌人妄想变天，搞“和平演变”，怎不叫人气愤！

我带着这个问题又把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学了一遍，真是越学越爱学，每句话都扣住了我的心弦。毛主席的话，使我懂得了必须用阶级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必须划清阶级界限，贫农、下中农必须紧握枪杆子。过去靠枪杆子打来了天下，今天还得靠它保卫社会主义。这时，我才恨自己从前脑子里阶级观点太少了，思想上少了“一杆枪”。我才认识到，那种看不见阶级斗争，认为妇女只参加劳动就行了，参加民兵活动没啥用的想法，可要不得。

我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提高了，劲也有了。劳动一天，活多重，我也不觉累，每天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参加民兵活动。毛主席的《为女民兵题照》那首诗，句句话都在鼓舞着我。我把“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两句写成对联，贴在屋内，时刻用毛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我主动地参加民兵的各项活动，并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起初，我参加民兵活动，也不那么顺利，家里人总是阻拦我。妈妈看我干一天活还去练武，怕我累着，便说：“玩刀弄枪的是小子的事儿，闺女练那个有啥用？赶明儿

别出去了。你开会、学习我从没拦过，玩枪我可不同意，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嫂子也愿意我有空帮她看看孩子，好多纺点石棉，多得点收入。听了她们的话，我心里暗地对自己说：要听毛主席的话，遇到难题可不能动摇。但是，现在我又该怎么办呢？翻开毛主席的书，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找到了钥匙，开了我这把锁：必须向她们做思想工作，才能冲破这一关。

晚上，我同父母、兄嫂扯起忆苦会上的事。我把民兵排长圣永平奶奶家受的苦，讲给他们听：“圣永平的父母，因为受地主的剥削和旧社会的摧残，早已死去了，只剩下永平和他奶奶孤苦伶仃的两个人。那时候，永平的奶奶抱着他天天到各村去要饭。有一次到了地主家，地主的心真狠，不但不给，反而放出恶狗，把永平的奶奶的腿咬得鲜血直流，至今腿上还有那块仇恨的伤疤哪！”经我这一说，可勾起我父母心中的往事。他们也悲愤地向我诉起了我家遭受地主、富农剥削迫害的家史。趁这个机会，我对爸爸妈妈说：“过去咱穷人只知道命穷，不知是受地主、富农们的剥削压迫。您们以前见了枪就害怕，那是因为枪在地主、伪军手里，他们胡作非为，迫害穷人；现在咱们穷人翻了身，枪杆子掌握在咱们手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军队给咱打来了天下，这江山靠谁来保呢？”他们说：“靠咱呗！”我说：“对呀！正是为了保住咱们的江山，解放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我才参加民兵啊！当民兵，平时不抓紧练，战时怎会过得硬呢？”他们听了我



的话，很干脆地说：“那你以后就去练吧！”后来我出去参加民兵活动，我爸爸、妈妈还让我二哥跟我一块去。有一次，我睡得太死，没听到集合号声，妈妈就把我叫起来。

我第一次参加民兵实弹射击演习时，在准备的时间里，我想的主要是如何打好了，好看，而对于怎样下苦功，练就一身杀敌本领，想得却很少。当时，我心里很紧张。实弹射击规定有三发试射，在试射时，我心中又浮现出打好了回去多光荣的念头。可是偏偏事不如人愿，第一发打高了，打个上八环，第二发又打低了，打个下八环，第三发跑掉了。这时，我心里更紧张了。我想：试射打糟了，正式射击再打不出成绩来，回村多难看！由于我背上了争取个人成绩和荣誉的包袱，在计算成绩的十发射击中，又昏头昏脑地发射，结果仅打中七发，脱靶三发。演习结束，我很恼丧，本来当天可以乘火车回家，可是，大白天进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等到下午才回家。第二天，我强打着精神去麦场劳动，头也不敢抬。结果怕什么就来什么，偏偏姐妹和嫂子们与我开玩笑：“人家老妹子是去得急，回来得快，怕耽误了家里过麦秋。”“女的就是不行，上不了阵。”我心里本来就不痛快，听了这些闲言碎语，就更吃不住劲了，心想：何必吃这苦头呢？不练了。

回到家里，我望着屋墙上自己贴的毛主席的话：“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呆呆地想：打枪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个人好看与不好看，我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华儿女，能见到困难低头吗？失败一次就不

革命了吗？这时，党支部书记、工作队同志和部队同志鼓励我的话，也在我脑海里浮现了：“没打好，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要很好地从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你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敢打枪就不错。”“要用阶级观点看问题，你是紧握手中枪呢，还是交枪？”“作红，你要把面前立的靶子，当作阶级敌人。”姐妹们和嫂子们与我开玩笑，对我只考虑个人荣誉的错误想法，也正是一个狠狠的批评。我记起了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①经过几番思考，对如何正确对待批评问题，稍微想通了一点。于是，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等几篇文章，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为什么打枪和为谁打枪的道理。我检查了前一次射击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过硬，缺乏敌情观念，临阵胆怯，只顾个人成绩、荣誉，忘了面对的就是“敌人”。我越想越感到以前的想法不对头。这次幸亏是演习，如果真是打仗，岂不放掉三个敌人！

从此，我带着敌情观念，下定决心，要排除万难，坚持练下去。我以从难从严的原则要求自己，一点空隙时间也不放过。在家门外下坡，栽上了胸环靶，院墙贴上靶，屋里贴上缩小靶，坚持早晚练，饭前饭后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下雨下雪屋里练。胳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3页。



膊肘由红到肿，疼得钻心，休息之后再卧地，胳膊肘就不敢触地了，怎么办？坚持就是胜利，咬紧牙我也要练下去。母亲见我这个样子，关心地对我说：“慢慢练吧，心急什么呢？”老人家的疼爱，更加鼓舞我练下去。邻居的女伙伴们见我这样，也主动找我一起练。一次修桥，活较累，休息时，我照样坚持练。为了练习压子弹的速度，手指头磨破了，我就缠上橡皮膏。民兵连的同志们见我这样，也起劲地练了起来。的确，疼是不疼的开始，时间久了，肘部和指头结了硬茧，再也不怕磨了。

练无依托射击时，起初，举起一支七、八斤重的步枪，真有些吃不消。托枪不到半分钟，就颤颤臂抖，支持不住。举枪不稳，我便每天练托砖，由一块增到两块、三块，时间也由一分钟延长到两分钟、三分钟，时间不断延长，重量不断增加，这不仅锻炼了臂力，也磨炼了意志。现在，我能一次举枪半个小时，也不觉累了。每次练时，我总想着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的“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①的话。同时，想到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还在疯狂地侵略越南，仇恨的怒火在我心中燃烧。我想，眼前的靶子就好比是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是蒋介石的脑瓜。我就带着这股劲去练瞄准，开始练，左眼合不上，右眼盯不住，一会儿就累了，眼前模糊一片，看不清目标。我就专门练眼功，现在，我能在二十秒内不眨一眼，看目标也清楚。

到第二次实弹射击演习，我村民兵连去的射手，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获得了第一名。领导上表扬我勤学苦练成绩好，乡亲们也夸奖我，电影队也制了幻灯片，真使我又高兴又惭愧。我想到，这既是对我的鼓励，又是对我的鞭策。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现在，我村的女民兵已由十来个发展到二百多个了。那种认为女的不行，练打枪是瞎闹，女人上不了阵的说法，已消除了。男同志与我们开玩笑说：“以前说真的，我们辅导时就腻歪女的。你一给她纠正动作，她就扭扭捏捏，再说深了，就抹泪了。”现在我们男女民兵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练好本领，打击敌人！技术好些的女民兵主动给男民兵校正动作，男民兵也给女民兵纠正姿势，互教互学的风气形成了。我村有十多名女民兵的射击成绩，是很好的了。

我们民兵要实行劳武结合，练好“武”只能说是做了一半，“劳”这一半也不可缺少。凡是队里有艰巨任务，我们民兵连都主动去完成。如修桥、挖渠等，我们每次都能提前完成任务。我们下地带的是三大件：一是工具，一是枪，一是毛主席语录牌。

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出席了省妇女代表会。会议号召妇女大搞科学实验。回村后，地里的麦子大部已收割完了，正赶上种晚秋作物。我想，现在搞试验田，正是好机会。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工作队和党支部一说，马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7页。



便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拨给我们一块试验田。民兵连又把这项任务交给我和五名女伙伴，由我负责。我们六个女民兵可高兴了。那天夜里，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想着这件事，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们开始搞科学实验了，担心的是怕我们几个搞不好。以前，劳动时听队长分配任务，现在搞这块试验田，由我领导，我的农活技术又不强，真有些为难。但又一想，搞试验田就是搞革命，如果不去克服困难，还搞什么呢？只要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先当小学生，多向别人学，准行。结果，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我们这块试验田获得了麦、秋两季平均亩产八百四十六斤的产量，比上年增加了一百一十斤。

近两年来，在党的培养和毛主席的教导下，我虽然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但是距离党的希望和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后，我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听党的话，以雷锋、王杰为榜样，练就一身好本领，做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思想不断革命 技术不断革命

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 邹 瑞 祿
青年机械化、自动化突击队队长

我们青年机械化、自动化突击队，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搞技术革命。通过几年来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样一条真理：什么时候听毛主席的话，思想就有进步，工作就有成绩；什么时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迷失方向，思想上就要出毛病犯错误，工作也就走弯路受损失。

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从我们几年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活动中，我

们的体会是，只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一九五八年，我们镀漆工段几个青年工人成立了青年机械化、自动化突击队，技术革命搞出了一些成绩。十一月间，我代表“双化”突击队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听了哈尔滨一位售货员同志介绍他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改进工作的报告，很受启发。我想，毛主席是咱们劳动人民的领袖，是他领导咱们翻身闹革命的，售货员读毛主席的书能改进工作，我们也一定能用毛主席的书指导技术革命。回



厂以后，我就同队员们一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分析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矛盾是一个“穷”字。当时，我们镀漆工段只有几个电镀槽子、几支喷枪和两个烤箱，全是手工操作，下一天活累得够呛，有时候还完不成任务。怎样战胜这个“穷”字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部分同志认为改变这个“穷”字，领导上就得给人、给设备，一句话，就是向国家伸手；一部分同志认为全国都在大跃进，咱们不能坐等国家投资，应该开动脑筋，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人、要设备。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和《愚公移山》等文章。毛主席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打消了伸手向国家要人、要设备的念头，坚定了用“干”和“革命”来改造“穷”字的信心。

搞技术革命，对我们这些油漆电镀工来说，确实是有很多困难的。人单力薄，技术差，想解决点大问题，不那么容易。当时，我们这伙青年工人一不会画图，二不会机械加工。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能够出科学，我们在实践中一定能够制造出机器来。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会技术干中学，不会设计搞实样，边干边学闹革命。我们还提出，要坚持干下去，干到底。口号是：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

胜利，对失败的回答是再干。

我们一边干一边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先后搞出了大灯浇漆烘干、清洗、沾漆、反光镜沾漆和挂镀等五条自动和半自动生产线。主要工序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基本上消灭了笨重体力劳动。

一九五九年，我代表“双化”突击队出席了北京市的和全国的群英会，报纸上刊登了我们的事迹，我写的《学哲学，用哲学，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文章也出了书。我们不少同志脑子里就晕晕忽忽了，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名利思想。认为“搞了这么多的革新够意思了，再没什么可搞的啦！”我也觉得自己功劳不小，今天到这里参加会，明天到那里作报告，真了不起啦！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我脑子里多起来了，毛主席著作学得也不经常了。有的队员对我说：“队长，你经常出去开会，每次都借衣服穿，就凭咱们这个全国有名的‘双化’突击队，你也该买身料子服穿了。”还有人说：“咱们搞了这么多革新项目，领导也该发点奖金啦！”我听了这些话，思想上也发生了波动。心想，这两年技术革命干得是不错，领点奖金也合情合理。但是，我又想，“双化”突击队是党培养起来的先进集体，我们搞的这点成绩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怎么能伸向国家要奖金呢？思想上很矛盾。于是，我就去找陈起念老师傅商量。陈师傅是个老工人、共产党员，在旧社会受过很多苦，他长期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技术革命中贡献很大。我把队员们要领奖金的事和他一说，他



就火啦，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他说：“你是党员，又是队长，我们在建队时提出的‘一不图名，二不为利，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吗？”党总支也及时给我们指出，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骄傲自满就要摔跟头。我们全体队员就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照自己的思想，开展了一次小整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展开了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这次小整风搞了两个多月，大伙思想收获很大。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搞出了一点成绩，是由于听了毛主席的话。离开毛主席的思想，“我”字当头，就会迷失方向，思想上就要生锈，技术革命就会停滞不前。只有思想不断革命，才能技术不断革命。我们取得的这点成绩，距离党的要求还很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就使我们更加振起了革命精神。

以后，党和毛主席提出学雷锋、学解放军、学大庆的号召，我们每学习一次，就找一次差距。在一九六五年生产高潮中，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不断地总结经验，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进一步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先后搞成了几十项革新，产量提高了一倍多，胜利地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

思想革命推动了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又促进了思想革命。几年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越来越高。思想有了什么问题，工作遇到什么困难，就自觉地向毛主席著作求教。现在，我们

已经有八个同志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十二个同志读完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或乙种本。通过学习，队员们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原来的二十五个队员中，有五个队员入了党，十五个队员入了团。

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

搞技术革命，光有革命的思想、决心和干劲还不够。毛主席教导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严肃的科学的科学态度。违背这个教导，不管三七二十一鲁莽地干下去，工作就要碰钉子，走弯路。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片面性的，认为我们工人凭的是干劲，搞科学那是技术人员的事。我们这些青年小伙子，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干的冲劲，一说搞革新，就像着了迷似的。这种勇于革命的精神是好的。但是，有时因为忽视了具体分析、反复试验的科学态度，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一九五九年，我们搞挂镀自动化生产线，当时，一无蓝图，二无样板，也没有跟老工人、技术人员商量，就凭大伙的设想画出来的草图，干了起来。许多队员睡在现场，吃在现场，夜以继日地奋战了二十多天。这条挂镀生产线搞是搞出来了，但是，投入生产以后，却暴露出许多问题，在一年零七个月中，经常使使停停，老出毛病。有人说：“这条线简直是条‘死龙’，影响生产，不如干脆拆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灰心丧气，反而促使我们冷静下来考虑问题。这条自动线从原理上说是合理的，那么，问题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



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教导我们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要做“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拿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分析了挂镀线失败的原因。发现毛病就出在没有摸清在浓酸、浓碱条件下自动化设备结构的规律，有些蛮干。我们吸取了使用这条生产线的老工人的意见，认真总结了挂镀线的经验。在领导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经过一百多次的反复试验改进，采用密封电器和用链条传动等措施，终于把这条“死龙”变成了“活龙”。

这次教训，使我们变得聪明了一些，明白了主观要符合客观，革命干劲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一九六五年十月份，我们制造了一条长十米、宽一米的锌合金钝化自动线。事先，做了周密的研究和设计，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制造过程中，队员与使用设备的老工人相结合，队员与技术人员相结合，边制造、边试验。设备制成以后，进行了试车和工艺验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经过两天时间的调整，就顺利地投入了生产。

学习和创造

搞技术革命，还要注意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和自己的创造相结合。我们的体会是，要学中有创，创中有学，学创结合。

最初，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那

么清楚的。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用“干”字改变工段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从自己的实践中闯出一条道路来。但是，在创新的过程中，却忽略了学习别人已经成功的先进经验，走了一些弯路。就拿真空喷镀铝这项新技术来说吧，我们搞出来以后，有些兄弟厂也采用了，不过，我们这台真空喷镀铝设备效率很低，满足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怎样更好地改进这项技术？几年来，我们一直是闷着头自己琢磨，没有走出大门看看兄弟单位有些什么先进经验。

一九六五年，北京市委组织我们到上海学习，动身以前，队员们就嘱咐我别忘了学习人家的真空喷镀铝的经验。我心里想，上海是从我们厂学去的，他们会有多大改进吗？我到了上海新城灯厂一看，大吃一惊，人家用的是高真空扩散泵，代替机械抽空，喷镀效率高、质量好，工艺比我们先进。这一看，算把我脑袋瓜里的闷葫芦打开了。我们怎么就没想到把真空改为高真空呢？我们一直把真空泵当作老虎屁股，连摸也不敢摸，正像毛主席说的：“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这次学习，对我们教育很深。决心敢下包袱，开动机器，学习他们，超过他们。

怎样学习上海的经验？是照猫画虎地学，还是结合实际情况有所创造呢？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大伙觉得，条件不同，不能照抄照搬，应该结合自己的情



况,学中有创。在领导和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我们试验出一种效率高、耐磨性强的开关阀门,增大扩散泵效能,喷镀铝效率提高了三倍。

小和大,土和洋

我们开始搞技术革命时,着重抓了些大的改革,使生产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有些队员的思想上就产生了一种偏向,认为大的、洋的搞起来过瘾。我自己也光想搞点自动化的洋玩艺儿,坐在那里一按电钮就行啦,看不起小的、土的革新项目。事实证明,我们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不切合实际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逐步完善起来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大的、洋的革新项目,不少是由小的和土的逐步改进、逐步发展起来的。如自动滚镀机,原来是人工手摇,后来改成半机械化,经过一段实践,又制成了机械化滚镀机,最后又改进成现在这种半浸入式自动滚镀机。这些事实教育了我们,所谓小和大、土和洋,都是相对的东西。抓紧了小改小革,促使矛盾转化,它就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小的和土的改革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什么人都能搞,费事小,见效快。如一九六五年汽车附件产量增加以后,有百分之七十的零件需要挂镀,出现了挂镀“吃不了”,滚镀“吃不饱”的矛盾。副队长冯福才用改进工艺的办法,把十多种零件由挂镀改为滚镀,解决了这个矛盾。又如滤油网,电镀任务增大以后,活镀不出来,有的同志就想出把挂具加长的办法。这样一改,产量就提高百分之

五十。几年来,我们“双化”突击队每个人都搞了一些革新项目,多的一个人搞了几十项,全工段每一道生产工序都有革新,有的改进了几十次。这些小改小革,一次比一次有进步,一次比一次有提高。

但是,这决不是说大改大革就不重要了,大的革新常常是生产上带根本性的改革,是改变生产落后面貌的重要关键。大的洋的革新项目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东西,生产不断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再过些年,这些洋玩艺儿,就会又变成土的啦。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就要不断地进行革命。因此,既要抓紧关键性的大改大革,也要抓紧群众性的小改小革,实行大小并举。

局部和全局

花开一朵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一个单位,技术革命搞得再好,不过是局部的好。如果把每个单位、每个部门的先进经验推广出去,变为整个社会的财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快得多。但是,走出自己狭隘的小天地,树立革命的全局观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拿我们开展技术协作来说吧。

一九六三年,我被选为北京市技术协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些队员也积极参加了市技术协作活动。兄弟单位找我们搞技术协作的逐渐多了起来。北京缝纫机厂赶先进,机头喷漆质量过不了关,北京子母扣厂出口产品的电镀质量有问题,找我们帮助解决。这时,有的队员就认为:“‘双化’突击队管得



太宽，自己的事就够多的了，管那份闲事干啥？”技术协作搞不搞？别人的事管不管？全队展开了一场讨论，党委和总支都支持我们出去搞协作，认为能帮的应该积极去帮，帮就要帮好。还组织我们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说：“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毛主席的这番话，对我们的教育很深。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干革命的，干革命就应该像白求恩大夫那样是个国际主义者，就不能坐井观天，光看到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点。子母扣虽小，在国际市场上，它也是新中国的产品。缝纫机赶超先进水平，也是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对他们有点帮助，就应该尽我们一份力量。通过这一讨论，大家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参加厂外技术协作就更积极了。当时，尽管我们自己生产任务很忙，我们仍然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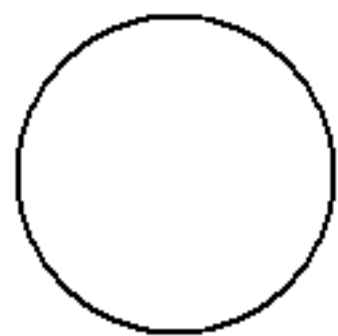
电镀技术最好的工人工程师金章老师傅去了子母扣厂，帮助他们解决出口产品的电镀问题。我和队员丁振发也多次去缝纫机厂同该厂工人一起研究，解决了机头喷漆的质量问题。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只有反掉了本位主义思想，才能树立起革命的全局观点，才能树立起身在附件厂，眼观全国，胸怀世界的革命大志。

几年来，我们“双化”突击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积极参加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思想上和生产上都有一定的提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还不够，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更不够。现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工业生产出现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从不愿当干部到决心干一辈子革命

通县马驹桥公社 宋文美
北海户屯大队妇代会副主任



毛主席批评的不正是我吗

我是一个农村妇女，是新当选的干部。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上过学，解放后只上了几天民校。家里人对我管教得比较严，平时总嘱咐我：在外边要稳重，不许多言多语，不要得罪人，要像个姑娘的样子。我受

家庭的影响比较深，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只想把我们家的日子过好。我常常想：“我们娘俩没有什么可以着急的，拣点柴禾够烧的，分点粮食够吃的，纳点鞋底够零花的。”对眼下的日子很满意，对集体生产和国家大事都不大关心。我们村的社员认为我老实巴交的，曾连续三年选我当生产队的妇女



队长，都被我拒绝了。

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有怕当干部的思想，见了工作队的同志也不理。工作队的同志想帮助我，可我总是躲着他们。后来工作队一位姓许的女同志常到我家来，帮助我。老许同志动员我入贫协，开始我说不入，经过几次动员，我说入贫协行，就是不当干部。

入贫协以后，工作队根据贫下中农的意见，又动员我当贫协委员，我心里真不高兴。过后，我又一想，当了贫协委员就不当干部了，比当妇女队长省心，也得罪不了什么人，倒也可以，就担当下来了。这时，老许同志发现我爱看小人书，就问我：“你怎么不学毛主席著作呀？”我说：“什么叫著作？”老许同志说：“就是毛主席写的书，毛主席著作是指路明灯，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要看毛主席的书。你要学习，我来帮助你。”接着，她给我讲山沟里“女秀才”黄顺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我听了后，思想开始有点活动，我说：“赶明儿我也学，试试吧！”

我向老许同志借了一本毛主席的书，翻开一看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只看了一下标题就说：“同志，给你吧，谢谢你的好意，我学不了。”老许同志给我念了《纪念白求恩》。我听了觉得毛主席说的话挺亲切，心想：“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远道来到咱中国，帮助中国搞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是中国人，不要说牺牲生命，叫我当干部都不愿当。”毛主席还说：“不少的人对工作

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①我越听越觉得自己的思想落后，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头。自己不愿当干部，怕得罪人，怕吃亏，还不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吗？看看人家白求恩，再和自己比一比，真是相差太远了。自己是个贫农的女儿，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解放后翻了身，党叫我们当家作主，可是不愿当干部。想来想去，觉得过去错了，下决心要为人民服务。但又想到我母亲思想落后，我当干部她一定不答应，是迁就思想落后的母亲呢，还是为人民服务，干革命？这时，工作队又鼓励我学习《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②毛主席不是在批评我吗？我越想越觉着自己想的和毛主席说的完全不对路，感到很惭愧。

正在这时，我又听了大庆油田职工家属的报告，对我的教育也很深，更增加了我干革命的信心。我心里暗暗地说：“我要是会写信，一定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一个保证书，告诉毛主席说，宋文美一定要干革命。”

用毛主席的话教育我母亲

这时我们村正酝酿选举妇代会干部，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3页。



的社员到我家串门说：“今年选妇代会主任又跑不了你，妇女群众都想选你！”我说：“选我，我就干，不能把困难推给别人。”我母亲听说要选我当干部，就说：“干部咱不当。谁爱当谁当。你要干，咱们娘儿俩就分家，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母亲躺在炕上不起来，逼我不要当干部。我想这样下去也不行呀！怎么对待我母亲呢？

后来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对我母亲进行了说服教育。她也是受苦人出身。思想落后，是我对她帮助不够。既然我能进步，相信她也能进步。我耐心地给她讲《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讲全国和本队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她忆苦思甜。我讲了美国鬼子在越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许多罪行，让她认识到不革命就得永远受苦。最后我说：“咱们都是贫下中农，咱们不干叫谁干？”我母亲开始有了转变。在选举妇代会干部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讲了话，表示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下一辈子革命。

为革命利益克服困难

我当选妇代会副主任不久，公社党委决定把管理棉花的任务交给妇联组织。我满有信心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由公社开会回来，主动找生产队的干部们商量，把本队四十亩棉花种植计划落实下来。为了把棉花种好，消灭病菌，促进种子发芽，有一天，我把四十亩棉花的种子，用三开一凉的办法进行了

浸种，一直搞到夜里十点多钟才回家。真没有想到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一些干部和社员，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人说：“我种了一辈子地，还没有听说过用这么热的水浸种。”还有的人说：“宋文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净出馊主意，简直是胡闹，把种子都给烫死了。”我还是第一次搞浸种，听了这些风言风语，心里也没有底。万一烫死了怎么办？这时我心里真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脑子发胀，真想大哭一场。我想，这五百多斤种子，不是值三十多块钱吗？干脆我包赔得了。又想不干了。但一想毛主席说的话，为了革命的利益，自己遇到一点困难就不想干，那叫什么干革命？想到这里，我就到生产队的库房，找到原来装棉花的麻袋，从那里拣下二十多粒棉花籽，拿回家用三开一凉和两开一凉的办法，分别浸了十几个粒，放在两个碗里，作发芽试验。我每天夜里都起来看几遍。好容易盼到第六天头上，都出了芽，我高兴地拿出去给社员们看，他们才相信了。

困难真是一个接着一个。在播种的过程中也有思想斗争。播种前，公社建议每亩下种十五斤至十八斤，队委会研究后同意。按这个要求还差二百八十斤种子，准备去买。谁想到播种完一看，种子还有余，原来是有的社员思想搞不通，认为多下种子是浪费，每亩才下了十一斤种子。棉花种上后，由于春天地寒天旱，墒情不好，半个月还没有



出苗。我心里很着急，天天早晨到地里去看，扒出几个粒来瞧瞧坏了没有，还到邻近红星公社的地里扒出几个粒，反复对照。天天看呀，瞧呀，好容易盼到了出苗。结果，才只有四、五成苗。没有苗拿什么增产呀！急得我在棉花地里哭了一场。后来一想，哭是不管用的，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还是请教毛主席著作吧。

我再次学习了《愚公移山》。愚公不怕困难的精神感动了上帝，背走了两座大山。毛主席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①难道我就不能发动群众，感动我们村的社员，把四十亩棉花种好吗？我找工作队的同志商量，在工作队的支持下，又买了二百多斤种子，动员全队社员，在垅背上重新开沟育苗。因当时地干，坷垃多，苗也没有出好。就在这时，报纸上介绍了吴吉昌的芽苗移栽法，公社也开会进行推广，我们就决定用移苗的办法补上这个损失。但和队长一商量，队长说：“四十亩棉花靠一棵一棵地栽，得哪年哪月栽完啊！”副大队长也说：“我看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种地的。”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一定要试验试验，我干我的。移苗时，生产队的农活正紧张，队长只派了六个人，干了一天，每人两垅都没有移完。前边移，后边蔫了，谁见了都寒心。我还是满有信心地去干，有时中午也不休息。没有苗就到兄弟队去借点，一面干一面还鼓励大家要相信科学，

移苗是经过试验成功了的，坚持就是胜利。队长见我们干的活少，就泄气地说：“别捣乱了，干脆补上玉米算了。”我坚决主张不能在棉花地里开杂货铺，一定按照公社党委的指示办事。当时农活正忙，队长就不给派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我一个人补苗也不行呀！我又找队长商量，我说：“挖挖潜力，找点不干活的老太太和小孩，你看行不行呢？”队长同意了。妇代会委员就分头挨门逐户地动员了十几个老太太和十几岁的小孩，组成了一个突击组。我们整整苦干了七天，移栽了十几万株苗，彻底完成了移苗任务，成活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管理过程中，也克服了很多困难。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四十亩棉花终于在土质差、肥料不足、没有水源的条件下增了产，亩产皮棉五十八斤，比上年增产十八斤，其中芽苗移栽三十亩，亩产皮棉六十八斤。

做好干部家属工作， 支持亲人当干部

毛主席的著作光我自己学不行，还必须想法叫大家都学毛主席的书。我们就把妇女代表以上的干部组织起来学习。妇代会委员们还利用地头打歌时间，组织社员们学习。我还经常把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收获介绍给大家，用毛泽东思想去教育社员。比如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页。



拣棉花时，开始小孩尽贪玩，打打闹闹，一天干不了多少活。怎么才能把这些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我想，这也得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我就给大家讲白求恩、张思德同志的故事，讲我们拣棉花也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搞革命；我们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任，拣棉花要拣干净，不留眼睫毛。大家了解了劳动的意义，干劲就足了，不少人表示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经过这些工作，每人每天拣的棉花，比开始时增加一倍多。

从这里使我想到了，还可以组织更多的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常想，要把我们村的工作搞好，必须把村里所有干部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可是，有的干部家属还拉后腿。我跟妇代会主任李月英同志商量，召开家属座谈会，组织她们学习毛主席著作。

首先，我们组织了几户主要干部家属，有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的爱人等。会议一开始，就学习《纪念白求恩》。党支部书记的爱人马凤如有点文化，我叫她给大家念。在讨论时，我给大家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收获，怎样由原来不愿当干部到愿意当干部、坚决干革命的，对大家的启发很大。我说：“白求恩同志，都五十多岁了，还帮助中国搞革命，牺牲在我们国家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贫下中农，我们要支持自己的亲人当干部。毛主席批评说，有的人拈轻怕重，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就是批评

我哪！以前，我不愿当干部，就是怕吃亏，你们以后可别和他们吵架了。我体会到当干部的可不容易，在外边下工作就够忙的了，回到家你们还咸的淡的说个没完，吃点饭顺脊梁骨下去。我们不应该拉后腿，应该支持他们，当个光荣的干部家属。”我还没有说完，大家都检查开了。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党支部书记的爱人马凤如。她说：“以前，我老嫌高庆生到家不干活，吃了饭就走。他回到家，我就有意叫他多干活。这和白求恩同志的思想比起来，差远了。今后得坚决改，支持他好好干工作。”一队队长媳妇李书芹说：“以前，我不叫他干，真不对。今年县里召开小麦会，他到县里开会去，我不叫他干，被子也不叫拿。想想真不对，以后我要支持他当干部。”大队长龚德明的媳妇说：“咱们不干叫谁干，还叫地主李继昌干吗？”

通过组织干部家属学习，效果很好。大队长龚德明对我们说：“我现在到了家里，吃的是热呼饭了，今后得好好干工作。”大队会计孙宝林，听说妇代会组织干部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找到李月英说：“你们再组织家属学习，叫你大嫂子一声。”

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 发动妇女出勤



正当县委提出以抗旱为中心，大搞平整土地的时候，妇女出勤的逐渐减少，都在家里忙着做棉衣服。每个队只剩下几个没有家务



负担的妇女出勤，队长很着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召开妇女代表会，分析了妇女不出勤的原因，主要是棉衣服没有做上。怎么解决妇女出勤的问题呢？在会上反复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大家认识到：要发动妇女出勤，就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代表会研究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要关心群众生活，必须在妇女中开展团结互助。

会后，代表们按照自己联系的户，到不出勤的妇女或烈军属、五保户家里访问。每个妇代会委员，都重点深入到一片，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我首先访问了光棍汉高兆海老头。我刚一进门，他就说：“这么冷的天，不穿棉衣服怎么干活去。”我就把他的衣料拿走，由赵据云、李月英、孙荣我们几个干部把棉衣给做上了。感动得老头说：“我谢谢你们！”我说：“您不用谢我们，应该谢毛主席，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才这样做的。”这时，我又想：光我们妇女干部做，什么时候能做完哪！我们就先召开了妇女会，跟大家说：“大家都愿意干活去，今天咱们开个团结互助会，妇女代表会想办法帮助大伙做棉衣服。”她们说：“你们干部都够忙的了，还给我们做活，我们可不落忍。我们明天都干活去，棉衣早晚做。”老胡家院，共三户，一户因为人多，棉衣没有做上，那两户就主动帮助给做上了。每个队都召开了妇女大会，向妇女讲当前生产形势和如何搞好平整土地，争取

来年大丰收。经过几次大会动员，妇女们都出勤了。有两个队增加到五、六十名妇女劳动力。

我们体会到，从解决妇女出勤的困难入手，比直接动员她们出勤效果更好。如李月芹的一条棉裤没有做上，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她做上了。她说：“我该怎么谢你呀！”第二天她就出勤了。妇女代表孙荣六十多岁了，还给胡王氏做棉衣，感动得胡王氏说：“明天就干活去。”她对婆婆说：“赵七婶这么大岁数，还帮助咱们做棉衣，您快给看看孩子，我好出勤。”

最近，我们在妇女社员中，开展了评“五好”社员活动，全村共评出二十六名“五好”社员，对促进妇女社员的思想革命化和当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锻炼了革命意志，增加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使我由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变成一个革命战士。

最近党支部讨论通过，上级党委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一生最高兴的事情。今后我要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坚决革命到底，不怕任何困难。

这次我入党，妈妈看我在入党志愿书上盖章，就说：“你当干部，还要订合同干一辈子是咋的？”

我回答说：“就是要干一辈子革命！”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

——评《收租院》泥塑群象

蔡 若 虹

《收租院》泥塑群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的反应，这在雕塑史上是空前的。《收租院》的成就，反映了雕塑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大进步、大丰收。它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又直接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服务的，是在文化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出现，又有力地表现了文化革命成果的好作品。这是雕塑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实行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深入生活和思想革命化的结果，是在艺术创作中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结果，是坚决实行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的结果。

—

《收租院》群象，无论在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所展出，还是在北京美术馆以部分复制品和图片展出，都得到群众热烈的欢

迎。老年的农民相约结伴从几十里外来参观，许多人从几百里、几千里外来参观。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生动的阶级教育的课堂。他们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指着泥象诉说自己过去受压迫的悲惨历史，战士们发出“不忘阶级苦，紧握手中枪”的誓言，青年们在这幅人间地狱的画图面前受到深刻的教育，立下“永远干革命，接好革命班”的决心。在展览会上真正出现了群众和作品中的人物强烈共鸣，打成一片的现象。

为什么这一群泥塑能够这样激动人心，产生这样强烈的效果，起到这样大的教育作用？十分明显，主要是《收租院》群象真实地、深刻地、生动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这种反映，表现了旧时代社会生活中最有普遍性的东西，表现了与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东西。这是艺术形象能够打动人心、深入人心的根本关键。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成为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进行阶级教育的



一种很好的有说服力的教材。

艺术作品要通过它的形象的教育作用，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怎样才能起这样的作用？这就要实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

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

雕塑《收租院》的突出成就，就是它通过众多的人物塑象，集中地表现了地主与佃农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3页。



恶霸地主刘文采租用的风车加上了滚珠飞轮，农民交来的好谷子被它一撮，一石只剩下七、八斗。这个老人捧着被撮出来的谷子跟狗头争辩说：“这是好谷子呀！”



两个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再现了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广阔图景。在一百一十四个人物塑像里面，除了少数是地主和他的狗腿子以外，都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佃农。这里有壮年男子，有妇女儿童，有失去了亲人的鳏寡孤独，有耗尽了劳动力的老弱残废。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贫苦佃农，又被交租、验租、算账、逼债这样一条绳索串连在一起；他们的

痛苦，他们的愤怒，他们的仇恨，他们的反抗，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交织成一幅惊心动魄的长篇画卷。众多人物形象的相互联系，前后呼应，就像百川汇海似的，把阶级斗争的丰富内容揭露出来了，发挥了只靠个别形象所不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收租院》反映的虽然是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那时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是过去的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但是对今天的群众仍有巨大的教育意义。群众说得好：“懂得剥削和压迫，才能懂得革命”，“不忘阶级苦，才知今日甜”。了解人民过去的苦难，才会更加倍地努力做好工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收租院》的作者们方向对头，道路正确，所以他们创作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好作品，为在雕塑领域扩大无产阶级的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摆在我们雕塑工作者以及一切美术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还需要百倍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同时更要着重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反映新人新事、新的精神面貌的作品。这是我们光荣的职责。



过了验谷、风谷、过斗三道关，老人背着两只空籬筐，一再接着过斗时发下的竹签码，担心凭这几根竹签，能不能过算账关。



二

雕塑《收租院》的突出成就，还表现在它在雕塑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许多雕塑工作者反映，《收租院》的创作，解决了雕塑工作上一个大问题，即雕塑如何为五亿农民服务的问题。雕塑下乡，向广大农村普及，这要解决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还要解决材料、成本、制作方法的多快好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雕塑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特别是雕塑下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收租院》的创作，为雕塑普及、雕塑下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们打破了旧框框，洋教条，在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收租院》的作者们从适应斗争需要出发，从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出发，打破了先入



交不够租子，这两个小女孩的妈妈被关进了地主的监牢；但监牢压不住强烈的怒火，锁不住刻骨的仇恨！

为主的铜象、石象、水泥、石膏之类的老观念老办法，创造性地采取了泥塑的手段来表现新内容，使泥塑艺术以全新的姿态出现；这是雕塑制作上的一次革命。他们采取了我国传统泥塑的工艺结构，可是在艺术上，却没有硬搬那些不宜于表现现代人物的陈旧公式。他们也采取了西方泥塑的写实技巧，可



是，对于那些不合乎我国人民欣赏习惯的表现手段，却大胆地加以改革。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外国的技法，他们一律采取批判地对待的态度，有目的有条件地应用；对革命对群众有利者留，不利者去。即使是留下来的东西，也还是从具体需要出发，有目的地加以改造，不是原封不动地套用。根据这个原则，他们把人物塑象从高高的台座上移到了地面；他们把生活中的用具（如帽子、扇子、椅子之类）和艺术的塑象结合在一起；他们用玻璃球作为人物的眼珠。这些看起来好像非常琐细的措施，其实，都是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作出来的，都是冲破了雕塑工作中许多洋框框和旧条条才能够办到的。

我们一向主张，对于我国古代的、民间的和外国的东西，只要是有用的，都要批判地吸收。但吸收就是要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血肉，而不是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这样做，就必然会在艺术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收租院》泥塑群象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是和作者们这种在艺术上的大胆革新分不开的，是和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

《收租院》泥塑群象给不便于大量制作的雕塑艺术，找到了多快好省的手段，从而把它推进到一个便于向广大农村普及的新阶段。这是雕塑工作的大革命，是雕塑艺术实

现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一个新的开端，是雕塑艺术进一步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个新的开端，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艺术实践上又一次的胜利。广大群众为了这一胜利欢呼。在今后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之中，雕塑工作无疑地将要作为斗争的武器之一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一共只有十几个青年雕塑工作者，花了四个半月的时间和很少很少的经费，完成了一百一十四座与真人同等大小的塑象，而且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这种惊人的创作力量，过硬的本领，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的力量和本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得到的。《收租院》的作者们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遇到问题就向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请教。他们坚决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坚持了“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实际行动，从而把他们的立足点逐渐移到了工农兵这一方面，移到了无产阶级这一方面。同时，他们也就熟悉了工农兵群众，积累了创作材料，锻炼了技术本领，在创作实践上表现出那种冲锋陷阵、奋勇当先的力



量。这是来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力量，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必然结果。《收租院》泥塑群象的巨大成果，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灌溉之下而获得的丰收。

《收租院》的作者们深刻体会到，要创作出革命的艺术作品，首先要自己思想革命化。也就是必须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结合，进行思想改造。正是因为这些雕塑工作者立足于工农群众之中，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他们自己成了广大工农群众中的一员，也就必定会爱群众的所爱，恨群众的所恨。这种与工农群众一致的思想感情，必定会在艺术实践中起积极作用。他们流着眼泪倾听收租院里那些受害者的谈话，受害者的痛苦和仇恨使他们有切身之感，他们带着这种阶级感情去塑造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站在和被剥削、被压迫者同甘苦共患难的地位，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在他们所塑造的人物身上，人物的一举一动，也都包涵有作者们自己的深切体会在内。这就是《收租院》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塑造得准确、生动和深刻的原因。由此可见，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阶级感情，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灵魂，是决定艺术成败的根本。毛泽东同志号召革



眼看着一年辛苦劳动的果实被剥夺一空，眼看着阶级弟兄被抓去，不能这样地活下去！要反抗！这个壮年农民忿怒地握紧了拳头。

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根本上解决文艺创作的问题。

自觉地实行艺术创作中领导、作者、群





哪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地主阶级逼得农民拿起了武器。
起来闹革命，这是唯一的出路！

众三结合，是《收租院》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收租院》的作者们从总体设计开始，就一直在听取领导的意见和农民群众的意见。他们从这里学习到如何看待过去生活的原则，找到了应当表现什么、不必表现什么的头绪，弥补了作者个人不能避免的那种站得不高，望得不远，看得不全面的缺点。

他们虚心听取意见，并不等于没有主见。他们是通过互相商量、互相讨论的方式，以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真正达到了发挥集体智慧的集思广益的效果。

在收集创作材料阶段，作者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之下，又在农村进行了几百次的调查访问，充分掌握了地主怎样收“铁板租”的各种情况，得到了当年受害者们目睹的许多非常具体的材料，从而给人物造型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当塑造工作正在进行的阶段，不少农民自动地跑来给作者们当顾问，指出各种人物的一些特点，以至亲自比划一些人物的动作姿态给作者们参考。由于农民群众这种切实具体的帮助，凡是作者们因为缺乏感性认识而碰到的困难，都能够顺利地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实行领导、作者、群众三结



合的创作方式，是这次创作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它能够使作者表现他们所难于表现的事物，它能够完成少数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它能够达到与广大群众的愿望相符合的成就。这种创作方式的优越性，只有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才有条件形成。

当然，创作内容这样丰富的作品，还必须在技术上有过硬的本领，不然就不能把思想和生活表现得这样准确和生动。但是，《收租院》的作者们的体会是，他们的技术本领也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他们所以能够批判地吸取古代和国外的技术，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推陈出新，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针，才使他们能分辨出哪些是为革命、为群众所需要的精华，哪些是必须抛弃的糟粕。他们的技术本领，也不是单从课堂里的基本练习中得来的，而更重要的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间，不断地进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中得来的，是在这样地反复认识，并通过艺术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中得来的。有了这样的技术锻炼，所学就不至于和所用脱节；理性认识就不至于和感性基础

脱节；间接的材料就不至于和直接的经验脱节。只有这样，造形技术才可以过硬，才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才可以灵活地多方面地适应创作的要求。《收租院》群象是取材于口头谈话和文字记录，不是取材于作者们的感性经验；可是作者们仍然能够表现他们所想要表现的形象，正是说明他们锻炼出了过硬的技术本领。

总之，他们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造思想感情，实现人的革命化，深入生活，取得丰富的创作材料，锻炼创作本领的。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毛泽东思想挂帅。

《收租院》创作中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所有美术工作者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收租院》群象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伟大和无比正确。它是一切革命工作取得胜利的保证，也是革命文艺工作不断走向胜利的保证。我们美术工作者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更紧密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把革命的美术运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红旗

H O N G Q I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好榜样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

4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四期 目录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1)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二十四日

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来信 (3)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

——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 郑之思 (4)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 戚本禹 林 杰 阎长贵 (19)

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

好榜样 本刊评论员 (31)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解放军某部侦察连的哲学故事会 张延吉等整理 (35)

实践出智慧 宋乐山 (41)

日常工作中的辩证法 (四篇) ... 王培建 黄玉明 姜大洪 刘 杰 (52)

简单一些好, 还是复杂一些好? 徐承德 顾 舒 (57)

坚决突出政治 反对折中主义 (读者来信) 倪志荣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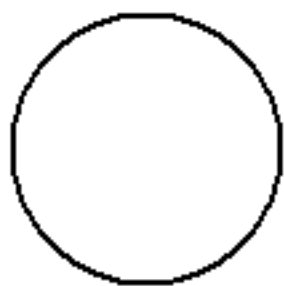
☆ 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收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来信，邀请我们派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你们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一个党开代表大会，邀请别的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在通常的情况下，应当说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但是，就在你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你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并且从上到下，直到基层单位，组织一系列的反华报告，煽动反华的歇斯底里。你们还向其他国家的党发出反华信件，策动他们同你们一起反华。你们放肆地污蔑中国共产党，说我们“好战”，“假革命”，“不反帝”，“鼓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冒险主义”，“分裂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等等。你们还制造谣言，说什么中国“阻挠援助越南”，“中国侵略苏联领土”，甚至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这一系列的反华活动只能说明，你们的这一次邀请是故意作态的，是别有企图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设想，被你们看作是敌人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去参加你们的大会呢？

中国共产党过去曾经多次参加过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苏共领导以后，我们也派过代表团参加你们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大反斯大林。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义的真面目，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考茨基背叛马克思和恩格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老路，使苏共领导变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过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我们对你们做到了仁至义尽，而你们却毫不悔改。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你们一上台，就宣称你们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你们当面对我们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你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你们不仅没有宣布撤销一九六三年七月的反华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二月的反华报告和反华决议，而且采取更阴险的手法，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你们尽管玩弄了一些欺骗的手法，但是你们一心一意地追求的还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你们所说的一些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话，你们所做的一些支持反帝斗争的姿态，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小骂大帮忙。这种手法，你们心里明白，美帝国主义心里也很明白。你们叫嚷的所谓“联合行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所谓“联合行动”，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圈套，其目的无非是要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你们一直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你们同美国勾结在一起，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一系列的肮脏的买卖。你们现在正在积极地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你们不但置身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之外，而且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妄图建立一个反对中国、反对人民、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神圣同盟”。

你们不顾许多兄弟党的反对，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召开了莫斯科分裂会议。这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我们曾经要求你们，公开承认召开莫斯科分裂会议是错误的，非法的。你们至今没有这样做。

我们愿意明确地通知你们：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去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

我们相信：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终归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上前进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终将扫除一切障碍，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苏联人民可以相信，一旦苏联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坚决抗战，中国一定同苏联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此致
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月二十四日 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来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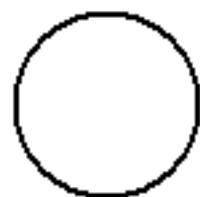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苏共第二十三次例行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日程如下：

- (1)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 (2) 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报告人检查委员会主席诺·阿·穆拉维耶娃同志；
- (3)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 (4) 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致
共产主义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列·勃列日涅夫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于莫斯科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

——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

郑 之 思

编者按：伟大的巴黎公社起义九十五周年了。本刊这一期发表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这篇纪念文章。

巴黎公社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这个原则还是背叛这个原则，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揭示出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背叛了这个原则，堕落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列宁同老修正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保卫了公社的原则，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巴黎公社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了各式各样的列宁主义的敌人，维护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共的领导，经过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彻底背叛了公社的原则，彻底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行一整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使苏共领导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中心。

这是从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反面经验。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如果抛弃了公社的原则，就谈不到领导革命，而且就会使自己变成叛徒和工贼；在掌握政权以后，如果抛弃了公社的原则，就会使人民革命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而且也会使自己变成彻底叛徒和工贼，变成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帮凶。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为什么要那样疯狂反华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胜利，进一步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对于一切抛弃公社原则的叛徒都进行坚决斗争。因此



引起这些牛鬼蛇神们的仇恨和反对，这是毫不足怪的，是值得我們自豪的。

今天，重溫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对于把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对于推进世界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已经九十五周年了。

九十五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巴黎公社被凡尔赛匪徒淹没在血海里的事业，经过四十六个年头，就在列宁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巴黎公社原则、十月革命道路的胜利。

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力图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演习。公社英雄们给我们留下了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目前，正当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口头上推崇巴黎公社，行动上背叛公社原则的时候，发扬公社的革命传统，吸取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不愿作奴隶的无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紧握手中枪

法国在十九世纪，是站在欧洲革命运动最前列的一个国家。它一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又一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法国工人多次拿起武器，又多次放下武器或被解除武装。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经过八十多年

漫长的时间，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这样，无产阶级才逐渐意识到，当他们幻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而不是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去争取自身的解放时，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就只是起了替自己的敌人打天下的作用。革命一胜利，不管执政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或者是资产阶级左派，他们都用解除工人武装来“报答”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被解除武装，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权利。

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权利，应该由无产阶级自己拿起枪杆子到战场上去争取。法国工人终于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个革命真理。一八四八年的巴黎六月起义，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就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将这一革命真理变为革命行动的表现。在这两次起义中，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已经是直接同自己的敌人作战，为自己的阶级打天下。

巴黎公社起义，是当时法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高峰，也是当时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高峰。这次起义和法国工人历次起义比较起来，在运用革命武装去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权利的问题上，有许多伟大的创造：

第一，起义前半年，就着手建立工人武装，凭借枪杆子，不仅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组织（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各区警备委员会），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第二，坚决顶住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威胁





巴黎公社社员坚守累内大街街垒。

(新华社稿)

利诱，拒绝交出武器，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要求就是紧握手中枪。瓦尔兰说：“我们绝不能不经过战斗就缴械……只要我们一天不胜利，斗争也就一天不停止”^①。

第三，当资产阶级政府企图用暴力解除工人武装时，敢于用革命的暴力回答反革命的暴力，敢于在在有反动政府血腥镇压、外有强敌压境的条件下举行起义，变剥削阶级之间的掠夺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第四，起义胜利之日，没有放下武器，没有让出权力。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②。

第五，起义胜利后，依靠无产阶级的革

命武装，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③。

第六，起义临近失败时，仍然英勇坚持战斗，宁肯拿着枪杆子光荣战死，不肯放下枪杆子忍辱偷生，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过：“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

①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44页。

②③ 《《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02页。



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①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突破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毅然决然拿起枪杆子，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新篇章。

剥削阶级一向认为，他们有权使用各种武器镇压被剥削者，而被剥削者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至于拿起枪杆子造反，那更是滔天大罪。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这种反动观点，总是向无产阶级宣传“千万不要动用武器”的奴才哲学，并把一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篡改成一部“和平过渡”的历史。对巴黎公社起义，也不例外。考茨基一讲起巴黎公社，就大肆渲染三月二十八日的选举，把公社说成是“全民投票”、“纯粹民主”的产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讲起巴黎公社，就津津有味地“计算”三月十八日那天死了几个人，企图以此证明公社“是不流血地掌握了政权”。

稍微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每一个革命运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要了解这个革命，就应该从总体上看，而不能从中抽出某一天或某一种现象，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一般。巴黎公社的全部发展过程，从起义前夕到流血的一周，充满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公社英雄们在武装起义和保卫起义胜利果实时所洒下的大量鲜血，决不是修正主义者的谎言所掩盖得了的。

**无产阶级应当采用革命手段，
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巴黎公社起义以前的法国政治舞台，很

像一盏走马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形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迅速交替。这样，无产阶级就亲身体会到，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各种形式的交替，无非是统治者把统治权从这一手转到另一手，从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转来转去，照样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亲身体会到，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各种形式交替的过程中，国家机器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完备，更加穷凶极恶地奴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

法国无产阶级积八十多年（一七八九——一八七一）的经验，逐步意识到“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②，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是反对这个机器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而是粉碎这个机器本身。巴黎公社起义者就是这样行动的。马克思说：“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③

第二帝国崩溃后，一场政权争夺战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逐渐展开。一八七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4页。

② 《〈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42页。

③ 《〈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6—587页。



○年九月初，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为了保存现成的国家机器，防止政权转入人民手中，便迅速地达成协议，组织了美其名曰“国防政府”的新政府。无产阶级由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还不可能立即成立自己的政府。但是，他们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军事组织，这种组织日益成为巴黎工人区的实际政权，成为和“国防政府”对峙的一种力量。

当时，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各区警备委员会，依靠工人武装和人民群众，监督国防政府和它的巴黎各区区政府的活动。工人区的警备委员会控制区长，或代行区长职权。当过市长的阿拉哥说，委员会“负责各区的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社会福利等工作”，是“革命积极性的发源地”^①。达留伯爵说：“它们擅自对区长施加压力以影响其决定，包办代替区长的职权，发布命令，检查住宅，经常以防止间谍为借口，进行逮捕和搜查”^②。

当时，在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和革命群众的监视下，“警察局已经完全无能为力，警察局长乖乖地坐在那里，生怕被人抓走”^③。国防政府的头子特罗胥哀叹说：“市区街道已落在人民群众手里，法庭已失去作用，维持公共秩序、风尚和卫生保健的一切机关几乎都陷于停顿状态”^④。反动当局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连撤换数任警察局长，企图恢复警察统治，但都遭到失败。

很明显的，从第二帝国崩溃到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这和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出现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相类似。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对立面，建立与之相对抗的无产阶级的军事组

织，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作了重要的准备。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当梯也尔挑起内战的时候，无产阶级正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击败了梯也尔的反革命进攻，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巴黎公社起义者根据阶级本能和政治经验，认识到常备军和官吏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两个主要机关，他们在起义胜利后，立即破除这两个机关。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撤销常备军改由国民自卫军代替的法令》。法令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成立或调入任何武装部队”，“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⑤。公社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资产阶级营。

同时，公社又在《宣布凡尔赛政府命令、指示无效的法令》中规定：“公社现在是唯一的政权，……各种社会机关的职员今后必须确认凡尔赛政府或其拥护者所发出的命令或通知为无效，无法律效力。……任何官吏或职员凡不服从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职务。”^⑥公社撤除了留在巴黎的反动官吏的职务，要求旧政府的一般职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办事。

公社打破了旧的司法机关，废除了反动法统，规定法官由人民选举，公社直接任命检察长。

公社在破除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物质支柱——常备军之后，又立刻着手破除它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宣布政教分离，取消宗教

①②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71页。

③④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107页。

⑤⑥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2、53页。



特权，等等。

巴黎公社起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否定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他们不是像蒲鲁东主义主张的那样，搞什么无政府状态，而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他们不是像布朗基主义主张的那样，搞什么少数革命家的专政，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初步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第一，公社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它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

武装起义中产生的，是在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它存在的短短的七十二天中，进行了反对国内和国际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英勇斗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说明一八七一年革命的社会实质的宣言》，把这种斗争称为“寄生生活和劳动、剥削和生产在相互搏斗”^①的伟大斗争。

第二，公社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它的主要支柱是工人武装，“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②。它

①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第145页。

②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页。



巴黎公社成立以后，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摧毁旧国家机器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法令。图是巴黎公社发布的一些法令。左边是《告农民书》，其中提出了一个符合广大劳动农民利益和要求的纲领。中上是关于成立国民自卫军的法令，中下是关于改善面包房工人工作条件的法令，右边是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令。
(新华社稿)



拥有工人和他们的群众组织的广泛支持。它的政策多数出自群众的倡议，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它的领导成员由群众选举产生，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可以依法撤换和罢免。

第三，公社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议会式的革命政权。在公社中“代表机关仍然存在，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机构，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①公社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委员会颁布法律，委员会委员执行法律，并对委员会和人民负责。

第四，公社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政权。“因为公社不是为某种地方性的或狭隘的民族任务而斗争，而是为全体劳动人类、为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解放而斗争。”^②《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宣布：“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③。

第五，公社是一个以消灭剥削为目标的革命政权。“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④。

巴黎公社的这些特征说明，它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对立物，它不是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而是被剥削者掌握自己命运，争取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反动派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冒牌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也攻击公社“是由很少的选民选出来的，它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无名之辈，他们在能力上、甚至有时在人格上——至少对某些人说来——都是可以怀疑的”^⑤。他美

化凡尔赛的国民议会，攻击公社是发动内战的罪魁。他说：“啊！内战呀！可怕的斗争！大炮在怒吼！杀呀，死呀，那些在国民议会里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和平解决这个流血问题的人，竟被迫不能作出任何行动，发出任何呐喊，也不能说任何话了！”^⑥这个叛徒的这些无耻谎言，活生生地勾画出一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丑恶嘴脸。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决驳斥了反动派对巴黎公社的污蔑。他们指出，公社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因而是一个不完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在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方面，作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尝试。马克思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指出，公社这种政权形式，以及公社的一些正确的措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性的结晶。拿起枪杆子力争自身解放权利，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无产阶级，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冲破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束缚，在斗争中闯出一条路来。恩格斯说：“公社是旧的、法国式的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1页。

② 《纪念公社》。《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5页。

③ 参看《〈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76页。

④⑦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361页。

⑤⑥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7、226页。



社会主义的坟墓，但同时也是新的（对法国来说）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①“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②列宁说：“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③

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最主要的内容，这是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议会痴呆症”和“无产阶级专政恐惧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列宁和斯大林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现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等反动言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变化，宣传不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可以夺取政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骗人鬼话。

从巴黎公社起义到现在，这九十多年中，世界上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无论那

一方面的变化，都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本性。资本主义制度越是临近死亡，资产阶级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器，进行垂死挣扎。以美国为例，它在一八七一年只有军队四万二千多人，现在竟达二百六十多万人。这支军队和俾斯麦、拿破仑第三、梯也尔的军队比较起来，不仅在人数上庞大几倍或几十倍，在装备上精良几百倍，而且在反动程度上穷凶极恶几千倍。它充当着国际宪兵的角色，既想扼杀美国的革命运动，又想扼杀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空前庞大、空前反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用武装颠覆，用和平演变，用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条件下，宣传所谓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可以夺取政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宣传假革命、真投降，就是贩卖假社会主义，维护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正是贩卖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掮客。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防止自己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干部，一律废除高薪、兼薪，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怎样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发生

- ① 恩格斯：《1884年10月29日给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页。
- ② 《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7页。
- ③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3页。



蜕化变质？巴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一些探索，采取了一些虽然是初步的但意义极其深远的措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①

人民群众是巴黎公社的真正主人。公社存在的期间，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讨论国家大事，每天都有两万名左右的积极分子出席俱乐部会议，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提出倡议或批评。他们还通过向革命报刊投稿写信等方式，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公社力量的源泉。

巴黎公社的委员很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他们出席群众的各种会议，研究群众的来信。公社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在给公社秘书的通知里说：“我们每天收到大批口头和书面的建议，其中有些是个人提出的，有些是在俱乐部或在国际支部通过的。这往往是一些很好的建议，应该提交公社审查。”^② 公社确

实是认真考虑并采纳了群众的建议，公社许多著名的法令，诸如废除公职人员的高薪制、取消欠缴的房租、实行非宗教教育、禁止面包工人夜间劳动等等，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建议为基础的。

人民群众还对公社的委员、公社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监督。第三区公社俱乐部在—项决议中说：“人民在当家作主……，如果你们选出来的人表现动摇或停滞不前的话，请把他们的推向前进，以便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争取我们的权利、巩固共和国、使正义事业获得胜利。”群众批评公社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对付反革命、逃兵和叛徒，没有及时施行自己通过的法令以及委员中的某些不团结现象。例如，四月二十七日《杜歇老爹报》上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说：“请经常推动一下公社委员，请他们不要打瞌睡，不要拖延实行自己的法令。让他们永远避免私人纷争，因为只有他们意见一致，他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来保卫公社。”

撤换、罢免违反人民利益的被选举者，也并非一句空话。公社撤了布朗舍的委员职务，因为他当过僧侣、商人、密探，巴黎被困时暗藏在国民自卫军中，并用假名混进公社。公社撤了克吕泽烈的军事代表职务，因为他“玩忽职守……几乎丢失伊西炮台”。在这之前，叛徒留尔耶也被国民自卫军中央委

^①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②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第556页。



员会撤职并逮捕。

巴黎公社坚决废除国家机关干部的任何特权，特别是在工资方面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

我们知道，剥削阶级国家为了培养一批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总是给官吏以优厚的待遇和种种特权。高官厚禄，横行霸道，这就是剥削阶级官吏的写照。就拿法国第二帝国时期来说，当时官吏的年薪是：国会议员三万法郎，部长五万法郎，枢密院委员十万法郎，国务参事十三万法郎。如果一个人挂几个官衔，收入就更多，拿破仑第三宠臣鲁埃，身兼议员、枢密院委员、国务参事三职，每年薪俸二十六万法郎，相当于巴黎一个熟练工人一百五十年的收入。至于拿破仑第三，每年由国库拨给两千五百万法郎，外加各种津贴，总共为三千万法郎。

法国无产阶级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在巴黎公社成立以前，就多次提出废除官员高薪制的要求。巴黎公社成立后，实现了劳动人民的这个宿愿。四月一日，颁布了规定公职人员最高年薪为六千法郎的著名法令。法令指出：以前“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而“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①。年薪六千法郎，这相当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据著名科学家赫胥黎计算，这种薪额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

巴黎公社还禁止公职人员在兼职时取兼薪。五月十九日的决议说：“鉴于在公社制度下，每种职务都有一定的报酬，其数额足以保障供职者的生活和操守。……公社决定：禁止一切兼职兼薪；公社公职人员除从事其本身工作外应当协助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无权另得任何报酬。”^②

巴黎公社在取消高薪、禁止兼薪的同时，还提高低薪，缩小工资差距。以邮局为例，低薪每年从八百法郎提高到一千二百法郎，增加百分之五十；高薪从每年一万二千法郎降为六千法郎，降低一半。为了保障低薪人员的生活，公社还明文禁止一切形式的扣款和罚款。

公社委员们模范地执行了公社关于废除特权、取消高薪兼薪的规定。公社邮政局负责人、公社委员泰斯，按规定应领月薪五百法郎，但他只领取四百五十法郎。公社将领符卢勃列斯基放弃了将官薪俸，拒绝迁到拨给他的耶利谢伊宫，并说：“将军的住处只能在士兵当中”。

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该委员会在四月六日的决议里说：“考虑到将军的军衔跟国民自卫军的民主组织原则不相容，兹决定：取消将军军衔”^③。可惜，这个决议没有贯彻下去。

①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4月2日。见《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第103页。

②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第484页。（译文略有更动）

③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1871年4月8日。



国家领导人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他们有多干工作的义务，没有多拿报酬的权利，更没有任何特权。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真正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不仅在于扫除了剥削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所谓国务活动的“神秘性”、“特殊性”，把国务活动变成工人职务的一种，把国家机关干部变成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而且在于从物质待遇方面提供防止国家机关干部发生蜕化变质的条件。列宁说：“一切政权机关不仅通过选举产生，不仅随时可以撤换，而且它们的劳动报酬不是同‘老爷’一样，不是同资产阶级一样，而是同工人一样，——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理想。”^①他又说：“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制，从国家这个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转变为由人民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照例’不讲它”^②。

确实如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正是把巴黎公社的这一条重要经验忘得干干净净。他们追求特权，利用特权地位，化公为私，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占有高过一般

工农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这些人从政治立场到生活方式，都是背向劳动人民，面向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官僚看齐。他们还用高工资、高奖励、高稿酬、高津贴以及花样繁多的捞钱办法，大力培植高薪特权阶层，力图加强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他们大肆鼓吹“物质刺激”，说什么“卢布是强有力的火车头”，应该“用卢布来教育人们”，企图用金钱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心目中的巴黎公社的“幼稚行为”比较一下，人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什么是人民的公仆，什么是人民的老爷，什么是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恩格斯曾说过：“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们想知道蜕化变质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苏联的“全民国家”。

无产阶级必须警惕敌人的假和谈、真备战，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既包括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包括许多沉痛的教训。

公社是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分担领导的，这两派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都

① 《论无产阶级的民警》，《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4页。

②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7页。

③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9页。



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都缺乏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他们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由于自觉性不够，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主要错误之一是，上了敌人的假和谈真备战的当，没有乘胜追歼穷寇，让敌人有机会利用假谈判争取喘息时间、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坐失扩大革命胜利的时机。

一切剥削阶级历来交替使用或同时并用暴力镇压与和平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当他们还没有作好向人民进攻的充分准备或遭到革命力量打击时，往往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一旦他们自认为有力量战胜革命人民时，就挥舞屠刀进行血腥的屠杀。梯也尔就是用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付巴黎公社的。

梯也尔仓惶逃往凡尔赛以后，只剩下一万五、六千名军警，这些士气低落、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将，根本不是在数量上、斗志上都占有很大优势的巴黎工人武装的对手。何况，巴黎和凡尔赛两地相距十八公里，巴黎工人武装完全可能朝发而夕至。梯也尔在讲到当时的情况时也不得不承认说：“这是我一生最不好过的日子。巴黎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凡尔赛完蛋了。只要我们一到，士兵就会举枪投降。’我确信不至于如此；不过，只要向我们进攻的敌人有七、八万人，我也不敢担保说我的军队是可靠的，因为军队会由于数量相差悬殊而发生动摇。”^①于是，老奸巨滑的梯也尔为了争取在凡尔赛站住脚跟，为了争取更多时间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

就大搞“谈判”阴谋，大放“和平”烟幕。

梯也尔首先指示巴黎各区区长，抓住公社选举问题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谈判，尽量纠缠，拖延时间，转移中央委员会的注意力，直到凡尔赛准备好进攻为止。这时国民议会也表示同意进行巴黎市政选举，和区长的谈判阴谋配合。谈判一直拖了八天，公社选举日期一延再延。凡尔赛得到了喘息，巴黎公社却错过了直捣反革命巢穴的时机。事后，区长们道出了假谈判真备战的真象。吉拉尔说：“我们采取这种反对立场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阻挠巴黎公社的军队进军凡尔赛。……我们在这几天进行反抗，就使政府可以做好防御的准备。”^②德马列也说：“我认为我有继续冒险的必要，以便使凡尔赛政府赢得时间来武装自己。”^③

其次，梯也尔高唱“不干涉巴黎”的“和平”高调，打起“保护共和国”的幌子。马克思说：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三月二十一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声明说：“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④梯

^①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第206—207页。

^②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301页。

^③ 参看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0页。

^④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72页。



也尔这种做法，是想把老共和分子搜罗到自己的周围，并为自己的反动政权涂脂抹粉；是想蒙蔽外省视听，拉拢中等阶级；是想麻痹巴黎，孤立无产阶级。他的所谓“不干涉”背后隐藏着最大的杀机，他的所谓“保护共和国”就是准备消灭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另一种说法。

在大搞“谈判”阴谋、大放“和平”烟幕的同时，梯也尔极力准备武装镇压的一手。他搜罗残兵败将，向俾斯麦乞求放回法国战俘，并派人在战俘中进行反对公社的宣传和训练；他根据进攻巴黎的需要，建立了宪兵队、骑兵队和炮兵队；他向巴黎派遣大量的间谍，收集军事情报；他组织对巴黎的围困，在巴黎周围修工事、筑炮台；他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诬蔑巴黎公社，为镇压起义作舆论准备。凡尔赛经过半个月的多方准备，就在四月初开始向巴黎发动武装进攻。

从四月初到五月初，梯也尔的军事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普鲁士释放的战俘不多，军事进攻进展不快，战胜巴黎的把握不大。因此，梯也尔在这段时间一边打，一边继续玩弄和平欺骗。他一方面，疯狂地屠杀公社战士，要求普鲁士更多的增援；另一方面，又利用“巴黎权利共和同盟”之类的资产阶级团体的所谓调解进行诱降，企图诱骗公社放下武器，交出政权，取得战场上尚未取得的胜利。例如，四月二十七日他在议会上说：“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

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①五月八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②

但是，到了五月中旬，普鲁士又释放了很多战俘，凡尔赛组成一支数达十三万的军队，麦克马洪向梯也尔保证可以很快打进巴黎，这时，梯也尔就把“和平”、“谈判”、“不干涉”等等幌子，扔得干干净净，他马上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③。他叫嚷：“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④他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

巴黎公社委员对于梯也尔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认识并不一致。多数人对反动阶级的本性认识模糊，存在着和平幻想。巴黎起义胜利以后，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宣传通过选举实现国内和平，说什么“选举比杀人要好一些……”。只有一致的、庄严的、占压倒优势的选举才能有助于斗争，才能使劳动者得到保障”^⑤。说什么“只有选举才能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74页。

②③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76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80页。

⑤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310页。



使人们的头脑冷静，才能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才能恢复信任、保证安全、建立正规的行政机构，最后，才能终止在血泊中毁灭共和国的仇杀”^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强调“要温和”，“要宽宏大量”，要把“两个光辉的大字：博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投票建立公社，可能避免内战。于是一方面下令拆除街垒，一方面开展选举的准备工作，并就选举的日期、程序、办法以及其他技术性问题，同巴黎各区区长进行多次谈判。

但是，选票并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魔力。它既没有“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更没有“使劳动者得到保障”。恰恰相反，忙于选举、忙于谈判的巴黎，失掉了加强革命力量的时机，忽略了扩大革命胜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没有封闭首都城门或控制交通，让反动分子随意进出；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活动；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没有进攻凡尔赛等等。而凡尔赛却得到了加强反革命力量的时机，作了进攻巴黎的种种准备。

有一部分公社委员看穿了梯也尔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们对梯也尔玩弄的和平阴谋进行了揭露，对于资产阶级团体散布的妥协和解的幻想和公社内部的和平麻痹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在五月四日的公社委员会上，公社委员巴斯卡尔·格鲁塞说：“公民们，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反动派戴着和解的假面具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而这个假面具还没有被戳破。”^②“在凡尔赛政

府屡次发表声明之后继续谈论和解，在炮声隆隆和我们的弟兄被凡尔赛凶手们的子弹打死的时候高谈和解，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这就是削弱巴黎的防务，这就是怂恿公民表现软弱和临阵脱逃。实际上，这也就是议论投降和失败。”^③革命报纸和群众团体也纷纷揭露反革命的“和谈”阴谋，批判和解幻想。《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严正指出：“不，巴黎的劳动妇女所要求的不是这种和平，而是战斗到底！在今天，媾和就是背叛！……就是背弃劳动者自身的解放！”^④俱乐部始终坚决反对妥协，不许妥协分子出席会议，有的还派代表团向公社声明：谁要是主张同凡尔赛停战，谁就要被宣布为叛徒。可惜，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完全被接受，一直到凡尔赛匪徒开始向巴黎进攻时，还有许多人没有觉悟，还在醉心于公社委员的补选工作。当时这种情况的目击者利沙加勒写道：“全巴黎都倾听着炮火的疯狂轰击。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次攻击，从二十八日以来，人们就生活在一种盲目的信任中——毫无疑问，这是礼炮，从最坏方面着想也不过是一场误会。”^⑤等到发现这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进攻时，尽管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抵抗，但因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不足，已为时晚矣！

① 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310页。

②③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第138页。

④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第35页。

⑤ 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171页。



凡尔赛在磨刀，巴黎在投票；凡尔赛在备战，巴黎在谈判。结果，凡尔赛匪徒手执屠刀攻进巴黎。他们枪杀被俘的公社委员和士兵，枪杀教堂里的避难群众，枪杀医院里的伤兵；他们枪杀年老的工人，说这些人多次造反，“罪恶”深重；他们枪杀女工，说这些人是所谓“卖油女”——纵火犯，“只有死后才像个女人”；他们枪杀童工，说这些人“长大后必定是暴徒”。他们把这场叫作“打猎”的大屠杀，延续了整整一个六月。巴黎到处是尸体，塞纳河里出现了一条血流，公社被淹没在血海之中。三万多人被屠杀，十多万人被判刑或被迫逃亡，凡尔赛就是这样“报答”巴黎的“仁慈”和“宽大”的，就是这样结束他们的假谈判真备战的骗局的。这是一次极其沉痛的血的教训。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穷寇，一定要追歼，落水狗，一定要打死，决不能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九十五年前，巴黎公社的一大部分委员没有及时识破梯也尔的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不清的话；那么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处处为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真侵略效劳，就决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完全是站在叛徒的立场上，伙同美帝国主义者，企图用反革命两手，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时代在前进，人民在前进，革命

在前进。革命的人民越来越懂得，如何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连同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手阴谋，终究是要被人民干净、彻底、全部地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

* * *

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时说：“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七月十四日或九月二十二日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三月十八日。”^①

现在，当我们纪念无产阶级的节日——巴黎公社起义九十五周年时，环顾全球，看到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伟大革命局面。历史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在九十五年前的预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②“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③

① 《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31页。

②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③ 《〈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50页。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戚本禹 林 杰 阎长贵

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冲击着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旧史学。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向旧的、传统的历史观点展开了斗争。这样，就使得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历史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摇摇欲坠了，非起来抗争不可。

于是，史学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辩论，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又为史学革命开创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

这一场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史学领

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当前史学领域里的这场大论战，就是坚持还是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论战。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①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由于他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颇具有迷惑人的作用。为了分清是非，辨明真理，就翦伯赞同志历史观点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认真进行一番讨论，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他们把历史一会儿说成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一会儿说成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一会儿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善良本性的发现，一会儿又说成是暴君的罪恶活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所以把历史歪曲成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阶级斗争

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迫使那些具有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方式。

翦伯赞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抛弃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

一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但是，把“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大肆宣传，那是近年来的事情。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到处宣传他的“历史主义”，要用所谓“历史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

^① 这些文章，分别见：《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新1版。1952年9月号《新建设》。1959年第10期《红旗》。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1962年6月号《江海学刊》。1962年5月18日《文汇报》。



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①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

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②

说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把中国历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这是污蔑。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历史，把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会把历史说成是“罪恶堆积”。在翦伯赞同志看来，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历史人物，就是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就会把封建阶级的历史人物否定掉。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③这是翦伯赞同志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又一个攻击。

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用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奴隶同奴隶主、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这种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来解释历史现象。翦伯赞同志说，不行，如果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这个，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讲历史应该复杂一点，复杂到分不清阶级界限。他所以要大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要用这种矛盾来冲淡或者代替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同志给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同志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简单化”、“片面性”、“否定一切”，等等。但是，最大的帽子还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翦伯赞同志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大肆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他说：“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应该反对”。^④

翦伯赞同志讲了不少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把阶级斗争观点除外。这是一种挖心战术。他所反对的恰恰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观点。

翦伯赞同志把所谓“历史主义”奉为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则。其实，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翦

①②③④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1962年6月号《江海学刊》。



伯赞同志不过是给它涂了一点金黄颜色，就拿来到处挥舞。

我们且不说现在世界上大谈“历史主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历史上说，最早用“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克罗齐。他认为“唯一的实在性，就是流动性”，就是“精神”，并且宣称这就是“历史主义”。资产阶级的许多哲学派别，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也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坡培尔即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过份简单化的观点”，只“承认贫富之间的分歧始终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把一切政治冲突都错误地解释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否认“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否认“统治阶级内部分裂”。^①臭名远扬的实用主义者杜威，他表面上也承认“历史是一个变化过程”，但他坚决反对历史变化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观点污蔑为“教条式的历史哲学”。^②

人们有理由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是站在一起的。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毛泽东同志一贯热情地歌颂历史上的农民，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

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③因此，怎样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根本态度、根本立场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④。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并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翦伯赞同志对历史上的农民，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完全暴露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请问：为什么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呢？难道封建压迫、剥削不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吗？为什么反对地主，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呢？难道地主阶级不就是由地主构成的吗？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

①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② 《自由主义与社会活动》。《杜威哲学文选》。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9页。

④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



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制度就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制度。怎么能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呢？列宁说，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其目标“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②。

翦伯赞同志之所以要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限，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污蔑。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③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把它叫做革命呢？难道把它叫做改良不是更合适吗？

所谓“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这句话，指的是有时农民起义借用王朝的名义来号召，就认为起义农民不反对封建的皇权主义，这是只看形式，不看实质。马克思曾经指出：“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④。难道对农民起义借用王朝来号召的现象不应当像这样地进行阶级分析吗？如果这句话，指的是起义农民没有

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思想，这是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⑤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⑥。请问：在封建社会里受剥削的农民，为什么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主义”呢？难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等，不是和封建的皇权主义根本对立的吗？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性质，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决定的，而不是以当时农民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依据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当时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

-
-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7页。
-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 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8页。
- ④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1页。
- ⑤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1卷，第393—394页。
- ⑥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



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

翦伯赞同志还说：“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①。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例如，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跪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穷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湮财货”，“兼并”了地主的“田园甲第”。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战争发展的高峰。它在建立农民政权方面，也最典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中说：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请问翦伯赞同志：如果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一样是封建性的政权呢？

封建社会的农民，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发展，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前奏。正因为他们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成为革命

和建设的主力军。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的，没有革命性，那么，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怎么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呢？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一方面用他的“历史主义”歪曲和污蔑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用他的“历史主义”大肆美化和歌颂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

一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场大破帝王将相主宰历史，大写劳动人民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翦伯赞同志在这个革命运动面前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②。这就是说，筑长城、开运河，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但是秦始皇、隋炀帝是发动者和组织者，必须承认和肯定他们的功劳。

毛泽东同志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

^①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②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58年第10期《红旗》。



本的阶级。”^①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些皇帝的功劳？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

特别是像隋炀帝，连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敢替他说好话，认为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慄慄黔黎，俱充蛇豕之饵”。^②而翦伯赞同志竟把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当作挖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加以歌颂，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

能不能够说由于隋炀帝是开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因而就应该把功劳写在他的账上，加以肯定、加以歌颂呢？当然不能。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剥削阶级所兴修的水利、所创办的事业，都一律看待。但是，那些直接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服务的工程，其政治目的必须坚决揭露。而翦伯赞同志完全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给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

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③

这是什么“历史主义”呢？这就是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主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般认为是从唐宋开始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走向没落的。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在唐宋以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巴黎公社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反对。谁如果反对，就是反“历史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唐宋前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秦末农民起义、汉末黄巾起义等等，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度。同样，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国、英国、德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触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认为，翦伯赞同志美化帝王将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② 《隋书·帝纪》。

③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相，似乎是有条件的，他只是歌颂历史上那些所谓对人民有功劳的帝王，只是歌颂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实际上，凡是地主、资产阶级，翦伯赞同志都是毫无例外地肯定。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像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①这就是说，对于帝王将相，即使要批判几句也不行，也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只许向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而不准说半个“否”字。你看，他对帝王将相是多么爱护备至！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封建帝王不仅能够替“个别的人民”伸冤，而且能够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

封建帝王替人民伸冤，根据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观点，是当然的事。但是，且慢，请问帝王替人民究竟伸的什么冤？伸那个阶级的冤？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吗？那怕有一件也算。什么是封建的法律制度呢？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政治制度。要求帝王用地主阶级的法律

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到底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是把帝王及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法律都当作超阶级的偶像来崇拜。

翦伯赞同志大叫要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为了美化帝王将相，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了贬低农民革命，否认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翦伯赞同志还一直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

^①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②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1959年第21期《戏剧报》。



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①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很显然，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正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翦伯赞同志宣扬的“让步政策”理论，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不比不知道”。对古今中外的地主阶级我们也要做个比较。

我们先看看现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规模不能算不大吧，对统治阶级的震动不能算不重吧，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究竟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对此，我们许多革命老同志和革命群众还都记忆犹新。统治阶级加给革命人民的是屠刀、是牢狱，多少人死在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真是血流成河！多少人身陷囹圄，真是暗无天日！工农群众在革命中争得的一些权利，被统治阶级夺回去了，并且加重了负担。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

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③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只有变本加厉地进攻和反攻倒算，只有白色恐怖！

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德国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影响很深远的革命运动。这次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担当的负担更加重了。”^④同样，在这里也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绝没有什么“让步

①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新1版，第117页。

② 《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0页。

③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④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8页。



政策”。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农民阶级在革命中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绝不会有有什么“让步”，更不会有有什么“让步政策”。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是翦伯赞同志宣扬“让步政策”理论的第一个例子。他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①

翦伯赞同志所特别称道的“除秦苛法”，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不是。

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这是“除秦苛法”吗？不。“约法三章”，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反对农民革命的法律，是刘邦背叛农民革命的标志。农民革命，“杀”地主阶级、“伤”地主阶级、“盗”地主阶级（财产），这犯的

是那家的“法”？难道不是地主阶级的“法”！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它，反而歌颂它，这不是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吗？

“除秦苛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是当时地主阶级用来诱骗人民，使之规规矩矩就地主阶级的法律之范的。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地主为农民准备的鞭子，它是专政的工具，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汉初法律的阶级实质，却一再宣传那所谓的“除秦苛法”，这不是在帮助地主阶级继续欺骗人民吗？

翦伯赞同志说，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到文景时代出现了“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廩实，蓄积有余”的现象^②。这种描绘完全是从地主阶级御用历史学家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中抄来的。封建社会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地主阶级越富，农民阶级越穷。地主阶级的富是建立在农民阶级的白骨上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地主阶级国家的钱积得“贯朽而不可校”，粮食存得“腐败不可食”，农民仍然要卖儿鬻女，在死亡线上挣扎。对这一点，连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也不否认。晁错给汉文帝上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

^{①②}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117、117—118页。



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① 翦伯赞同志对这些事实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举一反三，以此例彼。翦伯赞同志所说的各个朝代统治者对农民实行的“让步政策”，都是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对封建社会的歌颂。

翦伯赞同志声称，他的“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② 不是，绝对不是。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翦伯赞同志却认为，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推动了历史发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翦伯赞同志却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怎么能说“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解释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③ 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同阶级敌人进行

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不能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对人民作什么“让步”，实行“让步政策”。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对敌人抱有丝毫的幻想。

结 束 语

解放初期，在史学领域里，虽然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作了一些批判，但是，由于革命的史学工作队伍还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批判的锋芒还不那么锐利。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大肆宣扬“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宣扬“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是为个人主义，为个人的名利而研究历史。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史学革命运动。这个革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反对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

这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史学革命，方向对，干劲足，成绩大。革命批判精神得到了大发扬，旧的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

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

① 《资治通鉴》卷一五，《汉纪》七。

② 参见《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409页。

③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1182页。



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革命史学的发展也决不是平静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决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虽然经过斗争使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破产了，但是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会登台演出。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史学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以为有机可乘，他们就公开登台表演了。

翦伯赞同志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史学革命，冷嘲热讽，挖苦打击。他到处讲演，发表文章，把刚开始不久的史学革命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攻击史学革命。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

翦伯赞同志对“以论带史”，即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大为不满。他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有片面性，“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②他提出：“材料是知识的泉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③这实际上就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

针对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观点，翦伯赞同志提出“政治是替经济

服务的”，“经济是历史的骨干”，是“写历史的原则”。^④他指责有些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并说“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⑤

翦伯赞同志特别反对史学工作者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奚落“为了站稳立场”的史学工作者，说“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⑥

翦伯赞同志给史学革命竟然作了这样的总结：“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⑦

总起来说，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

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②③⑤⑥⑦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④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的好榜样

本刊评论员

焦裕禄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人民的忠实儿子，是各行各业领导干部的好榜样。

焦裕禄同志的不朽事迹吸引着每个人。日前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同志的热潮。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已经成为各级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最根本的是要学习他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宇宙观。革命工作者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一切事物，改造一切事物，就能够具有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无产阶级优秀品质。

焦裕禄同志把毛主席的书作为自己工作的最高指示，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毕生的战斗任务，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他善于把毛泽东思想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千条万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条，才能学到焦裕禄同志的优秀品质，才能把无产阶级宇宙观学到手。

焦裕禄同志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是在河南省兰考县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到兰考去工作的。焦裕禄同志究竟带着什么东西到兰考县去的呢？他既不是带着救济粮，也不是带着救济款，而是带着四卷《毛泽东选集》。他靠什么东西战胜重重困难，战胜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呢？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时，兰考县的工作千头万绪。在焦裕禄同志面前，摆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关键问题是什么？

有的人看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忙于发救济粮，放贷款，或者只是抓肥料，搞生产，却忘记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必须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必须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焦裕禄同志对他们说：“光抓这些不行啊！首先得抓阶级斗争，抓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没有革命思想，咋着也搞不好生产。抓思想，就要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一九六三年，他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上说：“我们不能在政治上生锈，不能只抓生产救灾，不抓阶级斗争，不能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

阶级斗争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实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由于焦裕禄同志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根本矛盾，于是就推动了兰考县历史的飞跃发展。

革命工作者总是经常会遇到困难的。在困难面前怎么办？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人是，被困难吓倒，在困难面前直不起腰来，认为困难就是困难，永远是困难，从困难中看不见任何胜利和希望。这是懦夫懒汉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一种人则认为，困难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困难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顺利转化。这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①焦裕禄同志不仅看到了“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更重要的是，他在不利条件中看到了有利因素，看到了转化和发展。“梅花欢喜漫天雪”。他不是被困难所吓倒，而是伸开双手去欢迎它，立志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当他走访了兰考县的灾区之后，热情地高呼：“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兰考县的干部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高就高在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看问题，用毛泽东思想对待困难。

究竟依靠谁来战胜困难？依靠谁来战胜大自然所带来的严重灾害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有些人认为，战胜“三害”最重要的是依靠治水、治沙、治碱的技术措施，依靠国家的物质支援。他们见物不见人，看不到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焦裕禄同志运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他认为，能够战胜兰考灾害的决定性力量，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三十六万勤劳勇敢的兰考人民。

照某些人的看法，在灾荒面前，群众只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饥民，群众的要求就是救济。他们看不见群众内心的革命热情，看不见群众对战胜自然灾害的迫切要求，看不见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

焦裕禄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信普通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坚信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他最看得起的是像萧位芬那样的老贫农，他拜萧位芬为师，向萧位芬请教了三天三夜。

焦裕禄同志认为，在困难面前，“要干，要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天灾，“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才是真正反映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这才是真正反映了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遇到严重灾荒时，有的人认为，唯一的就是解决吃喝的问题，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话。

①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4页。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页。



焦裕禄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认为，战胜困难，最重要的是“人的革命意志”，是“人的革命品格”，首先是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如果思想上没有树立战胜敌人的革命勇气，没有克服困难的坚强毅力，那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焦裕禄同志深深懂得，战胜灾害，首先必须抓思想工作。他认为，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正是由于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从而发动了群众，经过艰苦奋斗，战胜了自然灾害，迅速地改变了兰考县的落后面貌。

机械唯物论者只承认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否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只承认物质变精神，不承认精神变物质。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这是辩证的唯物论，彻底的唯物论。

焦裕禄同志向干部和群众反复宣传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他说：“要革生产的命，必须先革思想的命，有了一定物质基础，思想能变一切，什么样的思想，就做出什么样的结果。一种思想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坚持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敢想敢干和科学实验相结合，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很快改变落后面貌；另一种思想是：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的指示，思想落后于形势，工作落后于实际，看不到有利形势，看不到恢复发展生产的潜力，看不到群众要求改变面貌的积极性，工作中顾虑重重，小手小脚。抓不住阶级斗争这条纲，不能够贯彻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虽然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或者原来的基础就较好，也会使生产下降”。

兰考县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事实说明，人们头脑中有战胜内涝、风沙、盐碱的坚强意志，通过实践，就可以转化为现实。人们的头脑中有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产生粮食、棉花、油料等物质财富。焦裕禄同志说：“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里所说的“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

焦裕禄同志领导兰考人民同“三害”作斗争的胜利，是突出政治的胜利，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论思想的胜利。一句话，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一个是它的实践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性，就是说，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宇宙观。只有阶级立场坚定，对无产阶级无限忠诚的革命者，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书讲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要讲的话，毛主席的一言一语，都反映了无产阶级的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524页。



要求和愿望。只有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才能对毛主席的书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只有破除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懂得活生生的革命辩证法，才能学好毛主席的著作。

阶级感情就是对劳动人民无比热爱，对阶级敌人极端仇恨。焦裕禄同志就是带着这种强烈的阶级感情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焦裕禄同志所以能够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能够从困难中看到希望，看到人对物的决定作用，看到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首先是由于他有坚定的阶级立场。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①这就是说，必须在革命实践中去学习毛泽东思想。

仅仅在理论上记住阶级斗争，记住政治的统帅作用，记住困难的二重性，记住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不难的。毛主席著作学得过硬不过硬，决定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具体运用。焦裕禄同志学毛主席著作学得好，过得硬，好就好在他能具体运用，硬就硬在他能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领导兰考县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他用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制伏洪水，锁住风沙，“吃掉”盐碱。焦裕禄同志同兰考人民一起，在应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学会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世界观问题。毛泽东思想同那些脱离实践的知识分子，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汉，是没有缘分的。

焦裕禄同志的不朽事迹向我们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解决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不是坐在书斋里玄思冥想可以解决的，只有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立场。这是焦裕禄同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这是广大工农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

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每一个真正革命的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这是做不做的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处于世界新的伟大革命时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每一个有志气的革命干部，每一个真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应当下定决心，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的县委书记，我们的下部，都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领导着意气风发的六亿革命人民，英勇奋斗，还有什么敌人打不倒呢？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可以断言，无论帝国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原子弹也好，统统奈何我们不得。任何狂风恶浪，任何牛鬼蛇神，都吓不倒我们。我们国家的颜色，一定能够子孙万代永远鲜红。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永远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08页。



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二期刊登了《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的启事以后，广大工农兵和学生纷纷来信、来稿，表示热烈响应和支持。他们说：“工农兵动笔写文章，是毛泽东时代才有的事”；“看到《红旗》欢迎工农兵和学生投稿，受到很大鼓舞”；“中国共产党的刊物为我们而办，吸收我们参加，这是极大的光荣”。有的还说，“过去不敢写文章，认为那是理论家的事，现在也要拿起笔来了”。

对于这些文章，由于杂志篇幅的限制，只能选用一部分。其中，有的全文刊登，有的摘要刊登。《日常工作中的辩证法》这一组文章，就是摘要刊登的。

解放军某部侦察连的

哲学故事会

为了推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解放军某部侦察连的团支部和革委会根据大家的要求，举办了一个哲学故事会，交流大家怎样在平常事情里运用辩证法的体会。

故事会的主席是团支部书记张延吉。他说明了这个故事会的目的之后，问大家：谁打头炮？

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有人喊：“咱们连长故事多，数数足有十几箩。还是请连长先抛一个出来引个头吧！”

连长赵光欣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站起来，讲了个——

练“抓”和练“走”

以前，有人对咱们侦察兵夜间战术训练提过意见：光练“抓”（抓俘虏）不练“走”（接敌运动）不符合实战要求，得改。当时我想，得了，人家练了不少年，积累了不少经验，还轮得到我们来推翻吗？要改，人家不早改了？对前人传下来的经验，不可不信呀！因此，我还是照着葫芦画瓢，光练“抓”



不练“走”。

去年冬季野营前，上级要我们打破框框，改革训练方法。我想，既然群众早有要求，这回上级又有指示，那就干脆来它个彻底翻新，于是领着大家一个劲地练“走”，把练“抓”丢到一边去了。这一来，走倒比过去会走了，可是遇到“敌情”，却不知怎样靠上去“抓”了。

后来我才搞清楚，对练“抓”和练“走”都不能有片面认识，练“抓”和练“走”都不能丢。要在练“抓”中练走，在练“走”中练抓，才符合实战的要求。如果光练“抓”，抓敌人的本领是练到了，可是怎样靠近敌人，怎样甩开敌人，却没有学到手；如果光练“走”，靠近敌人、甩开敌人的本领学到了，可是怎样才能抓住敌人呢？不能从一个片面性走向另一个片面性。第一次片面，是我迷信别人的经验，墨守成规，结果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第二次片面，是我全然否定了别人的经验，瞎闯一气，结果走了弯路。看来，既要肯定别人的经验，又要发现其不足，不断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大胆地更新它，丰富它，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训练是这样，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连长一讲完，八班战士徐在鹏站起来说：“其他事情的确也是这样！”他接着就讲了一场由主观片面引起的——

查铺的风波

有天晚上下岗回来，身上冷飕飕的。我想，天这么冷，要是有人被子没盖好，受了凉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我就到各排宿舍去

查铺。查到我们排的时候，我刚把电灯一开，上铺马上有几个人嚷起来：“是谁没事找事？”我好心来查铺，却挨了一下闷棍，恼火得一夜没有睡好。

后来我冷静一想，原来我忘了我们排的电灯线路跟别处不同。别处是一只开关管一只灯，拉开一只灯查铺不会影响大家睡觉；我们排呢，是一只开关管几只灯，一拉开关整个宿舍亮堂堂。那天晚上一定是电灯光把睡在上铺的几个同志弄醒了，难怪他们有意见。我虽然出于好心，干的好事，但方法不对，效果不好。

这样看来，一个人无论办什么事，动机不好，效果肯定不好；动机是好的，如果方法不对，效果也不一定好。有些时候，由于我们主观片面，对客观实际没有全面了解，脑子里想的和实际情况不符，也可能把好事办坏。这里，方法很重要。毛主席教导我们，解决工作中的不同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方法对了，效果才能好。这就要对事物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有了好的动机，采取好的方法，就能得到好的效果。

“报告！”随着喊声站起来的是五班粗壮结实的机枪副射手钱智培。他说：开头我不安心工作，后来，认识到局部和整体是怎样的关系，我才——

安心当副射手了

领导上调我当机枪副射手时，我觉得当正射手才有意思，当副射手给别人唱配角，跑龙套，总感到比别人矮那么一截。一背上弹盘，就打不起精神。有一次打靶，正射手



已卧倒做好了射击准备，等我递弹盘。可是我递过去的弹盘，竟连弹带头都没有抽出来，影响了射击。

指导员找我谈心，他指着桌子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桌子呗。”他又问我：“要是把四条桌腿拆掉呢？”我回答说：“那还成什么桌子了？”指导员接着说：“是啊！桌子是由桌面和桌腿组成的，没有桌腿就不成个桌子，桌腿对桌子说来，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桌子是这样，一挺机枪更是这样，两个射手，谁也离不了谁。要打好靶，没有副射手还行啊！”经指导员这么一讲，我才懂得了正副射手在射击中的关系。打起仗来，正副射手密切配合，机枪才能发挥火力。如果锣齐鼓不齐，怎么能歼灭敌人呢？从此，我就安心当副射手了，操练时和正射手密切配合，第二次实弹射击，打了个硬梆梆的优等。

接着发言的是七班战士奚国森。他第一练习打半身靶时，得了个优等，可是第二练习打全身靶时，却打了个五发一中。他说：这是因为没搞清——

“差不多”和“差得多”

打第二练习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的技术练得差不多了，第一练习打半身靶还打了个优等，这次打全身靶，真是三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啦。上了靶场，第一发打中了，心一乐，手一松，“乒乒”几枪，结果四发全飞掉，“差不多”变成了“差得多”。

“差不多”思想万万不能有。当你一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实际上已原地踏步，不前进了。可是客观要求一天天提高，同志们

一天天进步，结果自己就越差越多了。事物是发展的，“差不多”随时可能转化为“差得多”。一个人只有永远感到自己“差得多”，不断努力，才有可能避免“差得多”。而当你感到“差不多”的时候，就会故步自封，不进则退，人进我退，又要陷入“差得多”的局面。在前进的道路上，只有永远感到自己“差得多”，才能勇往直前，登上顶峰，要不，就会从山坡上滚下来。

五好战士李思通几次站起来没有捞到机会讲，这次他没等主席点头就抢先说开了——

图轻快 倒不轻快

有一次，连里组织按地图行进，布置我们班两小时以内复杂地形上兜一个五公里的圆圈，寻找十个目标。接受任务以后，我打算组织大家在图上研究一番再出发。有的同志却说：五公里的圆圈在地图上就拇指大一块，在那上面花时间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如早点出发早点回来。结果，就匆匆出发了。谁知一出门就走错了方向，等发现不对，再看地图，已经过了第一个目标四里多路了。回头再找到第一个目标，一个小时过去了。吃了哑巴亏，走了冤枉路，我赶紧重新领着大家研究地图，连路上每个转弯处有什么明显的方位物都记下来。后来的九个目标，只用了五十分钟时间就找到了，提前完成了任务。

看来，做准备工作固然要花一些时间，做好了却能缩短以后的时间；怕耽误时间，不做准备工作，匆匆忙忙，结果，回头重来，



反而浪费更多时间。这样看来，办一件事情真是：越不怕麻烦越不麻烦，难办的事变好办；越图轻快越不轻快，好办的事也变得难办。

六班战士吴祥根对于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深有体会。你听他讲——

为啥大江里的船会翻在小河里

我第一次参加横渡长江时，和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游泳训练的伟大号召，下决心闯过去，在精神上压倒了困难，下水前又做好了各方面的物质和技术准备，在水里越游越沉着，终于冲破一层层激浪，胜利地游到对岸。

横渡长江回来又在小河里泅渡，我想，大江都闯过来了，这小河还能“翻了船”！说来也怪，正因为精神上松懈，物质上技术上又马虎了事，结果偏偏过不去。在一次泅渡中，由于身体没有活动开，腿抽了筋，枪又没有背好，滑过来滑过去，老往头上压，连呼吸也受到了影响。游了不远，只好停下来。

“到了家门口，还得防摔跤”，这话很有道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中往往包含着不利，不利中往往包含着有利，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利和不利会互相转化。大江大河水面宽，风浪大，是不利因素；但是，由于我看到了这些不利因素，通过主观努力，能促使它向有利方面转化。小河流水面窄，风浪小，泅渡的条件很有利；但是，由于我思想麻痹，结果出现了很多不利因素，在小河流里“翻了船”。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不

管在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下，都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困难。

说到游泳训练，九班长刘兆和讲了一个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的故事——

首先要看思想上的差别

游泳训练第一周，陈锡林在浅水里才能游十米米，陈继高已能到深水里游二百多米了。当时我想，他俩原先都是“称砣”，比个头、体力、领会程度，陈锡林那样也不差。所以，在游泳训练第二周便要求他赶上陈继高。谁知，一周以后，陈继高已游到七百米了，而陈锡林还是手脚动作配合不上。经过调查研究我才知道，陈继高每次训练总是争先恐后，陈锡林却见水就愁。陈继高进步快，是因为树立了一个“敢”字，陈锡林到现在却还没有打掉“怕”字。过去我光从表面看，认为他们条件差不多，而没有从思想上分析比较，找出差距，硬叫陈锡林到深水处去游，岂不成了“赶着鸭子上架”啦。以后我就给陈锡林讲学习游泳是为了消灭更多的敌人的道理，讲了毛主席横渡长江的故事，并向他讲明，人要在水里得到自由权，就要敢于实践。后来，陈锡林也很快跟上大家了。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找差别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首先要看思想上的差别。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否认内在的思想上的差异，就不能帮助后进赶上先进。

有人推了一下攀登能手金忠发，要他说说他从两次攀登中得出来的体会。金忠发站



起来说了——

胆大才能艺高

开始练攀登，到作业场一瞧，吓了一跳，直陡陡的山坡如何上得去？又怕上不去，又怕掉下来，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料，就在这当口上，班长又将了我一军，说我是老同志，要先开头炮。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上攀，攀到山半腰，身体被一个石棱角挡住了，骑虎难下，我只好停在那里发呆。后来还是山上的同志用保险绳拉了我一把，才攀登上去的。

第二次攀登就不同了，我总结了第一次的经验，打掉了“怕”字，带着敌情观念，一走到作业场，牙齿就咬得格格响。我想，我家祖祖辈辈受地主剥削压迫，想想外祖父被地主吊起来毒打的悲惨情景，想想南越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过着同我们解放前一样的生活，仇恨就涌上心头。听得班长命令一下，我就登登地往上攀。我对自己说：上面就是毒打你外祖父的地主，上面就是杀害南越人民的刽子手！我浑身来劲，就这样爬上去了，抓到了“敌人”的哨兵。班长问我怎样爬上去的，我说：阶级仇恨给自己壮了胆！

从两次攀登中，我体会到：艺高胆不大，艺是空的，甚至会变成零。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胆子最大的人，才能使武艺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暂时艺不高，以后也一定会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领。

别人的成功经验固然要学，但是，给养员鲁宏智说——

失败的经验也要认真学

听说兄弟单位改进野外烧煤灶已经试验多次了，我们便抱着很大的兴趣去取经。可是第一次去，人家火没烧着；第二次去，又碰上煮了夹生饭。回来，大家议论开了。有的说：“人家还没有绝对把握呢，哪里有经可取？”我不由想起了上半年改蹄形回风灶的经过。那回我们失败了二十三次，由于大家认真吸取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训，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要是没有二十三次的失败，哪会有第二十四次的成功！既然我们自己在改灶中能接受失败的教训，转败为胜，为什么不能把别人失败的教训当经来取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带着行军锅、炉条，到兄弟单位挖的灶上，生火试验，边烧边研究，反复琢磨了几天，终于找到了兄弟单位烧成夹生饭的原因，在于灶膛内壁挖得太直，行军锅四周空隙太小，灶膛里回不了风，火转不开，只烧在一小块锅底上。我们就按过去改蹄形回风灶的经验，把灶膛挖成鼓形，终于把满满的一锅饭烧熟了。

失败和成功，是对立统一的，失败里就包含着成功的因素。我们无论干啥，都希望成功，不希望失败，但事实上要得到成功，常常免不了要受到一些挫折或失败。只要经得起失败，善于从失败里找出教训，并虚心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失败是可以转化为成功的。

像这样失败变成功的故事多得很。在格斗练习中，小个子怎样斗倒大力士？四班战士孔庆霖同陶顺银交手时有过经验，他站起



来回答道——

以己之长 攻人之短

陶顺银“五大三粗”，整整比我高一头。还没和他交手，我就心慌三分。一上场，他气势汹汹，我原先想好对付他的那几招全忘了。憋憋气我猛扑上去，陶顺银却不慌不忙地往边上一闪，趁势来了个“顺手牵羊”，把我摔了个嘴啃泥。我不服输，可输在哪里呢？我根据毛主席的教导，重新估量了双方的条件：陶顺银身粗力大，我个小灵活，这是双方不同的有利条件。他的长处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对付这样的强手，必须首先有勇气，解决“心慌三分”的问题，才能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以己之智胜人之拙。于是第二次交手时，我就满怀信心，尽量避开我的短处，发挥我的长处，弄得他头上直冒汗，疲于应付，动作越打越乱套。我瞅准机会，趁他一个不注意，来了个击胸扫腿的配合动作，终于将他撂倒。

在敌我格斗中，勇敢是决定性的因素。不想斗，不敢斗，就谈不上斗倒对方；当然，如果有勇无谋，不讲究战术技术，碰到对方强过于你时，也谈不上斗倒对方。知己知彼，既有勇，又有谋，小个子就能斗倒大力士。

一个个故事，说明一条条哲学道理，大家越谈越开窍，争先恐后要发言。炊事班长顾发祥站起来说：我参加这种会头一回，好歹也说上一个——

口味为啥一下子变了

去年夏天，正当游泳训练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炊事班从生产地里收来了一大批洋葱。我想，这可是大家爱吃的菜呀，得好好给同志们改善改善生活。我召集全班郑重其事地研究了一番，接连几个中午的菜单上订了洋葱炒肉丝、洋葱炒鸡蛋……。炒菜时我亲自掌铲，还特地多放些调料。我满以为大家一定吃得很香，谁知第二天就有三个班剩菜了，第三天分菜时有的班干脆不要了。这真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为的啥，口味一下子变了？

后来连长叫我们炊事班参加全连武装泅渡。我下水游了八百多米，就觉得肚子里折腾起来，嗓子里也一个劲往外冒酸水，一股荤油葱味直冲脑门，呛得我气都喘不过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坚持到底。上岸以后，班里几个同志告诉我，吃了洋葱反起胃来特别难受。这时候我才知道了大家不喜欢吃洋葱的原因。陆地练兵和水里练兵不一个样，客观条件变了，同志们的生理反应变了，口味也变了，我还按老一套办事，怎么不碰钉子呢！

故事会已经开了两个钟头，大家的热情很高。指导员丁先明跟主席商量了一下，把会议结束了。

会散了，大家陆续走出会场，可是，不少同志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张延吉、刘玉峰、周可丰、

程明玖、杨泽民、陈云林整理）

续
②



实 践 出 智 慧

武汉部队后勤部营房部助理员 宋 乐 山

一九五五年，领导上分配我到武汉部队后勤部门做营房工作，主要负责营具的制作、采购和分发。十年来，我跑了南北九个省的许多地方，采购营具二十多万件，木材几千立方米，经手几百万元，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和大的差错。同志们说我工作做得有成绩，问我有什么经验。我想来想去，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和经验的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切实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学习《为人民服务》，热爱营房工作

我原来是做警卫工作的，文化程度很低，没有做过机关工作，对营房工作更不熟悉。初来时，看见营房的图纸蓝底白道道，弄得头昏脑胀也看不懂，营具统计表上的几十种品名，好多也识别不了，心里非常苦恼。我想，这工作我干不了，每天和桌椅板凳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不如趁早回部队。后勤部的首长对我说：“干革命可要服从分配呀！不能挑挑拣拣的。要是都回部队，这后勤工作谁来搞？”“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不怕不会，就怕不钻。你想想，参军前你会啥？还不是在党的培养下才有了进步的吗？”

这时，我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毛主席

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张思德原来也是做警卫工作的，党叫他烧炭他就愉快地去烧炭，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现在党叫我搞营房工作，这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三心二意呢？想来想去，终于想通了，懂得了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把自己锻炼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材；懂得了做好营房营具的管理工作，不仅可以体现党对部队的关怀，也可以节约经费，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就安心这个工作了。后来，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思想有波动的时候，又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就更加热爱这项工作了。

勇于实践，变外行为内行

有了做好工作的决心，不等于就是做好工作了。要想把工作做好，还必须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才能前进。

我到营房部工作不久，就同另外一个同志到郑州去接收一批正在加工的营具。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人家说啥我听啥，坐在那里像木橛子似的。我心里非常着急。怎样能学会工作呢？我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毛主席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毛主席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我过去根本不会打枪、刺杀和投弹，还不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吗！过去我一字不识，现在有了点文化，不也是在实践中学习的吗！现在，我对营房工作，虽然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工作是人做出来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勇于实践，善于学习，工作是一定可以做好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在实际工作中边干边学。

一九五六年，领导上派我到河南新乡制作营具。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外出执行任务，要开支一百多万块钱，制作十多万件营具。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心里真像揣着个小兔似的，蹦蹦直跳。制作营具的知识我一点也不懂。怎么办呢？还是请教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②这段话对我真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我想，工人们都是内行，都是老师，在这么多内行和老师面前我还怕什么？于是，我就从旅社搬到木业社，积极参加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们干活时，我就用心看他们如何操作，他们休息时，我就去虚心求教。

开始，有的人嫌我麻烦，说我缺心眼儿。他们说：“你住旅馆多舒服，抽时间来检查检

查，到时候运走不就行了吗？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放着清闲不清闲。”但是，我认为，图清闲就不能学到知识，学知识就不能怕麻烦。现在麻烦点，以后工作就顺利了。我坚持边干边学，和工人一起锯木料，刨木板，钉钉子，并在生活上关心工人，同工人们搞得很热火，很密切。这样，在工人帮助下，我学会了看图纸，懂得了做一副营具需要多少工时，多少钉子，多少油漆，多少附料，还初步学了电锯、电刨、打眼机、开榫机等的操作方法。取得了这些知识，就便于我计算营具成本和检查营具质量，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六一年，我到湖北恩施去调运木材，这对我又是一个新的课题。对木材如何识别，如何检尺，如何扎排，我又是一窍不通。不会识别，就分不出木材的好坏；不懂检尺，就像小孩不识数一样，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木排扎不好，遇到大风浪就会被打散。当时，时间紧，任务重，心里有些急躁，恨不得一下子把不懂的东西全学会。我向木材转运站借了一本《木材材积累计方法》来学习，但看了半天仍然不懂。怎么办呢？我想，要学会检尺、扎排的方法，还是必须亲自参加实践。

于是，我就到工人当中去学习。开始，自己不讲究方式，叉着腰问他们：“同志，检尺是咋搞的？”他们说：“检尺吗？上边知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4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页。



你去问上边吧！”我又问：“同志，哪种木材好？”他们说：“都好！”我感到不大对劲。工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回答我呢？毛主席说，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而我到这里没有参加劳动，没有同工人打成一片，就急急忙忙地问长问短，工人同志怎么会欢迎我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上山和工人一起扛木头，放木头，量木料，在河边和工人一起扎木排，给工人送水，忙时顾不上吃饭，就买柿子充饥。有时整天泡在水里，手脚都泡白了。还有一次掉在水里，把腰扭了，爬起来再干。工人们看到我一片真心向他们学习，就主动来帮助我，教我识别木材和检尺、扎排的方法。他们说，杉木、杂木由外往里烂，易识别；松圆木由里往外烂，不易识别。颜色发黑，两头冒白浆，并呈筛状，就是烂木材。用锤子敲一敲，声音发闷，也是坏木材。检尺时，条木直径量中间，圆木直径量小头。扎排时，头排腰箍要扎牢，底排要用杉条扎，因为杉木直，浮力大。工人们对我的帮助，使我深刻地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老师，在群众面前，只要认真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什么知识都可以学到手。

我在采购中还经常碰到运输方面的问题。开始，不了解运输规律，碰了不少钉子。一九六二年，我到黑龙江宝泉岭去运铺板，在机关里闭门造车，编造火车运输计划，要了两个敞车。谁知这种车皮容量小，装上铺板，还需要插木桩，盘铁丝，盖雨布。用这种车皮显然不合适。在调拨汽车时，运输站

的同志总问我要什么型号，多大吨位，多少辆，我又答不上来。

以后，我就在鹤岗、萝北、宝泉岭等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研究。我带着小本到火车站去登记每一种车皮的容量和吨位，并根据铺板的规格和车皮的容量，计划铺板的装法。我调查了五种车皮，经过分析比较，选定了两种装铺板最合适的车皮。我还调查了车站的一些规章制度，如什么时候申请车皮，什么时候装货等等。

用哪种汽车装运铺板好呢？我又到汽车站去了解情况，就是在街上也不放过调查机会。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辆大斗车。我想，这车这么大，一定装得多，便取得司机同意，到车上量了又量，比了又比。我自言自语地说：“这车最合适！”司机奇怪地问：“什么最合适？”我说：“装铺板最合适！”司机笑着说：“这家伙准是个汽车迷！”我心想，要说迷，就是迷，不迷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我还进一步摸索航运方面的知识和规律。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到江西南昌去运铺板。用火车运还是用船运合算呢？有人说火车运好，也有人说船运好，需要我下决心。我记起了毛主席的话：“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①我考虑到“侦察”二字，自己没有侦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察，怎么能下定正确的决心呢？我就沿着赣江，见船就问。有的船正忙着，不能上船。一直走了十多里，才见到一条大船。船老大同意我上船调查，我高兴极了，一口气跑上码头，借来尺子，仔细地量了船舱。经过计算，说明船运比火车运便宜，我下了船运的决心。

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热爱自己的工作。过去，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常常爱看看电影，逛逛公园。现在，我是先进木器铺，看看各式各样的家具，有合适的就记下来准备采用。看得多了，哪里什么东西好，哪里贵，哪里便宜，心里都有底儿。别人购买的营具，质量好坏，单价高低，也能够看得出来。例如，一九六四年，我们单位在汉口加工一批铺板，原来计算每副加工费五元三角，我一看，觉得太高，就和加工厂核算，并进行现场试验，每副降低到二元六角。同年九月，湖北白沙洲贮木场拨给我们七百立方米松圆木，在检尺过程中，我发现百分之八十都坏了，同场长、检尺组长商量并进行现场试验后，他们作了调换，已运出的降价处理。

这几年来，我在工作中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人，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社会实践，也就是说，要放下干部架子，走出办公室，作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

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几年来，我经常一个人远离领导出差办

事，常常遇到许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每逢遇到困难，我就学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结果把困难一个个地都克服了。我深深认识到，千难万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不难，依靠群众就不难。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在黑龙江省萝北县订购了五千副铺板和一万条铺凳，按合同规定，在六月底和七月底分两批运货。六月初，我又到了萝北，检查合同执行情况，并造了四个火车皮的调拨计划，准备把第一批铺板、铺凳运回来。可是，一到萝北，心就凉了，许多矛盾摆在我的面前：第一，已经做的铺板、铺凳，有一部分不合质量要求；第二，加工速度缓慢；第三，当时正处于农忙季节，装车劳动力不足；第四，自己一个人要担负三个加工单位的验收和组织运输的工作，照顾不过来。面对着这许多矛盾，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怎么办呢？晚上，我一边学习《矛盾论》，一边思考。毛主席说，捉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我就把这些矛盾一个个加以分析，看哪一个主要的矛盾。想来想去，我认识到，铺板是靠工人来做的，做得好与坏，工效能不能提高，全在工人，因此，还是人的因素第一，只要发挥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矛盾都可以解决。但是，我又不是这个单位的领导，怎样去进行思想发动，把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我就找场的领导，谈了我关于发动群众的想法，他们很赞成。同时，我又学习了《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认识到要发动群众，必须从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入手。于是，我就决心到贮木场，参加车间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并帮助工人和家属做事。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了床，拿着扫把把贮木场办公室周围和家属住区打扫得干干净净。吃完早饭，我又到电锯车间劳动。中午休息时，我借了一把锄头，帮助他们锄地。见到哪家水缸没有水了，我就给他挑得满满的。吃饭时，我帮助炊事员刷碗擦桌。这样干了几天，工人和家属们见到我就亲热起来了。每次劳动一休息，有许多工人围着

我，要我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我想，工人们主动亲近我，正是我进行思想发动的好机会。我说，我的嗓门不好，唱起歌来不好听，还是给大家读读毛主席著作吧！工人们听说读毛主席著作，更加高兴。我就给他们读了《为人民服务》和有关勤俭建国、自力更生的论述，并联系铺板的生产任务，说明提高质量，就能延长使用年限，减少国防开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具体地为为人民服务。

开始，有个别工人还认为铺板质量差点没什么。我对他们说：“你们住在东北，不知道南方的特点，天气热了，只铺一条床单，甚



宋乐山同志在载运铺板的船上，给工人讲《愚公移山》和王杰同志的事迹，鼓励工人战胜困难。

武 军 摄



至有的战士就睡在铺板上，如果不刨光，战士睡着就会磨得慌，床单也容易磨坏。”我还说：“你们把铺板做得好一些，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部队。战士们睡得舒服，练兵、打仗都有劲，他们就会感谢工人老大哥对他们的支持。”我还问：“你们有没有亲人在部队上？”他们说：“有！”我说：“要叫他们都睡在铺板上行不行？”工人们一听都笑了，说我讲得有道理，主动提出返工。有的还说：“老宋，你说咋办就咋办，一定保证质量。”

接着，场里召开了动员大会，开展比学赶帮的生产竞赛，提出了保证铺板质量，支援部队的号召。这时，我进一步深入车间劳动。工人们修整铺板时，我就给他们背铺板、送水。当时，我的胃病发了，疼得十分厉害，但仍然坚持同工人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为了使工人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到书店买了十几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送给工人学习。工人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干劲越来越足。为了保证质量，工人们自动组织了质量检查小组，检查每一块铺板是否符合质量要求。经过工人们的努力，铺板做得又好又快。

这时，离铺板装运的日期只有七、八天了。加工地点离鹤岗车站有一百公里，如何在计划的日期内把铺板运到车站，又是一个问题。按活计算，每天需要二十多个劳动力负责装卸，才能如期运到。但当时正值农忙季节，组织劳动力有困难。我想到动员工人家属装卸是一个办法，便把这个想法同场领导商量，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还没有到工

人家属中去说这件事，她们却主动地找来了。她们说：“老宋，咱们早就看透你的心思了，你不说，咱们也得来帮忙。”有的还说：“你起早贪黑为咱们担水、扫地、种菜，处处关心咱们，咱们也得为解放军做点好事。”头一天就来了二十多人，有的连饭也顾不上吃，加紧装卸，工作进行很快。

在运送铺板时，又赶上下雨，路上泥泞，有的司机不大愿意拉，也不愿多装。我就给他们讲拉营具的重大意义，讲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英雄司机的故事，鼓励他们向困难作斗争。有一次，汽车陷在泥泞里，司机说：“算了吧，把铺板卸了。”还有的说：“把拖车放在这里，以后再拖。”我一面动员他们，一面跳到泥里，挖泥推车。终于在工人同志的帮助下，把车子从泥泞中拉了出来。

这样，经过工人、家属和司机的共同努力，第一批铺板按原计划提前三天发走了。

第一批铺板运走后，必须加速赶制第二批铺板和铺凳。我又到了贮木场。当时该场铺板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是火锯车间的速度跟不上。我到火锯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挖潜力，终于由一天拉十六立方米原木提高到二十二立方米。木工车间为了提高产量，也想了许多办法。全场工人干劲倍增，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在萝北的这一段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



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①对这一段话，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精打细算，为社会主义 节约每一厘钱

我们做采购工作的，经常经手的是钱和物，稍不注意，就会为国家造成浪费。怎样才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呢？我没有别的门道，就是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节约的论述，树立勤俭建军的思想。毛主席说：“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②后勤干部是部队的管家人，要把这个家管好，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真正做到勤俭节约。

我每次购买营具的时候，都要精心算一算，看花的每一厘钱是不是用到正地方，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有利。

一九六四年，我在萝北名山贮木场装运铺板。铺板打捆可以用草绳，也可以用铁丝，但到底哪个省钱呢？我就跑到五金商店和货栈去打听。我对草绳和铁丝比了又比，算了又算，最后算出用十八号铁丝打捆，每捆只花五分钱，而且铁丝细，装车不占地方，解装后还可以再用。用草绳打捆，每捆要合五分五厘。这样，就采用了十八号铁丝。还有一次，在汉口加工一批三斗桌，厂里计算价格时说一张桌要用二两钉子。我找来了一张三斗桌数了一下到底用了多少钉子，又称来二两钉子数一数，实际证明二两钉子可以钉两张半桌子。平时，我走到哪里，只要看

见地上有一颗钉子，有一根能用的小木头，都把它拾起来，准备以后再用。

节约国家财产，必须经常动脑筋，想办法，反复试验，反复实践，因为处处都有节约潜力。一九六四年，我在吉安运铺板，当时铺板存放在三个仓库里，距离码头一千三百米。是用汽车搬运还是用板车搬运省钱？我找了一辆汽车和一辆板车来作试验。试验证明，汽车运因为要另外组织劳动力装卸，一块铺板的运费要九分五厘，而板车运不需要另外组织劳动力，一块铺板的运费只合五分七厘，比汽车运节约三分八厘。我就采用了板车运的办法。

几年来，我们用汽车和火车运输铺板，装载量不断有所提高，这也是从实践中反复摸索出来的。最初，一辆解放牌汽车装一百零四块铺板就满了。我想，一辆汽车的载重量是四吨，而一百零四块铺板只两吨多一点，这样装不能充分发挥汽车的运输能力。我就和工人们多次商量试装。开始试装时，只装了一百零三块，不但没有多装，反而少装了一块。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多费脑筋了，反正公家报销，又用不着你拿钱。”我说：“我们要为国家负责，多节省一辆车，就为国家多增添一分运输力量。”在工人同志的热情协助下，我坚持进行试验，一九六三年每辆解放牌汽车就提高到能装一百四十块，一九六四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7页。

②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9页。



年又提高到能装一百七十六块。火车装运也是同样的情况，开始一个车皮只能装七百块，以后不断研究，把一切空隙都利用起来，最多能装到八百三十五块。

要厉行节约，真正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就得有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这些年，我为了购买到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营具，到处去调查货源、货价，跑了不少的路，爬了不少的山，经常饿肚子，有时宿野外。虽然苦，虽然累，但我心情非常舒坦，因为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节约，自己再辛苦再劳累也值得。有一次，我在湖北麻城订购铺板，了解到龟山的铺板价格便宜，质量又好，就决定到龟山去。不巧，那时连下两天大雨，麻城到龟山不通车。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的指示，决定冒雨去龟山。这段山路确实不好走，累得我浑身是汗。到龟山后，午饭也没顾得吃，就联系买铺板的事，当天又返回麻城。这天，我走了八十多里，脚上打起了一个一个的血泡，虽然很累，但想到自己按照毛主席教导，克服了困难，订购到合适的铺板，心里却甜滋滋的。

我们做采购工作的，必须树立国家的观点、全局的观点。一九六五年一月，我在南昌装运铺板，航运局拨给我五条一百吨的木船。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城乡运输非常繁忙，我想，能不能腾出一条船来解决地方运输的困难呢？我就到船上去量船舱大小，船的高度，再按铺板的规格进行详细计算。计算结果，只要四条船就可以装完。装船时，我同

工人一起扛，一起装，一块压一块，一道缝也不留。最后，确实只用四条船就把铺板运了回来。按包运规定，少用一条船，运费并不减少，但却为航运部门节约了吨位成本费六百多元，为国家节约了一条百吨船的运输力，支援了春节物资的运输。

在工作中，凡是对于国家、集体不利的事，我坚决不做，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不马虎，绝不贪图小利。在南昌装运铺板时，南昌土产公司营业部多给我运了一副，我立即跑去告诉他们，并按价买了下来。多运一副铺板，放行证也得改，不然就要违反航运规则，我又到航运局重换放行证。咱们搞采购工作的人，就是要从这些小事中养成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模范地遵守国家法令的观念。

尽力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我们革命工作者，为人民服务是无止境的。只要有会，就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一开始我不是那样自觉的，在没有人的角落里做，在人多的地方不好意思做。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以后，我对照自己作了检查，并带着这个问题学了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①我是一个

^① 《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1页。



共产党员，我的工作使我同人民群众接触多，就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多为人民群众做些好事。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乘火车去萝北。一路上，我除学习毛主席著作外，就帮助乘务员倒水、擦车、刷厕所。经过信阳时，遇到寒流，我看见列车长衣服穿得很少，每到一站，他还冒着六、七级北风，下车接送旅客。我就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开始，他怎么也不肯穿。我说：“你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我在车厢里问题不大。”看到列车长穿上我的棉衣走了，我心里暖和和的。

这次乘车快到鹤岗时，我在列车上看见一个妇女，带了两个孩子和五十多斤重的东西。一个孩子正出麻疹，发高烧，另一个也在生病。这个妇女在车上很发愁。我问她：“家住哪里？”她说：“鹤岗市东山矿新二街。”鹤岗车站离她家还有七、八里，两个孩子又病得厉害，怎么办呢？我立即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保证把你们送回家。”车到鹤岗后，我把她们安放在一个背风的地方，就到转运站借来一辆手推车。那个妇女把孩子放到车上，自己怎么也不肯坐，怕我推车累着。我说，抢时间治病要紧，都坐上可以走得快些，为了孩子我累点没啥。这样，她才坐上去。四月的东北，冰还未完全解冻，我怕孩子冻着，脱下棉衣给孩子盖上。路途中，这位妇女在车上不停地说：“解放军真是处处为老百姓”，“你们真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战士”。到家以后，她的丈夫，老工人孙相恕激动得两眼含着热泪，双手拉住我，说我比

他的亲兄弟还亲。这位妇女又把已经睡熟的大儿子叫起来，要他给我敬礼，叫解放军叔叔好，说长大要当解放军。两夫妇看见天晚了，还硬要拉我住在他家。我说：“不要管我，我做这点事是完全应该的，快点去给孩子看病要紧。”以后，孙相恕夫妇还写信来感谢我，说他们两个孩子的病都好了。

几年来，我从南到北跑了好几个省区，凡是有能帮助群众做些好事的机会，我都不放过。在火车上，我为乘客端饭、送水；在旅社里，我利用早晚时间扫地、倒痰盂；在食堂里，我帮助炊事员洗碗、抹桌；上公共厕所，发现脏了我就打扫；到商店买东西，别人装车卸货，我就去参加；上理发店理发，看见等候的人多，我就帮助作卫生工作，等等。我扫过福建厦门的街道，扫过江西南昌、吉安的旅社和街道，扫过湖南津市的招待所，也扫过佳木斯、哈尔滨等车站的候车室。黑龙江萝北县的一些大街小巷，工人家属住宅区，我也打扫过。

扫地，表面上看来是一件小事，但是，这样一·扫，我同群众的关系就亲近热火起来了。在萝北，衣服脏了，服务员同志偷偷给我洗；下雨了，服务员同志就托人把雨衣给我捎到工作的地方；天冷了，群众见我在井边打水洗脸，就给我端来热水；我睡在桌子上，新婚的工人就将他的被子拿来，硬要我盖；我病了，工人家属们就擀面条，包饺子，硬要我吃；工作有了困难，群众就挺身而出帮助我。我每到群众家中，他们就向我问寒问暖，烧茶端水；走到街上，也有好些



人同我拉呱问好；在招待所里，经常有一些当地的干部、工人、学生来找我；有时扫大街，身后不知不觉就跟上一群小孩，他们边扫边说：“向解放军叔叔学习！”

特别使我难忘的有这样两件事。在萝北名山，我买了一百斤铁丝，要扛到五里外的贮木场去。我扛了一里多路，累得满头大汗。这时，碰见一个不相识的工人，他见我费力，就对我说：“老宋，我的车子在前边，顺便给你捎去。”我正想问他怎么认识我，他就把铁丝扛走了。我到贮木场刚坐下，他也把铁丝送到了。原来他根本没有车子在那里，而是他自己替我扛来的。另一次，我因为工作忙，夜里十一点多才回到萝北招待所。我一进门，服务员同志就问：“宋同志，你吃饭没有？”当天我没有来得及吃晚饭，但我怕给服务员添麻烦，就说：“吃过了。”过了不久，服务员同志就拿着几个馒头送来。深更半夜，炊事员都睡了，哪来的馒头呢？第二天才知道，是服务员同志摸黑进食堂拿来的。

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

毛主席著作

几年来，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必须把学和用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父亲在旧社会受尽欺压和剥削，后来被日本鬼子活活打

死。六岁的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而死。我从小就跟着母亲要饭，十岁就给地主放猪。幼年时，我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受了多少冻和饿。这种悲惨的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家乡解放时才结束，从此，我尝到了新社会的甜。

一九四七年，我参加了解放军。在党的教育下，我不断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了所有穷苦的人，能得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都是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懂得了我们穷苦人，只有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因此，我从心眼里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以后，我就开始读一些毛主席的书，从毛主席著作中找革命道理。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发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号召，我就更加注意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著作给了我力量，使我的思想、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我愈学愈想学，一天不学就不舒服，就睡不好觉。对毛主席著作有了阶级感情，有了学习的自觉性，学习的时间等问题，也就能解决了。我在学习中做到了出差和在机关一样学，学习环境差和环境好一样学，工作忙时和不太忙时一样学。要把学习放在忙字之中，决不放在忙字之外。忙，更需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然就会忙得不对头，或者出毛病。自己给自己立规矩，找压力，任务、环境千变万变，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始终不变。



我学毛主席著作，常常是一边学一边思考工作中的问题，琢磨着怎样用毛主席思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想通了，我就放下书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又想想自己的工作哪些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哪些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工作做对了，我又请教毛主席著作，研究一下为什么做对了；工作做得不对，我也请教毛主席著作，寻找为什么做得不对的答案。经过这样反复学习，把好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积累起来，继续巩固提高；不好的，就吸取教训，避免再犯。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解决“矢”和“的”的关系问题。要有目的地去学，有目的地去用。几年来，我在工作遇到困难时，就学《愚公移山》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论述；工作中矛盾多，问题多，需要深入实际去解决时，就学《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要同群众接触了，就学《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受到表扬，就学“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论述；受到批评，就学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觉察到自己思想有不好的苗头时，就以毛主席的有关的话来对照检查自

己，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我深刻体会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对于个人思想来说，是一个兴无灭资的过程，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有了缺点，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改正不了；有了成绩，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巩固不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但有自己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而且有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我在萝北贮木场、木材厂、招待所，南昌胜利路旅社、吉安站前饭店等地方，都参加了工人同志的学习，并帮助他们做一些组织和辅导的工作。南昌胜利路旅社有一个服务员，原来不安心工作，我就帮助她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来听说她工作做得很好，还列席过南昌五好企业、六好职工代表会议。在旅途中，乘务员同志常常组织旅客们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也趁这个机会讲毛主席语录。

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仅仅是刚入了一点门。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也还存在许多缺点。今后，我决心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日 常 工 作 中 的 辩 证 法

烧火的学问

开封专署教师进修班勤杂工 王培建

去年我高中毕业，到开封专署教师进修班做勤杂工，担任烧火工作。刚去熟悉工作时，我看见老工人把煤向火里一撒，火焰带着呼啸声就着起来。我一看很简单，就满口承担下来。尽管领导对我说“如果有困难，可先学习学习”，但我毫不在意。

第二天，我便上班了。真是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缠手。有时需要大火，我偏烧不起来；有时需要小火，它偏猛烈地燃烧起来。弄得我措手不及。结果是烧糊了一锅汤，馍蒸了四十多分钟还未熟，最后还是老工人帮了我的忙。头一天就这样难堪地过去了。以后几天日子更不好过，每天早上我烧的那两个火，不是这个灭了，便是那个灭了，有时两个竟一起灭了，弄得我整天提心吊胆。这时又听到一首“赞美”我的诗：“高中生，比沙松，干啥啥不中，烧火烧不着，就是条文背的清。”这一来，更加使我垂头丧气，精神不振，好

几次都想不干了。

好在领导上下了一场及时雨，给我指出了病根，并希望我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带着为什么搞不好烧火工作的问题，重学了《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搞不好的原因，首先是没有把烧火与干革命联系起来，分配烧火就烧火，没有想到烧好火做好饭，让进修班教师吃得好，保证更好地学习，将来毕业后出色地完成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没有认识到烧火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就没有树立起克服一切困难，搞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只是带着五分钟的热度去搞，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认为不是干这工作的材料，这怎能搞好工作呢？其次，有了正确的思想，还需要掌握烧火这项工作的规律，才能烧好火。学习以后，认识提高了，我鼓起了干劲。

从此，我就细心观察，并向老工人学习。经过一段努力，终于掌握了烧火的规律。我的经验是：烧火要与菜面案联系，需要大火时，应用少量多次的方法添煤，为小火准备条件；烧小火时勤添煤，不教它完全燃烧，等要大火时，用通条一捅，就会猛烈燃烧起来；晚上封火前先把煤渣掏出来，封时把煤均匀盖上一层，把火下面的水池填满水防止



漏气，第二天早上就不会灭了。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火烧得大小都能掌握了，我又发现我管的两个火中，有一个添进煤后，忽的一下就有很多煤被吹出来，不但浪费煤，而且烧不旺。我很奇怪，为什么用同样的煤加同样的水，在一个煤火里燃烧得很好，而在另一个煤火里却不行呢？我就天天细心观察，可是很长时间还没有解决，使我很着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一次学习了《反对本本主义》。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①这对我启发很大。前一段观察只在表面上打转转，没有深入事物内部，没有调查其历史。后来我就向老工人请教，才知道那个有很多煤被吹出来的煤火的鼓风机功率大，吹出的风“毒”，建灶时火肚子又浅。病根找到了，我向煤中多加了一些水，使煤粘在一起成为较大的颗粒，添煤时量多些，均匀些，这样煤就吹不出来了。

煤的性能不同，烧法也要不同。我们伙房旁边有一大堆煤，一到下雨到处流的是黑水，结果浪费了煤，又不卫生。有一次问事务长：“伙房旁那一堆煤为什么不烧？”他说：这是“李封”煤，烧起来很费劲，不好着，还易结成大块，掏火很不容易，不如烟煤烧起来省劲，着得旺，因此从前都不喜欢烧这种煤。我想研究一下怎样把这煤利用起

来，找了一个老年人问了问，才知道“李封”煤爆发性不好，但耐燃性很好，烟煤爆发性好，耐力却差些。知道它们的性能后，我就试验把它们掺在一起用，效果很好。这样，也为国家节约了一笔财富。

我在中学时学过一些辩证法，由于没有应用于实践，结果只会背点概念。现在把它用于实践有些效果，尝到了甜头，更增强了学习的劲头。但这只是初步应用，还差得很远，我今后要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工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行”和“不行”

解放军某部一连文书 黄玉明

我们干工作，常常有个“行”和“不行”的问题。

记得，我刚从班调到连部当文书，感到样样事情都很生疏，加上连部工作要求高，自己文化水平低，就产生了一种想法：“不行，我干不了这文书工作！”开始时，领导叫我写一份材料，我把劲全使出来，费了很大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27—28页。



气，结果还是出了个“废品”。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头发胀，脸发红，晚上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得搞文书工作实在不行。这时，连首长及时对我进行了鼓励和教育，用毛主席的话开导我，使我懂得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做工作，不能等学会了再干，而是要在干的当中去学。这样，我的脑子一下开了窍，心里也亮堂了。以后，我就按照毛主席的话，鼓起勇气干。

在工作中，我时时向同志们学习，向老文书同志请教，怎样写报告，写材料，怎样保管和登记文件；到别的连里去取经，听他们讲工作经验，观察他们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从大量的材料中抓观点；自己写材料，写报告时，事先请教他们，写好后请他们修改，然后再比较自己怎样写的，人家怎样改的，对在哪里，错在哪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工作不像刚开始那样没头没脑了，慢慢地进入下文书“行”的境地。

这时候，我想：现在基本上掌握了文书工作的规律，摸索了一些工作方法，同现在刚当上文书的新手比，我也算是个老手了。由于产生了自满情绪，结果又碰了一些钉子，给工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对自己作了分析，才懂得，当工作有了进步，觉得“行”了的时候，还应该看到自己“不行”的地方。用低标准衡量，算是“行”了，要按高标准要求，就“不行”了；跟新手比

“行”了，跟老手比就“不行”了；做经历过的工作“行”了，做没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又“不行”了。开始由于我没有一分为二地看待“行”和“不行”，满足于有点“行”了，原地踏步不前，结果“行”又转化为“不行”了。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文书工作是这样，干其他工作也是这样。当你刚刚接触它，还不入路，觉得“不行”的时候，就要有革命的勇气，有革命的胆量，在实践中学习锻炼，掌握事物的规律性，力争从“不行”转化为“行”。在“行”了的时候，又要全面看待自己，认识到还有“不行”的地方，防止停滞不前，转化为“不行”。总之，只有一分为二地认识问题，积极工作，才能不自馁，不自满，少走弯路，不断前进，我们的工作就越干越“自由”，越干越有成效。

“单枪匹马”和“一马当先”

武昌水果湖中学高二班学生 姜大洪

过去，我在工作中曾犯过“单枪匹马”的毛病。那时候，班上要出黑板报，学校要写标语、画刊头和漫画，我就一个人全部或大部包下来，绞尽脑汁，埋头苦干。可是效果并不好。同学们说我出的黑板报老是那些旧



框框，画的刊头老是一个人头、几个字。不生动，不活泼，没有几个人看。自己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宣传工作却搞得不好。问题在哪里呢？

我到毛主席著作里去寻求答案。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我们：遇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毛主席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①“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②。毛主席的这些话，好像是直接对我说的，简直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我不正是在做宣传工作中个人“空忙”一阵而效果不好吗？不正是个人逞英雄而实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吗？毛主席的话告诉我们，做工作必须发动群众。因为智慧从群众中来，力量从群众中来。

但是，我也遇到这样的学生干部，他没有“单枪匹马”，上面布置下工作来，他就命令主义地全部分配到下面去。而后自己就东瞧瞧，西望望，或则袖手旁观，或则指手划脚，等待着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样做的结果，任务也完成不好，并且还越来越脱离群众了。问题又在哪里呢？

还是请教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说：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③。这就是说，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和广大群众结合成一体，和他们一起战斗，和他们同甘苦，带领他们去冲锋陷阵。这样的

干部，他不是走在“群马”之后挥舞鞭子的“牧马人”，而是飞奔在“群马”之前的奋勇当先之“马”；这样的干部，他不是高踞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而是溶身于群众之中的普通一兵。这样的干部，他最能了解群众的要求和困难，最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样的干部也最能发动群众，做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圆满地完成工作任务。

上述两种状况，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从形式上看，好像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和做法，但从实质上看，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脱离群众的，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因而也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搞工作，必须既要反对“单枪匹马”，更要做到“一马当先”。反对“单枪匹马”，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倡“一马当先”，就是要带动群众，做到“万马奔腾”。

经一事，长一智。这一学期，我在切忌“单枪匹马”，争取“一马当先”方面，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得比以前好了，能够较快、较好地完成宣传任务，真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用就灵。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0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9页。



交通指挥，力争主动

长春市公安局交通三中队民警 刘 杰

做任何工作，都要力争主动，交通指挥也是一样。只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查 研究，努力熟悉和掌握各种车辆行驶的特性，不盲干，就能摆脱“堵车”的被动局面，使车辆畅行无阻。

过去，我在交通岗上指挥车辆，不能得心应手，经常出现“堵车”现象，有时弄得手忙脚乱，指挥错了，险些发生撞车事故。学习《实践论》时，看到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①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认识到，交通指挥工作中所以出现“堵车”现象，主要是自己对于车辆行驶的特性还没有摸透，不能按客观规律进行指挥。以后，我就注意摸索各种车辆行驶的特性，以便根据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来指挥。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我发现轿车喇叭响得欢的时候，可能是任务急，遇到这种情况，就尽快放行。卡车嗡嗡响，速度慢的时候，必是载重量大，这种车，起车、刹车既

困难又费油，也要尽快放过。速度较慢，车箱很响，是没载货的空车，可以慢放缓行。有的车行车不稳，很急，一般说来这是司机精神不够集中，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及时喊话宣传。同时，在指挥车辆时，还注意放第一个车迎第二个车，放车之前看前后，打起信号看左右，先放行车后放停车，及时排除交通障碍。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堵车”现象，工作由被动变得主动了。

但是，主动和被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指挥车辆的主动权不是绝对稳固的。在交通指挥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例如：在放行汽车时，可能出现骑自行车的人和汽车争道抢先，行人斜穿马路，儿童慌忙奔跑等。对于这些情况，如果注意不够，照顾不周，不仅会造成工作被动，而且还会发生事故。

过去，我总觉得这种现象很难避免，只好被动。后来经过一段了解，我认识到情况尽管复杂，归根到底，一方面是有些人忽视交通规则和马路上千变万化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作为交警没有常备不懈、防备万一的精神准备。

解决的办法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一些单位讲解安全常识，进行安全教育。在岗位指挥时，思想集中，常备不懈，并勤宣传，勤纠正。这样，在交通指挥上就更主动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页。



简单一些好，还是复杂一些好？

——从液压操纵箱的改革谈简单和复杂的辩证法

徐承德 顾舒

简单和复杂，是一对矛盾。在技术革新中，这一对矛盾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例如，一部机器，究竟是简单一些好，还是复杂一些好？机器的发展是愈来愈复杂，还是愈来愈简单？在改进机床设计的时候，怎样处理简单和复杂的关系？我们想，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研究这些问题，对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上海机床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液压操纵箱的改革，在处理简单和复杂这对矛盾方面，对我们很有启发。经过长期的努力，多次的改革，他们使液压操纵箱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在革新操纵箱的过程中，他们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解决了许多矛盾，其中也包括操纵箱结构上的简单和复杂的矛盾。

一般地说来，就机床而言，它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是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加工对象在性能上、尺寸上的要求越来越高。原始的简单的车床，一般是不能用来加工精密机器的零件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就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复杂一定要比简单好，愈复杂愈好呢？上海机床厂的职工革新操纵箱的过程，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液压操纵箱是磨床的心脏，它的性能怎样，对磨床能否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关系极大。可是，原来上海机床厂用的磨床上的液压操纵箱，在没有革新以前，结构是相当复杂的。一台磨床上操纵箱有两个，一个是控制磨床工作台往复运动的，叫做操纵箱；一个是控制磨头（即砂轮）进给运动的，叫做进给箱。工人加工制造时劳动强度高，材料消耗也大，还不能保证产品质量。能不能把它改革得轻巧、灵便和简单一些呢？

工人认为，这虽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经过努力可以做到。他们认为操纵箱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零件太多。因此，他们主张先从控制磨床工作台往复运动的操纵箱的零件上开刀。这个箱一共有四个阀，即“开停阀”、“节流阀”、“换向阀”和“先导阀”。这四个阀看起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它的作用，动不得。可是，工人们从自己的生产实践经验出发，又研究了收音机上的一个开关。他们想，收音机上的开关，不是既能起开停的作用，又能调节音量吗？根据这个原理，操纵箱上的“开停阀”和“节流阀”能否也合并在一起呢？如果这样一改，“牵一发，



动全身”，不单是省掉了一个阀，并且还省掉了许多零件，整个箱体的结构也会改得轻巧些。

他们经过试验，“开停阀”和“节流阀”果然合并在一起了，操纵箱的结构比原来简单多了，体积缩小了，重量减轻了，生产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告诉我们：本来看来动不得的复杂机床，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是可以变得简单的；而且，操纵这种比原来简单得多的机床，却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可见，那种认为机床愈复杂愈好的看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开停阀”和“节流阀”的合并成功，给工人们很大鼓舞。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换向阀”跟“先导阀”也合并在一起呢？如果把这两个阀也合并在一起，那末，原来的四个阀，就变成两个阀了。而且，他们在试验中又发现，把这两个阀合并在一起，还必须把这个合并的阀套在已合并的“开停节流阀”上去，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四个阀并成一个阀，操纵箱的结构更要简单得多。但是，经过试验，试制出来的操纵箱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合一”的阀，本身的构造太复杂，许多管路的油都要流经这一个阀，造成压力不平衡，操纵起来非常笨重，根本不能用。这次改革没有成功。但他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说，简单一些好，还是复杂一些好，要看具体条件，要看是否能促进生产多快好省地发展。如果离开了具体分析，以为任何复杂的东西，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变成简单的东西，这同样是不正

确的。

把阀再合并看来已搞不下去了，工人们就动了合并两个箱子的念头，主张把操纵箱同进给箱合并在一起。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行得通，因为操纵箱和进给箱的确有很多零件、管路是可以合并的。这样，不单是省掉了一个进给箱，节省材料和工时，还可以提高操纵箱的性能。因为，原来分开的两个箱合并在一起，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块，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就如同两个化学元素化合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和新的性能一样。这就是说，复杂变简单，决不只是砍掉一些零件，而是要在摸清复杂原因的基础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改变部分零件乃至整体的结构，提高它们的性能。当然，合并后的一个箱，在构造上要比原来每一个单独的箱复杂，因而工人操作时碰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再一次改革操纵箱的结构。就这样，经过多次的改革，操纵箱由原来的结构复杂、笨重，变得越来越轻巧灵便了。

这个操纵箱的安装布局由复杂变成简单的革新过程，明确地告诉我们：整个箱体的简单是由局部零件的复杂换来的。把两个阀合并成一个阀，把两个箱合并成一个箱，这一个阀或箱的构造当然也就要复杂些。但这个局部的“复杂”，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复杂。这就是说，从局部看，是复杂了，但这复杂里面包含着整体的简单；从整体看，是大大简单了，这简单却是更高一级的简单，其中包含着局部的复杂。整体的简单是我们的目



的，而局部的复杂是达到整体的简单的手段。如果人们不懂得正确处理整体和局部之间的简单和复杂的关系，以为什么都是越简单越好，要求整体和局部都要同时简单，操纵箱的结构革新就难以成功。因为把两个零件合并成一个，使这一个零件起原来两个零件的作用，在结构上就不能不复杂些。当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以后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个合并后的零件，也不是没有简化一些的可能。

那么，同样是用局部的复杂换来整体的简单，为什么两个箱子的合并成功了，而“换向阀”和“先导阀”的合并却失败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局部的复杂也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事物总是在一定

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的。超过了这个一定限度，局部的复杂就不能带来整体的简单，相反地会使整体不能使用。

可见，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中，正确认识和处理简单与复杂的关系，一定要破除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我们一方面不能把机床看得愈复杂愈好，不敢进行由复杂到简单的革新；另一方面，也不能以为愈简单愈好，不顾具体条件盲目开刀。只有对各种机床的具体条件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它们影响生产发展的复杂情况，对症下药，才能自觉地运用简单和复杂的辩证法，力争做到使机床结构小一点、轻一点、简一点、精一点，达到又巧又省的目的。

（原载《解放日报》1966年3月10日）

讀者
來信

坚决突出政治 反对折中主义

编辑同志：

我有一个情况，反映给你们，并希望组织力量在刊物上讨论。这个情况的概略是：

我在医院养病，一个兄弟厂的工人同志来看我，对我说他们厂党委正组织全厂职工辩论政治和生产技术的关系。我说厂党委有远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又说，他们车间也在开展

辩论。我问辩论的结果怎么样。他说：“结果使我很不服气。本来我们大多数工人，都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生产技术工作是第二位的东西，应当服从政治。只有少数人同我们的意见相反。可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即政治指导员。以下括号里的话都是我加的）在总结时各打五十大板，说：‘你们都有片面性，都不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言



下之意，他会一分为二，请看他是个怎么分法。）政治和生产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说得多好听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就是强调辩证法吗！）政治要为生产服务，生产也要为政治服务，两者是辩证的统一，要相互服务，过分强调那一方面，都是片面的。（很可惜，这话一点也不新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批判过这个观点。）”

同这位工人同志谈话结束时，我冒昧地说，你们的观点是对的，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那位支部书记同志的观点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折中主义观点，是机会主义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应当用毛主席的思想同他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帮助他改正错误，改造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让他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员。说完之后，我又把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和一些领导同志的文章，拿给他看。他看了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后，又高兴，又恼火。高兴的是自己明白了真理，恼火的是支部书记发表错误观点。他说回去后要 and 支部书记辩论。辩论得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反正我想这个问题是完全应当辩论的，而且大有辩头。

在突出政治上抱有折中主义观点的人，是不是就这一位支部书记呢？现实生活告诉我们，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多，但远不止一个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工业战线上有，农业战线上也有，可以说到处都有，只是数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他们的错误看法，也不止那位支部书记同志说的那些。诸如：“完成生产任务好，可以一俊遮百丑，可以带动

其他工作”，“生产和政治同等重要，应当在不同时期，轮流侧重”，“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政治，两者并重，不可偏废”，等等。事实证明，这些形形色色的折中主义观点，是突出政治的障碍，必须坚决反对。

有折中主义观点的人，总是打着唯物辩证法的旗帜，来贩卖折中主义的货色。他们一谈论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以及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时，总是空洞的、抽象的“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但是，而且”等等一大堆诡辩论。这一套东西，乍看上去，似乎像辩证法，好像有道理。其实，仔细一琢磨，是地地道道的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因为他们不叫人们知道那个是主要的，那个是次要的，那个是第一位的，那个是第二位的，那个是起主导作用的，那个是处于从属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他们是把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以及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看成是半斤对八两，看成是等同的、均衡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唯物辩证法。

有折中主义观点的人，在突出政治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手法。他们以唯物辩证法之名，行折中主义之实，打着突出政治的旗号，干着反对突出政治的事。他们总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心不一，言行不一。他们这种做法，可以暂时或较长时间地蒙蔽一些觉悟不高、嗅觉不灵的人，可能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折中主义者用唯物辩证法来伪装自己，



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唯物辩证法在我们的时代有着崇高的威望，如果他们不披上唯物辩证法的外衣，就会找不到推销折中主义的市场。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不给他们留市场和地盘。只有这样，才能扫除突出政治的障碍，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以便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地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目前，各级党的组织，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讨论突出政治的问题，都在开展一场要不要突出政治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以及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问题。这个辩论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这个辩论，是兴无灭资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不能低估这个辩论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

在这个辩论中，一些人的不要政治，忽视政治，排挤政治，贬低政治，“经济第一”，“技术决定一切”，“生产任务是重中之重，硬中之硬”等资产阶级观点，已经或正在遭到

严肃的批判。现在可以说，这些错误观点已经很少有市场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有的人拿出折中主义来为那些错误观点辩护，这肯定是徒劳的。既然有折中主义观点，我们就应当辩论一下。我希望各级党的刊物、报纸，都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辩论很好，而且好得很。它就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讲堂一样，可以叫全国人民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课。经过这个辩论，必将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有力地批判和粉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想。从而，使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更新的变化，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

坚决突出政治，反对折中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哈尔滨市国营东安机械厂
政治部干事、共产党员

倪志荣

三月二日

启 事

本刊今年第一季度共出版四期，第一季度的订户，不另加费。第二季度的《红旗》，从第五期开始发给订户。



红旗

H O N G Q I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一九六六年

5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

目 录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任重（1）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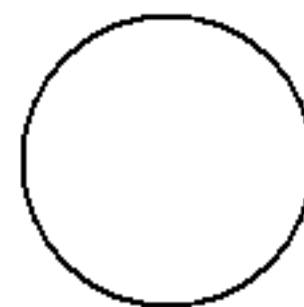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关锋 林杰（15）

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郑季翘（34）

工农兵诗选（四首） （53）

☆ 四月五日出版 ☆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 任 重

同志们:

这次省委召开各县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重点是讨论如何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统帅技术这个问题,讨论怎样突出政治,怎样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同志们批评省委过去对这方面抓得不够,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各县委的同志检查,说过去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好,那么,责任首先在省委。省委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可以摆一百条、一千条,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突出政治不够。这一条必须坚决改,快改。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要努力克服这个缺点、错误。省委已就突出政治的问题发了指示,把突出政治、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我们全年领导工作的第一位。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过去就是没有突出政治,根本就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说突出政治不够,政治挂帅不够。同志们在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时候,以从严的精神要求自己,严肃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中有成绩,就原谅自己,忽视我们的缺点、错误,特别是这样重要的缺点、错误。可是,反过来说,也不能夸大。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全面地总结我们的工作。

对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还有不少同志不那么清楚,位置没有摆正,有折中主义以及其他的错误思想。有些同志总是就生产论生产,总是对生产进度、积肥数字等非常感兴趣,而对阶级斗争,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兴趣就不很高。就生产论生产,只看禾苗好坏,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这实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同志是在搞折中主义、实用主义、修正主义。就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来说,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认识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我个人在内,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够好,政治思想水平不够高,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多一些,辩证法少一些。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盲目性,嗅觉不灵。因此,我们要力求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

现在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讲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一切

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政治要统帅一切，而不是别的统帅一切。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一个任意的政策，或随便提出的口号。什么是政治？毛主席给政治下的定义是：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政治。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从来就是抓阶级斗争的，从来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一切、统帅一切的。全国解放以前，我们党领导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这当然是政治。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搞土地改革，搞镇压反革命，搞三反、五反，这都是革命，都是政治。从没收官僚资本到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由共产党领导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进行的。这次革命运动，不仅改变了所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也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并且在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系列的革命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下进行的。

一九五八年开始大跃进。那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同志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又要红又专。红就是政治好，专就是业务好。毛主席提出要学点业务，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同时又提出不要因为要学点业务，学点技术，就忽视政治，忽视思想工作，变成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要求我们的干部又红又专，以红带专。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①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毛主席还一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忘记了它，忽视了它，是不是就会风平浪静没有斗争了呢？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忽视或忘记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77页。



就会向我们猖狂进攻，阶级敌人就会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腐蚀、侵袭、瓦解我们的党，同时对工人、农民也进行腐蚀和分化瓦解，那就会像毛主席所说的：“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毛主席在他的著作、讲话中无数次地讲过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又讲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现在已经搞了三年了，今后还要继续搞。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直搞到三个差别消灭、共产主义实现为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搞阶级斗争，这就是政治，就是政治挂帅。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仍然是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巨大的贡献。我们突出政治，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保证建成社会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如果不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修正主义就要当权，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中国就要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状况。所以，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胜利地完成，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唯一的保证就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加以彻底解决。

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都经过实践，这都是你们亲身经历过的事，请你们回想一下，是不是每当我们抓革命、抓政治挂帅抓得好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就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凡是不抓政治、不抓革命或者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就搞不好，其他各项工作也搞不好。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在一九五七年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抓两条道路的斗争，搞大鸣大放、大辩论，整风整党的基础上出现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正如毛主席在《送瘟神》那首诗中所形容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一九五八年工作中有没有问题呢？也有。由于我们脑子发热，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讲过：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劳逸结合，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搞强迫命令，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犯错误，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认真地、老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真正的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工作中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政治挂帅不够，挂得不好，决不是政治挂帅挂多了。

^①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第13期《红旗》。



挂坏的。

我们政治挂帅挂得不好，或者说没有挂起来，最主要的还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这两年。我们这个时期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起了好的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会议讨论中，有些人好像认为党的这些政策又可以不要了，这是十分错误的。问题是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们只顾了抓具体政策，抓生产，抓生活，忽视了阶级斗争，忽视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乘机向我们猖狂进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党内，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腐蚀侵袭。那两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抓住阶级斗争，没有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当然，我们口头上也讲过要政治挂帅，要抓阶级斗争。讲是一回事，有没有认真抓是另一回事。我们那时讲过三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阶级路线，坚持技术改革。但是，你那样讲了，并不等于你就没有责任了。你说要三个坚持，怎样坚持呢？反对什么东西呢？没有调查，没有下去蹲点，因此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到，总以为问题不严重。一九六二年秋季，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对毛主席的教导体会不深刻，说我们湖北省问题不严重。经过这几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湖北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有，并且在一部分地区还相当严重。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仍然要政治挂帅，仍然要抓住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不断革命。

从一九六二年冬天起，我们强调了抓阶级斗争。不过一九六三年抓得不大好，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也抓得不大好，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才抓得比较好一些。但阶级斗争到底严重不严重，这个问题还不能说都已经有了统一的认识。日前就许多同志来说，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这还是主要的。毛主席讲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省一九六二年是增产的，也算是丰收的；可是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这三年是我们解放以来生产发展最快的。这样的增产，在座的同志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呢？这还不是因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抓革命，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有这样的结果呢？我看决不可能。

回想历史上，一九五三年我们省的农业生产也有过较快的发展。那一年生产为什么好？还不是因为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搞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搞了三反、五反。一九五四年大水灾。一九五五年情况不好，无非是右倾思想作怪。一九五五年冬天，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抓了农业合作化，反对“小脚女人”，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



条，搞十二年规划，大抓技术改革，又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实践经验证明，毛主席所讲的：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说过去我们犯过错误，走过一些弯路，碰过一些钉子，认识不够，还有许多盲目性，现在，就要通过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我们亲身的体会，来认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真理：必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用政治来统帅一切。

怎样用政治来统帅一切工作

有的同志提出，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用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统帅技术，道理是懂了，但到底怎么做，感到没有办法。提出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弄清政治统帅一切的道理，是真懂而不是假懂。只要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具体做法就会在实践当中产生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不少这方面的好经验。不论军队或地方，都有很多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特别是最近报上介绍了河南兰考县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领导群众艰苦奋斗，改变兰考的面貌，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听说大家学习他的事迹时很感动，对照他来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感到自己很不够。这很好，要有这种精神。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党学解放军，学什么呢？就是要学解放军怎么突出政治，做政治思想工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放军有无数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活的好榜样，我们要学；地方上工业有大庆，农业有大寨，我们也要认真学。怎么学大庆，怎么学大寨，学它的什么？李雪峰同志对我讲过，大寨的经验归纳起来用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由于有大寨式的党支部，有大寨式的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农民），因此才创造了大寨式的先进单位。有的同志在讨论中往往把政治与生产对立起来，好像抓了政治工作，就会放松生产，把政治工作抓好了，生产反而会搞坏。这样看问题是片面的，是形而上学。政治与生产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挂帅挂得好，精神就会变物质，生产就会好，而不是相反。我不相信有哪个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很坏，而集体生产会搞得很好。相反，如果说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很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很高，干劲很大，但生产却搞得很坏，我也不相信。你们那个相信有这样的怪事，请拿出一个典型材料来！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到底怎么提法，就农村工作来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三大革命一齐抓。在国家统一计划、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寨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齐抓起来。这样提、这样做行不行？请同志们考虑。



有些同志争论：到底政治是目的，还是生产是目的？如果说生产是目的，政治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政治是手段，生产是目的，因而政治是为生产服务的。也有的同志说，政治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一般来讲，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把它简化成政治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是目的，政治是手段，那就是错误的。“为生产服务”，为的什么“生产”？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支援世界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我们政治挂帅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经济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总而言之，不仅要把我们一国建设好，而且还要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有的同志提出人与物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军队的同志懂得最清楚。毛主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去年林彪同志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十分透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的道理。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由美国人出武器、出钱、出顾问团指挥的飞机加大炮。我们军队少，装备差，却打败了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是革命的人民、革命的军队，政治思想第一，人的因素第一，进行的是革命战争，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越南南方还不是这样？还不是装备差的人民军队、游击队，打败了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南越反动派？古今中外，一切革命战争，无不证实人的因素第一这个普遍真理。当然，打仗也不否定物的因素的作用，如武器、弹药等，但人和物比较起来，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打仗靠人，难道搞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人的因素第一吗？我们在生产中也并不否定物的因素，没有土地、种子、肥料、耕牛、农具，没有必要的生产资料，怎么能生产呢？但是，要知道，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构成的。生产力本身是人与物的对立的统一，而人的因素是最生动、最积极的因素。在剥削制度下面，劳动者不仅是剥削者的奴隶，同时是生产资料的奴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或破坏。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劳动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普遍真理。同志们都知道不少这样的事例：同样的土地、农具、气候条件，可是，生产的结果却往往大不相同。有的皮棉亩产两百多斤，有的只产几十斤，这不是人的因素第一是什么呢？大庆和大寨的客观条件并不好，可是他们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这不是人的因素第一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政治工作，强调做人的思想工作呢？就是为了要教育农民为革命种田，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种田，为支援世界革命种田，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用社会主义思想，用革命到底的思想来教育农民，向资本主



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

干劲怎么鼓法？我们就靠做政治思想工作，再加上关心人民生活，靠这两条来鼓人民的干劲。这两条中那一条更重要呢？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农民为革命种田的觉悟这一条是主要的，应当摆在首位，这就叫政治挂帅。同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毛主席讲的：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按劳分配。在这里，我们和修正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总是讲物质刺激，讲金钱挂帅，根本不讲革命，不讲政治。如果说讲政治，那也是讲修正主义的政治。其结果是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瓦解，向资本主义倒退。有的同志说，既然讲政治挂帅，好像评工记分、生产队核算、改善人民生活都可以不要了，这是误解，是错误的。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干什么？生产还有一个目的嘛！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那里呢？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使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机器的主人。他们是为自己生产，又是为集体生产，为国家生产，为支援世界革命生产。我们党的方针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分配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只有正确执行这些政策，才能使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更加清楚地看到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才能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对立的统一，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千万不可片面理解。

劲可鼓而不可泄。问题是鼓什么样的干劲。要鼓正确的干劲，不能鼓错误的干劲，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鼓干劲，要善于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当然，没有革命热情，满足现状、甘居中游或者落后自满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求实精神的。焦裕禄同志满腔革命热情地来探求兰考县的实际，看兰考县的“三害”是怎么造成的，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正确的措施，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向“三害”作斗争，努力改变兰考的面貌。我们像焦裕禄同志这样做，就是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不这样做，就可能是个人主义挂帅。一个党有一个什么挂帅的问题，一个人也有什么挂帅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我们一个党、一个领导机关、一个人，不受这种思想支配，就要受那种思想支配。这回大家不是也对比了吗？我们湖北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县、区、公社、大队，也有一批比较落后的县、区、公社、大队。事物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三种状态，这是必然的。但我们要做工作，总要不断地改变它，要使先进的更先进，使中间的向先进看齐，使落后的改变面貌，赶上去。为什么有些地区先进，为什么有些地区老落后？同志们可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我看，是不是政治挂了帅，挂得好不好，搞没搞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条主要原因。凡是那些落后的地区，多半是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的地方，再就是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缺乏



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省委一九五九年提出“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的口号，强调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后来，我们在有些地方改得不适当，犯了一些错误。所以，一九六〇年省委总结经验教训时加了一句：“乱改就减产”。这样就全面了。实践证明：凡是正确地认识了大跃进中的成绩和错误，正确地接受了经验教训，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真正按照这四句话去做的，这几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就很快；凡是不这样搞，怕字当头，稳字当脚，不敢改革，甚至把改得对的也放弃了，良种也不要了，条播也不搞了，水利也不办了，这样的地方就进步很小，或者没有进步，甚至倒退。当然，对落后地区我们省委有责任，帮助不够。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着急，也不要泄气。要振作起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要按毛主席指示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扎扎实实地搞上去。

省委再三讲，省、地、县各级党委，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突出政治，狠抓政治思想工作，少抓生产中的具体事情。生产环节，分机器、分化肥，要交给业务部门去搞。我特别强调了，对于那些生产进度、积肥数字等等，希望你们这一辈子都不要感兴趣。有些同志对我这个说法误会了，说：你这一讲，我们县委就不要抓生产了。谁说县委不要抓生产呢？不是说要又红又专，要学点业务，学点科学吗？我们领导农业生产，就要学点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我那样讲，是要我们党委的负责同志多抓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少抓一些日常的生产、业务、技术等工作，少搞一些事务主义，而不是说要县委不要抓生产，不领导生产。我们要三大革命一齐抓，县委怎么能不抓生产呢？焦裕禄同志不是抓了生产吗？要像他那样抓生产中的大问题，不是抓小问题。县委书记不要代替“生产队长”。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搞生产，又搞科学实验。今后我们办点、蹲点，一律要这样做。

党委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抓些什么呢？我看讲多了也抓不了，就是抓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五个不可忘记，即：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党委今年抓，明年抓，永远要抓住这五个不可忘记，这就做到政治挂帅了。党委经常抓这五个方面的工作，讨论这五个方面的工作，检查这五个方面的工作。我看只要这五个方面抓好了，就能调动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保险生产一定搞得很好。这五个方面抓不好，就是天天讨论生产问题，生产也搞不好。

具体到下边怎么抓法，过去做得不够好，你们作检讨，我们也要作检讨。今后下去检查工作，发现哪个队生产搞得不好，是落后队，首先就要问生产为什么没有搞好？要向党支部作调查，向贫农、下中农作调查，看看这个地区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子，干部、党员的思想作风是什么样子，贫农、下中农有什么生活问题、思想问题。从这些方面着眼去找生产落后的



原因，而不是就生产论生产。首先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或者领导是否关心群众生活上去找原因，还要从政策上找原因，看政策上有哪些规定妨碍了群众的积极性。找到原因，加以解决，生产落后的面貌就可以改变。至于说还有没有生产上、技术上的问题？也会有的，一般来讲，这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只要把上面这五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让干部、群众去讨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脱离了干部、贫农、下中农的思想问题，就生产论生产，不抓活思想，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不关心贫农、下中农的生活疾苦，即使是发现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生产技术上同样存在着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只有通过说服、讨论、试验，把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解决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会议上讨论了“五好”和比学赶帮超的问题。要广泛开展这个运动，搞个开门红，又要红到底！口号是不是可以这样提：“五好为目标，比学赶帮超”。开展这个运动，一帮一，一对红，一面红旗带一片，百面红旗带全县。先进单位对比较落后的单位要帮，你赶我，我帮你，希望你超过我。比什么，学什么，赶什么，帮什么，超什么，都以五好为目标。谁先进，谁落后，都以五好为标准。五好当中政治思想好是第一个条件。不要把增产多少或单产高低，作为第一条。这样搞，就把政治思想工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一齐抓起来了，而不是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把一个一个问题孤立起来。

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现在世界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时期，革命就得到发展，走向胜利；凡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挂帅的时期，革命就遭受挫折，遭到失败。解放十几年来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真理。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项工作，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好的，工作就好；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差的，工作就差；凡是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就必然走上邪路。所谓政治挂帅，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要把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等联系起来看。这些都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空喊政治挂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国内进行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世界革命问题的指南。应当怎样看国内的问题，看世界的问题，认识国际形势？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进行分析和判断，不然就不会有正确的



认识。现在世界上阶级关系、阶级力量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正在搞反华大合唱。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表面强大，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实际上非常虚弱，都是垂死的东西。要记住：敌人反对我们、骂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越骂得凶，越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革命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修正主义分子不骂我们，奉承我们，叫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同他们差不多，成为修正主义或者半修正主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越骂我们，就越暴露他们自己。他们的人民会想一想，为什么要骂中国，中国是好是坏？可以提高人民的觉悟。现在美帝国主义把全球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矛头对准我们。好，这就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革命了，而且反对别人革命，做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一心想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我看这也是做梦。帝国主义内部还有矛盾，它同现代修正主义就能合作得好？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乱子，都不要惊慌。要相信人民。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他们有的已经起来斗争，有的迟早要起来斗争。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迟早要灭亡，他们的寿命是不会很长的。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客观形势的发展，还将再三证明是对的。当然，世界革命也和我们中国革命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会遭到一些挫折，甚至严重的挫折。但是，最后总是要胜利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社会发展规律。不坚定地相信这个真理，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学？怎么用？就是林彪同志讲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有些同志讲，不知道带什么问题学，学了也不会用。我个人是不是就会了呢？不能这样讲。是不是完全不会？也不是。究竟带着什么问题学？学了怎么用？用它干什么？根据我个人的见解，归纳起来，是要带着两方面的问题学，在两方面用。即：带着思想上的问题学，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学；用来改造思想，用来改进工作。改造思想，不仅是改造别人的思想，而且首要的是要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打铁先要本身硬”。光改造别人的思想，不首先改造自己的思想，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那样的思想工作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脑子里经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人要每天洗脸、扫地、打扫灰尘。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情。帝国主义分子诬蔑我们改造思想是“洗脑筋”。洗脑筋有什么不好？思想上有脏东西，就要把它洗掉，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洗掉。坏思想不去，好思想不来，这也是对立的统一，不破不立。

改造思想，改什么？就是毛主席讲的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资产阶级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方法论也是世界观，分开讲，也可以，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要教育我们所有的干部、党员，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具备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或者叫宇宙观。世界观问题是根本问题，是立场、观点问题。每个同志都要懂得，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都要兴无灭资，要经常注意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要帮助别的同志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让这两种思想“和平共处”。毛主席讲，没有党内斗争，我们党的生命就会完结。一个人的思想没有斗争，就等于思想停止了，死亡了。不前进就会后退，不是逐步走向彻底无产阶级化，就会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成资产阶级化。“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的思想变化就是如此。

什么叫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所谓无产阶级思想，就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无非是放大的个人主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兴无灭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想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方法论的问题就不重要了，或者方法论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在实际工作中，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动机好，方法不对，还是达不到目的。毛主席强调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就是鉴于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多了，辩证法少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就会出现烦琐哲学。一个案子写多少万字的材料，统计表报搞那么多。有的同志提出“会议多、文件多、表报多”。我们接受批评，我们省委要改，你们也要顶，不该填的表报一律不填。有的人不发表格，发调查提纲，结果比统计表还复杂，你们也不填就是了。对于“五多”，要采取各种办法抵制。

要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就要学习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特别要学好《矛盾论》。不是提倡唯物辩证法吗？《矛盾论》是写辩证法写得最好、最全面、最系统的一篇文章。真正把《矛盾论》读通了，就真懂了辩证法；多懂一些《矛盾论》，就多懂得一些辩证法；不懂《矛盾论》，就不懂辩证法。

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我提议同志们很好地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三篇文章。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也要好好学习。特别是省、地、县三级党委，要通过学习，检查工作，改进领导，一定要有具体措施，要有实效。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也是各级党委的根本工作方法。



总之，要带着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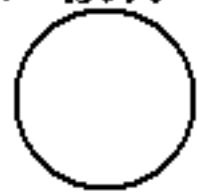
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学，怎么学？举个例子来讲。

毛主席一再强调两点论、两分法、一分为二。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同志们看事看人是否都学会了两分法？讲成绩就忘掉缺点、错误，讲到缺点、错误又看不到成绩；讲到困难看不到光明，讲到光明又看不到困难，这就不是两分法，而是形而上学。我们过去犯过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今后也还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犯了就要马上纠正。难道这也很难吗？贫农、下中农对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都会用两分法来分析，政治水平相当高。相反，我们有些工作人员，同贫农、下中农比起来，政治水平却不如他们，对问题看不清楚，又自以为是，不肯听取群众意见。这就不能不犯错误，碰钉子。因此我们要提高自觉性，努力学会用两分法去看人看事，力求减少盲目性、片面性。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工农兵学习。无疑，我们党、我们的领导干部，有责任向工农兵进行教育，向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而为了做他们的工作，首先就要向他们学习。现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都在学毛主席著作，有些积极分子学得很好，用得很好，写的文章也很好，那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写不出来的。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不要迷信教授，不要迷信伟人、作家、哲学家，有些所谓出名的“哲学家”，往往不懂哲学，是假哲学家。毛主席提倡哲学要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毛主席讲，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挑大粪的有真理，我们就跟挑大粪的走。北京市的挑粪工人时传祥同志，不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吗！我们要老老实实向工农兵学习。我参观过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的展览会，受到了教育。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来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兴无灭资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多快好省地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巨大动力！

有的同志讲，文化低，学不到，用不到。这不是理由。不识字也可以学，可以听别人读，不懂就问别人。既学毛主席著作，又学文化。有的同志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同自己的工作 and 思想联系不起来。那要看你是不是真正下了功夫。只要下决心，有高度的革命热情，有高度的阶级感情，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哪个人学不到、用不到。只能说有人学得快点、多点，用得差点。有人学得慢点、少点，用得差点。这样的差别是有的。根本学不到、用不到的事是没有的，除非是懒汉，根本不想学，那就没法了。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学生的一封信。她说：思想上的问题和学习上的问题，没有在毛主席著作中找不到解答的。这是一个中学生说的话，我认为是真理。中国乒乓球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赢得世界冠军。《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一篇讲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吗？没有。可是徐寅生同志却从毛主席著作



中找到了武器，写了一篇怎样打乒乓球的好文章。徐寅生同志二十多岁，我们在座的同志大都在三十岁以上，有的四十、五十了，再不学就要落后了。所以，同志们为了革命，要用满腔热情学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付出艰巨的劳动。要做到老学到老。要革命到底，就要学毛主席著作到底。我们每个同志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好宣传员。这是我们的义务。不论工农兵、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都是革命战士。为革命工作，为革命奋斗一生，要立场坚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要当好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处处以身作则，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谈话、在家里、在外面、和贫农、下中农谈心，都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像雷锋、王杰那样，不仅用嘴巴宣传，而且要用行动来宣传。身教重于言教。同志们！我们要求你们这样做，也希望你们监督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哪些做得不够，做得不对，就请你们批评。



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今年向大家介绍过孝感县委八个字的工作方法。他们的八个字是“值班、蹲点、劳动、学习”。值班，就是说，县、区、公社直到大队支部、贫协、大队长、副大队长，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成员轮流值班，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不值班的，就下去蹲点。蹲点要参加劳动，不仅仅是为劳动而劳动，而是要通过参加劳动，进行群众工作，进行科学试验，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学习，在家值班要学习，蹲点的带着毛主席著作下去，一样要学习，还要参加群众学习，领导群众学习。后来，我们又在这八个字上帮他们加了两个字：民主，成为十个字。民主，就是说办一切事都要发扬民主，先民主，再集中。下去蹲点，不要站在群众头上指手划脚，要同群众商量办事。哪些事要办，哪些事不办，哪些事先办，哪些事后办，都要同群众商量，同贫农、下中农、基层干部商量。要真正地商量，先听群众的意见，再发表自己的看法，群众有不同的意见，要反复酝酿，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能一去就当先生。党委会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准一个人说了算。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以上十个字——“值班、蹲点、劳动、学习、民主”，建议各县也都照着办，大家看行不行？

有的同志提出，从实际出发有时候与执行上级指示有矛盾，怎么办？办法：第一是可以暂缓执行，第二是立即向上级报告。至于有些小事，例如什么时候下秧、什么时候积肥等，上面本来不该管的，却硬要管，出的主意又与下面实际情况不符合，下面可以不执行，也不必报告。这不算无组织无纪律。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要向上面报告，一直可以报到省，报



到中央。同志们，民主是个大问题，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那还有什么群众路线？我们工作中犯错误，除了没有认真领会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之外，我认为主要的还在于两条：一条是没有蹲点，再一条就是民主不够。如果有这两条，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发现和纠正得更早、更快一些。蹲点和民主搞得更好一些，了解实际情况多一些，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林彪同志提倡吃透两头，看来不吃透“下头”，就难以吃透“上头”，反之，亦然。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不经过实践，不碰钉子，往往不能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思想。现在我们照上面的十个字办，努力做到“吃透两头”，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工作方法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县委怎样更好地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县委的具体事可多了，那么多的部门都要来找，要处理日常工作，还要蹲点，还要劳动、学习……。如果一个县委书记不能比较闲一点，有一点时间看书，作调查研究，同下面干部和贫农、下中农谈心，想问题，就是辛苦忙碌到浑身是病，工作也还是搞不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改进县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可以分几条战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分头负责。该分给业务部门办的事，就交给业务部门负责去办。县委领导干部，轮流值班。县委书记管总的，除了主持县委会议、抓学习以外，就是下乡蹲点，还可以抽时间跑一跑面，不要老在家里坐办公室。你们看这样办行不行？

“这一边不放心，那一边害怕。”县委书记自己不直接抓生产业务，让别人抓，总不放心；分工管生产的同志也有点怕，怕抓不好。我看，你当书记的也不要不放心，负责管生产的同志也不要害怕。只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就不会把事情办坏。就是出点毛病，也不要怕。同志们要懂得，具体事情错一百件，无伤大体，大政方针（例如思想工作或生产上的重大措施）只要错一件，就会全盘被动。不抓大政方针，天天打杂、催耕、催种、催收、催交，结果工作还是搞不好啊。再者，具体事情的处理，并不是件件都能联系到重大原则上面去的。有些具体事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那样处理，分工负责的同志就要大胆负责。处理错了，改过来就行。我们对各部门的同志讲过，大事情要请示报告，日常事情你们大胆处理，办错了，省委替你们担担子。

总之，要搞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必须实行毛主席说的八句话：“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按照这八句话去办，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今天我讲的没有哪一个是新鲜问题，用湖北人的说法就是“炒现饭”。现饭也不坏，加点油、盐一炒，蛮好吃嘛！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挂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过我加的油、盐不多，现饭不一定炒得好吃，好在会议还有几天，有什么意见，大家还是敞开思想谈。不要因为我讲了，你们就不讲了。还要讲，特别是要批评省委领导的缺点、错误。我讲得不对，你们就批评，我就改正。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关 锋 林 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①

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要了一个花招：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寻求毒草的根源，必须到阶级斗争中去找。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他不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迷住”了。

“你们拿大帽子压人！”——朋友们，不要发脾气，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请看看我们的分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是驳

不倒的，驳倒的就不是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请反对的，不赞成的，不完全赞成的朋友们、同志们来反驳、批评。对完全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吴晗同志急急忙忙地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②。在这篇所谓“自我批评”的文章里，表面上，吴晗同志给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等等；实际上却歪曲事实，指东说西，多方掩盖，极力避开问题的实质，避开《海瑞罢官》的要害，并给自己下了个结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页。

② 载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从政治上批评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吴晗同志的“始料所及”。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反而帮助了人们看清他的问题的要害，看清他歌颂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出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吴晗同志文章的第一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研究海瑞？》，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〇年，跟“单干风”无关；可是这样一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吴晗同志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吴晗同志写道：“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他自己回答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这段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十分赞成，“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弄清楚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吴晗同志把《论海瑞》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他这篇文章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这个说法，你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既然，吴晗同志自己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和批评也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一些我们在后面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说他的“排队”。

照理，既然是《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的标题下排队，就应该说一说每篇文章的写作目的，那怕是简略地说一说。可是对头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却只写了“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话。请问吴晗同志，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再说写历史文章必须“古为今用”吗？不是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吗？在现在，你不是说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吗？你这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庐山会议前夕，究竟是怎样“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哪个阶级之用？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哪些“好品德”？对此，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然而，对于第二篇文章，即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论海瑞》，吴晗同志却大做起文章来了。他大讲而特讲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呢？吴晗同志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一段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可是，关于这段话，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与他的全文是



根本不协调的，完全是外加的。当时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称海瑞”；而《论海瑞》则极力歌颂海瑞，把反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海瑞写成“人民的救星”，并要人们学习海瑞的所谓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反对“乡愿”、“不屈服”的精神，这样的货色，竟会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岂不是海外奇谈！其实，《论海瑞》也是一株毒草，这一点，在本文第四节里再来分析。

撒谎，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写《论海瑞》的时候是清醒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对于紧跟着《论海瑞》、“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这是吴晗同志自己说的，见《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应该是清醒的，为政治服务的，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了。可是，不行，《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了，找不着辩护的借口。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忽然“糊涂”了，对它的现实意义“一点也没有想”了，忽然“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了！

好吧，就让我们讨论讨论他的所谓“糊涂”、所谓“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让我们看看，吴晗同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在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一）一九六〇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说：今天的人们要学习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好品德”。

（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出单行本时写的序言中说：“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

史上的改良主义（按：指以退田为主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你看，当时吴晗同志自己出来证明，他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对它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点也没有想”，而是曾“多次翻复”地想过。

（三）《海瑞罢官》一上演，吴晗同志在《北京晚报》上借讨论历史剧之名大肆宣扬这出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目的讲得一清二楚。他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代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①。

（四）吴晗同志说：“作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戏剧艺术来看，历史剧和故事剧是必须有区别的。”——见吴晗《谈历史剧》。此文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据吴晗同志自己说：《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那么，他写这个历史剧，当然是有意识地力求使它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五）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的《文汇报》，又发表了《再谈历史剧》。他说：“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要使历史上……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请读者注意：吴晗同志是认为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见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引者注），特别是我们祖先艰苦朴素，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历史

^① 《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1961年2月18日《北京晚报》。



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又说：历史剧要“结合当前的实际要求”。这是在《海瑞罢官》上演后，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这些话正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经验之谈和自我表白。

(六) 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了《论历史剧》。他说：正确的历史剧“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七) 一九六一年《戏剧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了吴晗同志的答记者问（五月十八日吴晗同志作答）。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如下的导语开头的：“历史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吴晗同志大讲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他说：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就是“使观众从中汲取某些经验、教训，好的吸收，不好的引以为戒，达到鼓舞士气、加强斗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又说：“谁都会看戏，男女老幼，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可以从历史剧受到教育。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这也是吴晗同志写作《海瑞罢官》的自我表白。

(八) 一九五九年底，就在吴晗同志将动手写《海瑞罢官》时，他也明白地说：历史剧必须“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并且承认自己过去“也常常……‘指桑骂槐’。”^①

上述种种，都是吴晗同志亲口讲出来，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

不仅吴晗同志自己这么说，就是在《海瑞罢官》上演时，大肆吹捧《海瑞罢官》的吴

晗同志的朋友，对这出戏的现实意义，也是很清楚，并且极力设法宣传。他们同吴晗同志称兄道弟，庆贺《海瑞罢官》的出笼，竞相宣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繁星说：《海瑞罢官》是“新鲜好戏”，因此“赶戏场、挑座位”，“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至于脑子里“转个不停”的是什么，不便于“细说”，只好“私下去讨论”^②。史优（即孟超）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动感人的出现在舞台上”，“予读者或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③。方三也说：《海瑞罢官》“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养”^④。邓允建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现在又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新途径”^⑤。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惟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煞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

①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灯下集》，第141、143页。

② 《“史”和“戏”》。1961年2月16日《北京晚报》。

③ 《也谈历史剧》。1961年3月17日《北京晚报》。

④ 《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1961年3月11日《北京日报》。

⑤ 《评〈海瑞罢官〉》。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己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①，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这是多么正确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这是在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历史是无情的。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

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二) 《海瑞骂皇帝》 的居心何在？

《海瑞骂皇帝》^②单取一个“骂”字。吴晗同志究竟是骂谁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历史，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

^① 见时汉人发表于196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② 见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斗争形势，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指出海瑞“骂”皇帝的阶级内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呢！）。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却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一字不提，既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揭露地主阶级本身的矛盾，甚至连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情况都没有具体说。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什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等等。

吴晗同志为了“骂得痛快”，根本改铸了历史，也改铸了海瑞。

海瑞骂皇帝，这句话本身就是歪曲历史的。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从本质上说是劝皇帝、爱皇帝；对皇帝的谏诤、批评是有的，并且有些话很尖锐，但实质上还是贯彻一个“忠”字，而不是骂，更不是什么“骂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像《治安疏》中所说的，是在于“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疏中对嘉靖皇帝朱厚熜有不少批评；但是即使在批评的时候，海瑞的敬爱之心仍跃然纸上。他首先歌颂朱厚熜“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说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汉文帝远甚（即比汉文帝高多了）”。继而又替朱厚熜辩解，说“格非而归

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意思是说，皇帝有错不算什么，圣人也是有过错的，问题在于“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并指责大臣说：“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从头至尾，贯彻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海瑞由于“受国恩厚矣”，而“请执有犯无隐之义”，虽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这一点，连朱厚熜也是清楚的。朱厚熜在看了《治安疏》之后，感情很复杂：初览，“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为感动太息，称有比干之忠。”^①又秘密地对徐阶说：“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②朱厚熜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对他的厚意。海瑞后来在追述这段故事时说：“当是之时，即蒙陛下念臣一点赤忱，虽冒出位妄言之罪，实存忠君报国之心，特命左右侍臣传谕刑部及锦衣卫官，毋加重刑，留臣后用。”^③在海瑞死时，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介”，表彰他对朱家王朝的忠贞。

海瑞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在他听到朱厚熜死讯时，表现得更为突出。《明史》本传记载：“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饌款之。瑞白疑当赴西市（即被处死），恣饮噉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上距海瑞不远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极力赞叹海瑞这种“忠臣心事”。他说：“噫！到此

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见《海瑞集》，第540页。

② 谈迁：《国榷》卷64。

③ 见《海瑞集》，第222页。



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几百年来，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是由于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于海瑞对皇帝的“真忠”，而决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由于对皇帝的“真骂”，由于他“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称的吴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对地主阶级的忠贞隐瞒了，而且连朱厚熜死时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隐瞒了。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来了这么一段：“《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然后，他全部引用何乔远的《名山藏》海瑞传的资料。其实不仅《明史》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经过删节，《名山藏》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也是经过删节的。就这一点说，二者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传没有海瑞哭皇帝一段。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吴晗同志写历史文章，向来是重于故事情节的，可是他这回却一反其多年习惯，对海瑞哭皇帝这样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一九五九年写的《海瑞骂皇帝》上，还是在一九六一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只字不提。居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吴晗同志不过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来“骂得痛快”，宣扬抽象的“敢骂”，进行煽动；如果写上海瑞哭皇帝这一节，就会使读者想到海瑞是忠于他自己的阶级的，忠于他自己阶级的领袖的；那样就不能收到吴晗同志所预期的效果了。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

传》的一个原因。

吴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录《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吴晗同志注明，《海瑞骂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话，是根据《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译的。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吴晗同志所翻译的文字同《名山藏》所载《治安疏》，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对不上茬口。有的是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作者任意添加的。例如：

吴文：“你比汉文帝怎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玄修，……滥给人官做……”这一段和《名山藏》原文太有出入。“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滥给人官做”，这都是原文没有的。

吴文“你要知道玄修无益”这一段，篡改、删削不少。最后一句，《名山藏》原文是：“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吴晗同志则写作“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骂皇帝》编入《海瑞的故事》中时，竟然改作：“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吴文：“一意玄修，……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主要的是修醮，……”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像话。《名山藏》原文是：“陛下之误，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说，“陛下的错误，主要在修醮”，并没有“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意思。“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一句，纯属捏造。《名山藏》上下原文是：“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详审，挠乱政事，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是己



拒谏，执陛下—二事之不当，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误陛下终于不释，诸臣欺君之罪大矣！”海瑞这段话的大意是讲，臣子们自己有私心，挠乱政事，不合于陛下的意思，遂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谏劝。抓住陛下—两件不恰当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这样，陷误陛下，臣子们欺君之罪太大了！吴晗同志竟斩头去尾，挖取“是已拒谏”四个字，译成“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这真是“偷天换日”的妙计。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死抱住《名山藏》呢？《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见到的一本书，这本书上所载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资料；《名山藏》所载《治安疏》是据全文摘录的，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向来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吴晗同志，却偏偏不用第一手资料，而用摘录的第二手资料。他的用意是，以为人们没有见到《名山藏》，会认为那些骂人的话，虽然《丘海二公集》中没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那样记载的。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吴晗同志在当时为什么那样大肆宣传他自己绝对忠于史料、历史剧必须“处处有本，字字有据”的真意了。这是要制造一种神话，仿佛凡吴晗同志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必怀疑，不要查对，而要绝对地相信。这样，吴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历史、走私放毒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吴晗同志的“运思独苦”之处在于，既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

是那位已经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

图穷匕首见。真正骂人，“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应读作“非常之恶毒”）的是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究竟骂谁呢？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同志发表《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当庐山会议前夕。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疯狂地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恶毒地辱骂我们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那时，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中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会议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公开向党进攻，疯狂地辱骂我们党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编造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社会作用，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鼓励牛鬼蛇神骂党“骂得痛快”；鼓励他们大骂而特骂，说“同情”和“支持”他们骂的“到处都是”。《海瑞骂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今天，只要没有偏见，又认真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是不难看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性的。

旧剧每出大将，要打“急急风”的锣鼓来助威；《海瑞骂皇帝》，就是给要出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将”打“急急风”的锣鼓助威的。——吴晗同志当时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论斗争说来不是重要的。阶级斗



争的规律，促使人们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出来为这个阶级或者为那个阶级说话，如“骨鲠在喉”，非吐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紧跟着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上海出了一出“海瑞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对于这出戏，丁学雷同志分析得好。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我们大举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海瑞上疏》出现了，真的“在戏上骂”了。《海瑞上疏》的编者，在吴晗同志《海瑞骂皇帝》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①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很好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说，丁学雷同志对于《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评对不对呢？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唱之于前，《海瑞上疏》和之于后，一唱一和，两者如出一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不是，那就请讲出道理来吧。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晗同志也是这样。吴晗同志自己说过：“写这个

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的启发作用”。他在庐山会议前夕，写海瑞就是着眼于海瑞敢于骂的方面对于“人们的启发作用”，即“启发”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骂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又着眼于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这个方面来“启发”人了。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他苦心经营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吧。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海瑞罢官》^②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就是“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不丧气、不屈服的所谓高尚品德，给今天的所谓“海瑞”们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当然，一出坏戏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它是当时牛鬼蛇神开始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的反映，它起着鼓吹“单干风”、“翻案风”的作用。从吴晗同志的主要用意来说，从剧本的主要思想来看，从吹捧这出戏的文章来看，《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则是“罢官”。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写道：“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

^① 丁学雷：《〈海瑞上疏〉为谁效劳》。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

^② 《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以下引自《海瑞罢官》的话，不另注出。



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在这里，他把《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了。

从戏剧本身来看，吴晗同志是紧紧地围绕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展开的。

《海瑞罢官》是紧接着《海瑞骂皇帝》之后写的。海瑞一出场，就通过郑愉的口说：海瑞“把皇上骂苦了，皇上大怒，要问他斩罪”，“海瑞关在天牢，受尽了刑罚。到皇上驾崩，才被赦出狱”。吴晗同志再一次歌颂海瑞的敢于“骂”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骂”的同时，剧本就替“罢官”写了伏笔。乡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时的德政，唱词的最后一句点了一下主题：“调官去赢得了百姓心酸。”剧情越向前发展，剧本的主题思想也就更清楚。第五场《母训》中，作者借海瑞母亲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题思想：“媳妇啊，你丈夫为官清正，刚直知名，纵然罢官坐牢，还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这正是他的好处哪。”又对海瑞说：“纵说你有蹉跌被人倾陷，回琼岛饱看那绿水青山。”第七场《求情》中，作者通过徐阶向海瑞替儿子求情，特意虚构了一场海瑞同徐阶的所谓面对面的斗争，以便进一步刻划出一个不怕丢官，丢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阶：（唱）得罪了众乡官同心较量，只怕你乌纱帽戴不久长。

海瑞：哼！哼！哈哈，哈哈！乌纱帽吗？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顶乌

纱帽！喏！喏！（取下乌纱帽）……徐太师，纱帽在此，纱帽在此！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朝旨一下，立刻归田。……（唱）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

“罢官”这个主题思想，“画龙点睛”是点在最后一场《罢官》上。《罢官》是全剧的最高峰。在这一场，吴晗同志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海瑞”身上。《罢官》这最后一场戏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为“海瑞”辩理，说“海瑞”罢官是被人“阴谋倾陷”，气昂昂地唱出“将我罢职理不公”！

第二，对被罢了官的“海瑞”，寄以无限的同情。通过“海瑞”唱出：“海瑞罢官姓名香”；并且在闭幕时，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是一首出自作者肺腑的诗。千万条相思牵系着作者的心，多么缠绵悱恻的感情？！“万家生佛把香烧”，多么崇敬虔诚的深情！“天寒地冻风萧萧”，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气候啊？！这样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剧”（剧者，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阶级斗争也）中去，是写不出来的。

第三，剧本还大叫被罢官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即卷土重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笔。这里喊出了：“海青天回来吧！”

第四，为了突出海瑞罢官之后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被罢了官的海瑞打扮成胜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



溜溜的”。

吴晗同志曾经十分得意地叙述最后一场写作的经过，他说：“故事的收场”，“原来几稿”，“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唱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海瑞同戴凤翔、徐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编造这个收场，被罢了官的海瑞已经足够威风的了。但是，吴晗同志说，这样收场，还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怎样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脑子一转，计上心来：要杀他几个再走；于是，吴晗同志便“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这不是更有戏吗？不，戏是要服从政治的，所以吴晗同志决不采取。他说：不杀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杀几个人再走，出不了“怨气”，也不能表现“丢了官并不屈服”的所谓“海瑞”精神。

《海瑞罢官》演出时，吴晗同志的朋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并且一再赞扬剧本的主题思想鲜明。方三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明确”，“我们看到了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的鲜明形象”^①。

《海瑞罢官》的捧场者们还直接点明，最后一场《罢官》是剧本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绘声绘色地说：“最后一场‘罢官’是戏的

高潮，冲突达到饱和点，海瑞坚定地传令处决徐瑛和王明友，泰然举起官印办移交，徐阶、戴凤翔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幕布徐徐合拢，戏就戛然而止。这个场面形象鲜明，思想鲜明，整个舞台成为一幅动人的画象，而从这幅画象中表现了海瑞的最可贵的品德，总结了剧本的主题。”^②另一位《海瑞罢官》的捧场者则说：“最后一场”，“海瑞举起了大印，他的个人官宦前途完结了，他坚持的正义却胜利了。这个严肃的又愁又喜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它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手法，作者可算运思独苦”^③。

《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这是铁案如山，吴晗同志是赖不了的。

吴晗同志为了突出“罢官”这个主题，还不惜捏造历史。

吴晗同志曾经宣称，“事实没有根据”是不能“叫历史剧”的^④。但是，他在《海瑞罢官》中，为了主题思想的需要，却把自己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

历史上，海瑞根本没有杀过徐阶的儿子。替吴晗同志辩护的人说，这是艺术“虚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虚构。艺术虚构不能违反历史真实。即从《海瑞罢官》一剧来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杀死徐阶的儿子的。封建法律以严格区别尊卑等级、保护

① 《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1961年3月11日《北京日报》。

② 邓允建：《评〈海瑞罢官〉》。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③ 曲六乙：《盖为甘草剂，敢作南包公》。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④ 《谈历史剧》。1960年12月25日《文汇报》。



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为前提，它公开规定王公官僚贵族犯法须经“八议”^{*}，不与庶人同罪。只有属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议”保护。徐阶属于“八议”之列。按明律规定：“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明律还有“存留养亲”的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①对于徐瑛，是必须按照这两条处理的，因此完全可以免判死刑。在《海瑞罢官》中还说明：徐阶“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如此，当然应按明律“存留养亲”的规定，不判徐瑛死刑。

历史事实是，在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贵族同农民打官司时，封建法律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特权，决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地主，更不会杀死一品宰相的儿子。海瑞杀死徐瑛，从史实上讲，没有；从封建法律看，不可能。可是吴晗同志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杀几个人出出怨气，便下定决心，歪曲历史。

根据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后，确是“灰溜溜的”，“弄得无法下台”。当时吏部批复戴凤翔的疏说：“海瑞志大才疏，宜改两京他秩。”^②海瑞自己也说：“臣气体原弱，从来疾病相仍。古人称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日今疾气交作，血气益虚，……外强中愈，衰弱为甚”，“恳恩曲赐归田以延残喘”^③。说海瑞是什么“昂然挺立的英雄”，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纯粹为了“主题”需要而捏造出来的。

总之，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吴晗同志是不惜一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思想，那样地不择手段，主题思想表现得那么鲜明，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海瑞罢官》完稿时，还特别声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议论起《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来了。他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原来是退田，“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他又唠唠叨叨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海瑞“罢官”的理由。

请问吴晗同志：

（一）《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你在一九六〇年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吗？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又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呢？

* 八议，即规定有八种人犯了法，须由大臣评议，经皇帝批准，减轻罪等。这八种人是：“亲”、“故”、“功”、“贤”、“能”、“勤”、“贵”、“宾”。亲，指皇帝的亲族；故，指皇帝的故旧朋友；贤，指有德行的（符合地主阶级道德规范的）官吏；能，指地主阶级有“才能”的官吏；功，指对封建王朝有功勋的官吏；勤，指忧勤地主阶级国事的大臣；贵，指官高爵厚的地主阶级分子，明律规定，三品以上的文武职事官都属于贵；宾，指前代帝王的子孙。总之，八种人都是地主阶级的官僚贵族，他们在法律上享受特权。

① 《明律集解》附例，卷1。

②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见《海瑞集》，第567页。

③ 《告养病疏》。《海瑞集》，第241页。



(二) 既然说主题是除霸，为什么又不厌其烦地诉说写“罢官”的理由呢？

这是故弄玄虚。吴晗同志越是掩盖，就越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表达出来；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作者却一方面要设法使读者懂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的主题思想。《海瑞罢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吴晗同志一方面力图向观众宣传自己的主题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剧起作用；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大摆迷魂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一些人，识不破他反社会主义的老底，以便招摇上市。

吴晗同志是很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词，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但是，剧本明明叫《海瑞罢官》，而不是《海瑞除霸》。于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什么海瑞一生事迹都已有了剧本了，非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罢官”这段事不可。

这是经不起一驳的。除霸只是剧本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主题思想。通过故事情节所宣扬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题思想。假如真的是宣扬海瑞什么“除霸”精神，那么，据吴晗同志的研究，海瑞在兴国时确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书的侄子张豹、张魁的刑（按：退職兵部尚书的侄子不在“八议”之列），故事情节也很生动，问题是这次“除霸”，海瑞

胜利了，没有“罢官”。写这段故事不行吗？以除霸为主题，这不是好题材吗？不是也就用不着挖空心思，歪曲历史，让海瑞不灰溜溜的吗？不行，因为那是不能实现作者的意图的，不能达到赞美、歌颂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中，对它的主题思想遮遮掩掩，并且制造非写海瑞“罢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心里有鬼，表明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庐山会议，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之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服气的，在我们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还有人力图翻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庐山会议前夕写了《海瑞骂皇帝》，为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急急风”锣鼓的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说穿了，《海瑞罢官》是：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

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

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为活人服务”的。

吴晗同志说，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不错，是站稳了的；但是，他站稳了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四) 戳破吴晗同志的 “护身符”——《论海瑞》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分析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再看他的《论海瑞》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容易明白了。

《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据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写于九月十七日。这时，庐山会议刚结束。在庐山会议上，“自命海瑞”、攻击并辱骂我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先满以为可以胜利；但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失败了。就在这时，写过《海瑞骂皇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摇旗助威的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论海瑞》。

吴晗同志现在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的几句话，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尾巴上那几句话是外加的，与全文思想根本不协调。分析一下他的全文，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论海瑞》写了些什么呢？

除了把地主阶级的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以外，着重地宣传了以下几点：

(一) 继续《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骂”的思想，宣传（比较隐蔽了）所谓敢骂的“海瑞精神”。这里虽然没有用“骂”字（因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说海瑞“写信给嘉靖皇帝，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仍然本着《海瑞骂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对《治安疏》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实质一字不提，

把《治安疏》中所说的臣下误以为“陛下是已拒谏”，照样歪曲为海瑞骂皇帝“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二)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全面地给海瑞写传记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骂皇帝》一样，对嘉靖死后，海瑞哭皇帝的“动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后，海瑞被释出狱”一语带过。

(三) 这篇文章大反所谓“乡愿”。如说：“海瑞所反对的乡愿，凡事调停，自居中间，逃避斗争，不肯批评人，遇风转舵，作事圆滑，总留有后路，不肯负责任做好事，也怕坏事沾了边，好比中药里的甘草，什么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坏不了。”又说：“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这种人他叫做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后来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嫌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反“乡愿”，让人们学习所谓海瑞的这种反“乡愿”精神呢？

是反对自由主义吗？不是。如果是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有《反对自由主义》的著名文章，为什么不宣传这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发挥，而要借死人海瑞来说话呢？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党性明确；不可能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乡愿”一词是可以迷惑人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反“乡愿”抽去其阶级内容，把它伪造成超阶级的东西，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



条道路斗争的大前提，借死人来宣传“超阶级”的反乡愿，就既可以出“怨气”，又可以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结合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看，结合他的《论海瑞》全文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四) 开始宣传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为人们歌颂、赞扬（虽然不像《海瑞罢官》那么集中，那么明显）。例如，他说：“内外夹攻”，“硬把海瑞赶出了巡抚衙门”，“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丢了官，这是海瑞所没有预料到的”；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他恨极了，但他“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也还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颂的、赞扬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为是当代伟人”。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隐瞒了海瑞对自己的阶级、对皇帝的忠贞，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阶级地办“好事”，“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这篇文章里，字面上改成了“严厉批评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气馁，不屈服，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歌颂赞扬的大丈夫精神。吴晗同志突出海瑞的这些“好品质”并要我们学习，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并且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请问：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党打败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罢了他们的官之后，吴晗同志抛开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们“学习和提倡”所谓“超阶级”的“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并且要

“充分的发扬”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要人们同情他们，为他们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可能辩解说：我说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啊？是的，这话说过；可是“在社会内容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呢？吴晗同志没有说，他接着说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扬的海瑞精神，如前边所说，他是作了规定的。那么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海瑞”，实际上就只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了。所谓今天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是：历史上的海瑞忠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巩固现存秩序——封建秩序；吴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则是反对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社会主义，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尾巴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显了。

的确，如吴晗同志自己所说，《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同《论海瑞》一样，《海瑞罢官》里有“骂”，有“罢”，有“反乡愿”（这一点在《海瑞罢官》中也是很突出的）。不过，《论海瑞》比较隐晦；《海瑞罢官》则十分露骨，并且特别突出地宣扬“失败了再干”，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所谓“海瑞”精神，要人们学习。这是因为政治气候不同的缘故。

吴晗同志硬把《论海瑞》说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样一来，倒是从反面点明了



《论海瑞》及《海瑞罢官》等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吴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来。

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①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周先生是说：吴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右倾不右倾之类政治性的问题，只装糊涂，当作纯学术问题就得了；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因此，周先生叹息说：吴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其实，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晗同志说《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这固然是泄露了“天机”；但是周先生这么一指点，就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而且周先生还以吴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分证明：吴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刚直不阿的“清官”，这岂不是说，吴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吗（自然是当代“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社会思潮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

吴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同他的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又是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就一目了然。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呢？

一九五七年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办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时，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条战线上，向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进行挑战。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进攻面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进行反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在党内煽风点火，从

^① 见1966年1月7日《文汇报》。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82页。



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们自称为海瑞，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骂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咒骂群众的革命能动精神是主观唯心主义，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狂妄地要我们党立即改正错误。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些骂人的话，是不能公开拿到报纸上来的。要把那些骂人的话发表出来，就需要化装一番。“化装师”，总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场了。吴晗同志的这篇骂人文章，实质上是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灵魂塞到“海瑞”这具僵尸中去，借死人之口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说的话。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全会还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

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八中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①。

在八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领导人发表了文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坚决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开地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全会之后，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之下，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重大打击。顽固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希望他们能够复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爷。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退却了；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则歌颂他们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们塑造成为“胜利的英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续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

^① 见1959年第17期《红旗》。



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之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

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的。

就拿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说，不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就有人起而应和，按照《海瑞骂皇帝》的精神、题材写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么一些人出来大捧其场。这难道不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思想界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吗？如果说不是，那么在当时思想界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又到哪里去找这种斗争、去找企图复



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呢？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轰的一声出来为之捧场，为之宣传；在《海瑞罢官》的带动之下，接着又出现了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来写文章叫好、宣传，为它“作护法”。大家都认为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为什么起了带头作用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试问：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还灵不灵呢？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千万不要被吴晗同志的“巧言善辩”所迷惑，千万不要上当啊！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对于任何东西，必须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分析其阶级实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阶级立场支配人们的行动。吴晗同志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骨鲠在喉”非“把它写出来”不可^①。

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一、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什么“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思想“糊涂”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以古讽今，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二、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三、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时，他就骂；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时，他就歌颂被“罢”而不屈服，并且同时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当我们批判时，他就装糊涂，力图避开政治，企图混过去，并且还来了个“回马枪”，对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攻击。由此可见，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 * *

吴晗同志，为吴晗辩护的同志，你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怎么样呢？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你们站出来把你们的反对理由摆一摆吧，你们把我们驳倒了，我们自认晦气；如果不说话，那可对你们不利，社会舆论就会以为你们默认了，没有道理可说了。

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红袍的“青天大老爷”，是化装为美女的谢瑶环，还是面目狰狞的厉鬼李慧娘……决吓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骗不了革命的人民。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① 见《学习集》，第273页。



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郑季翘

编者按：郑季翘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对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对于“形象思维”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现在发表出来，欢迎大家进行讨论。

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又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我们相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也一定会有好处的。

一、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委是运用

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被一些同志奉为金科玉律的形象思维论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文艺创作的特质果真在于“形象思维”吗？这个被某些人祭在空中，借以唬人的“法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经过研究，才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



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创作，相反，正是它，迷悞了许多作家。

当前，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在文艺领域中，我们正在对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理论进行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彻底破除形象思维论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体系，那就等于还给反社会主义的文艺在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留下一个掩蔽的堡垒。所以，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对形象思维论进行彻底的批判，扫清形象思维论者散播的迷雾，应该是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二、形象思维论的基本观点

什么是形象思维？论者一致主张：它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立而为作家艺术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现在根据看到的几种著作，将其论点引述如下：

以群同志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高等学校试用教材）说：

“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而说的。”^①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的《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说：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就有所不同。一般把

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以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②

蒋孔阳同志在他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的小册子里说：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对称的。它们都是我们人类的思想活动，为了适应不同的实践需要，而后产生出来的不同的掌握和认识客观现实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主要是指科学家为了掌握客观事物间的关系，发现和制定有关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然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逻辑的推理的思维方式。至于形象思维，……它是作家和艺术家为了构造艺术形象的要求，而后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③

那么，形象思维是不是指人的感性认识而言的呢？又不是。形象思维论者一致指出，形象思维也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是认识的理性阶段。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说：

“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作家的形象思维和科学家的抽象思维一样，都必须遵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④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说：

^{①④}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221页。

^③ 《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是人们通过实践在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都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①。

李泽厚同志在其《试论形象思维》的论文中说：

“思维，不管是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都是认识的一种深化，是人的认识的理性阶段。”^②

蒋孔阳同志说：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我们的认识逐渐由现象向本质的深入，都在于揭示现实生活的规律性。”^③

霍松林同志在其编著的《文艺学概论》中说：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以‘感觉材料’为依据，同时都要概括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的联系和关系”^④。

形象思维既然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是“认识的理性阶段”，那么，它是怎样从感性发展到理性的呢？它既然是和逻辑思维“对称”的，那么，它与逻辑思维的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说：

“它们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一个是凭借形象、一个是凭借概念进行形式不同的思维”^⑤。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指出：

形象思维的特点和“精义”在于“在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

维”^⑥。

蒋孔阳同志说：

“如果说逻辑思维从个别和具体，上升到一般和抽象，以达到纯粹的本质的东西。那末，对于形象思维来说，它始终是个别的和具体的，它虽然也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比较起来，形象思维就不是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概念，而是就通过现实生活本身的形式来进行构思。”^⑦

李泽厚同志说：

“形象思维是个性化与本质化的同时进行。这就是恩格斯称赞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典型的创造。形象思维的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⑧

霍松林同志说：

“总之，形象思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⑨

总括起来，所谓属于理性认识阶段而又和逻辑思维对称的形象思维，就是不用抽象、不用概念、不依逻辑规律，而是用形象来进行的思维。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能进行思维吗？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吗？

形象思维论者答道：这种形象思维妙得

①⑤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第221—222、222页。

②⑧ 《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第104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③⑦ 《论文学艺术的特征》，第56、68、70页。

④⑨ 《文艺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0页。

⑥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第190页。



很，它比逻辑思维要高明：“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在形象的思维上达到了的，并不一定就同时能够在逻辑的思维上达到。”^①而且“正由于这两种思维规律的不同，……因而某些作家的世界观虽有着落后因素，但有可能突破其世界观的局限而达到真实的反映生活。”^②

这种形象思维论难道符合毛泽东同志阐明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吗？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是这样说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所以理性认识即理论的（逻辑的）认识“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③

显然，所谓形象思维论，就是在文艺领域中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点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再引霍松林同志的一段话：

“有些人认为不论是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改造制作’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逻辑思维是从具体到抽象，‘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形象思维也是从具体到抽象，形成抽象的主题思想。在他们看来，形象思维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只是它在形成抽象的主题思想之后，还需要给这种抽象的主题思想制造形象的外衣。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是有很大的危害性的。按照这种说法，必然会在创作的一定阶段上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其结果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④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在文艺领域中运用《实践论》中所阐述的普遍的认识规律，竟然达到如此狂妄的地步！

三、不用抽象、不要概念、 不依逻辑的所谓形象 思维是根本不存在的

形象思维论者把所谓形象思维说得神乎其神；但是，只要我们破除迷信，剥去形象思维论用以装饰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分析它的本质，就不难发现：这种所谓理论不过是一种违反常识，背离实际的胡编乱造而已。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文艺家用概念来思维，而要他们用形象来思维，这不能不使人惊奇。大家知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⑤斯大林说：“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

① 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1956年第9号《文艺报》，第35页。

② 周勃：《略谈形象思维》。1956年8月号《长江文艺》，第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79页。

④ 《文艺学概论》，第8—9页。

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5页。



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语言是由词组成的。概念就寓于词之中。列宁说：“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②可见，不用概念的思维，是不存在的。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作家在思维中运用抽象，要求作家在整个思维过程中永远不离开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不离开形象的整体。这是一个极端荒谬的论点。抽象，就是抽去具体事物的非本质现象，摄取其本质的一种思维活动。世界上整体相同的事物，就只有这个事物本身，所以，人们如果不利用抽象，就不能将两件事物联系起来，就不能找出各种事物的共同性，就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达到理性认识。概念，就是经过抽象才形成的。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③。显然，要思维，要发现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运用抽象的方法。没有抽象就根本不可能有思维。形象思维论把“不经过抽象”作为形象思维的特点，这正是这个“理论”的最根本的错误。这里，应该说清楚：我们反对的是形象思维论，并不是反对文艺的形象性；我们说思维必须运用抽象，并不是说作品应该抽象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阐述。

形象思维论者虽然声称形象思维也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但他们既然反对作家在

文艺创作中运用逻辑思维，实际上就是在文艺创作中取消思维，反对理性；因为认识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抽象，运用概念，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才能达到的。思维中运用抽象，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就必须遵循逻辑规律。必须说明，我们所说的逻辑是指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两者而言的。思维所以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正是因为它所遵循的逻辑规律乃是客观事物最根本、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的反映。列宁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④又说：“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⑤正因为这样，依照逻辑规律进行思维，就可以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取得正确的理解。可见，要发现事物的本质，不是谁愿意不愿意在思维中遵循逻辑规律的问题，而是必须遵循逻辑规律的问题。

有些形象思维论者似乎感到了他们的理论的危机，想尽办法在暗中给这个理论修修补补，说作家在创作时也需要点抽象思维，

①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27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3页。

③④⑤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89—90、192页。



作为形象思维的助手，有的并且利用辩证法的形式，说：“否认形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会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反过来，否认抽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可能削弱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在形象思维论者想来：这样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列成矛盾的两个方面，又把形象思维当作矛盾的主导方面，真是稳妥和保险不过的事情。但是，形象思维论者想用这种办法维持一个假道理，是枉然的。折中主义的诡辩并不等于辩证法。我们且问：在这里，那起主要作用的所谓形象思维，还是不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如果是的，那就还和过去一样，在达到理性认识的途径上，制造了二元论，实际上反对了《实践论》；如果说，作品形象的思想意义是抽象的思维赋予它的，那就等于自动宣布形象思维论的破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形象思维论者的思想是极端混乱的。

为了论证不经抽象、“从个别到个别、从具体到具体”的形象思维也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形象思维论者发明了一个“合二而一”的公式：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他们说，这就是形象思维的特征。

必须指出，形象思维论的这个论点，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修改。马克思在讲到人的认识和思维过程时说：“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恩格斯说：“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完全在于我们在思维中能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高到特殊、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一般”^②。列宁说：“为了要

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③毛泽东同志谈到人们对于特殊和一般的认识的关系时，指出：“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④显然，形象思维论者的“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的论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个认识的阶段论的。

为了给这种荒谬的臆造编制论据，形象思维论者硬说文艺创作中典型化的过程，就是“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这当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大家知道，典型是一类事物的完备的或最完备的形态。在现实事物中，不体现本质（共性）的个性和不为个性所体现的本质，都是没有的。所以，典型不能不是本质和个性的统一体。但文艺作品的典型，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典型，因而什么是这个典型人物的本质和他的个性特征，作家对它必须是自觉的，他才能够掌握和创造这个典型。为此，作家必须把他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个性不同的许多人物加以分析、比

①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1页。

②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5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1页。

④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



较，取得对于各个阶级中各类人物的各种共性(本质)的认识；又必须根据“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原则，依据人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对典型人物体现其共性的个性，取得明确的认识；才能根据这种认识进行创造，把取自现实人物的与自己的思想意图相适应的某些表象材料加以集中，使个性与共性统一起来，创造出各个阶级的各种典型。这样，人们才能通过这个典型，认识到某种人物的本质，它才能具有认识的意义。可见，作家在创造典型时，他的思维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认识规律进行的，而不是什么“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的浑沌一片。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抽象，主张作家用形象来思维，要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等等，就是反对创作时有主题思想，有思想指导。有些形象思维论者并不隐讳这一点。霍松林同志说：“在形象思维的整个过程中，抽象化和具体化是统一的，不应该先抽象出赤裸裸的‘主题思想’然后再将它具体化。”^①有的人则说：“作品的主题，是作品写成后，由批评家给分析出来的。”必须指出，这种不要先有主题思想的文艺创作论，在不久以前，在不少文艺工作者当中，还是一种时髦的理论哩！

实际上，这是一种空论。人类的一个特点，是有自觉的能动性。无论做什么事情，预先总要有个目的，有个安排；纵然这个目的和安排还是粗略的，但总须要有，才能动手去做。作家没有个主题思想，就不知从何写起。当然，人的认识总是从感性的东西开始，作品的主题思想属于作家的理性认识，

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来，主题思想总是作家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结果。由于人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发展和改变原来的主题思想的事也是常有的。但不论怎样，作家总是在主题思想(原来的或新的主题思想)的统帅下写作的。艺术实践表明：主题思想不仅通过作品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而且有时作者还在作品中用一定的方式直接加以表白。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头《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等回目中，就表出了本书的主旨。《水浒传》作者，则在《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回中，通过对梁山好汉的赞辞，道出了他贯串于全书的指导思想。托尔斯泰对俄法战争的历史宿命论观点，在《战争与和平》一书里，不仅体现于一些人物形象中，而且还以作者插话的形式，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即使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作者所描写的社会现象，也是经过他自己的选择的；而任何选择，都是在人的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总之，作家创作，都是为了表达来自实践的—定的思想意图；而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总的思想意图，就是主题思想。至于和作家时代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思想水平和生活经验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概括和认识作品形象的意义，得出和作者意图不完全相同的结论，这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得到说明，并不能为否定主题

^① 《文艺学概论》，第10页。



的形象思维论者提供任何根据。

至于说到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品，过去有，今后还会有，是必须加以反对的。但是必须正确指出它产生的原因，才能有效地克服它。产生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这是由于作者缺乏社会实践，没有取得丰富的原始材料，更说不上在这些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性认识。他只是从别人口中或书本上得来了一些概念，又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加以体验和检证。这样，他就无法使这概念和活生生的事物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法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形象。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这个作者头脑中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恰恰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办事。公式化概念化作品产生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低，思想简单化；有时即使积累了一些生活体验，也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复杂的生活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从中引出其固有的含义，而常常是把这些丰富生动的生活素材削足适履地纳入某些现成的公式里。可见，文艺作家要想真正地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就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地深入工农兵，参加实际斗争，而不是按照形象思维论者的指导，在思维中排斥抽象，弃绝概念，回到动物状态去！

排除了理性，乞灵于感情，并且把感情神秘化，这是许多形象思维论者的共同主张，而李泽厚同志则说得更加露骨。他要作家依

靠“正确的情”——“美感感情”——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大家知道，文学理论中的“唯感情论”，本来是资产阶级神秘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一个基础，形象思维论者却把它当作了宝贝。李泽厚同志公然搬出了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则更认为艺术的本质和使命就在于传达感情；把作者的感情传给读者；上一代的传给下一代……。其他英、法、德国许多美学家也有与此相同或近似的论点。所以，不仅是像诗歌、音乐、舞蹈……这些更直接表现感情的艺术（所谓‘表现性’强的艺术）是如此，就如小说、绘画、雕刻以至建筑、工艺等（所谓‘造型性’强的艺术），也是如此。”^①形象思维论者就这样公然宣布了自己是托尔斯泰的门徒，是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美学家的崇拜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形象思维论和有些人鼓吹的资产阶级美学的“使情成体论”是一类货色！

应当弄清楚感情和理性的关系。大家知道，人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事物，有一些事物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和社会要求的，另一些事物则相反；于是人们就依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及其与自己的关系，而决定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态度：肯定它或者否定它。人们对于被肯定的事物发生满意、愉快、喜悦、热爱之类的感情，而对于被否定的事物则发生不满、愁闷、悲伤、痛恨之类的感情。毛泽东同志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① 《试论形象思维》。1959年第2期《文学评论》，第107—108页。



恨。”^①和形象思维论者所说的恰恰相反，人们不是凭感情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决定着人们的感情。所谓美感感情，是人们的感情的一种，也必然是这样。

人的某种感情在一定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以后，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固定性，当引起这种感情的类似事物一旦出现，人们就会发生类似的感情反应。但是，这种迅速的感情反应，很可能是不对的。例如有人见到某种事或听了某种话，勃然大怒；但当他想了一想，即经过深入的考虑之后，他的气消了，有时还可能转而高兴或感激起来，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很复杂，而且是不断变化的；类似的客观事物，出现在不同的条件下，常常具有着不同的意义，包含着不同的性质。而认识这种意义和性质，感情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深思熟虑，重新作出判断，才能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态度。感情总是由理性制约的。

人的感情对人的实践起着巨大的影响。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任何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劳动的创造，不仅是在一定的思想的统帅之下进行的，而且也是在一定的感情推动之下进行和完成的。作家是这样，科学家、革命的政治家等等都是这样。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②但是，这种感情必须是基于深刻的理性认识的深厚的感情，那种不是基于深刻的理性认识的一时的感情，即使当时表现得十分强烈，也只能是一种易逝的冲动，不可能成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推动力，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作家创作的推动力。

作家必须以其洋溢在作品中的激情来感动读者。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通过形象传达给别人；正如普列哈诺夫所说，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说艺术在形象地传达作者思想的同时，也传达作者同这思想相联系的感情，艺术作品不但以其深刻的思想使读者受到教育，同时也以其热烈的感情使读者受到感染，那就是正确的了。具有热烈的感情，是艺术有别于科学的特点之一。虽然如此，但艺术还是以理性认识为基础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感情，是由理性所决定，并为理性所统驭；在语言艺术中，又是为理性的东西——语言的词、句——所表现的。读者受到作品感情的感染，也是通过对作品文字的理解而得到的。只有把感情与理性结合起来，并且把理性放在第一位，才能正确地说明感情对艺术的意义。否则，把两者割裂开来，反对理性，片面地强调感情的作用，如李泽厚同志所说的“情感愈真愈强，就愈有反映的能力……”^③就会变成狐仙堂上的牌匾：“诚则灵”，而走向极端唯心主义的感应论！

总之，形象思维论这种所谓不要概念、不用抽象、不依逻辑、从形象到形象就可以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2页。

② 《书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5页。

③ 《试论形象思维》。1959年第2期《文学评论》，第108页。



认识事物本质的认识论，显然是一种直觉主义因而也是神秘主义的体系。这种所谓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 说明文艺创作不容 代替的科学理论

文艺作家的认识和创作活动，是绝不能脱离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的。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又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名言，对文艺的本质和文艺创作作了科学的说明，是我们理解文艺问题的根本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文艺领域中的重要发挥。因此，必须从思想和存在的辩证同一性即由物质到精

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辩证转化的原理出发，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问题的上述科学论述，正确地解释作家的认识和思维活动。下面我们就结合叙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阐明这些问题。

大家知道，人们的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使人们的头脑和外界物质环境发生联系的，则是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认识来源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客观世界的森罗万象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形成感觉和知觉。感觉是对于客观对象的个别属性（例如它的颜色、气味、冷热等等）的反映，而知觉则反映着一个客观事物的互相联系的属性的总和。感觉和知觉是物质世界的直接反映，它总是具体地反映着物质客体的具体特性。例如，它反映的不是一般的颜色，而是某一个物体在某种条件下的某种颜色；不是一般的重量，而是在某种条件下某一物体的重量等等。感觉和知觉，是人类认识的基础。

由于人脑有记忆能力，人们通过感觉和知觉获得了外界某个事物的映象之后，就在没有这个具体事物引起人们的感觉得时，在人们的头脑中，也可以出现这个事物的具体形象。这种在人的记忆中复现出来的形象，叫做表象（即印象）。表象是过去知觉的再生，它大致地反映出客观事物的轮廓。感觉、知觉、表象都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它们只能反映事物的现象，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863页。



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①而记忆，则是人们进行思维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表象材料积累多了，经过多次的反复和比较，分析和综合（把许多事物的表象加以分解，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的东西），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形成概念。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它已经超越了对具体事物的直观，而进入了理性认识的领域，即思想的领域。概念是由对具体事物的分析、概括而产生的，它又为人们进一步进行分析和概括提供了可能。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就可以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步步深入地揭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样，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感觉、知觉、表象而发展到概念，再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过程。

由此可见，思想同样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它不是以感觉、知觉、表象的形式，而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来反映客观存在的。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事物的具体形象，而是事物中共同的东西：它们的本质，它们内在的联系和固有的规律性。因此，人们在进行思维时，就必然要越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对感觉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如果停留和执着于事物的具体形象，思维就是不可能的。当黑格尔谈到“抽象着的思维却是扬弃了感性材料并把它这种简单现象归结为只在概念中显现的本质的东西”时，列宁批注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他着重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是认识真理的必经之路。^②这就说明：形象思维论者所说的那种不扬弃感性材料、不脱离感性形象而能认识事物本质的形象思维，是根本没有的。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概念毕竟是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和概括出来的，它和事物的一部分属性是紧密联系着的；即使是经过多次判断和推理而达到的高度抽象的东西，看起来与感性的东西相离很远，但它还是植根于感性的东西的。列宁指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又说：“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③这就是说，一切本质都要通过具体的过程、关系、现象等等表现出来，不表现为任何现象的本质是没有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158、278页。



的。因此，在思维中，只要这概念是人们自己对具体事物进行概括而得到的；或者他从别处得到某个概念后，经过自己对实际生活的体验，是充分了解这一概念和具体生活的联系的，那末，当需要的时候，人们就能够从概念再回到感性形象上来。可见，形象思维论者以为人们只要用概念思维，形象便一去不返，概念就不能返过来体现为感性形象，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人们的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否正确，也必须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检证。在物质到精神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经过感觉映入人们的头脑而成为表象，再由表象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思想；在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中，这种思想转过来又成为人们实践的依据和指导。在实践中，由于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或其他原因，人们常常需要部分地以至全部地改变原来的思想和计划，但是，改变了原来的思想和计划，又产生了新的思想和计划，所以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自觉目的的活动。这正是人类的特点。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①。可见，形象思维论者否定作家创作时先有主题思想，是不合乎人类活动的规律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劳动中，就需要从一定的思想认识出发，通过创造性的想象，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相应的表象，再根据这个表象改变物质的形态，

即进行新的创造。马克思说：“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还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是，使最拙劣的建筑师和最巧妙的蜜蜂相比显得优越的，自始就是这个事实：建筑师在以蜂蜡构成蜂房以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把它构成。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所以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②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劳动过程开始时劳动产品在人的头脑中的观念形态的存在，就是劳动者的思想复现而成的表象。这样，人们由一定的思想出发，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取得和自己思想一致的新创造的表象，再依据这个表象来制造产品，改造世界——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过程。

由此可见，表象是由物质到思想所必经的中间环节，同样也是由思想到物质所必经的中间环节。在由物质到思想的过程中，正因为客观物质经过感觉进入人们的意识中成为表象，人们才有可能对诸多感性的形象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概括，取得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在思想到物质的过程中，又正因为表象材料可以经过抽象而变成思想，人们就可以把表象材料经过抽象而同自己的思想意图彼此比较，反复衡量，然后用它们在头脑中建立起和自己思想意图相一致的形象，根据它来制造器物、改造世界。思想和

① 《自然辩证法》，第145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172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存在的辩证同一性，在意识中就表现为概念（或思想）和表象的辩证同一性。从存在到思想、从思想到存在那种互相转化是在实践基础上，经过人们意识中从表象到概念、从概念到表象这种互相转化之后才能实现的。这也就是说，用思想指导实践来改造世界，是必须以由思想转化而成的新的表象作样板的。

由物质到思想和由思想到物质虽然都以表象为中介，但是这两个阶段的表象的性质却是不相同的。前一个阶段中的表象，是已有的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映象的再现。这是理性认识的前行步骤，是属于感性认识阶段的。后一个阶段的表象，则是由人的思想意图转化而成的，它是新创造的产品在创造者观念中的模型，是理性认识在人们头脑中的感性体现。第一阶段的表象的出现是由于人的形象记忆，而第二阶段的表象的产生，则是依据人们的思想意图进行创造性想象的结果。工程师的蓝图，是新的物质产品的样板，文艺作品则是供人阅读和欣赏，对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作用的。这两者对客观世界实现改造的方式不同，但就思维过程来说，**艺术形象也是人们头脑中第二阶段的表象，是由作家用一定的艺术手段描绘出来的第二阶段的表象。**创造性想象是人所共有的。文艺作家在头脑中所以能够塑造形象，正是因为他和一般人一样，能够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想象。

高尔基讲过：“想象，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世界的思维。不过它特别是凭借形象的思维，是‘艺术的’思维。想象，可以说是一种甚至能给与自然的自发现象和事物以人的性质、感觉和意图的能力。”^①有些形象思维论者就以这样的含糊语句为依据，把创造性想

象说成是一种作家特有的用形象来进行的思维，而反对思维中运用抽象。这同样是徒然的。前边已经论证过：人们的思维必须经过抽象才能进行，所以，创造性想象绝不是什么不用抽象而用形象来进行的思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抽象思维，创造性想象才成为可能的。

创造性想象，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思想意图，从头脑中贮存的客观事物的表象材料中选择相应的部分，予以适当的加工组合，构成新的表象的一种意识活动，也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思想意图去“想”与之相适应的“象”。人们的思想意图是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经过感觉再经过抽象的思维形成的，它属于理性的范畴。而人们头脑中的表象材料，却是感性的东西。如果不对这些感性的东西加以分析和抽象，认识它们的性能和意义，那末，这些表象材料就不能同人的思想意图挂起钩来。可见，文艺作家头脑中新的表象的创造，**必须是一个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循环往复的思维过程。**这和形象思维论者的不经抽象、“从具体到具体”的主张，是有原则的区别的。简言之，人们（包括作家）所以能够运用想象在头脑中创造出新的形象，是因为有第一阶段客观事物的表象的基础，有抽象的思维的中介即有理性认识的指导。正因为从生活中的形象到艺术中的形象是以把握事物本质的抽象的思维为中介，艺术形象才能

① 转引自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社1949年版，第76页。高尔基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要创造典型，必须先把某一社会集团的本质特征抽象化，然后再把这特征具体化于一个人物身上。参看同书第102页。



比普通实际生活中的形象“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如果认为没有第一阶段客观事物的表象，就可以产生第二阶段的创造性表象，——在文艺创作中，如果认为离开社会生活的源泉，也可以凭空创造艺术形象，那便是唯心主义。但是如果认为没有抽象的思维的中介，第一阶段的表象就可以直接变为第二阶段的创造性表象，如形象思维论者所主张的那样，那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成为不折不扣的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

“形象大于思想”——这是好多形象思维论者反对思想和形象的辩证同一性，论证作家创作是从形象到形象，抹杀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坚持主张形象思维论的重要根据之一。这是形象思维论者昧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表现。前边说过，从表象到概念的飞跃，就是经过抽象的，就是把许多不同事物的某些属性舍去，概括其相同属性的结果；而在从概念到新的表象的转化中，人们又必须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回到体现这个概念的新的事物的形象上来，因为这是事物的具体形象，所以它就同时也具有别种属性。能够因为这种情况而否定思想和形象互相转化的辩证同一性吗？其实，概念和形象就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一个概念包涵着若干形象的这种同一属性，一个形象又具有包括这共有属性在内的若干个不同的属性。列宁说：“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

物。”^②就概念是形象的“一部分”来说，形象大于思想；就概念“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来说，思想又大于形象。所以，同一主题，可以用不同的形象来表现。例如，给画家们出一个题目，使他们各不相谋，独自构思，就会画出不同的画面来。反过来，作家依据一定的主题思想创作出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形象，所以，除了主要的表现这个主题思想之外，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时，还可能发现另外的意义。这种现象并不是只在文艺领域中存在，而是认识和创造中的普遍现象。但就创造者来说，他所以塑造这样的形象，正是因为这个形象同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形象，是由创造者的一定的思想转化而成的；形象思维论者认为作家可以创造出根本违反自己思想倾向的作品，是非常荒谬的。

总之，形象和概念，是辩证的同一关系，它们往返转化。否认了这一点，也就相应地否认了物质和精神或存在和思想的辩证同一性。

根据上面的论述，作家创作的总的思维过程是：**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一般**——**典型**。当然，不论从表象到概念或者从概念到新的表象的转化，都不是直线进行、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辩证的、多次循环往复的过程。但这里有一点必须充分明确：作家的思维和一般人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一样，必须经过抽象才能进行，也只有经过抽象，人们才能得到理性认识。作家的理性认识是在实践中经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研究才形成的，但它返转头来又成为作家创作工作的统帅，作品形象的灵魂；文艺作品正是作家这样形成的一定的理性认识的形象体现。否认了这种理性认识的中介，就是否定了文艺作品的创造性，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指导的可能性，反对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倾向性。

文艺创作是进行阶级斗争，改造人、改造社会的武器。革命的文艺作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必须投身于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之中，从这唯一最广大的源泉中汲取丰富的“原始材料”，获得对于社会生活的感性知识；又必须对这种“原始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即经过科学的抽象，把握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的本质，达到理性认识，才能贯彻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创造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文艺作品，有效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五、从形象思维论的演变 看它到底为什么人服务

为了了解形象思维论到底为什么阶级服务，考察一下形象思维论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直觉主义，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基础之一。像我国过去一些资产阶级美学家宣扬的克罗齐的理论，就是以直觉主义为基础的。但现在我国流行的形象思维论，却是从苏联某些文艺集团搬来的。苏联现代的形象思维

论者在论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援引别林斯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一年写的题为《艺术思想》的没有写完的论文中，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艺术是对于真实的直接观照，或者是形象中的思维（Мышление в образах）。”^①在另一些文章中，他还常用“用形象来思考”（Мыслить образами）的提法。传到我国后被译成“形象思维”。在《艺术思想》这篇文章中，别林斯基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是自我思考、自我发展着的思维。思维体现于人，有三个发展阶段，构成三种方式：宗教的、艺术的和最高最后的纯思维（即哲学）。所以艺术乃是自我发展着的思维在人身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思维外化为形象，因而形象中的思维就是艺术的本质。别林斯基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定义，并不是他的发明。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谈到艺术的实质时说：“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作品“是概念从它自身出发的发展，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表现理念，以供直接观照”^②等等。别林斯基的艺术定义正是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里引来的。至于艺术家“用形象来思考”的提法，却是别林斯基从黑格尔的观点中引伸出来的。

黑格尔对于艺术的本质的论述，是从他的所谓绝对理念出发的，因而是唯心主义的，

① 《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选辑，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② 《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14、65、86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但是其中也含有辩证的合理的因素。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角度说明了概念和形象的辩证同一性。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这一辩证的思想，在当时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从概念和形象的辩证同一性的原理出发，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说明了艺术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论证了典型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等等。但是，别林斯基同时也引伸和发展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因而在他的艺术观中又充满了许多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的糊涂思想。一方面，他不能科学地了解思想的来源，不懂得从客观存在到思想的转化。他认为构成艺术内容的思想，“就是那永恒的、在自由的必然性中辩证发展着的思想”，“它不是通过理性、而是直接地”出现；而“诗人创作活动的源泉是从他的个性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①。另一方面，他也不了解思想如何转化为形象。他说：“连艺术家自己也往往不明白，一篇新作品的胚胎怎样会落到他的心上的，他怀着这‘诗的思想’的种子，有如在母亲的子宫里怀着胎儿一样。”^②他把思想到形象的转化归结为艺术家的天赋，天性赋与艺术家“一种直接的能力”，使他“能以形象思考、判断”，“能通过情感、以诗的方式获得现实的印象，并且能通过幻想的活动，在诗的形象中去复制这些印象。”^③上述这些，又是别林斯基艺术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在思想战线上，对遗产的继承，从来就是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联系着的。无产阶级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建设科学的文艺理论的材料；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则要弃其精华，取其糟粕，作为

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武器。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文艺界和理论界虽然也有一些人谈论形象思维，但其解释是各不相同的。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文艺界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逆流。一些人打着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幌子，实际上是要反对文艺的倾向性，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些人便从别林斯基的著作中拾出“形象思维”的论点，攫取其中消极的错误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意思大加发挥，并且用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把它装饰起来，使之成为所谓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实际上是在文艺领域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现代形象思维论的一个代表作，就是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三年第五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她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的定義的中心。”但别林斯基这个定义被人们作了“错误解释”，因此必须“为正确理解形象、形象思维的实质而斗争”，并且把这个“真正科学的原理”向前“发展和精益求精”。她认为：“逻辑思维 and 形象思维是反映现实的统一过程的不同形式”，两者“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其本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文章在总结形象思维的特征时指出：“在形象思维中对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揭示、概括是与对具体的、富有感染力的细节的选择和集中同时进行的。”从这个公式出发，尼古拉耶娃反对作家在思维中应

①②③ 《别林斯基论文学》，第 27、9、138、52、13、11 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用逻辑和抽象，认为文艺作品所以发生公式化和概念化，就是因为“在创作的一定阶段上用逻辑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①尼古拉耶娃在她的文章中口口声声地宣称：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用列宁的反映论原则，反对非理性主义等等，但是，由于她反对在文艺创作的思维中运用逻辑和抽象，就在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修正了列宁的反映论，宣扬了非理性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修正主义的特色。

一九五五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十八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断言：“对生活作艺术的认识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这种规律同科学认识的规律在许多方面是很不同的。”^②它指出，同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情况不同，一定的党性立场和政治观点在艺术认识中并不是揭示现实本质的必要条件。专论援引巴尔扎克为例证，认为即使是政治上反动的作者，也能写出进步的作品。这个专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形象思维的问题，但在总的倾向上支持了形象思维论。一九五八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该杂志编委伊凡诺夫的论文：《谈谈艺术的特征》。这篇文章对形象思维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虽然人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最终可以归结为两种区别最大的形式——科学的形式和艺术的形式。实质上，可以把它们确定为人的两种认识能力。每个人都有这两种认识能力。不过，有的人用概念思维的能力强些，有的人用具体画面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强些。”“艺术的实质恰恰可以规定为这样一种认识形

式：从现实现象的具体感性面貌中再现现实现象。而这就是形象思维。”^③后来，形象思维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的支持下，在苏联的地位就进一步巩固起来，并且还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真理”。

考察了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演变和流行的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引来的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论点，在今天的苏联忽然被人们从消极方面加以发挥，并且大走红运，原来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修正主义者在文艺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多方面进行的，而形象思维论则是从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进行修正的，它的作用就是要在文艺理论中挖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基，使文艺成为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以便于他们在其中兴妖作怪。很显然，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文艺界逐步流行起来的形象思维论，正是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形象思维这个观点传入我国后，曾被胡风拿来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所作的《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甚么？》一文中说：“文学创造形象，因而作家底认识作用是形象的思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他狂妄地向作家发出号召说：“要使艺术（文学）成为

① 以上引文见《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年版，第145、146、147、160、182页。

② 《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7年版，第107页。

③ 1958年第6期《学习译丛》，第30、32页。



艺术（文学），要使艺术（文学）取得它应有的威力，作家就应该有毅力从‘逻辑公式的平面上’跨过。”^①一九五一年，胡风在为他的反党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所作的后记中宣布，作为本书的续篇，他准备写一篇《论形象的思维》的文章。胡风这篇文章没有写成，但从他后来以意见书的形式提出的反党文艺纲领中强调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的指导作用等等，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所预定要写的“论形象的思维”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后来，胡风的反党阴谋被粉碎了，但是他的形象思维的论点并没有得到批判。这时尼古拉耶娃的文章已经被翻译过来，并由出版者以十分推崇的态度推荐给我国文艺界。一九五五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专论的发表，标志着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在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文艺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来继续以形象思维论为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开火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当时的《文艺报》编委、后来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陈涌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搬运尼古拉耶娃的论点，并且援引上述《共产党人》专论中关于文艺有其特殊规律的话，公然反对把《实践论》的思想用于文艺创作，反对应用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认识的阶段论的原理来说明作家的思维过程，诬蔑这种应用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的公式”；从艺术本质和作家思维的根本问题上，为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制造论据。右派分子周勃于同年八月份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

《略谈形象思维》一文对这一点就说得更加露骨。他还依据所谓形象思维的规律，公然向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挑战，宣称：把作家的创作过程表述为这样一种公式——“作家经过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以后，获得了理性认识，然后才进入创作过程”，“是非常有害的”^②。在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对陈涌、周勃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了斗争，但是对他们用来向党进攻的理论武器——形象思维论——却没有触动。当时虽然有个别同志曾经对形象思维论提出批评，但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遭到一些人的反驳。在他们看来，形象思维论既然是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所肯定了的，因而也就是毋庸置疑的。另外有些同志认为，用形象思维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作用是错的，但形象思维论本身并不错；只有形象思维才能说明文艺创作的特点。这样，人们的出发点不同，而结果却是一个：都肯定了形象思维论。从而，形象思维论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广泛地被采用在我们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和大学的文学课程中，成为文艺创作的一个认识论基础了。

六、结 语

上面的论述，完全证实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说的话：现代形象思维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这个体系，为作家的思维编造了一个“从具体到具体、从形象

① 《剑·文艺·人民》，泥土社1953年第3版，第155—156、149页。

② 1956年8月号《长江文艺》，第41页。



到形象”的特殊公式，不允许抽象思维或概念“插在中间”，这就使一切理性思想在作家的头脑中毫无立足之地，从而在文艺创作领域中否定了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的可能性，也使文艺批评成为白费。这个反科学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理论的传播，只能麻痹作家的理性，阻窒作家的自觉，使文艺创作在过渡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自发地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显然，形象思维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如果听信形象思维论，那么，不管我们在文艺创作方面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都会被它勾销得干干净净。显然，不彻底打破形象思维论，就在文艺领域中讲不清道理，从而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各种错误倾向。

形象思维论在我国所以如此流行，正是由于它是从苏联搬来的。像克罗齐之流的赤裸裸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在我国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从来就没有合法地位，建国以来又进一步受到人们的批判。而来自苏联的形象思维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许多主张形象思维论的同志，正是受了蒙蔽，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接受的。而一些混进我们阵营的别有用心的人和受了资产阶级影响而蜕化变质的人，则乘机利用形象思维大做文章，进行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必须进行分析，既不能因形象思维论是个修正主义理论而把一些受人欺骗、曾经主张或宣扬形象思维论的同志说成修正主义者；同时又必须如实指出形象思维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实质，以便人们认清它的危害，同它划

清界限。

就被欺骗的同志来说，他们所以接受欺骗，从认识方面来说，是由于他们对文艺的形象性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没有理解思想与形象的辩证同一性。从精神状态方面来说，则是由于他们的灵魂深处对国外一些文艺家的“理论”，存在着很深的迷信。他们不去研究这些理论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使有时发现这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抵触，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这些“理论”，而是企图把两者调和起来。

我国形象思维论者的错误，从反面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科学的文艺理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是我们从根本上说明文艺创作的科学根据。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以及他对文艺工作的各项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我们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于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遗产进行科学的鉴别，把当代文艺战线上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扫清文艺领域里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妖氛迷雾，并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但是把这个任务明确地提到文艺界的日程上来，并且着手去做，已经是时候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初稿，一九六四年十

月修订，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次修订）



工农兵诗选

人把毛主席著作比太阳

梅茂亭

人把毛主席著作比太阳，
我说太阳比不上；
太阳上山又下山，
毛主席著作日夜放光芒。

战士最爱毛主席的书

薛治本

世界上书籍千千万，
毛主席的书战士最爱念。
篇篇文章是真理，
字字句句金不换。

一天不看毛主席的书，
饭到嘴里无油盐。
天天都念毛主席的书，
一颗红心永不变！

（摘自1966年3月31日《解放军报》）

不靠神仙不靠天

殷光兰

不靠神仙不靠天，
集体力量大无边，
毛主席带着咱办公社，
换地又改天！

晨 读

郭国栋

早晨，
勘察队员散坐在帐篷旁，
吸着清新的空气，
阅读毛主席的文章。

一句……一滴雨露，
滋润人们的思想；
一篇……一阵春风，
吹开心灵的门窗。

身在江边，
胸中翻腾着五大洲的风浪；
脚踏高山，
双手描绘着共产主义的图样。

满怀激情读着智慧的文章，
越读越觉眼明心亮，
字里行间充满着真理，
给人们增添力量。

太阳照耀着山头的白云，
露珠在青草上闪光；
勘察队员捧着毛主席著作，
要把真理的阶梯攀上。



红旗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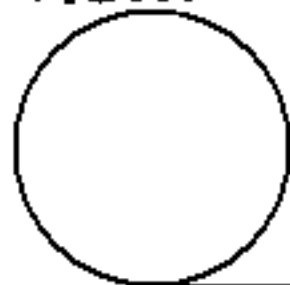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工农兵群众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评吴晗的《投枪集》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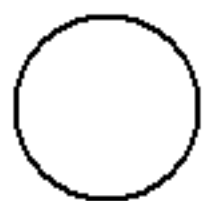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六期 ★

目 录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社论（1）

工农兵群众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10）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本刊评论员（20）

评吴晗的《投枪集》……………史绍宾（23）

附件：吴晗一九五九年编的《投枪集》

是怎样“作伪舞弊”的？……………（34）

☆ 四月二十九日出版 ☆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解放军报》社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毛主席说：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服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文化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还比较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比较多，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比较严重，他们同我们斗争的方法越来越阴险狡猾，越来越曲折隐蔽，只要我们稍不注意，稍有松懈，就不容易看出来，就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甚至丧失我们的阵地。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党和人民的最驯服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它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也要起重要作用。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同全国人民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发挥巨大的威力。

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潮。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我们在文化战线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的斗争，如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及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毛主席的这四篇光辉著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最高峰，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最高指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从反映人民战争、描写人民军队和其他军事题材的作品来看，真正歌颂革命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



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社会上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中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没有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对我军进行破坏，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对我军进行腐蚀。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但是，有人却不是这样看法，他们说部队文艺方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极其有害的，也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十几年来，在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里，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些人经不起考验，犯了或轻或重的错误。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影响。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对部队的影响。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关系到我军革命化建设的大事，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

自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文化战线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就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来了个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些外来的古典的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



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我们部队的文化工作，这几年来也出现了很好的形势。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一九六〇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大多数部队文艺工作者，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连队、农村和工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兵相结合，加强锻炼，改造思想，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因而创作了《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好的戏剧，《欧阳海之歌》等好的小说，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报告文学、战士诗歌、音乐舞蹈和美术作品；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作者。

当然，这些都还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我军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奋发图强，作出应有的贡献。

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搞出好的样板来

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艺，要搞出好的样板来，领导同志要亲自抓。我们有了好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

我们要敢于标新立异，就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努力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毛主席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因此，歌颂那一个阶级，塑造那一个阶级的英雄人物，那一个阶级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区分不同阶级艺术的界线。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



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要成功地塑造英雄人物，在创作方法上，一定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决不能采取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的方法。

部队的作者，要把表现革命战争，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塑造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当作自己的光荣任务。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的时候，去渲染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的时候，去渲染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要搞出无产阶级文艺的好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领导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要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来。

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必须有破有立。不彻底破，就不能真正立。要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艺，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



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有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的古典文艺，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地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

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把好突出政治的关。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不听群众意见，逼着领导人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领导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和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对一些有模糊认识的人，还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

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我们要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



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在文艺评论中，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能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文艺干部， 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为了彻底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必须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远在井冈山斗争的时期，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光辉照耀下，工农红军就建立了红色的文艺队伍。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我党我军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我们的文艺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根据地和军队中，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坚持了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问题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有些人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因而在前进中掉队了。新参加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也带来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还有少数人，根本没有改造，坚持资产阶级立场。

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我们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我们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最高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



书，革一辈子命，改造一辈子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像林彪同志所指示的那样：思想过硬，生活过硬，技巧过硬。我们的文艺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

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这个伟大的革命潮流，必将荡涤一切旧时代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污浊，开创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面对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有信心，有勇气，敢于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努力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原载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

注 释

《武训传》：是一部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坏影片。武训，清朝时代人，是个地主的奴才，影片却把他描写成一个为了贫苦农民子弟取得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人物”。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的反动性，号召全国展开对《武训传》的批判。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大规模的批判。

《红楼梦研究》：作者俞平伯。这本书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烦琐考证的方法，来论证《红楼梦》。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展开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是一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

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一个叛徒，后来又混到革命队伍里来。解放以后，他在文艺界组织黑帮，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四年，他向党中央提

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恶毒攻击党的文艺方针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彻底揭露、粉碎了这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

“写真实”论：“写真实”论，是修正主义的创作主张。反革命分子胡风是主张“写真实”的，冯雪峰也是主张“写真实”的。他们这一伙人强调“写真实”是别有用心的，是要在“写真实”的幌子下，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倾向性，反对文学艺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他们要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专门寻找阴暗的角落和历史的垃圾，他们鼓吹什么“写真实”，目的就是要把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写成漆黑一团。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文艺界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它已经过时了，要另外开辟什么广阔的道路。以秦兆阳为代表所提出的“现实主义广



“阔的道路”论就是这种货色。他们认为：为工农兵服务这条最正确、最宽广的道路是太窄了，是“死硬的教条”，是“给人们画出一条固定不移的小路”。他们鼓吹让作家们根据“各人的生活经历、修养和气质、艺术个性种种条件的不同”，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让人们离开工农兵方向去探求什么“无限广阔的发挥创造性的天地”。

“现实主义深化”论：邵荃麟在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同时，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这个理论要求作家去表现人民群众身上“旧的东西”，去概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塑造出性格错综复杂的“中间人物”形象。要求作家写“平平凡凡”的东西，从而实现“以小见大”，“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只有描写了充满内心矛盾的“中间人物”，概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表现他们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苦难历程”，才是有现实性的，只要这样，现实主义便“深化”了。反之，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描写人民群众的英雄形象倒是不真实，不现实的。“现实主义深化”论是直接来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那里贩来的货色，是一种非常反动的文艺理论。

反“题材决定”论：反“题材决定”论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田汉、夏衍等人都是这种主张的积极鼓吹者。无产阶级的作家选择和描写什么题材，首先考虑这个题材是否对人民有益。选某一个题材，写某一个题材，都是为了兴无灭资，鼓舞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题材决定”论者认为这些正确的主张是清规戒律，“有彻底破除之必要”。他们以扩大题材为名，宣传离“革命经”，叛“战争道”。说我们的电影写革命，写武装斗争的太多了，不离经叛道，电影就不能出新品种。还有些人宣传要写什么“人情味”、“人类爱”，写“小人物”、“小事情”等。这些主张，实际上就是企图使文学艺术脱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

“中间人物”论：“写中间人物”这个错误主张的主要倡导者是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邵荃麟。他在一九六〇年冬至一九六二年夏曾反复鼓吹这个主张。他诬蔑我国贫农、下中农的大多数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状态”的人，主张文艺作品应当多写这种“中间人物”。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写中间人物”去散布对社会主义怀疑动摇的情绪，抵制和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写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

反“火药味”论：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学，大肆渲染战争恐怖，宣传“活命哲学”、投降主义，涣散人民的斗志，为帝国主义效劳。近几年来，我国也有这么一些人，一再地叫嚷，说我们的文学作品火药味太多了，舞台上枪杆子太多了，这样就没有艺术性了。要作家离“革命经”，叛“战争道”。反“火药味”论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在我国文艺界的反映。

“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周谷城为代表所提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周谷城不承认时代精神是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不承认时代精神的代表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阶级。他提出，“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起来才能叫做时代精神，“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都要包括在时代精神之中。“时代精神汇合”论，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

别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俄国民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他通过文艺批评活动，反对沙皇时代的农奴制和专制政体。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俄国民主义者，批评家，作家。他坚持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反对沙皇，反对农奴制。

杜勃罗留波夫（一八三六—一八六〇）：俄国民主义者，文艺批评家。他进行了反对沙皇政体和农奴制度的活动。



工农兵群众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

编者按：本刊编辑部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几位同志，最近先后到太原、天津、苏州、上海、济南、沈阳、鞍山、长春等地区，在当地党委和驻军部队党委的大力支持下，邀请部分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举行了学术批判座谈会。所有到会的同志都非常关心当前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他们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运用毛泽东思想，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一致认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助威打气，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对吴晗所宣扬的“清官论”、“让步政策”和“道德论”，也作了深刻的批判。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刊只就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按问题摘录一部分加以整理，发表在这里。所有这些座谈会的纪要全文，另在《哲学研究》一九六六年第三期发表。我们认为，工农兵群众的发言，很值得大家读一读。

一、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我们工农兵一定要坚决、
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

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揭露和批判吴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政治目的的文章。这些文章揭得好！批得有劲！这场大讨论决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更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一场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天津劝业商场日用百货部副政治指导员李克勤）

这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的大事。

我们工人阶级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要站在第一线，一定要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天津仁立毛织厂基层工会主席李长茂）

我们与吴晗的争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贫下中农必须积极参加这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要冲锋陷阵，站到斗争的最前列，和吴晗论战到底，坚决、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山西汾阳县上堡大队李纪淮）

吴晗从思想上向我们进攻，企图毒害我



们青年一代，叫我们放弃枪杆子。他想叫我们国家变颜色，出修正主义。美帝妄想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四代身上。吴晗散布各种毒素正是和美帝国主义起了配合作用。（南京路上好八连副班长范守安）

吴晗借用海瑞这个死人的嘴来骂党、骂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能答应，解放军战士在思想战线上也要有敢于拚刺刀的精神，把各种各样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拚垮。（解放军某部雷锋班战士何绍勇）

我们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切牛鬼蛇神和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休想蒙混过关。不论什么人，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战士就拿出敢于刺刀见红的革命精神，一定和他斗争到底。（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购员张志高）

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作为照妖镜，使吴晗的反动面貌原形毕露

我们有毛主席的思想作为照妖镜，吴晗尽管有花言巧语，也是迷惑不了我们的。（沈阳鼓风机厂工人张明利）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藤儿结什么瓜。吴晗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和我们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根本不一样。吴晗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思想感情，不管用什么方法借尸还魂，我们只要运用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下，就可以把它的反动本质揭出来。吴晗把政治问题说成学术问题，想来个“金蝉脱壳”是脱不了的。（李长茂）

有人说：“不读完二十四史，就没有资格评价历史人物。”这是吓唬工农群众。我们不读封建地主阶级写的二十四史，我们用毛主席著作就能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彻底打退。（山东历城县祝甸公社徐文亮）

我们对中国历史没研究，文化低，没上过大学，没念过大书，但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能看清吴晗的反动面貌。去年从报上看到吴晗的观点，就觉得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的屁股是坐在资产阶级那一边，为资本主义复辟拚命效劳。只要我们掌握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能剥他的皮，看他的骨，吴晗怎么耍把戏，也不能使我们上当。（沈阳服装鞋帽商店营业员沈素娟）

二、《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不是什么学术问题**

吴晗做贼心虚，剥了他的画皮，他来个

假检讨，出尔反尔，企图迷惑大家。在我们同他进行斗争时，他又狡猾地说，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这是诡辩手法。（上海求新造船厂安装车间副政治指导员张银荣）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我们来看看，吴晗所“站稳了的”究竟是什么立场。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三面红旗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的时候，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罢”了他们的“官”。在这个时候，吴晗又“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除了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抱不平，鼓励他们继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外，又能是为别的什么呢？如果吴晗说自己在“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话，那么很显然，他“站稳了的”正是资产阶级立场，而决不是无产阶级立场。（李长茂）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忘记了阶级斗争”。吴晗不是忘记，恰恰是挺身而出骂我们，这本身就是向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南京路上好八连副指导员徐树仁）

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拆社会主义的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要看清他的本质，不能被现象所迷惑。（解放军某部干事宋双新）

《海瑞骂皇帝》的中心就是骂党

正当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时候，说什么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等。吴晗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他的《海瑞骂皇帝》，并

说：“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这到底是为谁说话，不是明摆着的事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钳工张长山）

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中心就是“骂”，戳穿了就是骂党。他是配合当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煽风点火，向党进攻。我们都知道，封建社会里，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臣哪敢骂皇帝，这是歪曲史实。其目的就是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天津仁立毛织厂染整车间指导员刘景琪）

海瑞骂皇帝是假的，他对皇帝是忠是爱，吴晗骂党、骂社会主义倒是真的。（上海市政公用设备公司人保科王志文）

党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命根子。吴晗把矛头指向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的恶毒用心，激起了我们的无比愤恨。我们劳动人民坚决不答应。吴晗的恶毒阴谋，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击。（李克勤）

《海瑞罢官》是鼓励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失败了再干

庐山会议后，我们打退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职，“罢”了他们的“官”，吴晗又写了《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鼓励他们继续向党进攻，要他们学习“海瑞精神”，失败了再干。（鞍钢无缝钢管厂退火工陈洪斌）

吴晗通过《海瑞罢官》这出京戏，反对三面红旗，在唱词中这样写道：“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从而唱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他自己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心里话。我们要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吴晗就



鼓吹单干，说什么“退田才能使民安”。这“民”指的是谁？就是指那一小撮地、富、反、坏。这明明是要反攻倒算。如果真让这些“民”安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变了颜色，广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又要遭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但这是妄想，我们劳动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定要保住社会主义江山。（刘景琪）

吴晗还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搽粉抹脂，说什么：“海瑞罢官姓名香”，“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有谁怀念他们呢？

有吴晗，还有一小撮人。他们不但怀念，而且美化、同情。吴晗说：“海瑞罢官姓名香”，实际上是跟党唱对台戏。我们劳动人民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唾弃、痛恨。他们的名声是遗臭万年。在今天，真正流芳千古的是忠于党、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焦裕禄、雷锋、王杰等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吴晗！你看不见这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却把人民唾弃的、阶级敌人拥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看成是“好官”！这难道不是和阶级敌人一个鼻孔出气吗？（李克勤）

三、彻底驳倒吴晗“清官论”的鬼话

“哪有猫儿不吃荤，哪有官儿不贪财”，旧社会根本没有“清官”

在旧社会里，无官不贪。所有的官，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吃人肉、喝人血的坏家伙。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官，没有一个好玩艺。（山西汾阳县北关大队老贫农马成速）

旧社会从来没有什么“清官”，从唐宋元明清不论什么朝代的官，直到国民党的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保甲长、狗腿子，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过去的俗话说得好：“做了一任官，十年吃不完，做了三任官，子孙后代不受穷”。他们嘴上说的是“天官赐福”，内心里是“男盗女娼”。旧社会做官的都是有钱人，没有三百两银子不能进考场，穷人连饭都吃不饱，书都读不起，哪有做官的。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清官”，“哪有猫儿不吃荤，哪有官儿不贪财”。（苏州市三轮车工人蔡学富）

所谓“清官”和贪官是“四个一样，一个不一样”。四个一样是：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一个样；效忠皇帝、巩固皇朝统治一个样；替地主富农讲话、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一个样；为自己升官发财、官上加官、富了更富一个样。一个不一样：压迫、统治人民的手法不一样，贪官明显，“清官”暗。“清官”是嘴里讲出糖来，心里拔出刀来。正如六月里的隔夜红烧肉，看看红冬冬，吃吃臭烘烘。（江苏太仓县沙溪公社印南大队第四生产队女社员曹云亚）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按封建王法断案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官都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论“清官”、贪官，都是一号货色，都是为反动封建王朝、



地主阶级效劳、卖命的忠实走狗。(解放军某部红九连指导员王银泽)

俗话说：“官向官，吏向吏，老虎向着把门的”，意思是说，官儿虽然不一样，要是打官司，小地主向着大地主，大地主包庇小地主，官总是向着官。海瑞只能为封建统治者说话，绝不可能为穷人说话，为穷人伸冤。(解放军某部红三连战士高真德)

“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这句话是农民凭空想出来的吗？不是，这是农民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农民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一个真理。(沈阳和平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李素文)

在封建社会里，“王法”只有官老爷知道，劳动人民根本不晓得那上边写了些啥玩艺。打官司的时候，官老爷说的就是“王法”。“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官老爷根据“王法”断案，总要让有钱人打赢官司。我村农民吴怀明，在自己靠渠边的地里栽了五棵树，村长贾昌明(恶霸)说，树根扎到了渠里，树应该归公。吴怀明不答应，村长就把他告下了。吴怀明接到传票后去打官司，进了衙门，一直往里走，走到二堂正好碰见官老爷与贾昌明勾搭，他就说，你们私下串通好了，还打啥官司。官老爷发着脾气说：“吴怀明冒犯公堂，犯了欺上之罪；在衙门还敢如此猖狂，在乡下定是刁民。”于是判了八个月徒刑，树归了公。“归公”后，贾昌明却用这些树给自己盖了一间房子，做了一口棺材。叫吴啥听听，官老爷断的案子公不公，劳动人民冤枉不冤枉。(山西汾阳县贾家庄大队副

大队长范仰高)

有一种说法，执法“公正”，按法律办事，就是“清官”。这也要看法律的阶级本质，看法律是谁制定的，为谁服务的。法律是专政的工具嘛！封建的法就是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本身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压迫人民的，它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正。无论海瑞也好，包公也好，他们是否按照法律办事，这点我们不用去研究；就是完全按照法律办事，也是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穷人在旧社会有冤无处诉，就是因为旧社会的法律不是保护穷人的。(宋双新)

“官向官，民向民，
朝朝代代都是官压民”

“官向官，民向民，朝朝代代都是官压民”。从来没听说还有“官为民”的道理。每朝每代都有阶级斗争，代表什么阶级就为什么阶级服务，这是阶级本质决定的。(解放军某部红三连战士向本宏)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为的朝里人。”在旧社会里，穷人有苦无处诉，有冤没处伸，哪有替穷人说话、给穷人办事的官？(太原冶金公司老工人张万千)

把“清官”说成“为民请命”，甚至说成是人民的救星，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试问：在解放前，有哪一个“清官”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农民世代累得腰弯骨折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清官”来给他们解除贫困。“为民请命”这句话在历史上不过是用来美化



封建统治阶级的假面具。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宣传。今天人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试问吴晗还要谁去替我们请命呢？又是向谁请命呢？吴晗之流要替被劳动人民打倒了的统治阶级来请命，向人民请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幻想。（吉林舒兰煤矿工人袁振祥）

封建官僚之间也有斗争。他们互相勾心斗角，那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是狗咬狗，大鱼吃小鱼，而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贪官贪得太多了，侵犯了封建王朝的利益，封建王朝要对贪官打击一下。封建地主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斗来斗去，还不是老百姓遭灾受难。（太原重型机械厂工人杨耀宗）

吴晗的“清官论”

是“合二而一”的阶级调和论

吴晗说海瑞为民作主，为民伸冤，这是散布阶级调和论。吴晗把“官”与人民串起来是为了迷惑人民，取消阶级斗争。（上海国棉一厂织布挡车工杨富珍）

吴晗说海瑞既忠君又爱民，这是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调和在一起，这就是“合二而一”。（苏州阊门厂工人侯志高）

有人说对“清官”也要一分为二，“清官”一方面为地主服务，一方面为农民服务，这完全是歪曲。地主和农民是两个敌对的阶级，认为“清官”既为地主服务，又为农民服务，是合二而一，不是一分为二。（江苏无锡县陆区公社永宁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福元）

我们对敌人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但是不能把敌人的一部分——所谓“清官”，分到人民方面来，弄得敌我不分。（杨耀宗）

在阶级社会里，一分为二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抽去阶级斗争的一分为二。如果像吴晗那么一分为二，就会把帝国主义分为战争的一面和和平的一面，正像修正主义把帝国主义说成战争派和明智派一样。这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张银荣）

吴晗不仅吹捧“清官”，还不准别人批判。吴晗说谁要批判“清官”，就是往老祖宗脸上抹黑。咱们的祖先是劳动人民，不是那些“清官”、赃官。我们要批判他们，整他们，彻底批判彻底整。对有这种观点的人，像吴晗，也要彻底批判彻底整。（沈阳橡胶机械厂钳工王瑛）

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

才是劳动人民的救星

吴晗说清官是人民的救星。这是胡说。过去我们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受打挨骂，连活的权利都没有，吃不上，穿不上，那有“清官”出来搭救一下呢？解放前，我们家到处要饭，那有“清官”出来过问一声呢？这不但是我们一家，所有穷人都这样。这说明在旧社会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星。真正的救星是伟大的党和毛主席。（解放军某部雷锋班班长于泉洋）

劳动人民的真正救星只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垮了地主和恶霸，给我们贫下中农分了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又引导我们走上集体化道路，让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人民的

救星是谁，灾星是谁，连三岁的小孩子也知道，吴晗为啥硬要说“清官”是人民的救星。我看，他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山西汾阳县馮家庄大队贫协主任张亨福）

四、反动阶级对劳动人民根本没有“让步”，只有反攻倒算

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寸步不让

吴晗和翦伯赞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这完全是胡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越多越好，压迫是越狠越好，真是寸利必争，寸步不让！农民和地主斗争，是谁也不让谁，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斗争。说地主阶级可以向农民“让步”，那是睁眼不看事实，想调和阶级矛盾，是替地主说话。（山东历城县祝甸公社辛甸大队社员李景河）

吴晗、翦伯赞说，农民起义失败后，统治阶级对农民会采取“让步政策”。按这个说法，就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了。世界上的统治者会不会这么仁慈呢？革命战士知道，反动阶级只有反革命两手，没有什么仁慈。人民遭到暂时的失败和挫折，反动派只会反攻倒算，只会更加残忍地屠杀，绝不会有什么“让步”！（解放军某部红三连学员余宝元）

剥削阶级就是要剥削劳动人民，俗语说：“狗走千里要吃粪，狼走千里要吃人”，他们的本性是不变的，不可能对农民有什么“让步政策”。（江苏沙洲县港口公社庄溇大队党支部书记陶明保）

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像“屋檐上的洋葱，叶焦根烂心不死”

反动统治阶级不仅掌握政权时没有让过步，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他们也从来不肯“让步”。许多事实可以说明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决不肯“让步”。农村中的地富反坏，表面装得很老实，骨子里无时无刻不想复辟变天。（江苏吴县洞庭公社星光大队党支部书记戚根大）

阶级敌人确实是不死心的。如太仓岳王公社有个反革命分子，一贯仇恨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他装成狐狸精到处放火。第一次放火后，见啥人去救火，第二天就烧啥人家，先后共烧了十四户，烧死十一人，损失一万多元。以上事实说明，阶级敌人与我们劳动人民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决不会“让步”的。阶级敌人就是被我们斗倒了，还是像“屋檐上的洋葱，叶焦根烂心不死”。（曹云亚）

永宁大队石漕头生产队一个地主分子，在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时，洋洋得意地对干部说：“现在我们是四类分子，蒋介石一来，你们就是四类分子，公社干部是一类分子，大



队干部是二类分子，共产党员是三类分子，生产队长是四类分子。你们一个也跑不掉。”他还对共产党员、生产队长沈忠良说：“蒋介石来了，你当心要去拜阳山（意思是要枪毙在阳山上）”。（周福元）

剥削阶级从来没有向人民“让步”过。就连吴晗本人，我们给他这么高的地位，他也没有“让步”，还要猖狂进攻，这就反映了他的阶级本质。（王志文）

**推动历史发展的是阶级斗争，
不是反动阶级的“让步政策”**

吴晗、翦伯赞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荒谬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让

步”——推动了历史发展。这些都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早已教导我们的。他们说统治阶级“让步”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歪曲历史。（王志文）

阶级敌人历来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的解放不是从剥削阶级的“让步”得来的，是我们工农群众拿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拿起枪杆子，经过流血斗争，才推翻了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所谓“让步政策”是捏造的谎话，是要模糊我们的阶级观点，我们要擦亮眼睛，高举阶级斗争的纲，决不上当。（江苏昆山县葛墩公社金星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小毛）

五、吴晗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为 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无产阶级道德和地主资产阶级
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
决不能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

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道德，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一个“公”字，资产阶级道德就是一个“私”字，两者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解放军某部雷锋班战士许振江）

我们劳动人民的道德是“专门利人，毫不利己”，而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我们的道德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他们的道德是“剥削第

一，金钱第一，个人第一”；我们劳动人民是艰苦朴素，勤劳勇敢，而地主资产阶级是不劳而获，坐享其福。在旧社会，地主是肩不挑担，手不提篮，住的高楼大厦，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我们农民一年忙到头，今年盼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汗滴在别人田里，眼泪掉在自己屋里。地主是春有春景，夏有夏景，秋有秋景，冬有冬景，而我们农民一年到头，妻离子散，一片惨景。这就是地主剥削农民、吸农民血的道德。（陶明保）

吴晗说，他说的继承是继承其中好的部分。我们说，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那有一



点好的部分。(李纪淮)

地主资产阶级表面讲的是“仁义道德”，实际是“男盗女娼”。这有什么可继承的？在旧社会里，剥削阶级害死了我们多少阶级弟兄，吴晗还要我们继承他们的道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太原钢铁厂工人李文山)

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 都是吃人的道德

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一把杀人的大刀和一个剥削人的大算盘。旧社会的万人坑和白骨塔就是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最好的说明。(解放军某部雷锋班战士任志顺)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在我们看来，这是缺德。(解放军某部雷锋班副班长曲建文)

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不吃穷人不肥，不杀穷人不富”的道德。(柯绍勇)

封建道德和封建王法一样，都是地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枷锁，只是花样不同，一文一武，一个是镇压手段，一个是欺骗手段，一个是限制人的行动，一个是束缚人的思想。(冯成连)

吴晗说，地主阶级有什么“勤劳”、“刻苦耐劳”的美德，这完全是为了美化地主阶级，连个三岁的娃娃都不如，三岁娃娃都知道地主老财不劳而获，专靠剥削为生。如果说，地主既“勤劳”，又“刻苦耐劳”，那和农民有什么两样？！(太原邮电局投递员李桂芬)

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劳而获，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那来的勤劳呢？勤劳只有劳动人民才具有。剥削阶级不是勤劳而是

“勤捞”。日夜“勤劳”地想通过什么手段好更多地剥削穷人，大斗进，小斗出，利滚利，不“勤劳”地动心思那能想出这么多方式来。

(解放军某部雷锋班战士余长合)

吴晗！查查你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家谱，能有像雷锋同志这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吗？

吴晗说，无产阶级若不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就只好“凭空创造”，然而“凭空创造”又不可能。这段话拐了几个弯，抹了几个角，就是不承认我们无产阶级具有自己的道德。这是对无产阶级的污蔑。(余长合)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班长雷锋同志，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党叫他干啥就干啥。雷锋把人民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雷锋处处是人民的勤务员。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班长及许多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难道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最高尚的道德吗？(解放军某部雷锋班战士冯富臣)

我们老班长雷锋同志是人人皆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男女老少都发自内心地向他学习。他为什么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能具有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呢？难道是从海瑞那里学来的吗？吴晗！查查你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家谱，能有这样的道德吗？把海瑞的皮扒了，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一点点这样的道德来。(曲建文)



**要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就要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

雷锋班长说：“我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以后，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这说明了只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能产生出伟大的共产主义道德，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只有头脑中没有我字，去掉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的人，才是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这种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高尚的，是其他任何阶级所没有的。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有这样的道德。高尚的道德来源于高尚的思想，高尚的思想来源于毛主席的教导。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许振江）

不破除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树立不起来。我们的观点正好与吴晗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说无产阶级不能“凭空创造”自己的道德，必须“吸取”地主资产阶级的“优良品德”，我们说，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道德，必须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彻底粉碎，彻底批判。不批判旧的道德，我们的道德就树立不起来。（宋双新）

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说过：“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决不能让地主资产阶级文人学士占领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斗争，谁胜谁负，还没有解决。我们不仅要紧握手中的枪，并且要占领学术阵地。（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李德辉）

过去看戏都是帝王将相，工农兵在舞台上没有位置，现在把工农兵也搬到舞台上，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就是好。历史研究也有个方向问题，是歌颂帝王将相，还是歌颂劳动人民？史学界应和戏剧界一样，也来个革

命，要研究劳动人民的斗争史。（宋双新）

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占领历史、哲学、文艺阵地，培养出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上海轻工业机械厂老工人李新宝）

我们工人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的。我们也要关心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绝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使得我们国家变颜色和出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但把它用到生产方面，还要用到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方面。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太原某厂工人胡春琴）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本刊评论员

几个月来，学术界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令人特别兴奋的是，广大工农兵群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斗争。最近，很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议论，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他们说，这场大论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不能不管，不能不问，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赢得这场大论战的彻底胜利。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使这场大论战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创举。在旧社会里，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术论坛完全是被一小撮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所垄断的，他们搞学术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农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参加学术工作的可能。人们一提起学术，一提起理论，总认为这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国人民革命胜利了，工农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做了主人，也要做文化的主人。剥削阶级垄断文化学术的丧钟敲响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工农兵群众直接登上学术论坛的时代也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事实证明，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武器，不仅能够用它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且能够用它参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一切革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却感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快要完蛋了，于是制造种种借口反对工农兵参加学术批判。他们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说什么，“不读完二十四史，就没有资格评价历史人物。”说



什么，“工农兵不懂历史！”在他们看来，工农兵群众没有资格在学术问题上发言。

工农兵群众对这种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他们说，我们虽然没有读过地主阶级写的二十四史，但是，我们有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自己革命斗争的实践，我们有自己的“四史”——家史、村史、厂史、社史。有了这些，我们就能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一切骗人的谬论彻底驳倒。

完全正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最强大武器，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四史”是驳斥剥削阶级邪说的有力根据。

说“工农兵不懂历史”。我们倒要问问，究竟什么是历史？究竟是谁不懂历史？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①地主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历史，歪曲阶级斗争的真相，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完全抹杀劳动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一味歌颂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完全被颠倒了。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即使能把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也不能算懂得历史。

什么人才真正懂得历史呢？不是那些把二十四史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们，而是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干部。

工人，贫农下中农，他们记得自己的悲惨的家史，他们熟悉自己的村史、厂史。在这些历史里，有剥削，有反剥削，有压迫，有反压迫，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曾经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才最懂得阶级斗争的历史。

工农兵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所以他们嗅觉灵敏，眼光锐利，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分得最清，看得最明。本刊这一期发表的工农兵群众学术批判座谈会的材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的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政治。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党和社会主义看作是自己命根子的工农兵群众，对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狡猾手段，都能看出来，嗅出来，一语道破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目的。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即使对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也能够发表深刻的正确的意见。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讲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讲也讲不出来的革命的科学的道理。他们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本质，三言两语把道理讲得明白透彻。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所谓“清官”问题，曾经迷惑了許多人。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的家史和村史、厂史，证实了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清官”。他们说，“哪有猫儿不吃荤，哪有官儿不贪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清官”完全是地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编造出来的。

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相当流行的观念。而工农兵群众一听吴晗、翦伯赞宣扬“让步政策”的谬论，就明确指出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狗走千里要吃粪，狼走千里要吃人”，地主阶级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现在地主被我们打倒了，还像“屋檐上的洋葱，叶焦根烂心不死”，不肯“让步”，怎么能够想象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后却对农民采取什么“让步政策”呢？

在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上，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把剥削阶级的道德说得美妙的很。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控诉了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吃人的道德，是“不杀穷人不富”的道德。他们说，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没有一点好东西。

看！工农兵的阶级观点多么明确，旗帜多么鲜明，道理讲得多么透彻。

在我们整个革命事业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里的斗争，要靠工农兵；文化革命，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也要靠工农兵。工农兵群众不仅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主力。没有工农兵群众的参加，任何革命都不会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依靠工农兵群众，发动工农兵群众，才能保证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子。

在文化革命中同在其他领域的革命一样，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①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当前的学术批判中，再一次证明，知识分子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和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同工农兵群众一道进行战斗，才能在文化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工农兵群众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取得文化革命的彻底胜利。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6页。



評 吳 哈 的 《投 槍 集》

史 紹 賓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吳哈在《海瑞罵皇帝》發表的同時，又把他四十年代寫的雜文編集成《投槍集》出版。

吳哈為什麼選擇廬山會議前夕拋出這批舊貨並且命名為《投槍集》呢？他在《前言》里說：“我們當年的確這樣想過，這樣說過，這樣罵過，這樣鬥爭過，這一段歷史，是值得回憶的，也還是值得年青的一代參考的。”在《海瑞罵皇帝》里，他頌揚海瑞那種敢“罵”的勇敢精神；在這裡，他又毛遂自薦，要人們“回憶”、“參考”他自己“罵過”、“鬥爭過”的“光榮歷史”，並且把這種“罵”的精神點化為自己的一杆“槍”，然後宣稱：“有槍總得使，怎麼辦？放不得，投它一下如何，管它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會有點痛的，……”於是，他就把這本雜文，命名為《投槍集》。

我們要認真考察一下，吳哈在四十年代寫的那些雜文究竟是一杆什麼槍？它在當時是投向誰的？他在一九五九年拿出來，又是投向誰的？

一個政治騙局

吳哈長期以來吹噓自己四十年代的所謂

“革命”歷史，這是他招搖撞騙，反黨反人民的主要政治資本。

其實，他所炫耀的“革命”歷史，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從解放以來，吳哈就着手偽造自己四十年代的歷史。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逐步深入，為了適應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目的，他對自己歷史的捏造，也逐步“升級”，一連串神話越編越離奇。到了現在，吳哈竟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個民主革命時代的“英雄”。

讓我們來排一個吳哈偽造歷史的時間表：

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寫了《我的治學與思想是怎樣進步的？》^①，裡面有一段頗值得玩味的话：

“我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成年成月把自己關在研究室里，教書的時候因為討厭國民黨腐敗，不願接觸政治，自己專心於學術研究，一九三七年到昆明時，仍然抱這種態度。但自一九四〇年以來國民黨統治愈來愈壞，湘桂戰役一

^① 《中國青年》第8期，1949年5月。



败涂地，加之恶性通货膨胀，自己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天困苦，于是对国民党由讨厌到痛恨。”

话说得多么漂亮，三十年代就“讨厌”国民党，四十年代以来又由“讨厌”到“痛恨”。

但是，事实证明，吴晗在三十年代“专心于学术研究”，并不是什么“讨厌国民党”的表现，而是忠实执行胡适为国民党效劳的“科学救国”反动路线的表现。

不过，刚解放，吴晗伪造历史的胆子还不像后来那么大，还多多少少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消息。比如说，他对国民党态度的一些转变，主要是在湘桂战役以后，即一九四四年以后，原因则在于，“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天困苦”，不能再保持和“一般人”的不同，不能再“养尊处优”了。这时，他还不肯大肆渲染他对国民党究竟怎样“痛恨”。

到了一九五〇年一月，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①，就升了一大级。他说：

“在行动方面说，十年来是跟着进步力量走的，在紧要关头也没有吝惜过自己”。

从此，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为了革命“没有吝惜过自己”的“英雄”。而且在文章中大言不惭地说，“我和一多”怎样怎样，把自己和闻一多相提并论，从烈士身上捞取政治资本。

一九五九年七月，吴晗在为《投枪集》写的《前言》里面，更升一级，硬把自己挤进闻一多、李公朴这些革命烈士的行列中去，说什么当时自己写的文章，刺痛了国民党，“要

不痛，怎么会连李公朴闻一多这样的人也乱杀？”

我们要质问吴晗：闻一多、李公朴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英勇牺牲的时候，你在哪里？干了些什么？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②而你呢？要你与闻一多一起留下来，你却坐上飞机，去奔自己的“锦绣前程”。这叫做“在紧要关头，也没有吝惜过自己”吗？这样的吴晗，竟然把自己与革命烈士并排在一起，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吴晗为了抵制批判，进行反攻，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③把牛皮吹到了极点，公然说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这样，一个进行政治投机的流氓，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二十多年来站稳了立场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在上述一连串伪造历史的记录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骂皇帝》的同时出版的《投枪集》。《投枪集》收的几十篇杂文中，贯串着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吴晗正是要拿这些资产阶级的黑货直接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把它投向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把这几十篇杂

① 《中国青年》第32期，1950年2月。

②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9页。

③ 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



文的原貌和盘托出，就会揭穿他多年伪装的进步面具。又要“投枪”，又要粉饰自己的历史，“怎么办”？于是，吴晗冥思苦想，“想了个把月”，精心制造了一个政治骗局。

骗局之一：吴晗说，“重温这些文章，大体上都是骂国民党的。”他这么说，是企图免除人们的怀疑，叫人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不仅如此，说穿了，这是要用骂国民党的话，来骂共产党，骂无产阶级专政。

骗局之二：吴晗说，“在当时情况下，行文时只能国民党和共产党并提，虽然语气有不同，中心论点有不同，但在提法上，只能这样说，不这样是发表不了的。”由于书中明明有着反共语调，要让人们一点不生疑惑是不可能的，吴晗又托辞于“当时的情况”。这就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并提”，乃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骂共产党，是因为“只能这样说，不这样是发表不了的。”为了能够骂国民党，不得不让共产党陪斩！其责在于环境，并不在他呵！吴晗用这种手法把他当年骂共产党的话公然重新拿出来，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骗局之三：吴晗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除个别地方文字上稍加改动以外，如满清一律改作清朝之类——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吴晗郑重声明这些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如果“以今天的看法来代替十多年前的看法”，那是“作伪舞弊”，“何苦呢，又何必呢”？这是他最后的一着棋，是一种政治骗子的手段。他以为，既然作了这样的声明，别人就不会想到这位自称尊重“历史

事实”的“学者”，竟会上下其手，“作伪舞弊”，从文章里抹去一堆见不得天日的反动东西！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投枪集》和原来发表的文章对照，有许多重大的删改，改掉了许多露骨的反共、反革命的东西，绝不只是“满清”改为“清朝”之类的个别改动，更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吴晗究竟怎样篡改原文，其中大有奥妙，我们不惜篇幅，作了个校勘表，附于篇后，也算是“奇文共欣赏”吧！

骗局终难持久，谎言掩盖不住事实。

下面，我们就来剥开《投枪集》的画皮，看看吴晗的本来面目。

吴晗向国民党三上“治安疏”

《投枪集》没有收入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文章，这不是偶然的。吴晗自己也觉得，一九四三年以前，他对国民党死心塌地，一点“火气”、“辣气”都没有，拿不出装样子的“骂国民党”的东西来。吴晗怎样从不骂到骂，所谓“骂”又是怎样性质的骂，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写的《说士》、《论贪污》、《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三篇文章，勾画出了他的脸谱。

一九四三年，吴晗在国民党官方报纸《云南日报》上发表《论贪污》一文。如果我们把这篇文章和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大吹大擂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对比，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巧合”。

海瑞在《治安疏》里列举当时“不治不安”



的情况是：“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吴晗则说当时“内政不修”的现象是：“政出多门，机构庞冗，横征暴敛，法令滋彰，宠佞用事，民困无告，货币紊乱，盗贼横行，水旱为灾等等”，“而最普遍最传统的一个现象是贪污。”

海瑞向嘉靖皇帝表白，他上《治安疏》的目的是为明王朝“求万世治安”。吴晗则向蒋介石集团表白，他所以写《论贪污》，是为了“翻翻陈账，看看历代覆亡之原，再针对现状，求出对症的药石，也许可以对抗建大业有些小补”，亦即帮助蒋介石总结统治的经验教训，使他免遭“覆亡”。

当然，海瑞是四百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僚，他向嘉靖皇帝提出的方案只能是“正君道，明臣职”，说来说去还是维持封建纪纲那一套；而现代的吴晗为蒋介石设计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蓝图，却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换句话说，吴晗是希望蒋介石修明内政，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求得蒋家王朝的“万世治安”，自己也好“爬在桌子底下等啃骨头”。这是现代化的海瑞的“正君道，明臣职”。

在《说士》这篇文章里，吴晗征引“史实”，上及春秋，下迄近代，反复说明“士”（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重要作用。他说，士对“上层的贵族阶级说，是维持治权的唯一动力，王、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权立刻崩溃，连身家也不能保全。”他代表一部分想从蒋家王朝找出路的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向当时“上层的贵族阶级”——蒋介石集团呼吁：“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并且说，“这是今后全国所应全力以赴的课题。”这是吴晗向蒋介石上的第二个“治安疏”。

但是，蒋介石这个寡头独夫，连一片小小的“民主布”也不想要，对吴晗的这个“治安疏”并不赏脸。吴晗的物质生活也每况愈下，教授的“身分早已经没有了”，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吴晗有点骂人了。

可是，吴晗并没有死心。一有机会，就要向蒋介石献策，希望得到重用。一九四四年，他三上“治安疏”，又在国民党官方报纸《正义报》上抛出了他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这篇文章开头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结尾又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吴晗翻来复去强调这一点，生怕蒋介石忽略了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

吴晗是怎样用“历史讽刺现实”的呢？

他借分析明末形势的题目，影射当时的现实：“国上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兵威所蹂躏”。为了加强暗示，他反复说“流寇纵横晋陕”，“流寇主力恣张晋豫”等等。很明显，吴晗是站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区等同起来，说什么国土沦于“流寇”和异族。他要蒋介石接受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却用全力来扩充



队伍”。要蒋介石指挥那些“按兵不动”的左良玉们，用“全力来消灭”被吴晗诬称为“流寇”的八路军、新四军。

《说士》、《论贪污》、《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这三篇“治安疏”，集中地反映了吴晗当时的政治立场。吴晗的老朋友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是“清官”，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确实是深知吴晗的，吴晗确实是蒋介石的“清官”。

第三条道路的狂热鼓吹者

一九五〇年，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自我吹嘘，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以为共产党是对的，好的，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这就是说，当时他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在《投枪集》中，收进了他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写的《论中立》一文，里面五处提到：“中间路线是没有的！”“中间路线是没有的。”“绝对不站在中间。”“绝对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路线这一个名词。”

你看，当年的吴晗是多么革命，多么进步，多么坚定，多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对中间路线是多么深恶痛绝，连这个名词都要坚决消灭掉！

请勿上当，这是弥天大谎！

当年的吴晗是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最狂热的鼓吹者。正是他自己，以所谓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而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的代表自居，标榜中间路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总

路线。

上面提到的五处反对中间路线的话，都是他“作伪舞弊”，在解放后的一九五九年，偷偷地添上去的。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早在一九四三年，在给蒋介石上的第一个“治安疏”——《论贪污》中，他就提出了最根本的政治主张：“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亦即把封建主义的社会改变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实质上，这只能是巩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这就是吴晗二十多年来一贯追求的理想。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针锋相对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个前途：一个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一个是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等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妄想充当“中间式的调人”、“相对的平衡的力量”，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进行政治投机，大捞一把。

旧政协协议签字以后，吴晗欢喜欲狂，说什么“远东的天际，逐露一线晨曦，中国新生了。”他以为国民党既然“承认”了各个政党的法律地位，今后就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用主义来竞争，来争取人民的信任，走上多党政治的常规了。”吴晗是想用他的美国货，在“平等的地位”上和共产党竞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炮声，使吴晗“中间式的调人”做不成了，于是，他鼓吹建立一种“新基础”。什么是他所说的“新基础”呢？据说，它是“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人民利益的”，也就是超出国民党，又超出共产党的利益的。它的中坚力量，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间阶层”，吴晗这样的“卓越的民主斗士”就是他们的代表。吴晗宣布，它是“中国前途的引导者”。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只有吴晗之流的所谓“卓越的民主斗士”，才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所以他狂妄地叫嚷，“这力量的本身就是天平秤，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请看，吴晗鼓吹第三条道路，鼓吹中间路线，鼓吹建立中间力量，达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吴晗竟然在仅隔三年多以后的一九五〇年，说自己当时早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这种撒谎的勇气，实在令人吃惊！

第三条道路实质上就是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弱，拿不出装样子的东西来骗人。他们为了鼓吹这条道路，只好到西方搬取救兵，极力宣扬英、美式的“民主”。吴晗也是这样。

吴晗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话，实在太多，只举一例，以见一斑。

一九四六年七月，他在《论法统》一文中，鼓吹学习美国“民主”的“榜样”。说：“以美国、英国的现实政治作准绳，故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次，每一次都由公开的合法的选

举方法——故罗斯福总统所领导的党是执政党，他们由政纲政策，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几度执政的政绩，来要求选民的选票，和另一政党竞选。结果，选民果然选择了他们。罗斯福先生和他的党凭选民的选择取得政权，而且继续当政多年。

……

是的，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的民主方式，美国的政府是全世界全人类所公认的合法政府，因为这政府是由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①

吴晗对美国的“民主”，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完全抹煞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把它描绘成一个“全民国家”。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②不管是罗斯福也好，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也好，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吴晗提出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相对抗的。他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是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吴晗和他的恩师胡适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奴。

一九四六年一月，正当美帝国主义用极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的时候，吴晗和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肉麻

^① 《投枪集》，第195—196页，删去“全人类”三字。

^②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9页。



地说：“我们在欢迎你的时候，心里又充满着惭愧。中国人民怎么不知道引起内战的，责任是全部应当由我们自己负担的？……我们……已尽力向武装冲突的双方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我们惭愧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家务整理明白，有劳我们的好友的斡旋；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我们并不袒护在野而有武力的共产党，我们也反对任何政党私有武力。”“我们盼望国际的友人，为了世界和平，不但要劝阻国共交锋，而且能有效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主的助力。”“我们对于你的服务不但感激而且有信心，……敬祝你在历史上留下为我们后世子孙永志不忘的伟迹。”

吴晗虽然不敢把这封极端无耻、极端反动、见不得人、毫无民族气节的信收在《投枪集》里，但是，他的洋奴本性在这本集子里同样暴露了出来。

收在《投枪集》里的《正告赫尔利将军》的原文中，公然把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美国侵略军捧为“民主斗士”。

一九四六年六月，吴晗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居然恬不知耻地说，“只有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同年八月，他又向美帝国主义献策，要他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摇摇橄榄枝，多洒一点救济粉，说什么“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最好基础是真诚的友谊，相互的尊重和基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国的门户是永远为真诚友人开着的。”^①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七年曾经指出：“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②吴晗正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全心全意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

反共的老手

吴晗不仅从胡适那里继承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路线，也继承了他的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思想。

一九三四年，正是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也正是胡适在报纸上大力向青年推荐吴晗这个标本的时候，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向蒋介石集团献策，用以抚济剿的办法来消灭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红军。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叫嚷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同时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吴晗在这个时候写了《明太祖》（又名《由僧钵到皇权》，是《朱元璋传》的第一个版本），向蒋介石介绍朱元璋的反动统治“经验”：“禁止一切邪教”。说什么“后来的事实证明明太祖的先见，红军在西北的余党并没有完全消灭，过了四十多年又四处起事，……虽然都

① 《投枪集》，第229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4页。



被政府用武力削平，却可看出这个时代里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历史上的海瑞向皇帝献了一个《平黎疏》，企图消灭当时的革命力量；现代的吴晗写的《明太祖》，实际上是向蒋介石上的一个新“平黎疏”，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是当时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反蒋还是假反蒋，是拥护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这是一个试金石。自称为“反蒋”的吴晗，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目前军事的症结在于国民党要共产党退出若干地区，共产党呢，表示有些地区可以撤出军队，政治机构则非保留不可。国民党呢，要一起撤退，不能保留。左说不拢，右说不拢，只好打了再说。”就是说，内战打起来，国民党固然有责任，共产党也有一份，如果共产党让了步，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就打不起来了。

这个只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吴晗，狂妄地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反对人民革命战争，他说：“人民对于党争无兴趣，对以兵力解决党争则誓死反对”。他煽动“人民不参加，不支持内战，……全体人民起来消极的抵制内战。”他公开号召：“在这块大好河山的土地上，所有的士兵都放下枪杆，这一瞬间，中华民国就走上光荣和平的康庄大路！”

蒋介石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反对内战只能把矛头对准蒋介石。当蒋介石向解放

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进行革命自卫战争的时候，任何一个站在中国人民方面的人，只应该全力支持人民的革命战争。而吴晗却要“所有的士兵都放下枪杆”，要“全体人民起来消极的抵制内战”，实际上是要人民在反动派的进攻面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不是蒋介石反动派的帮凶又是什么呢？

吴晗还积极破坏蒋管区人民反蒋的革命群众运动，直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上海十万人民反蒋大示威的前五天，吴晗在上海《周报》发表文章说，“假如凭一纸通电式宣言的呼吁，……就可以停止内战”，“假如游行示威可以遏止内战，……那末，过去有过多少次游行示威，……内战早该停止了。”说什么“光是喊一阵，跳一阵，动动笔，动动嘴是不够的”，想用他的所谓“长期性”、“建设性”的空洞口号，涣散人民的斗志，瓦解群众的反蒋运动。^①胡适为了反对“一二九”运动，说什么“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过临时补漏救弊而已。”^②吴晗在当年忠实地执行了胡适的反动路线，这个时候，为了替蒋介石效劳，又搬出这一套来毒害人民群众。

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在《怎么办？》一文中，要蒋介石抛点小恩小惠，做点“好事”，欺骗人民，挽救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他说：

① 《论反内战运动》。上海《周报》1946年第42期。

②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



“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的满足是不费事的。……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是不愁人民不站在你们这一边的。”^①

吴晗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为国民党的“前途计”，说什么“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逃杨归墨，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②他又说：“不能再打了！”“只有这样做，才是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民党之福。”^③

这些材料已经足够说明，吴晗的所谓反内战是害怕共产党越打越强大，国民党越打越没落。他最怕的是共产党胜利。

说到这里，吴晗又会辩解说，我不是在一九四八年就到解放区去了吗？

问题不在于到解放区去了没有。许多曾经染上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向前发展，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逐步有所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对于他们的进步，人民从来是欢迎的。但是，吴晗和这些人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善观风色、见风转舵的投机政客。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已经在望，这时候，他和罗隆基勾勾搭搭，想以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身份，干政治投机买卖，同我们党讨价还价。他虽然到了解放区，但还死抱住他的资产阶级政治野心不放。这位自称是占人口百分之九

十以上的“中间阶层”的代表，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并不心甘情愿，他进了解放区以后，“看见了‘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心里有点不习惯，总觉得何必也来‘万岁’这一套。”^④吴晗就是混进革命阵营的脑后带有反骨的一个人物。

就在吴晗进入解放区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指出，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他们“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⑤吴晗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终于公开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共老手的真面目，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

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出谋献策，为美帝国主义指引的第三条道路狂热宣传的

- ① 上海《周报》，1946年第49、50期。
- ② 上海《周报》第42期。
- ③ 上海《周报》第43期。
- ④ 《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中国青年》第8期。
-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9页。



一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枪，突然在一九五九年重新抛了出来，“旧枪新投”，这是为什么？

必须从当时阶级斗争的背景上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的夏天，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同资本主义复辟的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时刻，革命的群众，按照党所指明的方向，高举总路线的伟大红旗，坚持大跃进，坚持人民公社，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群众伟大的革命创举，使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力量恐慌万状。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利用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和我们某些前进中的缺点，猖狂向党发动进攻。在这场进攻中，隐藏在人民革命阵营中的吴晗，迫不及待地上阵，充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的《海瑞骂皇帝》和一九六一年一月的《海瑞罢官》，代表了吴晗反党反人民的活动的两个阶段。《投枪集》，出版在《海瑞骂皇帝》之后，《海瑞罢官》之前。吴晗在紧张的“骂”“罢”之间，匆忙整理出版他的旧作，这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擂鼓助威，《海瑞罢官》是为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而出版在这两棵大毒草之间的《投枪集》，则是利用他四十年代的杂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政治纲领。这是用四十

年代历史作烟幕，向党投出的一杆恶毒的黑枪。

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吴晗为《投枪集》出版写的“前言”里说，我的文章“都是有的放矢的”。这就是说，他出版《投枪集》，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的放矢的。

什么“的”？这“的”就是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请看，这本书里的“枪”：

“和历史上比较，‘家天下’变成‘党政府’，政府属于一人一党，财富尊荣威权属于一人一党”。^①

“我们不能不指出，特别指出，人民的要求是废止一党专政。”“党和政分开，更和国分开。收起以党治国的招牌，……不但退出各级政府，也退出工厂，退出学校，退出铁路、邮局、银行、一切国家机构。”“实行还政于民，政党不再直接统治人民。”^②

“你们所喜欢的一党专政，……我们也是深恶痛绝的。在你们的立场是‘民之所好不好之’，我们人民呢，‘政府之所恶深喜之’。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在这场合上，还不够显明吗？”^③

谁都知道，在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上，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不是人民专反动派的政，就是反动派专人民的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吴晗的这些话，

① 《救灾必须停战》。《投枪集》，第117页。

② 《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投枪集》，第87、89、90页。

③ 《不提旧账和不提联合政府》。《投枪集》，第84页。



就在四十年代也是从美国贩来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在一九五九年，吴晗不加任何批判和说明，重新发表这些东西，则是利用它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用吴晗的话说，这就叫“指桑骂槐”。

甚至吴晗把他过去直接骂共产党的话也照样搬出来了。什么“人民受罪，结怨于人民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处的”，什么“好战分子”，什么共产党不代表人民利益，只代表“党派利益”等等，所有这些反动透顶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图穷匕见。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在这里暴露无遗了。

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包庇吴晗的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吴晗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推翻党领导的人民国家，企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他公然号召人们为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实现“自由世界”而奋斗。公然号召人们走美国的道路。

“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①

“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注意：这人民是假的）的民主方式，美国的政府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合法政府，因为这政府是由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②

“欧美一些国家人民所已经享受的正是我们今天所争取的，如思想言论身体出版旅

行等自由，如选举权，如议会政治。”^③

吴晗所要争取的就是这些货色。包庇吴晗的人，你们所要争取的，又是什么呢？

借四十年代的政治杂文，提出一个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纲领。这就是吴晗为什么要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猖狂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刻，迫不及待地抛出他的《投枪集》的真正居心。这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一切反动派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党和人民的力量。吴晗也不例外。一九五九年的夏天，中国的天空上出现了几片乌云，他就以为时机来到了，急急忙忙地投出了他那杆破烂不堪的黑枪，以梦呓般的语言，疯狂地为资本主义制度呼喊。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走向了反面，到头来，这杆黑枪恰恰投中了他自己。正是这杆黑枪，戳穿了他“民主斗士”的画皮，暴露了他媚美、仇共的黑心肠。

毒草不可怕，锄了好肥田。我们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吴晗的《投枪集》，希望人们，特别是年青的一代，认真地耐心地读一读这本书，看一看混入革命阵营的反共知识分子，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这是一部难得的反面教材，读了它，可以增长见识，提高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本领。

^① 《报纸与舆论》。《投枪集》，第34页。

^② 《论法统》。《投枪集》，第196页。

^③ 《论民主政治》。《民主周刊》（华北版）第12期，1946年10月16日。



附件

吴晗一九五九年編的

《投枪集》是怎样“作伪舞弊”的？

吴晗在《投枪集》的前言中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除个别地方文字上稍加改动以外，如满清一律改作清朝之类——基本上没有什么修改。”“作伪舞弊，何苦呢，又何必呢！”“要动笔改，可难了，……要改全篇中心论点，可不成。”总之是没有改，《投枪集》是按原来的面目出版的。

吴晗这些话，又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有些东西，吴晗确实没有改，不肯改，死抱住不放，一直坚持到今天。这就是他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说它不对，是因为吴晗在撒谎。他为了更好地贩卖他那批资产阶级的黑货，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編集《投枪集》时，“作伪舞弊”，有许多重大的修改。哪些不改，哪些改，怎样改，这里面大有文章。我们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了一个校勘表，有些地方略加按语，以饗读者。

原文

“贪污的根柢，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的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

《论贪污》，1943年11月14日《云南日报》。

《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5页。

《投枪集》文

“贪污的根柢，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不工作者不得食**，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从依赖家长生活消费性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人人工作自食其力的生产性的社会组织，……**”

《投枪集》第6页。

按：原来的目的很清楚：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改，资本主义的货色犹存，又点缀一些社会主义的词句，不伦不类。殊不知，这一来，正暴露他今天打起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继续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



“三百年前，当明思宗殉国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吴三桂的向导，占领北平分兵南下的时候，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升平，……夜以继日。他的父亲死于非命，元配离散不知下落，国君殉国，国土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兵威所蹂躏，……”

“三百年前，当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纵横晋陕，民穷财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

“三百年前，当外族铁蹄纵横河朔，‘流寇’主力恣张晋豫，国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时候，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坐观兴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乱，只要自己能保全实力，舍出一点贿赂当局，自然会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在这个看法之下，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却用全力来扩充队伍。政府也仰仗他全力对付‘流寇’，不肯调出来对付外敌。”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1944年，昆明《正义报》《新论衡》周刊第9期。

《历史的镜子》第99、101页。

按：从删去的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吴晗当年写这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用“流寇”影射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替蒋介石出谋划策，用全力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吴晗反共、反革命的面目，跃然纸上。

“民主国家有一个特点，便是多党政治。在野的政党有堂堂正正批评政府的权利，倒过来，在野党执政了，执政党在野，同样保有这权利。彼此互相批评，互相责难，一方面有权提出以事实为根据的质问，被质问的也有义务提供解释的事实，是非曲直，取决于人民的舆论，舆论所表现的工具，最主要的是报纸。”

“三百年前，当明思宗自杀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汉奸吴三桂的向导，占领北京分兵南下的时候，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升平，兴建宫室，大备百官，征歌逸舞，夜以继日。”

“三百年前，当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民穷财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

“三百年前，当外族铁蹄蹂躏河朔，国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时候，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坐观兴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乱，只要自己能保全实力，舍出一点贿赂当局，自然会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政府也仰仗他对付农民起义军，不肯调出来对付外敌。”

《投枪集》第24、25页。



“几十年来我們沐猴而冠，事事学人家，学得都有点样子，例如人家有政府，我們也有，人家有委员会，我們也有，……所不同的是我們的政府是一元的，委员会是一元的，……”

《报纸与輿論》，1945年。

《历史的鏡子》第34、35頁。

“几十年来我們沐猴而冠，事事学人家，学得都有点样子，例如人家有委员会，我們也有，人家有政党，我們也有好几个，人家有报纸，我們居然也有几十百种大大小小的报纸。所不同的是我們的委员会是一元的，甚至报纸也属于一元的，报纸的消息属于一元，輿論自然也无例外。”

《投枪集》第31頁。

按：吴晗是用这篇文字恶毒地攻击党的绝对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政府是一元的”这句话，实在太露骨了，为了黑货能够出籠，只好“忍痛割爱”。

“朱明政权的被消灭，被消灭于这政权和人民的对立。杀鸡求卵。”

“朱明政权的被消灭，被消灭于这政权和人民的对立，剝削无度”。

“在整三百年前，北平的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政府請助貴大臣富賈巨商献金救国，……可是，結果，最著名的一个富豪出得最少，……人民虽然肯尽其所有报效国家，可惜的是他們早已被榨干了。”

“在整三百年前，北京的形势最紧张的时候，皇帝請助貴大臣富賈巨商献金救国，……可是結果，最著名的一个富豪出得最少，……人民呢，早已被榨干了。”

“十七世紀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政府軍包围，追逐‘流寇’，两个力量互相抵銷，給关外的新兴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机，乘虛而入，建立了大清帝国。”

“十七世紀前期的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政府軍包围、追逐‘流寇’，給关外的新兴的建州部族以可乘之机，乘虛而入，建立了大清帝国。”

《投枪集》第37、38、42頁。

《論晚明“流寇”》，1945年2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历史的鏡子》第103、105、10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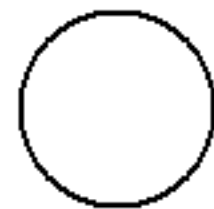
按：一九三四年，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文，向蔣介石献策消灭紅軍。一九四五年，他把这篇文章改头换面，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但仍留下一些痕迹。如劝蔣介石不要“杀鸡求卵”，即要他“养鸡取卵”等等。

“我們……也尊重真正美国人民大众的尊重民主自由的愿望，和故罗斯福总统的永不能使中国人民忘怀的可敬可感的努力，……”

“我們……也尊重真正美国人民大众尊重民主自由的愿望。”

“我們不但欢送曾經百战之民主战士，英勇的美軍回国，……”

“我們不但欢送曾經百战的美軍回国，……”



“为了保持百年来传统的友谊，为了保持八年来对于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援助的充分供应的感激，……”

《正告赫尔利将军》，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17期，1945年11月22日。

按：请看他本来的洋奴面目！



“至少要先做到行政的处分和取消禁令，前二项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学生自然复课，做到了其余两点，国家纲纪保持，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增加，如果政府真是实行民主，……保证人民一切自由的绝对尊重，获得人民充分信任和尊敬，那岂止解决此次的所谓‘不幸事件’，人民还敢以充分的信心保证此后不再有任何的类似事件发生。”

《论一二一惨案与纪纲》，昆明《民主周刊》第2卷第20期，1945年12月25日。

按：这完全是一副蒋介石帮凶的嘴脸！吴晗急于投出黑枪，改得匆匆忙忙，还留下了这副嘴脸的轮廓。

“其次我们要不麻烦，不嫌费辞，再度向美国友人呼吁，中国的和平决定于美国人民。只要美国人民能够认识今天中国不幸局面之所以造成，立刻以全力制止美国政府，不许再供给武器装备，运输方便，以及借款等等于任何从事内战的国家，中国立刻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繁荣的道路，这不正是帮助了中国人民，不正是帮助了马歇尔特使，也帮助了美国人民，因为只有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

“为了保持百年来中美人民之间传统的友谊，为了保持八年来美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援助的感激，……”

《投枪集》第62页。

“至少要先做到行政的处分和取消禁令，前二项问题解决了，学生自然复课。如果政府真是实行民主，以人民为重，能够立刻停止内战，立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立刻组织联合政府，保证对人民一切自由的绝对尊重，那岂止解决此次的所谓‘不幸事件’而已，还可以获得人民信任和尊敬。”

《投枪集》第76页。

“其次我们要不麻烦，不嫌费辞，再度向美国人民呼吁，中国的和平是和美国人民有关系的。只要美国人民能够认识今天中国不幸局面之所以造成，是由于美国政府直接操纵中国内战，只要美国人民了解这一点，立刻以全力制止美国政府，不许再供给武器装备，运输方便，以及借款等等于任何从事内战的国家，中国是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繁荣的道路的。这样做，不正是帮助了中国人民，不正是帮助了马歇尔特使，也帮助了美国人民，因为只有和平民主繁荣的中国，才能够保证世界的和平。”



十五天已經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們應該有行动，告訴談判中的双方，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可耻的内战，我們不再信任任何諾言和文字，我們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上海《民主周刊》第35期，1946年6月15日。

按：原来所謂反美的“和平斗士”，实际上是出卖祖国的掮客；所謂反蔣，实际上是反共。

“根据过去的史实，誰都知道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二十年的作战經驗，……今天的共产党比之那时候無論从那方面說都更强大；国民党呢，怕不比那时候更强大，除了美国的片面支持以外，並沒有有什么可操的胜算。这样一个对比，不是很明白的嗎？没有党見和私利的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国民党决消灭不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

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結怨于人民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处的，而且，退一步替国民党想，……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貨再膨脹，政治更无办法，人民更痛苦，逃楊归墨，为渊驅魚，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沒落，也是划算不来的。”

《論反内战运动》，上海《周报》第42期，1946年6月22日。

按：这是吴晗反共、反革命的铁证。

“說英国，美国，糟了，民主国家的政爭用笔爭，用口爭，誰的道理对，誰的話能兌現，誰得人民拥护，誰就得胜。根本沒有这一套（按：指暗杀）。……”

《論暗杀政治》，上海《民主周刊》第43期，1946年8月。

按：明明是美国式民主的販賣者，現在涂上一点脂粉，企图把自己化裝成资本主义制度

十五天已經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們應該有行动，告訴仍在坚持内战的政党，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可耻的内战，我們不再信任任何諾言和文字，我們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投枪集》第123—124頁。

“根据过去的史实，誰都知道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二十年的作战經驗，應該明白过去在江西那一小块地区，共产党那末有限的一点兵力，围剿五次，苦战十年还解决不了。今天的共产党比之那时候無論从那方面說都更强大；国民党呢，怕不比那时候更强大，除了美国的片面支持以外，並沒有有什么可操的胜算。这样一个对比，不是很明白的嗎？

同室操戈，人民受罪，結怨于人民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处的。而且，退一步替国民党想，好話說尽，坏事做絕，已經到了天怒人怨，‘予与汝偕亡’的地步了。还要打内战，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貨再膨脹，政治更无办法，人民更痛苦，国民党的更沒落。也是划算不来的。”

《投枪集》第130—131頁。

“說英国，美国，糟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爭用笔爭，用口爭，誰的道理对，誰的話說得动听，誰能騙得了人民，誰就得胜，根本沒有这一套。而且，相反，假如誰敢于用暗杀的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目的的話，这人一定被人民所共弃，除了毀灭以外，沒有第二条路。”

《投枪集》第211頁。



的揭露者。但是本性难移，他还在美化美帝国主义。

“是与非之間无中立。”

“民主和反民主之間也絕不可能有中立。”

“人民完全站在民主的一边，坚决的要求民主，实现民主，不中立，絕對不中立。

民主和反民主之間无中立。

‘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在人民的辞典中，沒有中立这一个名詞。”

《論中立》，《中华論壇》第1卷第12期，1946年8月。

“是与非之間无中立，**中間路綫是没有的！**”

“民主和反民主之間是絕對不可能有中立的。**中間路綫是没有的。**”

“人民完全站在民主的一边，坚决的要求民主，实现民主，不中立，絕對不中立，**絕對不站在中間。**

民主和反民主之間无中立，**絕對没有中間路綫。**

‘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在人民的辞典中，沒有中立，**也没有中間路綫这一个名詞。**”

《投枪集》第218頁。

按：“是与非之間无中立”！ 吴晗的“是”是什么，“非”又是什么呢？“民主和反民主之間也絕不可能有中立”！吴晗的民主是什么阶级的民主呢？吴晗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翼的民主，吴晗的“是”，就是“中間路綫”，第三条道路，吴晗的“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綫。一个“中間路綫”的鼓吹者，在解放后又给自己戴上坚决反对“中間路綫”的桂冠，“作伪舞弊”的胆子可謂大矣！

“由于內战的扩大，使人民的苦难加重加深，……絞尽农民最后一滴血汗。**还有数以百万計的壮丁在前綫相斫相杀，莫名其妙地死去。**”

“民主在中国也像旁的东西一样，鬧双包案了，有真民主，有假民主。**人人自以为真，指斥对方的是假貨，冒牌貨。**”

《怎么办？》，上海《周報》第49、50期，1946年8月24日。

按：这就是所謂“中間道路”、“第三条路綫”！

“为什么不先在这些有爭执的地区，先来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由于內战的扩大，使人民的苦难加重加深，都市中工厂倒閉，商店关门，工人店员失业，学生交不出学費失学，农村中又重新征购征实了；絞尽农民最后一滴血汗。”

“民主在中国也像旁的东西一样，鬧双包案了，有真民主，有假民主。**假的也偏偏說自己是真的。**”

《投枪集》第224、225頁。

“为什么不可以先在这些有爭执的地区，先搞一些临时的地方联合政府呢？”



办法，第一双方都把军队撤开，把有争执地区转变成非军事区。第二由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参加者英美苏三国或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步骤，在这些地区以民主方式产生地方联合政府。

或者有人会说这样来是招致国际干涉，有失国家体面。

那末，我们要问由美国一国来处理中国问题，是不是够体面？

而且安理会是国家之上的一个组织，在法理上，就是在面子上，都不会有问题的。

这样办，内战可以停止，至少可以不致扩大。”
《怎么办？》。

按：联合国的仆从！美国的奴才！

“那末，于此，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的满足是不费事的。至少，不要再做坏事，取消征购征实吧，……严办贪官污吏吧，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是不愁人民不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怎么办？》。

按：这也是向国民党上的一篇“治安疏”！

“第四，政协的解决对象因为组织成分的限制，着重在党派冲突的清除，质言之，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大串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人民本身问题的解决。把今天中国的严重局面单纯地看作只是两党之争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反之，今天的主要的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不能忍受反民主政权压迫剥削的问题，……质言之，人民对于党争无兴趣，对以兵力解决党争则誓死反对，相反的，人民要建立一个为人民自己服务的民主政府，来解除痛苦，提高生活。”

办法，第一双方都把军队撤开，把有争执地区转变成非军事区。第二由当地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地方联合政府。

这样办，内战可以停止，至少可以不致扩大。”

《投枪集》第 230 页。

“那末，于此，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是容易满足的。至少，不要再做坏事。取消征购征实吧！取消特务机构吧！停止打风和杀风吧！收回封闭报纸期刊的命令吧！撤销中纺、中蚕吧！严办贪官污吏吧！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你们还会有前途的。”

《投枪集》第 231 页。

“第四，政协的解决对象因为组织成份的限制，着重在党派冲突的清除，把今天中国的严重局面单纯地看作两党之争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反之，今天的主要的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不能忍受反民主政权压迫剥削的问题，是民主和反民主政权的选择问题，是人民自己要求行使主权的问题；质言之，人民要建立一个为人民自己服务的民主政府，来解除痛苦，提高生活的问题。”



“人民的力量是**潜在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組織，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中間群人民利益**的組織在今天**是必需的**，应该使其立刻现实存在的。”

“这一力量的出现，它的使命不再是**中間式的調人**，而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对于党派的争执，……没有迁就没有敷衍，**如是的民主的人民所喜爱的一切和相对的一切斗争**。

.....

中国的人口假定有四万万五千万，**中間阶层**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参加这新基础，**坚强**这新基础，任何問題是可以解决的，任何困难是可以征服的。”

《論新基础》，北平《民主周刊》第15期，1946年11月。

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吴晗，自封为人民的代表，而把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排除在人民之外，这是何等猖狂！

“内战更扩大了，和平团结即使是口头禅也已被放进历史档案里去了。**相杀相斫，轰炸，互相毁灭**的双方都是中国人民，**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血，一样的服装，一样的头脑。积骸成山、流血成河、抓进抓出，杀人的是中国人民，被杀的还是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境况中来纪念五四，我們的心情是沉痛的、悲愤的。”

《論紀念五四》，《清华周刊》1947年5月4日。

按：正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吴晗不区别战争的性质，不区别共产党与国民党，說大家都有“一样的头脑”，籠統地反对战争。这是露骨地破坏人民革命战争，为国民党效劳。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組織，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人民利益**的組織在今天**是必需的**，是应该使其立刻实现的。”

“这一力量的出现，它的使命不再是**中間式的調人**了，而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对于党派的争执，只有是非的标准，民主和反民主的标准，人民所喜爱或憎恶的标准，没有迁就也不许可有敷衍。”

于此，这力量的本身**就是天平秤**，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自身作为法碼，作为一个相对的平衡的力量。

中国的人口假定有四万万五千万，**无党派的人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参加这新基础，**加强**这新基础，任何問題是可以解决的，任何困难是可以征服的。”

《投枪集》第234、235、236頁。

“内战更扩大了，和平团结即使是口头禅也已被放进历史档案里去了。

在这样一个境况中来纪念五四，我們的心情是沉痛的，悲愤的。”

《投枪集》第265頁。



红旗

H O N G Q I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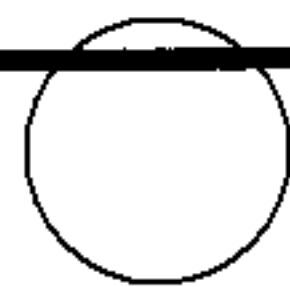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

一九六六年

7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七期 ★

目 录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 (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社论 (20)

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 (24)

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

邓拓贩卖的是什么货色?陈同浩 (32)

邓拓, 我们就是要斗倒你!陆志天 (33)

吴晗, 不许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楼 森 (33)

把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李素文 (36)

突出政治, 大写英雄

——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仲正文 (39)

☆ 五月十一日出版 ☆



評 “三 家 村”

——《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动本质

姚 文 元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



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



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破



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候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的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



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 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谁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意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



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



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



呼声，决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欢呼“这半年多米”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



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



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来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大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〇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猗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



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铓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



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



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



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吴晗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



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三——六四年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的头脑中”“还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



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反动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当“三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自夸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在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

（原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本刊转载时经作者作了小的校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解放军报》社论

本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发表以后，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纷纷来信来稿，积极参加战斗，对文化领域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表示极大的愤慨。大家认识到，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对这场斗争不能不管，不能不问。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事实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解放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有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停止过呢？譬如，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后来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九五七年对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猖狂进攻的反击；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电影、戏剧、文学等方面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毒草的大量出现和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一九六四年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以及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论战，等等。一场斗



争接着—场斗争；一次斗争比一次斗争更深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就说明，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本性，总是要想尽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迷恋资本主义，死抱着资产阶级的僵尸不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敌对情绪，内心憋着一股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和怨气，一有适当的气候，就冒出来；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笼。他们在一再地遭到广大群众的揭露、批判、打击以后，就采取了更加**隐蔽、狡猾、迂回、曲折**的手法，继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新的特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人利用党和政府给予他们的职权，把持了一些部门和单位，抗拒党的领导，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工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这些人**大都是一些所谓“权威人士”**，在社会上也有点“名气”，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们还有一些迷信。他们自认为还有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资本，拚命地固守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堡垒。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是和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相呼应的，是和国内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一鼻孔出气的，是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相配合的。**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严重的危害性，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至于有的人也写过一些不好的作品，但是他们同党和社会主义是一条心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改正的。对这样的同志，应当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以前，就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资本主义复辟，总是采取暴力的形式和“和平演变”的形式，或者是两种形式的互相配合。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不仅企图使用暴力推翻我们，而且还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用“糖衣炮弹”来征服我们。他们千方百计地散布反动的政治思想毒素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企图腐蚀和溶化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使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薄弱者，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逐渐蜕变为资本主义。列宁缔造的、十月革命炮声中诞生的、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一小撮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和把持之下，已经和正在“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上去的事实，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生产



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对于同不拿枪的敌人的战斗，是绝对忽视不得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解放十六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并日益巩固，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它们不仅阻碍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且力图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化，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我们一定要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决不要以为，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只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什么大事。决不要以为，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只是“打笔墨官司”，无关大局。事实上，任何反革命复辟，都是先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搞理论、学术、文艺等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为自己制造舆论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夺苏共领导是这样。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也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和知识分子，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当前，我们国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也正是妄图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如果我们对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失去警惕，不对他们进行坚决反击，任凭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社会主义的墙脚就有被挖掉的危险，我们的国家就有变颜色的危险。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和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主要支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我们既要密切注视拿枪的敌人，随时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们的武装进攻，又要高度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我们的干部战士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做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反对“糖衣炮弹”的政治思想战线上做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见到错误的东西就批判，见到毒草就铲除，见到牛鬼蛇神就打倒，决不能让它们无法无天、兴风作浪。

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正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来的。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我们突出政治，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军队中来，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上来。我们决不能低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我们的影响。好的文艺作品，好的文章，可以提高我们的觉悟，鼓舞我们的斗志。坏电影，坏戏，坏小说，坏文章，如果不去鉴别它，抵制它，批判它，思想上就会中毒，就会逐渐地发生变化，走到邪路上去。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敌人，不管他如何凶恶，不管他要什么花招，都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自己麻痹起来，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当前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生动、最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干部战士政治思想上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革命热情，密切注视和关心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积极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从中得到锻炼，得到教育，得到改造，得到提高。

毛泽东时代是工农兵掌握理论的时代。在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群众正在显示出它的主力军的作用。虽然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者”、“专家”、“教授”，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但是，他们是吓不倒我们的，也是迷惑不了我们的。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有一颗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火热的心。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干部战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嗅觉灵敏，眼睛雪亮，能够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只要我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敢于藐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的所谓“权威”，破除对他们的迷信，我们就一定能够识破和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五月四日《解放军报》）



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

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为这个资料加上了“编者按”。当天出版的《北京晚报》，也以三个多版的篇幅选登了这些资料。声势之大，是这几个报刊创办以来所罕见的。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现在如果能对这许多毒草进行认真的批判，并且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现在的这种作法，是不是在认真地批判毒草呢？是不是在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呢？不，不是。

你们批判过吴晗吗？

没有。

从一九五九年吴晗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以来，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间共有六年多。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没有揭露过吴晗一个字。相反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在这个期间积极发表文章，为吴晗，为吴晗所塑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热烈捧场。“老兄老弟”们那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在所有吹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是最不像样子，最恶劣的。

姚文元同志提出吴晗的问题以后，你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也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同志这样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不转载，不介绍，反而质问上海的同志：“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背景？背景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背景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学说，背景就是你们报纸上也登载过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在全国开展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决定。难道进行阶级斗争，还要经过你们



批准吗？难道不经过你们批准，就是没有党性吗？看来很清楚，你们所要的党性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是资产阶级的党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时，你们的态度转变了吗？也没有。《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正确地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对《海瑞罢官》却既不讲是，又不讲非，只是说，这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其实，你们的支持吴晗，反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前线》《北京晚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日报》出来转载一下，这是装出一副假公正的面孔，来掩盖你们真偏袒的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前线》《北京日报》突然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发表了署名向阳生的文章，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好像你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站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前线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篇同文化革命唱反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为吴晗保驾。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道德继承”问题。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向阳生的文章里，变成了一个所谓“纯学术”问题。

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来为吴晗辩护。其实，你们从来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吴晗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者。你们对于反动的东西，一直是开放绿灯，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量出笼，而对于批判毒草的文章却一概扣压起来，不准发表，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折不扣的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哪里是什么平等呢？

向阳生文章的末尾还装腔作势地要求大家对所谓“道德继承”问题，进行讨论，企图为吴晗《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定调子，想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从尖锐的政治问题转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后来人们知道，所谓向阳生者，也就是同吴晗合写反党文章的邓拓。更为严重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邓拓还在《北京日报》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并且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同吴晗的文章一样也有错误。

隔了不久，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是一篇假检讨、真进攻的文章。《北京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



加任何按语，不作任何批判，这实际上是支持吴晗以检讨的形式向批评他的同志进行反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就心照不宣地对向阳生说，你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完成了反攻任务以后，就按照向阳生定的调子，在《前线》《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所谓自我批评，欣然承认自己错误的“中心”，是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两个人密切搭配，一唱一和，演了一场双簧。

一篇不够，调子定不下来。你们又接连发表同类性质的文章，一个劲地想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发表在今年一月八日《北京日报》上的李东石（即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抛出来的。这篇文章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同一个《海瑞罢官》，一会儿是所谓“道德继承论”的产物，一会儿又是某种评价历史人物观点的产物，就是不肯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产物。

众目睽睽，营私舞弊是不行的。《前线》《北京日报》对吴晗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手法，迅速为大家识破了。不少报刊发表了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特别是今年四月以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知识分子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一种难堪的“将军”局面摆在支持、包庇吴晗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面前。于是，你们才扭扭捏捏地走出来说，“吴晗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的作者”，并且重新发表了吴晗过去在《前线》上发表的《赵括和马谡》，想以此敷衍塞责，欺骗读者。这就是你们对吴晗的所谓“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把一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当做重要秘密来介绍，而对于吴晗忠实继承胡适衣钵，甘心充当美国洋奴，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策的种种罪恶活动却连一个字都不肯提呢？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

没有。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①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

^① 廖沫沙曾经在1934年用“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攻击鲁迅的革命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用这句话回敬了廖沫沙，并为自己的杂文集取名《花边文学》。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1、397—400页。



“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助浪，在社会上散放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谑”》，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污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污辱，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梁壁辉（即俞铭璜）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个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这样一篇假检讨，当然蒙混不了群众。读者严肃地对这种假检讨提出了批评，但是无论是《前线》还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不理睬群众这种正当的批评。因为对你们来说，廖沫沙是必须好好加以保护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是万万退让不得的。

今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为“鬼”张目，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为地、富、反、坏、右张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跟洋鬼、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你们批判过邓拓吗？

也没有。

前几年，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在奔腾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里掀起了一股逆流。他们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



动进攻。邓拓在这场猖狂的进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吴晗、廖沫沙、邓拓，“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邓拓。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邓拓，在一九六一年的九月，亲自出马，纠集吴晗、廖沫沙，在一个饭店里聚餐，组织起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黑店的名称是他起的，吴南星的化名是他定的，文章的刊登与否是他批的。“三家村”开业的历史，就是邓拓率领吴晗、廖沫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有一篇化名卜无忌《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极右分子林希翎，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林希翎曾经称呼他是中国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连资产阶级右派也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邓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失败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职务被党中央撤销了。他被人民“罢”了“官”。在这以后不久，他又钻入了北京市委，重新上台，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

邓拓颇“懂得”一些斗争的策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惊涛骇浪，使他改换了自己的斗争方式。右派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广大群众批判、斗争的情景，使他心有余悸。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不再像一九五七年发表右派言论那样赤膊上阵，而是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他凭借《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样的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为李三才辩护》《昆仑山人》《宛平大小米》《郑板桥和“板桥体”》《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林白水之死》《专治“健忘症”》等，是其中最甚者。

对所有这些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十分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曾经作过批判没有？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特别是那篇极端反动的《专治“健忘症”》，这是一支很恶毒的箭，它的矛头直接射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他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党。他要用“狗血”淋我们的“头部”，要用外国



特制的棍棒对着我们的“头部”打得我们“休克”，以让他们那些所谓“高明的医师”，也就是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这一篇疯狂的反革命杂文，充分暴露了邓拓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刻骨地仇恨党、仇恨人民的黑心肠。

邓拓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他们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信，提出严正的批评。但是，你们对于这样的批评信都不予刊登，不仅不予刊登，反而千方百计地为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辩护。你们嘴上说的是“百家争鸣”，实际上行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家独鸣”。就是说，只许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放资本主义之毒，不许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铲除你们的毒草。你们实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独裁，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形势陡起变化。一场新的反击战开始了，邓拓的合作者吴晗被揭露出来了。如果《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真正愿意揭露邓拓，这时候，你们仍然有一点主动权，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你们还请邓拓做报告、写文章，支持、包庇吴晗。

客观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不断深入。吴晗、廖沫沙、邓拓联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完全明朗化了。广大的读者对《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作法极端不满，愤愤不平，盖子非揭不可了。这时候，你们为了摆脱被动挨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才匆匆忙忙地把邓拓的问题提了出来。

提出邓拓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这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不，并不矛盾。

三个多月以前，《前线》《北京日报》不是就曾经为了保护吴晗，而积极发表了向阳生“批评”吴晗的文章吗？提出邓拓的问题，不过是这种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丑剧的重演。

《前线》《北京日报》在“编者按”里，极力回避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三家村”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里却占了最次要的地位。吴晗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将”，而邓拓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轻重倒置，掩盖要害，牺牲车马，保存将帅，这就是《前线》《北京日报》在保护邓拓问题上玩弄的一套手法。

《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批判”邓拓的资料，同样不提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占了两个版面的《燕山夜话》摘要，只在最后用两个平淡不引人注意的小标题，提了一下邓拓的“以古讽今”问题。邓拓那些恶意攻击党，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动



言论，那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也是为他自己的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的文章，都被《前线》《北京日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庸俗无聊”，“孤芳自赏”的东西，至多也不过是“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今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日报》又散发了一份“关于批判《燕山夜话》的参考选题”，说什么“邓拓是艺术上的复古派”，“站在古人的楼台上”，“宣传艺术越古越好”，继续为邓拓打掩护，企图引导读者把对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到“崇古师古”的方向上去。

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政治要害问题没有了。

这能叫做“批判”吗？把它叫做掩盖错误、包庇坏人、欺骗读者，不是更符合实际吗？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过去由于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利用报刊的专栏来开辟他们的‘自由市场’，……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

这能叫做自我批评吗？

“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教训呢？

“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真是放松了吗？

“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被别人乘虚而入吗？真是被别人利用了吗？

“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那末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在挂帅呢？

“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吗？

“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丧失立场吗？是丧失警惕吗？

统统不是。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抹胭脂搽粉，是遮盖不住丑陋的面孔的。你们过去放了那么许多毒，出了那么许多牛鬼蛇神，又要了那么许多恶劣手法来抗拒文化革命，今天用几句空话，就能向读者交代过去吗？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到了彻底革命的时候了。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是谁积极支持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遭到革命群众反击以后，是谁用各种办法包庇邓拓、吴晗、廖沫沙呢？后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问题包不住了，又是谁指使你们玩弄那一套“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假批判把戏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不揭发，群众要揭发，你们不批判，群众要批判。我们相信《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部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一定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和批判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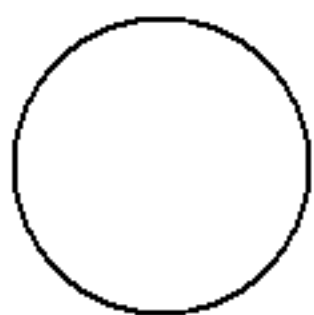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把一批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下台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应该看到，还会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登台表演。不同的是他们的表演方式会经常变花样，有的是赤裸裸的，有的则比较隐蔽，有时分散出击，有时集中进攻。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前的运动，坚决地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

邓拓贩卖的是什么货色？



解放军某部排长 陈 同 浩

读了邓拓的“燕山黑话”，真使我气愤极了！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邓拓在暗夜里放出的这一支支毒箭，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说别的，单把他的《“伟大的空话”》拿来一分析，就很明白了。

一个孩子，以热烈的阶级感情，写了一首诗，表达对祖国对党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憎恶和仇恨，这说明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儿童，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迅速，爱憎分明。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每个革命者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可是邓拓听了却大为恼怒。他说：“这叫做什么诗？我真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孩子写的诗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革命的人民认为是好事，邓拓认为是坏事；革命人民赞扬的，邓拓反对；真是界限分明！邓拓究竟是个什么人，不是明明白白了吗？说穿了，邓拓对于孩子歌颂祖国

歌颂党，所以十分恼怒，无非是怕我们革命下一代成了红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就作不成了。

邓拓这篇《“伟大的空话”》仅仅是反对那个写《野草颂》的孩子吗？绝不是。他是在那里声东击西，以小喻大，他是在那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反对一切革命人民群众的壮志豪情。在他看来，一切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全世界革命人民，长人民志气，灭敌人威风的语言，都是“陈词滥调”，只有像他那样用以古喻今的手法，从黑暗里向党向人民发出的恶毒咒语，才是值得赞扬的“好话”，才不是陈词滥调。他真是好恶毒！

邓拓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向我们发出了挑战书，我们人民的战士就要起而应战。你邓拓放了那么多毒，今天我们有责任有权利来同你清算这笔账，绝不能让牛鬼蛇神滑过去！

（原载五月九日《解放军报》）



邓拓，我們就是要斗倒你！

解放军某部班长 陆 志 天

邓拓在《多学少评》一文中狂妄地说：“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他还阴险地说：“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保持虚心的态度。”邓拓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仅仅是反对开展学术批评，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唱对台戏吗？不。说穿了，就是让我们和一切牛鬼蛇神和平共处，让我们放弃斗争，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我们要问：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也应该包括在“一切事物”之中吧？对于这些人民的死对头、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也要“多学习、少批评”吗？邓拓的所谓“保持虚心的态度”，不是明明要我们认敌为友、拜敌为师，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吗？邓拓，我们正告你：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对待任何敌人，我们从来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坚决斗、斗到底，直到全部干净地把它消灭掉。这是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历史赋予我

们的责任。

邓拓提倡“多学少评”，又因为他做贼心虚。他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特别怕被人揭露出反动的原形。有了“多学少评”，就可以为他自己及其同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打掩护。也就是说，邓拓叫嚷所谓“多学少评”，实际上是妄图把文化战线变成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沿阵地，而不准我们工农兵进行反击。谁要是起来反击，谁就是“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这是什么样的如意算盘啊！邓拓，你这套把戏是骗不过人的！你的反动本质我们已经看清了。是毒草，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拔掉，甩在粪坑里沤肥料。我是个战士，我就知道革命。谁要是破坏革命，阻碍革命事业的发展，我就要打倒它，扫除它。你既然如此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不是什么对你“挑剔”的问题，而是要和你斗到底！

（原载五月九日《解放军报》）

吴晗，不許你反党反社会主义！

浙江省义烏县下駱宅公社党委代理书记 楼 森
义烏县下駱宅公社贫协筹委会主席

我是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干部，对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写不出什么科学论文，但

是吴晗这种赤裸裸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却实在令人愤慨，因为怒不可遏，



也说出几句。

首先，我要问问吴晗：你为什么早不写，迟不写，却偏偏要选择在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发起猖狂进攻的时候，写出《海瑞骂皇帝》这样恶毒的文章来？你又为什么偏偏要在一九六一年社会上刮起“单干风”和“翻案风”，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突然“破门而出”，写出《海瑞罢官》这个恶毒的剧本来？你现在说，你“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但是，你以前不是说过“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吗？把这两者对比一下看，何以自圆其说？你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是披着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外衣，借海瑞的嘴脸，为地、富、反、坏分子，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擂鼓助威，以便使这些牛鬼蛇神，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重整纪纲”。好一个“古为今用”、“以古讽今”、“指桑骂槐”！可是，我要正告你：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你高兴得太早了！

吴晗是非常强调“历史真实”的。好吧，我们就让事实来说话吧。你说旧社会里有“清官”，能“为民请命”。这是抹杀阶级斗争，散布幻想，不要人民进行革命。但是，谁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是怎样受着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和剥削的。在那个世道里，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劳动人民经年累月，耗尽心血，到头来却落得个吃

的猪狗食，穿的百结衣，生命如草芥。就拿我家来说吧，解放前，虽然一度种过五亩多田地（包括租种地主的土地），但由于地租债利、苛捐杂税的盘剥和生活所逼，最后不得不全部出卖或典押给剥削者了。从此，一家七口，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常常穷得揭不开锅，个个皮包骨头，身瘦如柴，真是含辛茹苦，度日如年。我父亲死时，连棺材也买不起。说起我的邻居、堂兄楼章华家，更是苦不堪言。他一家六口，那时过的是什么日脚呢？他自己拖着吐血的重病，给地主打短工、挑脚过日；老大和老二从小就给地主当长工；老三和一个女儿，年幼力小，给地主看牛不要，只得去讨饭，后来患病无钱求医，活活地折磨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个“清官”为劳动人民请过什么“命”呢？这就是旧社会历史的真实。

“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①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才从火坑中得救，终于站了起来，扬眉吐气了。仍以我们两家为例：论政治，有四个共产党员，三个共青团员，一个公社干部，四个大队或生产队干部，两个县人民代表，一个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论文化，有一个大学生（现担任中专学校的教师），三个中学生，四个学龄儿童全部上了学，都戴上了红领巾；论经济，更是如雨后春笋，节节上升。像这样的翻身家庭，真是千千万万，数也数不尽。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页。



都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得来的。这也是新社会历史的真实。我们劳动人民将世代永远也不忘记这些历史的真实。“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这就是我们的誓言。

你吴晗以“马列主义史学家”的“权威”自居，为什么对如此史无前例的、极其伟大的中国阶级斗争史一概加以抹杀？

吴晗还打着“为民请命”的招牌，煽动农民“退田”单干。但是，我们贫下中农最清楚：只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农民起来闹革命，打倒了封建地主，我们贫下中农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历史教训又使我们懂得：小农经济不过是“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它只能使农民向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致富，大多数人却贫困破产。因此，农民要想获得经济上的彻底翻身，只有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于是在党的正确指引下，我们自觉自愿地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办起了合作社，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我们贫下中农也因此而成了集体经济的台柱子，自然也就把集体经济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了。用我们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天雷打不散，台风刮不倒”。现在广大贫下中农都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保护着集体经济的利益，热爱集体的新人新事，风起云涌，不胜枚举。总之，广大贫下中农群众对集体经济寄予无限的信心和希望。请问吴晗：你到底在为谁“请命”？请什么“命”？我们贫下中农绝对不需要去“请”什么“命”！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退田”！也绝对不允许任何牛鬼蛇神来“退田”！说穿了，你煽动农民“退田”的目

的，无非是要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拆散搞垮，使我们贫下中农回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去，再吃第二遍苦。你这是白日做梦，绝对办不到！

吴晗，你是义乌人，我们知道你的底细。你出生在地主剥削阶级家庭，你是吃劳动人民的肉，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你的知识完全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如今人民不记你的旧账，给了你很高的荣誉和地位，指望你能很好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给人民办一些好事。可是你不但没有将功抵罪，反而恩将仇报，利用人民赋予你的职权，将劳动人民百般丑化，而将那些牛鬼蛇神却捧上了天，甚至居然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了。

吴晗，你是翻案的老手了。你还记得不？那是一九五六年，你的亲戚、反革命分子杨祖霖（当过伪连长，有血债），隐瞒了政治历史和罪恶，混入人民教师队伍，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被我人民政府查明以后，清洗出了教师队伍。他回家以后写信向你鸣冤叫屈，妄图“翻案”。那时，你就同反革命分子杨祖霖站在一个立场上，复信给他，称兄道弟，公然支持他的翻案活动，并亲自写信给浙江省人委负责同志，要求重新查处。后来由于杨祖霖的反革命罪状确实，翻案未能得逞。你今天又来鼓动右倾机会主义者“勇敢”地起来“翻案”，这不是存心拆社会主义的墙脚，搞资本主义复辟是什么？老老实实地警告你：在觉悟了的劳动人民面前，这根本办不到！如果你死不悔改，顽抗到底，那么，只有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把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沈阳市和平副食品商店
副政治指导员 李素文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有时候是很激烈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教导是真理。

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就要占领那里的阵地，向人民放毒。吴晗就是这些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一个最猖狂的家伙。

吴晗利用他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反党、反人民，是一贯的。

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高高地举起了抗日的革命旗帜，坚决进行了抗日救国的斗争，而吴晗却适应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需要，不仅自己钻在故纸堆里，埋头“治学”，还大力鼓吹青年读死书，不问国事。当革命青年起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时，吴晗就承受胡适的衣钵，对革命青年冷嘲热骂，污蔑救亡运动是“装门面”、“显时髦”，故作“爱国表现”。当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这个极端反动、极度腐败的政权的时候，吴晗又出来捍卫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说贪官污吏的根源是由于“家族为本位”的结果。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发展壮大的时候，吴晗担心蒋介石的失败，竭力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要蒋介石吸取“历史教训”，全力以赴消灭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吴晗就出来替美蒋反动派开脱罪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妄想消灭共产党，吴晗却歌颂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

解放以后，吴晗仍然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假借古人之名，行其反党、反人民之实。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吴晗就给擂鼓助威，加油打气，用以古讽今的手法，竭力赞扬他们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党和人民击败并被“罢官”以后，吴晗就鼓励他们要“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失败了再干”，妄想东山再起。

吴晗利用史学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他歪曲历史，硬说旧社会里有“清官”，能为人民谋利益。吴晗美化海瑞，说海瑞敢骂皇帝。

我们要擦亮眼睛，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吴晗是在同党争夺我们年青这一代。有些老工人、老农民亲自受过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用大量的事实，揭穿了吴晗的鬼话，吴晗等人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也不相信。



有些青年人不知道过去的官怎样，只是在戏剧上看到有黑脸的、白脸的、红脸的、花脸的。吴晗就是利用青年这个弱点，来迷惑他们，使他们认不清方向，好跟着他走。

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觉悟，时时记住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分析方法。

在旧社会里，根本没有什么“清官”。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吏所追求的就是衣锦还乡，良田万亩，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欺压群众，作威作福。他们想方设法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让劳动人民永远给他们当牛作马。什么“清官”、贪官，就是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使用很明显的压迫手段，很粗暴，有的使用另一种办法，但是两种办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这样，一伙又一伙，这个上去，那个下来，换汤不换药，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清官”！

其实，劳动人民早已把他们的底细看透了。不论地主阶级的官也好，资产阶级的官也好，大官也好，小官也好，没有不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他们的道德信条。“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这句话是农民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一个真理，这都是农民从自己长期的悲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在封建社会，像吴晗吹捧的海瑞那样的“清官”是没有的。是狼就是狼，不会摇身一变立地成佛。海瑞要是那样受群众拥护，来反对他的皇帝，他还会当县官、巡抚吗？能升官吗？那是不可能的。

“清官”这个概念，是剥削阶级的虚构，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迷惑人民，便于统治

压迫老百姓，延长他们的统治寿命的。

吴晗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破门而出”，企图占领文艺阵地。他写了《海瑞罢官》这个坏剧本，硬说海瑞命令地主退田给农民，是人民的“大救星”。这简直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但吴晗却说，四百年前地主阶级的官僚海瑞就能处处为群众着想，跟农民站在一边。这就是抹杀了阶级斗争，要农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清官”大老爷身上。这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地主用残酷的政治、经济手段来压迫农民，压迫得他们出不了气呵！农民只有起义，用暴力来反抗地主阶级，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吴晗歪曲了我们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不要劳动人民起来革命。

吴晗为什么这样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竭力美化“清官”，把“清官”说成“人民的救星”呢？说穿了，他美化吹捧的不是什么“清官”，而是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他企图模糊我们的阶级界限，淡薄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疏远我们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让我们留恋旧社会，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这是白日做梦，是绝对办不到的。想搞资本主义复辟，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不答应的。我们一定牢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吴晗不仅“破门而出”，妄图去占领文艺阵地，他还妄图通过谈论道德问题，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



财经工作总方针，是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商业的根本原则。而吴晗却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把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的道德，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不明明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道德，无非是压迫剥削人民的道德，损人利己的道德。这和无产阶级的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本质上是不同的。

资本主义商业讲“精打细算、多方赚钱”，是为了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小利小干、大利大干、无利不干、唯利是图，是为了投机取巧，千方百计地把劳动人民的钱给“卡下来”，达到他们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损人肥己的目的。

我们社会主义商业的根本目的是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的。我们商店的每个营业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要为我们的阶级弟兄服务。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方便群众，为群众服务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提倡精打细算，但是我们不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是在做好为人民服务工作的前提下，提倡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事业，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我们所得的一切利润，归根到底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我们也讲利，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大利，人民的大利。因此，有时即使是无利可得，甚至还要赔钱的买卖，我们也要做，并一定要做好。

资本主义商人对待顾客表面上是非常殷勤的。顾客一进门，就殷勤招待，目的是想让顾客多买他的东西，多赚点钱。我们也讲服务态度热情，但和资本主义商人根本不一样，我们是为阶级弟兄服务的。我们为阶级弟兄服务好了，把他们的干劲调动起来，用到生产和工作上去，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高尚的道德，带着资产阶级脑瓜的人，学也学不去。无产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想学我们这些，必须抱着强烈的改造思想的决心，把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手。

很显然，吴晗要我们继承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多方赚钱”的原则，是要把无产阶级的企业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搞资本主义复辟。

吴晗原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地站在亲蒋、崇美、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人，他的历史就是一贯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历史。毛主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永远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时时、处处、事事突出政治，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把我们商店办成一个受人民爱戴的人民商店，坚决回击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把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突出政治，大写英雄

——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

仲正文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新英雄人物的优秀长篇，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好作品，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长篇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形势下，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一个最新的成果。它以其重大的主题、新颖的题材和崇高的形象，为社会主义文学在创作上树立了一个样板，为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创作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这部小说有着十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认为是一部切合时宜的书，是一部突出政治的书，是一部促进我们思想革命化的好教材。

我们认为，《欧阳海之歌》取得的成就、提供的经验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最根本、最中心的一条，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处处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毛主席的书作为创作实践的最高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整个作品的灵魂。《欧阳海之歌》既在作品中做到了突出政治，又在创作过程中做到了突出政治，它既是突出政治的具体表

现，又是突出政治的产物。

作为一本突出政治的好书，《欧阳海之歌》最主要的成就，是大写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完全新型的英雄人物。

在我国，一切社会主义的文学，都必须是突出政治的文学，都必须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学。而要突出政治，要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在艺术创造上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塑造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英雄人物。《欧阳海之歌》所创造的欧阳海的形象，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心胸坦荡、思想透明，毫无私心杂念的，和一切旧思想彻底决裂了的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新人。他真正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描述过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是当代许多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的优秀思想、优秀品质的高度概括。他来源于真人真事，但不拘泥于真人真事，他比实际生活中的人物“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样思想高尚，形象



丰满，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在以往的长篇创作中还很少看到过。因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十分可贵的创作成就。

《欧阳海之歌》在英雄人物的创造上是怎样突出政治的？

首先，它写出了毛泽东思想在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当代，所谓英雄人物，就是具有毛泽东思想的人物；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英雄人物。从小说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欧阳海的成长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他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欧阳海出身贫苦，在最初，他只有一种朴素的阶级觉悟。带着深厚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走进了新社会，入了伍。开初，他想的也只是像董存瑞那样，当一名战斗英雄，为自己受压迫的一家人报仇，杀敌立功，把喜报寄回家去。思想还远远不是共产主义的。他愿意到福建前线去打反动派，愿意到西藏去打反动的农奴主，却不安心按照党的分配在后方搞施工、训练。这时连队的干部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的思想，教育了他。在他懂得了施工也是干革命的道理，在工作取得了成绩、受到了表扬之后，欧阳海对待荣誉的正确态度还是没有解决的，他脑子里想的仍是大红花、挂着冲锋枪的照片，和个人的出头露面。这时，指导员曾武军根据毛泽东思想，用重锤敲打他这面响鼓，使他懂得了我们干革命为的是人民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经过党的教育，共产主

义思想因素在他脑子里逐渐增长了，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更饱满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更提高了，他决心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终于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

欧阳海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他对毛主席著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从指导员曾武军那里，懂得了毛主席著作是为穷苦人写的，是为闹革命的人写的，是我们为人民服务、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干世界革命的法宝。他从指导员曾武军身上，也从自己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得到了曾武军送他的三卷《毛泽东选集》之后，他如饥如渴地学着，不分白天、黑夜，工作忙闲，有空就读，有机会就记。他文化水平低，就买一本字典，边查字边学习；自己不会，就去问人。为了买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他夜里兴奋得睡不着觉，天不亮就赶到书店去。……

第二，他能够活学活用，不仅注意“学”字，而且特别注意“用”字。他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为了教育别人，而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例如，他原先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战士高翼中有些恨铁不成钢，工作方式上有些急躁，经过“两忆三查”学习，诉了阶级苦，认识到和高翼中是一条蔓上的苦瓜；又反复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感到自己对高翼中还关心不够、帮助不够、爱护不够。于是，就主动向高翼中作



了检讨，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高翼中多方关心、爱护和帮助。以后，在为公社拣茶籽的过程中，高翼中怕艰苦，他起初又有些发急。可是，读了《愚公移山》，读了《矛盾论》，他的思想又豁然开朗了，觉得帮助高翼中不耐烦，主要是自己缺乏愚公移山的精神，没有看到高翼中思想进步的主流。他深有所感地说：“这关键的关键在我自己身上呵！”

第三，他做到了学用结合，学一点用一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学习的主要方法，是带着问题学，有了问题到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例如，在由副排长调任营部通信班长的时候，他带着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愉快地接受了新任务，工作做得很出色。以后，在和代理副指导员薛新文的关系中，他遇着问题就去找毛主席著作，充分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解决了和薛新文的关系问题。

总之，欧阳海真正做到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毛泽东思想，使他由一个贫农的儿子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

欧阳海的成长过程，对于我们是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教育意义的。欧阳海成长的道路，就是我们青年一代革命化的道路。

欧阳海是个好战士，但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好战士，而是一个集中了无产阶级各种优秀思想品质的出类拔萃的伟大共产主义战

士。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工农兵各种英雄人物共有的各种好思想、好作风、好品格。当代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欧阳海就是概括了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一个性格完美的典型。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明确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他有充沛的革命干劲，忘我的劳动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战胜一切困难的毅力；他有敢于挑重担、坚持高标准的工作态度；他对待同志亲如兄弟、暖若春天，对待群众，爱如父母，关怀备至；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思想嫉恶如仇；他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对待别人的缺点、错误，能进行原则斗争，对待自己的缺点也一丝不苟；他处处舍己为人，表现了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他心胸开阔，高瞻远瞩，时时不忘支援世界革命的重任。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不图名，不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在他身上都有明显而突出的表现。如果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来衡量他，他是当之无愧的。

欧阳海又是一个平凡的、平易近人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他的行为，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只要积极努力，认真去做，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平凡，不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提倡的那种卑微的身边琐事，阴暗的苟且心理；我们指的是一切有益于人民的革命工作，和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所不可缺少的一切革命行动。一切平凡的革命工作



中都包含着伟大的革命意义。怀抱着远大的理想，去从事一切革命工作，都可能从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成绩。欧阳海的思想发展过程正是这样：当他抱着当英雄、争荣誉的想法去做工作的时候，工作得并不出色，并没有受到周围群众的赞扬；当他懂得了自己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伟大意义，安于平凡的工作岗位，积极完成上级分配给自己的一切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做出了极为出色的成绩。不安于平凡的革命工作，想当英雄，终不能成为英雄；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创造性地做好一切平凡的工作，甚至成了英雄，反不自觉其为英雄。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生活逻辑。欧阳海就是这样从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而成为英雄的。看，他在部队生活的短短数年，做的工作多么平凡哪！砍树木，扛木柴，打炮眼，抡大锤，担土，挖泥，修桥，筑路，训练，学习，拣茶籽，砍毛竹，救人，救火，帮助公社劳动，和战友、和自己的亲人进行思想互助，等等。但是，面对这些平凡的工作，可以做得平凡，也可以做得不平凡。欧阳海因为彻底解决了世界观问题，所以他做到了后者。

欧阳海具有雷锋、王杰、董存瑞、黄继光、麦贤得等英雄人物共同的特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也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最崇高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英雄行为，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革命化的结果，来源于平时党对

他的培养和锻炼。欧阳海在短暂的时刻里，向着飞奔而来的火车冲去，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他身上发出了闪光，靠的是平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头脑。只有在平时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才能表现出最大的勇敢，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聪明的人，最勇敢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在欧阳海身上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产生英雄人物的革命品质、革命情操的最大动力，是勇敢、无畏的唯一源泉。

围绕着欧阳海英雄形象的创造，小说写出了产生这个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通过欧阳海的成长道路，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军和我国人民灿烂的现实生活，歌颂了我们伟大的现实，赞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赞扬了在一切实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伟大胜利。它描写了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描写了我军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几年来我国人民经历的三大革命运动和重大的斗争，诸如战胜灾荒，西藏平叛，加强战备，反帝反修……；我军在大学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出现的新面貌，都得到了较好的恰当的反映。我们读着作品，处处觉得那样亲切、生动、丰满、鲜明，原因就是作品把我们伟大的社会现实，把毛泽东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开花结果的生动图景，都和盘托出了。正由于作者把英雄形象的创造放在如此



广阔的现实背景上，所以，它既充分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也大大地丰富了人物性格。

《欧阳海之歌》在英雄人物创造上得到的成功，和它在读者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了：努力塑造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有着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世界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所谓“英雄人物”。流氓，阿飞，盗匪，杀人犯……那是资产阶级最反动、最腐朽、最没落的文学中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毒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杀人不见血的暗箭和毒药。叛徒，怕死鬼，流浪汉，阿飞式的青年男女，利欲熏心的个人主义者，……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学中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腐蚀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麻醉剂和进行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工具。我国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或者热衷于写什么有“缺点”的英雄，或者提倡写什么“中间人物”，写所谓“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目的，是丑化劳动人民，歌颂资产阶级，诋毁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可见，在要不要写英雄人物，写什么样的英雄人物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文艺家只会去歌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去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去创造无产阶

级的英雄人物。至于我们，则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一定要大力地、全心全意地歌颂无产阶级，歌颂劳动人民，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歌颂伟大的党，歌颂伟大的领袖，歌颂我们无产阶级的新英雄人物。社会主义文学是兴无灭资的文学。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也应该是兴无灭资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等，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我们的笔应该着力去描写他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力创造的，应该是为毛泽东思想所教育、所武装的共产主义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对人们的鼓舞力量是最大的，教育作用也是最直接的。

为了创造我们时代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欧阳海之歌》在艺术形式上也冲破了过去的框框，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这本小说，没有一个贯串到底的中心事件，没有尖锐激烈的贯串全篇的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连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也只有欧阳海一个，但是，它却那样吸引人，那样感人，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首先是因为作品的思想性强，毛泽东思想表现得深、透、鲜明、生动，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震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弦，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共鸣。其次在于写出了千万人心目中向往的、仰慕的、急于要学习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在欧阳海身上，既体现了千百万人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的社会现实，又体现了人们为之朝夕奋斗、孜孜追求的远大理想。此外，还由于作者依据内容的需要，创



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这种形式和风格的特点，就是充满革命激情，非常政治化，调子很高昂。我们读着小说，总觉得书中的政治空气是那样浓郁，思想境界是那样高，格调是那样铿锵有力，革命的热情是那样澎湃激越，语言是那样简洁明快。我们认为这是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一个可喜的成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新的文风。

所谓“非政治”的倾向，以及颓废的、悲观沮丧的感情，软绵绵的、低沉的调子，艰涩晦暗的语言，是资产阶级文学的文风。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是全心全意，千方百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因而它应该是阶级立场明确，是非爱憎分明，渗透毛泽东思想，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政治化的文学；应该是立脚点站得高，胸怀开阔，有革命气魄，充满革命激情的文学；应该是调子高昂，语言准确、生动、明快、简洁，体现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审美观点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要描写新的阶级，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就必须采取新的艺术方法，逐步形成新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对于古代的、外国的艺术形式，我们要研究，要继承，要学习，要借鉴，但我们更必须从生活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和喜爱出发，从内容出发，大胆地创新。研究、借鉴，是为了古为今用，外为中用，而且要有利于创新。我们要敢于树雄心，立壮志，敢于在文学事业上，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

产阶级之异，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欧阳海之歌》突出政治的另一个表现，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了自己整个的创作活动。

一九六四年，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在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向部队文艺创作人员，提出了“三结合”“三过硬”的要求，《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就是依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林彪同志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去做的，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欧阳海之歌》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地活学活用了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作者和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作者和战士在一起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又不断地带着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能把自己摆进去，首先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向自己的思想开战。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才比较正确地认识了部队生活，懂得了战士的思想感情；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才逐渐缩小了和战士的思想差距，理解了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才摸索到了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英雄人物和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特征的艺术技巧。毛主席著作，真正成了作者的创作指针，成了打开一切困难问题的钥匙，给了作者以智慧、力量和方法。



创作的过程中，作者长期地、不断地深入了部队生活，不断地在火热的斗争中逐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作者没能在欧阳海生前见到欧阳海，却写出了欧阳海；通过写欧阳海，又把整个部队这几年的现实生活，乃至我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写得那样生动、形象、丰富、多采。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作者不是为了要写欧阳海才去生活的；而是因为在长期的部队生活中首先熟悉了许许多多欧阳海式的英雄人物，才去写欧阳海的。几年来，作者不断地深入连队当兵、蹲点，参加了部队的各种实际斗争，结识了许多战友，把部队生活摸熟了，把战士的心摸透了。特别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经常注意向战士学习，向先进人物学习，使作者的思想与英雄人物逐渐接近了。这些直接的生活感受和从欧阳海的战友那里取得的关于欧阳海生平事迹的素材，就构成了作者进行创作的丰富源泉，而直接的生活感受又是进行艺术创造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几年以来作者自己的思想变化、生活积累和“库存”，想取得今天的创作成果是不可能的。

当然，《欧阳海之歌》的成功，只是作者在创作上的一个实践，一次飞跃。今后还要不断地学习提高，改造思想，加强实践，才有可能产生新的飞跃，取得新的进展。

《欧阳海之歌》创作的过程，也是在文艺创作中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小说构思之初，作者所在部队的领导曾给作者以极其重要的指示：“写英雄，是为了写我们伟大的

党，写我们的时代。要通过欧阳海的成长写出部队几年来的变化。”这个指示对于小说主题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上又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作品的修改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帮助。特别在作品核实、修改的过程中，地方和部队的有关领导部门，欧阳海的战友，欧阳海家乡的群众和亲人，都积极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积极参加了创作活动。所以，《欧阳海之歌》的成功，又可以说是个群众性的集体创造。没有领导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想取得今天的创作成果，也是不可能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三结合”是符合社会主义创作规律的、发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好办法。

《欧阳海之歌》的出现，是突出政治的一次新胜利，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一次新胜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新胜利；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已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颗威力巨大的精神原子弹，将在我国的思想战线上和文艺战线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将对促进千百万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起重大作用。

中国人民需要这样的作品，全世界被压迫的、革命的人民需要这样的作品。让我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鲜明旗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歌颂伟大的人民革命、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的作品吧！



红旗

H O N G Q I

毛泽东思想领先 干部层层带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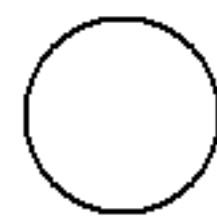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
望远镜和显微镜

工农兵和学生痛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

一九六六年

8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八期 ★

目 录

毛泽东思想领先 干部层层带头(社论).....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社论) (4)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社论) (12)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

望远镜和显微镜(《解放军报》社论) (15)

工农兵和学生痛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 (18)

☆ 六月八日出版 ☆



社 論

毛泽东思想领先 干部层层带头

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千条万条，归根到底是一条：毛主席著作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思想领先，我们事业的前进就会势如破竹，无往而不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

近几年来，在工农兵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中，兴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运动。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展开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更加阔步前进，各条战线上都不断地出现人间奇迹。

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人民解放军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林彪同志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成为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指南，已经收到了无可估量的效果。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解放军已经出现了大批英雄人物，例如，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孙乐义，等等。他们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对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学习解放军，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各行各业一个普遍的行动口号。大学习解放军，最根本的就是学习他们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毛泽东思想领先，就是学习林彪同志提出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



大庆油田，是在我国正遭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各种物质技术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实现企业革命化，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大庆人靠的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我们是依靠‘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起家的。”举世闻名的大庆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全国学大庆，出现了一大批大庆式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先。用工人的话来说，就是：“人听毛主席的话，机器就听人的话。”

大寨大队，在荒山秃岭、瘦土薄田的自然条件下，没有向国家要钱要物，就建成了一块块高产农田，连续获得大丰收，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农业树立了一个伟大的典型，开创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他们靠的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举世闻名的大寨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全国学大寨，出现了一大批大寨式的农业先进单位。这些农业先进单位的最大特点，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先。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毛泽东思想是最好的革命武器，有了它就能与山斗，山变样；与地斗，地增产；与水斗，水浇田；与林斗，林成长；与歪风邪气斗，就能脚跟硬，方向明。”

我国广大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一革命运动的根本经验，也是毛泽东思想领先。哪里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用得好，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哪里运动就搞得深，搞得透，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生革命性的根本变化，生产面貌也就会焕然一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领先。怎样识破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识破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这些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必须依靠毛泽东思想。

是拥护毛泽东思想领先，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领先，是主张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还是主张钞票挂帅、业务挂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各项工作中坚持毛泽东思想领先，必须依靠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必须依靠干部层层带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保证。



有一些干部，天天忙于开会，发指示，打电话，忙于日常事务，就是不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懂得，做一千件事，一万件事，只要忘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是忘记政治，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糊涂人，这是很危险的。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一切工作都是做不好的。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就会晕头转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自己就会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成为修正主义者。全党干部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

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有的地方，干部不如群众学得好，领导干部不如一般干部学得好，这种现象必须迅速改变。干部必须带头学，带头用。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干部也必须向工农兵请教。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革命的带头人。

干部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各地都有。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像工农兵群众那样，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阶级斗争当中学，在生产斗争当中学，在科学实验当中学。他们带头学习，带头工作，带头劳动，带头改造思想。他们同群众一起工作，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搞思想革命化。因此，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高，工作做得好，真正能够领导群众。他们在工作中都是毛泽东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推动一切。各级党委应当注意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

干部和群众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改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改观，工作面貌就会改观，生产面貌就会改观。

干部层层带头，逐步扩大和提高学习积极分子的队伍，形成更广泛更深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使毛泽东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脑里扎根，在一切工作中真正做到毛泽东思想领先。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这是沿着正确方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思想领先，干部层层带头。这就是结论，这就是党的号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由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迅速地猛烈地开展，其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当。

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高举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在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

这是在上层建筑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否巩固和向前发展，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也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对这场斗争，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为什么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样重要？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经常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突出政治，千万不要忘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指出：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号召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

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从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就是先抓意识形态，先作舆论准备。欧洲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起，就不断地批判封建的意识形态，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舆论准备，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才先后在十七、十八世纪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

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就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舆论准备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舆论准备，才夺取了政权。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更是记忆犹新的。当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力量薄弱，手无寸铁。干革命，从哪里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走狗。中国无产阶级



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从五四文化革命开始的。

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来，就是毛泽东思想掌握工农兵群众的历史。群众说得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伟大的革命旗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使得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日益得到群众的拥护，就有了军队、有了枪，就能一块一块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而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就成了统治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成了被统治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绝不甘心被统治，绝不甘心死亡，他们时时刻刻梦想复辟，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企图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他们还有很强大的力量，他们有金钱，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国际联系，有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有很大的市场。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会被剥削阶级的思想腐蚀，以至变成反革命。而且，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还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还存在丧失政权的危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如果不严重地注意这一点，采取必要的措施，那就要使我们党和国家变颜色，那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最重要的一个阵地，就是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的复辟活动，首先就是要抓意识形态，千方百计地用他们那一套腐朽的思想，欺骗群众。抓意识形态，制造舆论，这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举行行政变，夺取政权。

苏联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后，没有认真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益泛滥，腐蚀着人们的头脑，并且以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方式，瓦解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更加明目张胆地制造反革命舆论，不久，他们就举行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宫廷”政变，篡夺了党权、军权、政权。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分子也是先作舆论准备，然后上街闹事，举行暴乱。这个反革命事件，就是在帝国主义策划下，由裴多菲俱乐部一群反共知识分子发动的。当时还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纳吉，“黄袍加身”，做了反革命的头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坚持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必然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取“宫廷”政变的形式，或者采取武装政变的形式，或者两种形式相结合，来夺取政权。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兴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地拔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子，牢牢地扎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努力去做多方面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必须贯串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贯串在一切工作中的历史任务。

有些同志，把无产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在报刊上的争论，看作是文人“打笔墨官司，无足轻重”。有些同志，埋头业务，不关心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极端危险的。如果听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泛滥，其结果就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对于这些同志，要大喝一声：同志！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要推翻我们的政权，你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我们要保卫和发展革命事业，不仅要牢牢地抓住我们的枪杆子，而且必须拿起无产阶级的笔杆子，横扫资产阶级的笔杆子。清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更加牢固地抓住无产阶级的枪杆子。

看看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令人惊心动魄。

建国以来，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后，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加深入，更加复杂，更加激烈。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这次进攻中，章罗联盟反动政客集团公开出台以前，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就放出了大量的毒草，一批反革命的观点、反革命的政纲和反革命的电影、小说，纷纷出笼了。很显然，这一套东西，都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夺取政权作舆论准备的。

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红旗照耀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同时，工农兵群众热情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开始了革命。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间，由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破坏和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经济困难。困难，吓不倒革命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经过了几年，就克服了困难，出现了大好形势。可是在经济困难的几年里，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反动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达到了极其猖獗的程度。

在哲学界，杨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意识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谬论，来打击工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对大跃进。接着杨献珍又抛出了“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注）的极端反动政治路线，提供哲学“根据”。钻进党内的那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所谓“权威”人物，猖狂地挥舞起“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这三根棍子，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还利用职权，禁止报刊发表工农兵的哲学论文。同时，某些资产阶级“专家”，借研究哲学史为名，大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大肆吹捧孔子，利用孔子这具僵尸，宣扬他们一整套的资产阶级观点。

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

在史学界，一批资产阶级“权威”，对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史学革命，大肆攻击。他们反对史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批判帝王将相，突出农民和农民战争，十分仇恨。他们对帝王将相歌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农民和农民战争则尽情污蔑。他们是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保皇党”。其中，有些人是反共老手。吴晗、翦伯赞就是这样的人物。

在文艺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宣扬对抗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一整套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卖力地宣扬他们的所谓三十年代传统。“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在这些论点“指导”下，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戏、坏电影、坏小说、坏电影史、坏文学史。

在教育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教育方针，极力反对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宣扬苏联修正主义的一套教育“理论”和制度。他们拚死命地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妄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在新闻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反对新闻要有指导性，提倡资产阶级的所谓“知识性”。

注：“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



他们妄图扼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妄图让资产阶级的货色自由泛滥，妄图夺取我们的新闻阵地。

在这股逆流中，最反动、最猖狂的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他们的阵地很多，有报纸，有刊物，有讲坛，有出版机关。他们的手特别长，伸到了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篡夺了部分的领导权。他们的反动政治嗅觉最灵敏，他们的作品配合反动政治气候最及时。他们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

在这股逆流中，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打扮成解释党的政策的“权威”，大肆放毒，欺骗群众。他们利用职权，一方面让牛鬼蛇神大批出笼，一方面压制无产阶级左派进行反击。这是一撮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党反社会主义狗肉的阴谋家。这是一些最危险的人物。

对于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的资产阶级进攻，我们不断地进行反击。特别是从去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反击战。

在这场反击战中，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觉悟空前地提高了，战斗力大大地增强了。经过群众的战斗，粉碎了“三家村”反党集团，挖掉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根子。这个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串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持了许多阵地和工具，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集团。他们的阴谋被揭穿了，他们失败了。我们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建立了新市委。这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决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从去年我们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战以来，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乱了阵脚，他们匆匆忙忙地祭起了五个“法宝”，来支持和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压制和打击无产阶级左派。

一个“法宝”，名之曰“放”。

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歪曲党的放的方针，抽掉放的阶级内容，把放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只准资产阶级右派“鸣”，不准无产阶级左派争，只准资产阶级右派进攻，不准无产阶级左派反击。他们让右派大放而特放，对左派反击的稿件则予以扣压，或者强令作者按照他们的意图加以修改。他们说：不要从政治上批判《海瑞罢官》，否则就妨碍了放，人家就不敢说话了。请问这班老爷们：你们“放”得还少吗？你们不是剑拔弩张地从政治上向党进攻吗？为什么不准无产阶级放，不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右派从政治上进行反击？原来你们的“放”，就是对资产阶级开绿灯，一律放行，对无产阶级开红灯，不准通过。



一个“法宝”，叫作“先立后破”。

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装作“辩证法”家，在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大叫“先立后破”。他们借口“先立后破”，不准无产阶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准攻打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堡垒。“先立后破”是反辩证法、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破不立。我们就是要破字当头。破就是革命，破就是批判。破就要讲道理，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破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先破后立、破中有立，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真理，难道这不是立吗？请问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要立什么呢？很显然，你们是只准立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不准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当无产阶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击资产阶级进攻，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候，你们大叫“先立后破”，就是保护右派、不准左派反击，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和防止“左派学阀”。

每当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在所谓要“细致”、“深入”种种借口下，大骂左派“粗暴”，是“棍子”。在这次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大反击中，他们还祭起了反对和防止“左派学阀”这个“法宝”，妄图把无产阶级左派压在阴山之下。这是做不到的。我们说，“学阀”这顶帽子，只有戴在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上，戴在资产阶级所谓“学术权威”的头上，才恰当合适。你们这些钻在党内包庇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老爷，才是不看报，不读书，脱离群众，什么知识也没有的以势压人的大党阀、大学阀。无产阶级左派从来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的，从来是靠科学论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无产阶级左派跟“学阀”是不相干的。对于资产阶级“学阀”，对于你们这一小撮大党阀、大学阀，我们就是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讨伐。告诉骂左派是“棍子”的老爷们，左派是无产阶级的钢棍子、金棍子。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棍子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打倒你们这撮大党阀、大学阀，捣毁你们的阎王殿。这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

一个“法宝”，叫作“纯学术讨论”。

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说成所谓“纯学术讨论”，一方面用以掩盖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一方面压制无产阶级左派进行反击。请问这班老爷们，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邓拓、廖沫沙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究竟有什么学术？所谓“纯学术讨论”，这是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骗人的东西。在阶级社会里，“纯学术”是没有的，一切学术都是建立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一切学术都是从属于政治的，都是这样或那样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在这次大反击战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祭起所谓“纯学术讨论”这个“法宝”，反对突出政治，就是要掩盖“三家村”“四家村”之类反党黑店的政治要害，就是要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反对突



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把这场大斗争拉向右转，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宝”，叫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大家有份”，“混战一场”。

在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的这场反击战中，钻在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祭起这个“法宝”，一方面要他们的亲信顶住，牢守阵地，寸步不让；一方面制造混乱，混水摸鱼，伺机反攻。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完全虚伪的。在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当今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客观真理，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规律完全一致。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早已和真理绝缘，他们的所谓“真理”，只能是逆乎时代潮流，反乎客观规律的谬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在无产阶级真理和资产阶级谬论之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绝不可能有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拿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撑腰，对左派的反击进行压制。请问这班老爷们，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的讲平等吗？为什么要扣压左派稿件，不予发表，只准右派大放毒草？这里有什么平等呢？老实告诉你们吧：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同无产阶级有什么平等，我们同你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你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只能实行专政。

所谓“错误言论大家有份”，所谓要“混战一场”，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说，首先要分清阶级界限，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革命的左派，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中，也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这同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言行，是根本不同的，绝不能混为一谈。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你们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对抗性矛盾。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对于你们的一切反革命言行，我们一定要痛加批判，鸣鼓而攻之。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当然也是要批判的，但是，这同对待你们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有区别的。我们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学者，只要他们不是反共反人民的，我们就要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我们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大叫“错误言论大家有份”，“混战一场”，其目的无非是揪住左派不放，企图把水搅浑，造成一片混乱，来一个



反攻倒算。这是枉费心机的。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划分左、中、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争取、团结和教育大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钻进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这些“法宝”，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们要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已经篡夺了部分的领导权，对我们实行了专政。我们必须把这些阵地统统夺回来，把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打倒。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个最大特点。

怎样识别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还是抵制毛泽东思想，反对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

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赞成，就拥护。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无论他有多高的职位，拥有多大的“声誉”和“权威”，我们都要无所畏惧地同他斗争，把他打倒。

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看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其实，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都不过是纸老虎。

毛泽东思想是方向盘，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主力军。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盘，有了工农兵这支主力军，什么妖魔鬼怪都会被打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当我们揭露和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时候，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和外国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幸灾乐祸，以为可以从这里捞得一点油水。我们要告诉国内外的反动派：你们比驴子还要蠢。揭露和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是打掉你们在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挖掉你们寄以希望的“定时炸弹”。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

国内外反动派还污蔑我们打击一切知识分子。这是胡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是针对着一小撮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是针对着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从旧社会来的广大知识分子，我们是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正在日益壮大。

一切革命的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乘胜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报》社论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鄙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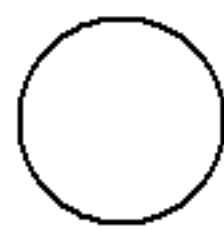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原载六月一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 望远镜和显微镜

《解放军报》社论

当前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是改造人的思想，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用什么武器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什么思想来武装人的头脑，改造人们的灵魂？唯一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行动的最高指示，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统帅一切。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冲锋陷阵，夺取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黑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隐蔽，更狡猾，更阴险，更毒辣。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由于我们党和毛主席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由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包括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内，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惯用的手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特点。

从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们，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是人，暗中是鬼。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吃人的笑面虎。他们常常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作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反面文章，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私货。那些打着假红旗的敌人，要比打着白旗的敌人狠毒十倍。那些披着羊皮的狼，要比不披羊皮的狼阴险十倍。笑面虎要比张牙舞爪的老虎凶恶十倍。糖衣炮弹要比真枪实弹厉害十倍。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钻到我们“肝脏”里面来的敌人，比公开的敌人要更危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和高度的警惕。



在这样极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怎样才能分清敌我，站稳立场？怎样才能够识别革命还是反革命，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这就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用毛泽东思想作为观察一切事物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毛主席所发展了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个锐利的武器，我们就有了辨别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就能明察秋毫之末，“见微而知著”。就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拨开迷雾，洞察一切，使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都无处藏身。就能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局，看到未来，看到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就能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站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两种世界观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要搞复辟、颠覆的阴谋，总是思想先行，总是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利用他们的地位和职权，篡夺和把持一些部门的领导权，通过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报纸、刊物、广播、出版物、学术研究以及学校等等，千方百计地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来腐蚀人们的头脑，搞“和平演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作思想和舆论的准备。如果我们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阵地，资产阶级思想就会自由泛滥，逐步蚕食，一口一口地把你吞下去。无产阶级思想一退下来，上层建筑就退下来，经济基础也就会退下来，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去战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民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也是世界革命人民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经过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检验，经过国际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检验，都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革命的实践经验，总结了苏联党和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的痛苦教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的英明的政策。这不但能够使我们国家永远保持革命的气概，能够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而且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兴旺，就无往不胜。世界各国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够得到解放，就能够彻底埋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能够在全世界逐步实现共产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普及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密切相结合。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事实说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聪明，最齐心，立场最坚定，眼光最锐利。在这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正是他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结果。这个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不管牛鬼蛇神玩弄什么花招，伪装得多么巧妙，“三十六计”也好，“七十二变”也好，都逃不过他们雪亮的眼睛。不管什么样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都逃不脱被彻底摧毁的命运。

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还是抵制，是拥护还是反对，是热爱还是仇视，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要革命，就要拥护毛泽东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是反革命，就必然要贬低、歪曲、抵制、攻击、反对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的“权威”老爷们和一切牛鬼蛇神，包括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千方百计地诋毁毛泽东思想，极端仇视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们胡说什么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其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从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本能出发，害怕毛泽东思想，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特别是害怕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就要被彻底揭穿，他们的丑恶嘴脸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幻梦就要完全破灭。

阶级敌人是不打不倒的。被打倒了，它还想爬起来。搞掉了一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打倒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登台表演。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一定要抓住突出政治不放。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接过来，传下去，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作好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的需要，是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保证我国从社会主义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需要。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原载六月七日《解放军报》〕



工农兵和学生

痛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

编者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开以来，广大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给本刊寄来大量稿件和信件。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痛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

这些稿件和信件，充满了强烈的阶级感情，是非爱憎极其分明，字字句句都表达了对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无比愤怒。这些来稿来信，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江山是极其稳固的，什么“三家村”、“四家店”之流的反革命分子，必然被人民的铁拳打得粉碎。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也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大量的来稿来信中，工农兵的最多，我们选了一部分摘要发表。同时也选摘了一部分学生的来稿来信。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 and 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决不可以忘记阶级斗争。我们

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我们要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山西省太原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第四公司工人谢大壮）

目前，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

6
料



全中国。我们亿万革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斗号召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这场伟大的革命，打碎了多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那些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印把子虽然早已掌握在人民手中了，但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辟。

短短几个月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砸开了“三家村”黑店，把一伙牛鬼

蛇神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一系列事实，雄辩地说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不是好惹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识破、捣毁、彻底打垮一切反革命黑帮！

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却白日作梦，妄想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要大吼一声：住手！一万个不行！我们要说：

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对革命！

谁反对党中央，谁就是反对革命！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反对革命！

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反对革命！

谁反对社会主义，谁就是反对革命！

（石景山钢铁公司技术处技术员张洪都）

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谁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同这些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我们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反击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

“三家村”黑帮，要人们去写“新东西”，不要说“人云亦云的废话”。很显然，“三家村”黑帮所要的“新东西”，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所谓“人云亦云的废话”，就是恶毒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现在，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革命的人民都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指

示，用毛泽东思想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处处听毛主席的话，这是极大的好事。然而“三家村”黑帮，竟恶毒地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人云亦云的废话”，这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咒骂和诬蔑完全一样。“三家村”黑帮还要“报刊编辑部，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尽可以大胆地删去来稿中人云亦云的重复内容”，他们事实上是见了毛泽东思想就删。这说明他们十分害怕毛泽东思想，害怕革命人民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所以就煞费苦心地对



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警告“三家村”黑帮，你们想用咒骂和诬蔑来诋毁毛泽东思想是办不到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翻身闹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指南。每个革命战士，一切革命人民，都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谁要诬蔑和攻击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解放军某部战士孙应龙、孙怀力）

“三家村”黑帮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空话”，他们认为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是“可怕”的，是“糟糕”的。他们还说，要是我们的后代也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那就更糟糕了”。他们的这种论调，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是多么一致啊！他们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腔调，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小丑跳梁而已。国内外一切反动派都有一个通病，他们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又恨又怕。恨，表明他们是反动派；怕，表明他们是纸老虎，色厉内荏，心虚胆怯。

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科学真理。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者看来，完全是好得很，只有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看来，才是糟得很。（中共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委宣传部通讯组）

无数的革命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离不了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同样也离不了毛泽东

思想。世界上一切要革命的人都向往着天安门，纷纷来取毛泽东思想之经。各国反动派却恶狠狠地盯着北京，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知道，毛泽东思想兴旺之时，就是他们完蛋之日。“三家村”黑帮也十分懂得：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就必须从攻击毛泽东思想入手，使革命人民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三家村”黑帮就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一起，兴风作浪，大叫大闹，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妄想挖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的灵魂，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狂妄目的。

但是，他们决不会得逞。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诬蔑，决不会损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根毫毛。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敌人的仇视，更说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更使我们热爱自己的伟大领袖，更提醒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同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作斗争。

（石景山钢铁公司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工人张富）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
正确的，受到全国人民的无限信任**

“三家村”黑帮诬蔑我们党“自食其言”“不堪信任”。这是撒的弥天大谎。

我们党向来说话算话，说了就做，说一不二。大家都知道淮河吧！解放前在蒋介石血



腥统治下，沿淮河地区连年受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我的家乡三岔湾地势低洼，灾情更为严重，有句民谣说：“有女莫嫁三岔湾，单被改做裤子穿！”无辜百姓因遭灾遭难死去的数以千计，我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解放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说干就干，十多年如一日，奋斗不懈，封山育林，修水库，筑堤坝，疏通河道，根治了淮河。我的家乡也实现了水利化和电力排灌，再不怕老天作难了。社员说：“如今三岔湾，和过去不一般，丰收果实堆成山，世界革命挑重担！”这铁的证据不正表明党说了就做，做就做好，最使人信赖吗？（解放军某部五好战士张景琢）

敬爱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的党是哺育我们成长的母亲。我们的党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

在石家庄地区遭受地震灾害后，我们部队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星夜奔赴灾区，抢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帮助社员迅速搭起临时住房。全国各地大力支援灾区的物资源源不绝地运到，从粮食、烧饼、木料到锅、碗、瓢、勺，无一不有。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教育，能办得到吗？

广大贫下中农，万分感激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他们说：“爹亲娘亲不如党和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贫农社员李老发在接到救灾物资后，激动地说：“我们受了灾，党和毛主席这样操心，给我们送来了粮食，送来了苇席。只要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这就是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话，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心里话。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受到全国人民无限信任的党。我们要警告“三家村”黑帮，你们诬蔑毛主席和我们的党，我们决不答应！（解放军某部训练队战士曹庆泽）

共产党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三家村”黑帮说的“群众”，其实是地富反坏右

我听了“三家村”这帮坏家伙的反动话，肺都快气炸了。他们都是黑心贼，说鬼话。

他们攻击党“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拿我这个老婆子说吧，旧社会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小孩他爹被他们活活打死，孩子胳膊被他们拿枪打了个透眼，差点没死，仅有的两间破房，还被他们把檩条和砖都扒走，他们哪拿穷人当人看。共产党来了，我们才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从公社到中央开劳模会、代表会，研究国家大事，都有我们的份。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曾几次接见我们。省委书记、省长都亲自找我征求意见。县和公社商量什么大事，更是少不了俺。怎么说共产党“看不起群众”呢？“三家村”这帮坏家伙，是大瞪两眼说白话，是造谣诬蔑，是恶意破坏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关系。

从我们见到共产党的那天起，就知道共



产党处处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办事最投我们的心思。共产党把我们这些旧社会的叫化子，看成是“眼珠子”，说俺们是“顶梁柱”。这些事实比铁还硬。什么蔓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三家村”黑帮指的“群众”是伙什么货色？就是那些早被人民打倒的地主、富农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蛋，他们根本不是群众，是牛鬼蛇神。“三家村”的坏蛋们，你们想让党看得起这些坏人吗？不行，贫下中农、全国人民都不答应。你们这是白天作梦，痴心妄想，是万万办不到的。（河北省贫下中农代表、滄县史楼公社社员芦秀英）

“三家村”黑帮攻击我们党“看不起群众”，我们决不允许他们攻击我们的党。解放十几年来，我们工人阶级真正当了家作了主人。党把政策交给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有事跟我们商量，使我们的觉悟一天天地提高。事实说明，党最相信我们工人阶级，也最看得起我们工人阶级。我们也最相信党，最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石景山钢铁公司铸造厂五好工人刘兴云）

“三家村”黑帮所说的“群众”是什么人？是地富反坏右，是牛鬼蛇神！对这些人，我们要专他们的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对他们“广谋从众”，就要吃大亏，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

命复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解放军某部战士朱忠兴）

天是变不了的。反革命集团妄想推翻党的领导，这是“灯草撬石板”，绝对办不到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胜利。“三家村”黑帮挖空心思，想尽狂言滥调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真是比刽子手还凶恶。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损害我们党的伟大事业的一根毫毛！天是变不了的。这些牛鬼蛇神反党，是“灯草撬石板”，“螳臂挡车”，枉费心机。他们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南宁铁路分局职工赖文青）

反革命分子妄想让我们党下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把印把子交给他们，把我们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拖入旧社会的人间地狱，过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这是白天作梦，办不到！（解放军某部五好战士吴亮琪）

“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激起了我们工人阶级无比的愤怒。我的话在肚子里憋不住了。我决不允许这伙暗藏的敌人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救星毛主席。

亲爱的工农阶级弟兄们，我们劳动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救



出来的。解放前，我的祖父担着我父亲到处逃荒，来到东北。万恶的旧社会，真是天下乌鸦一样黑。祖父和父亲都给地主扛活，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一次，父亲病了，亲友送给点面粉，想做点汤喝，还未等吃，被伪村公所发现，他们来推翻了桌子，还给我们家定了“经济犯”的罪名。如今，我父亲说：“生活好了，越活越年轻了，可不能忘记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我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我们的社会是幸福的社会，再不能允许万恶的旧社会复返了。（黑龙江省牡丹江林业管理局赤京城大修厂电工张景棠）

在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心明眼亮，决不允许任何阶级敌人反对党的领导。

我们吕王公社，在旧社会，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被地主富农霸占，广大贫下中农受尽了苦难。吕王大队有个地主万洪吉，人称“眼镜蛇”，霸占土地上千亩，残酷剥削压榨人民。他用一头小猪，驴打滚，利滚利，三年就滚去下中农于永富十三亩好地。贫农张允芳，租种万洪吉的土地，辛辛苦苦修了几亩坡梯田，多收了一点粮食，地主一看眼红了，第二年就涨了地租。我自己在旧社会也是扛长活，做劳工，过了半辈子人间地狱的生活。

今天，我们吕王公社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红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使这个穷山沟发生了翻天复

地的变化。全社已修起了水平梯田和坡式梯田七千六百多亩，育林造林一万二千多亩，柞桑满坡，花果满山，河流两岸修起了大面坝，驯服了几百年来乱石滚滚的大河，数千亩不足一犁土的沙石薄地，变成了稳产高产农田。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这些成就都是依靠党的领导取得的。谁要反对党的领导，让我们回到穷人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去，谁就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就要同他拚个你死我活！（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营口县吕王公社党委书记徐树刚）

在我们同学中，大多数人出身于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贫下中农家庭。不少同学在旧社会流浪，受尽欺凌。

解放后，我们不仅吃得饱，穿得暖，在政治上经济上当了国家的主人，而且在文化上当了主人。不仅能入学读书，而且可以受高等教育。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祖祖辈辈作梦也不曾想到的人间奇迹。每当我们忆昔日苦，思今日甜时，我们怎能不发自内心地高声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呢！怎能不激动地唱出“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呢！又怎能不深情地说出“千好万好不如毛主席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田永禎、魏元之）



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许“三家村”反革命集团乱说乱动

世界上没有只准狼吃人、 不准人打狼的道理

我们处在边防对敌斗争的最前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对反动派要实行专政这个指示的重要性。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复辟的阴谋虽屡遭破产，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他们经常在边防地区阴谋搞爆炸和偷袭活动，并派遣特务偷越边境，企图潜入大陆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解放前逃亡港澳的地富反坏，也时时刻刻想回到大陆来，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就在我们驻地的对面，住有一个从边防村庄逃亡过去的地主，他经常坐着小船来到海上看他过去的房屋土地，一边看一边骂。直到临死时，还叫人扶着他坐船到海上来，用手指着房屋土地，咬牙切齿地说：“不收回房屋土地，我死不瞑目！”看，阶级敌人何等嚣张，何等猖狂，多么想在中国复辟，重新统治压迫人民。在阶级敌人面前，我们怎么能放松无产阶级专政呢？我们对反动派，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了专政，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使他们不能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地富反坏右的忠实代理人“三家村”黑帮极度不满，起来攻击无产阶级专

政。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骂我们“不得人心”，说明我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对地富反坏右就是要越狠越好，越不得他们的心越好。不然，我们得了他们的心，还叫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还叫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呢？（解放军某部“红色前哨连”指导员陈仕如）

“三家村”黑帮恶毒地攻击我们党是“蛮横逞强”，并恐吓我们党说，这样下去，就会“不得人心”。难道我们能把用鲜血换来的政权和我们手中的枪交给他们，让他们重新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去得他们这种人的“人心”吗？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霸道”，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霸道。世界上没有只准狼吃人，不准人打狼的道理。（湖北省武昌水果湖洪山礼堂金业亮）

人民江山人民保，我们要把地 富反坏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

无产阶级专政对地富反坏右，只能实行“霸道”，决不能施行什么“仁政”。毛主席说：“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如果按照“三家村”黑帮说的，对地富反坏右施行所谓“仁政”，反革命就会复辟，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人头就要落



地，人民的国家就要灭亡。

人民的江山人民保。我们决不会放过“三家村”黑帮，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我们紧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坚决拔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福建省顺昌县公安局廖富贤）

对于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对于地富反坏右，就是要实行专政，实行“霸道”，就是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假如对他们还讲什么温良恭俭让，那我们岂不是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吗！看来，对他们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专政，今后还要大大加强才行。（解放军某部战群）

旧社会，我家很穷，衣服没得换，肚子吃不饱。整天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气。他们逼迫我们穷人给他们出民工，那时我才十一、二岁，不去，地主保长又打又骂；去吧，母亲又担心我累伤了。穷人在旧社会受尽了压迫，过尽了苦日子，受尽了窝囊气。有一天，国民党还乡团来了，硬拉我去给他们找保长。我正推碾子轧玉米，家里还等着吃呢！我不肯去，说了一句“你们

不是讲民权吗？”一个叫张昌友的匪军骂我：“他妈的，谁跟你讲民权？”他上手就打我两个耳光。那时候，穷人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

解放后，我们穷人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有了政权，我们穷人才扬眉吐气了。地富反坏右以及“三家村”黑帮那伙反革命分子，时刻都不死心，妄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和我们是死对头，势不两立。

对这帮家伙，只能讲专政，决不能讲“仁政”。同他们讲“仁政”，那我们就是背叛革命，我们就要回到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的日子里去了。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三家村”黑帮里这些反动的家伙不打也是不会倒的。我们决不能有一点点儿含糊。（石景山钢铁公司技术处修理车间党支部书记司仲良）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剥夺反动阶级、反动派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发言权。对这些敌人，只能实行“霸道”，实行“专政”，决不能实行“仁政”。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只要阶级敌人存在一天，永远是这样。（北京钢铁学院学生杨为庄）

四、把诬蔑总路线的牛鬼蛇神扫光

祖国建设成绩巨大，
总路线红旗不容诬蔑

“三家村”黑帮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骂我们的党在事



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

事实胜于雄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突出政治，拿出了“愚公移山”的干劲，发挥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工农业面貌焕然一新。工厂似雨后的春笋，一个接一个地投入生产。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之后，广大社员干劲十足，大兴水利，大搞科学实验，粮食一年比一年增产。前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六亿五千万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变成了现实。长江大桥使天堑变通途。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能造的万吨水压机，我们制造出来了。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发展成拥有拖拉机、电灌站的人民公社。我们建成了十三陵水库，佛子岭水库，新安江发电站，长春第一汽车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等等。这些成绩难道是“吹牛皮”、“说大话”吗？我们的党是英明伟大的，总路线红旗光芒万丈，是不允许任何人玷辱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党走，把总路线红旗举得更高，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军某部战士徐友德)

我们石钢铸造厂职工和公司广大职工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在少资料、缺设备的情况下，经过上千次试验，把日本

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陈旧的“砂型立式铸管机”改成了现代化的“连续铸管机”，为国家生产出大批的优质铸管，支援了工农业生产。石钢工人十四天建成了“小转炉”，改变了石钢有铁无钢的历史，烧结厂、三高炉、三焦炉等三大工程一年完工投产。这都是我们工人阶级用双手创造出来的。“三家村”黑帮想给大跃进抹黑，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全国劳动模范、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人工程师王治国)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幸福起来，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三家村”黑帮攻击大跃进，诬蔑社会主义，我们决不答应。我们是亲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见证人。我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们要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陕西省户县城郊公社西郊大队社员李强华)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拿我们大队说吧，真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大队现在用上了拖拉机，改旱田为水田，粮食大增产。一九六四年大队粮食总产量是一百四十万斤，一九六五年就增加到二百二十万斤。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三家村”黑帮诬蔑我们的大跃进，诬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贫下中农要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

(中共通县翟里大队总支书记邓项田、宣传



委员邓万田)

“三家村”的反革命分子听着：你们敢来唐城看看吗？吓死你们！唐城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粮食总产量由一九六四年的五十万斤一跃而为一九六五年的九十万斤，难道这不是大跃进？过去几十年没有修成的西河渠，去冬今春只半年时间就修成了，没有一亩水浇地的唐城，一跃而有了一千五百亩水浇地（平均每人一亩）。这是“吹牛皮”吗？旧中国的唐城，到处是战争的废墟，现在汽车、拖拉机成天跑个不停。我们还办起了耕读中学，贫下中农的子女都上了学。我们这里现在还发了电，有线广播到处都有，每天都能听到国内外大事。这是说“空话”吗？（山西省安泽县唐城大队张金福、李志庆、郝福文等）

看看我们下甸子大队吧。我们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大跃进以来，劈山引水，把原有六十亩水田扩大到八百二十多亩，植树造林五十多万棵。漏河上修了上千座木牛坝和铁牛坝，使年年泛滥成灾的漏河被驯服了。在十五条沟修谷坊二百多处，修坡式梯田六百多亩，把过去的穷山恶水治理得山清水秀。治山治水的结果，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提高，粮谷豆单产由解放初期的一百六十多斤增加到一九六四年的三百五十五斤，去年增产更多，平均单产四百一十四斤。

我们广大贫下中农社员，贯彻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的精神，确实把一头小牛“吹”成骡马成群，光牛就有三百多头；把一挂木轴小破车“吹”成胶车、铁车四十多台。不仅如此，还有一辆解放牌大汽车！这是“吹牛皮”“说大话”吗？我要说的还多着呢！在辽宁东部山区里的一个贫穷队如此变化，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这些事实，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否定不了的！（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农业特等劳动模范，桓仁县沙尖子公社下甸子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建生）

旧社会，工人农民当牛马； 新社会，党最关心群众生活

我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老工人，旧社会的苦我是受够了。过去我替地主放牛当长工，在门头沟煤窑给资本家背煤，起五更，睡半夜，累死累活，吃的是混合面，穿的是麻包片，住的是烂窝棚。他们哪里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待，连资本家的一条狗都不如，稍不顺眼，就拳打脚踢。我背上长了一个疮，工头看我背的少，拿起木棍子就朝我背上打，打得我眼冒金花，当场昏死过去，醒来还得背煤。资本家为了赚钱，根本不顾我们工人的死活。有一次，煤窑中沙沙响，煤块往下掉，眼看着就要出事了，但工头还硬要我们继续干，突然一声巨响，窑塌了，砸死了二十多个工人兄弟。像这样，在煤窑里，砸死的、压死的、淹死的、放炮打死



的、撞死的，真是数都数不清。资本家根本不把这些事故放在眼里，还恶毒地说：“要三条腿的蛤蟆没有，要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这就是“三家村”黑帮所说的旧社会“爱护劳动力”的真相。

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从人间地狱救出来，使我们当了国家的主人，过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党处处关心我们工人的生活。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是党给我们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工人的今天。“三家村”黑帮攻击我们的党，要我们回到吃人的旧社会去，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斗到底！（石景山钢铁公司白云石车间工人蓝彬朋）

我们公司在“万人坑”那儿开了个纪念在旧社会里死去的阶级兄弟追悼大会。听了老工人李护国等的控诉，我心里又悲又痛。回车间的路上，我狠狠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学好毛主席著作，接好无产阶级的班，把无产阶级的印把子抓得紧紧的，决不让牛鬼蛇神夺走咱们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印把子，不让咱们的后代再受那“万人坑”的苦难！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邓拓、吴晗、廖沫沙这帮牛鬼蛇神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看到他们说什么封建统治者也懂得“爱护劳动力”的谬论，我们几个人读了读，议了议，越议越有气。

天下老鸦一般黑，不管是封建地主，还是资本家，剥削阶级都是专门欺榨我们劳动人

民的。解放前，在石钢的“万人坑”里，让剥削阶级害死了多少阶级弟兄！我们许多阶级兄弟被压榨得不能干活了，让封建把头扔进“万人坑”，活活地喂狗！“三家村”黑帮为旧社会的统治叫好，诬蔑我们的党，我们决不饶过他们。（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工人马小六）

“三家村”黑帮大肆美化旧社会的统治阶级，说他们懂得“爱护劳动力”，掩盖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榨。他们还借题发挥，说什么“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诬蔑我们党“不爱护劳动力”。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们的党是最爱护劳动力的。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我们贫下中农利益着想。试问：我们党领导人民兴修农田水利，变荒山为花果山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家在旧社会里世世代代做牛做马，吃不饱穿不暖，我父亲给地主干活累弯了腰。我从十三岁开始给地主扛活，地主逼着起早摸黑，拚命地给他干活，还不叫吃饱饭，累出了心口疼病。去年，我妻子病了，党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补助生活费、医药费，叫我妻子看病、养病。“三家村”黑帮恶毒地攻击我们党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我们广大贫下中农是决不容许的。

（山东省东阿县贫下中农代表王文成）



五、“三家村”反革命集团要把青少年拉上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家村”黑帮打着“珍爱幼小的心灵”的幌子,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毒害青少年的心灵,以“人生皆有善性”的反动观点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这无疑是向青少年宣扬,一切人都有好的道德品质,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一切阶级敌人也不例外。所以,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不必要的,如果搞阶级斗争,那就是“到处树敌”。你听,这是多么反动的论调!

“三家村”黑帮,为了和我们党争夺接班人,极力把青年往只专不红的道路上拉。说什么“古人每到书多的时候,往往也有了相当的地位”,要青年“不要空喊读书”,说什么“到处叫嚷毫无用处”,要青年“闭户遍读家藏书”,这不明明是要青年脱离政治,钻故纸堆,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吗?这不明明是要青年为爬到“相当的地位”而“赶快读书”吗?这完全是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把青年拉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路上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为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退“三家村”反革命黑帮的猖狂进攻,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彻底挖掉!(云南省下关中学学生张锡祿)

“三家村”黑帮向青年学生散布了很多毒素。吴晗教青年学习的方法只是两个字:“读书”。他要青年“勤读、勤抄、勤写”,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邓拓在他的黑话中同样要我们“苦读”,以成为著名的“学者”,对一切都要“多学少评”。党和毛主席教育我们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三家村”黑帮却要我们整天读书,钻故纸堆,走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妄图使我们做“三家村”的忠实信徒,做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河北省完县中学学生韩占军)

“三家村”黑帮要我们去学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腐朽东西。他们还要我们学习了这些东西以后,“举一反三”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明明要我们当革命的叛徒,走



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邪道，当他们的接班人吗？这不明明要缴我们头脑里毛泽东思想这支枪吗？我们要警告“三家村”黑帮，不管你们怎样配合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举行进攻，我们都不怕。在我们工农兵脑子

里，已经有了一部毛泽东思想的雷达，你们这伙披着羊皮的狼，早已在萤光屏里现了原形。你们只要把屁股一翘，我们就知道你要拉屎。现在，你们的狼尾巴已经被我们揪住了，要想逃脱，那是妄想！（金业亮）

六、“三家村”反革命集团跟着现代修正主义的拍子跳舞

“三家村”黑帮这一伙牛鬼蛇神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怀着同一个鬼胎，那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们死心塌地为资产阶级效劳，为帝国主义充当马前卒。（江苏省常熟县练塘中学学生贾祖兴）

“三家村”黑帮完全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穿一条裤子，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诬蔑我们的大跃进，“三家村”黑帮同他们的反动言论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三家村”黑帮以讲笑话、说故事为幌子，打着“红旗”，披着进步的外衣。他们更加阴险，更加狡猾。（赖文青）

“三家村”黑帮攻击谩骂我们党，恶毒地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冲着无产阶级开火，冲着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开火，替资产阶级分子鸣锣开道，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一个调子。“三家村”黑帮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给蒋介石搭桥，给现代修正主义修路，妄想让我们国家变颜色，妄想叫我们

翻了身的人民重新回到苦难的日子里去。这完全是白日作梦！“三家村”黑帮不过是大路上的一粒小土块，历史的车轮一定要把他们压得粉碎！（北京市南线阁中学学生冯荣喜）

“三家村”黑帮含沙射影，攻击我们党“白命不凡”，“把老师一脚踢开”。这些话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赫鲁晓夫不就曾以“恩人”、“老师”自居，骂过我们“狂妄”、“忘恩负义”吗？赫鲁晓夫定下拍子，“三家村”黑帮跟着跳舞。其目的，就是要我们服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生谈光云）

“三家村”黑帮用黑话、鬼话来攻击“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断，是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唱一个调子，配合世界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垂死挣扎。他们越是挣扎，我们就越要打得狠。我们要乘胜追击，把中外一切反动派打他个稀巴烂。（江苏省盐城县北蒋公社北蒋大队女社员卢招娣）



七、挖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根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的消息刚一传来，我们石景山钢铁公司安装公司一片沸腾。我们衷心地热烈欢迎这一英明而伟大的决定。

目前，全国正在面临着一派大好形势。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对党中央，无限信任，无限敬爱。我们是首都的钢铁职工，我们要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们保证做到永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举起千钧棒，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要把所有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三家村”彻底捣毁，戳穿纸老虎，捣毁黑线，砸碎黑店，打他个落花流水。（石景山钢铁公司安装公司团委副书记 鹿德元）

我们坚决拥护和热烈欢呼党中央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和成立中共北京新市委的英明决定。

历史的车轮是谁也扭转不了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谁也反对不了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谁也反不倒的。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是

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永远紧紧地跟着党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旗，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石景山钢铁公司设计处冶炼科第二组全体工作人员）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热烈地庆祝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新的伟大胜利。

工人同志们说：“党中央这个决定，称了我们钢铁工人的心。北京新市委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对修正主义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三家村’这伙反党黑帮，多年来霸占着北京市委的领导岗位，这次毛主席党中央罢他们的官，真是大快人心。”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革命人民最爱毛主席。不管‘三家村’黑帮们的地位多高，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我们就要坚决斗倒他。谁要与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对，和人民作对，我们就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把他们拉下马，罢他们的官，不准他们搞修正主义。”（张富）

“三家村”黑帮和它的根子前北京市委，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本营。他们布下了许多条黑线，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安下的“定时炸弹”，是妄图使中国走向修正主义的坏根子。他们幻想有朝一日来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党，篡军，篡政。要是真让这帮坏蛋掌了权，可就了不得。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拿起锄头，坚决把这伙黑帮和它的根子连根锄掉，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果实，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现在，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邓项田、邓万田）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个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着整个北京大学。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师生，在首都和全国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声援和坚决支持下，斗志昂扬，贴出了千万张大字报，开了无数次批判大会，向一切牛鬼蛇神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陆平、彭珮云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革命群众运动的急风暴雨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其他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也被揪了出来。他们已经陷入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丧钟敲响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牛鬼蛇神们虽然已陷入重重包围，但他们仍然是要顽抗的。这些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敌人，同革命的无产阶级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他们必然还会继续玩弄各种阴谋诡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运用这个阶级斗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继续斗争，战胜一切牛鬼蛇神，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克明、夏剑勇）

我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

北京，我们虽然远离你的身边，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你，时时刻刻都在警惕地保卫着你。因为你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工作在那里。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是具有最强大的战斗力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三家村”黑帮终于被人民捣毁了，它的根子也终于被挖出来了。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任何敌人休想动我们分毫！人民革命的浪潮是永远前进的，一切妄想阻挡革命前进的牛鬼蛇神，都难逃灭顶之灾。

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流毒，必将彻底肃清，长期以来扎在北京市委、北京市其他部门乃至全国各地的修正主



义根子，必将彻底挖出来，消灭掉！（解放军某部一分队全体指战员）

“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和他们的根子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这帮家伙是笑面虎，是大阴谋家，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他们篡夺了北京市委的领导权，把持了一些报刊、一些部门、一些学校，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活动的工具和基地，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夺取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如果让这些家伙的阴谋得逞，就会亡党亡国，就没有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地位。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现在已经从反革命集团手里夺回了北京市委的领导权，夺回了他们所把持过的阵地。这是一场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我们热烈欢呼这一胜利。“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一定要彻底斗倒“三家村”黑帮，彻底打垮他们。（解放军某部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

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是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和它的根子的判决书，是促进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动员令，它适时地完全地表达了我们广大工农兵的心情和迫切的要求。我们衷心地拥护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大大地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大地灭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威风。

这必将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解放军空军某部樊桂枝、史中、李焯、陈维德）

我们听到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成立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的消息，心中万分高兴。这个决定完全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充分证明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如磐石般的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打倒了“三家村”这伙黑帮，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后，阶级敌人必然会用更隐蔽、更狡猾的手法，继续进行捣乱和破坏。正如《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所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造思想，不断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谁胆敢再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用毛泽东思想这根威力无穷的“千钧棒”，砸他个粉身碎骨！我们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解放军某部李应治、王连荣）

